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共和国之战 (上)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写在前面的话

这是一部威武雄壮、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也是一曲嘹亮浑厚、激越悲壮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赞歌。它雄辩地证明了中国人民反对侵略、不畏强暴、维护祖国统一和世界和平的正义立场；显示了中国军队英勇顽强、所向披靡的气概。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百多年中，由于封建统治者的腐败，中国人民曾经备受列强的欺凌。“五四”运动后，中国共产党诞生，领导中国各族人民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然而，人类所居住的地球，并没有因为新中国的出现而变得平静。海峡两岸的对峙、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争端，时而急风雷电，时而绵绵细雨，时而雪霜如剑，时而天高气爽。面对变幻莫测的世界政治格局，台海风云，中国政府始终主张处理国家关系必须遵循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特别是互不干涉内政、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本书对建国后中国军队进行的历次战争给予全景式的反映。这些不平凡的历史，不但告诉人们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同时也说明今天的人民政府及和平环境来之不易，它是对全国人民、尤其是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共和国之战

第一章

追歼残敌，毛泽东布下天罗地网。迷幻破灭，蒋介石含恨离大陆。

第一节 开国大典

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

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候。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披上了红纱。下午2时许，百万群众汇集广场。无数红旗，形成红色的海洋，从城楼上望去，让人眼花缭乱。

将近下午3时，毛泽东和其他国家领导人来了。毛泽东左胸前缀垂着红锦缎飘带，飘带的中央有闪着金光的“主席”烫金二字。飘带的下部，剪裁成了燕尾状，随着走动和秋风的吹拂，在绿色服装的衬托下飘舞，真是万绿丛中一点红了。其他国家领导人也都在左胸前佩带着红色锦带，印着不同的职称。虽然他们衣着的色调和式样不很相同，但是不管什么颜色的衣服，佩上这红锦缎的飘带都是光彩夺目，个个精神焕发、神采奕奕。

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则佩带着绿色的锦缎飘带。上面印着“工作人员”、“服务人员”或“记者”烫金字样，这锦缎飘带也就成了走上天安门的证件。

毛泽东带头向天安门北面西侧的大砖垒成的梯道向上健步走去。此时，早就等候在那里的摄影师们，看到毛泽东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向上走来时，立即打开了摄像机的旋钮，一边向上退行着，一边将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英姿纳入了镜头。

当毛泽东带头走上天安门时，设在天安门上的扩音器中放出了播音员的声音：

“毛主席来啦！”

“毛主席健步登上了天安门！”

顿时，天安门上下掌声雷动，如暴风骤雨一般，经久不息。数十万双眼睛一齐射向天安门，身着节日盛装的群众，像盛开的花朵，铺满整个天安门广场，在阳光的辉映下分外娇娆。广场上的红旗在蓝天的衬托下，像彩霞一般随风飘动，人们兴奋欣喜的面孔汇成欢乐的海洋。

毛泽东主席登上城楼后，站在前排的正中。

朱德发布总部命令

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广播里播放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广场上的群众随声高歌。30万张嘴共同唱出的歌声，像太平洋上掀起的狂涛巨澜，震撼着古老的北京城，也是这座古城千年以来所经受的最响亮、最动听、最美妙的声响。

毛泽东向前挪动了两小步，站在麦克风前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在国歌声中，毛泽东亲自按动电钮，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54门礼炮齐放28响。

接着，毛泽东宣读了政府公告，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员，沈钧儒为最高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各项政府机构。

公告宣读完毕，林伯渠宣布阅兵开始。

阅兵司令员朱德身着戎装，威风凛凛地走下天安门城楼，乘敞篷汽车通过金水桥，由聂荣臻总指挥陪同，检阅了 16400 名官兵组成的三军部队。之后，朱德重登天安门，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

《八路军进行曲》中，步兵师昂首阔步走来了；

《军队进行曲》中，炮兵师开来了；

《坦克进行曲》中，战车师来了；

《骑兵进行曲》中，骑兵师来了；

天上飞机一批又一批飞来了……

一位将军睹此情景，不禁感慨万千，对身旁的哲学家艾思奇说：“当年咱们经过雪山草地，几门旧式山炮还得拆下来用肩膀扛着走，而今‘鸟枪换炮’，大不一样了。”

两个多小时之后，欢腾的群众游行队伍来了。首都群众欢呼雀跃，振臂高呼口号。这些口号都是由国庆筹备会于 3 天前发布的，共 30 条。群众欢呼最多的口号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万岁！”

开国统帅的沉思

入夜，开国大典的最后一个节目是采纳苏联顾问建议而决定燃放礼花。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司令员下令：“现在开始施放礼花！”

只见一枚绿色的信号弹腾空而起，随之而来的是火树银花不夜的天空。

盼望已久的北京人民，在那一时刻，胸膛里也绽放出朵朵怒放的心花……

新中国的第一个夜晚呈现出五彩缤纷的美丽景象。

毛泽东穿上了那件棕红色的毛衣，在儿女们的簇拥下，坐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焰火。他泰然自若地享受着天伦之乐，体会着这大业初建的喜悦，恢复着在主席台上站立了五六个小时的疲劳。

五颜六色的焰火，千姿百态。加上焰火腾空的炮声和火花的爆炸声，交织在一起，非常动人。

那腾空的焰火随着一声爆炸之后，向四面八方射出彩花的同时，发出“啾！啾！啾啾”之声，像是百鸟交鸣，又像是百鸟朝凤时唱出的歌声。制花工人真是别具匠心。

从焰火爆炸中心向四周喷射而出成伞状的无数条金色的火花，像金色下垂的菊花瓣，更像是金黄色的线菊，那是“战地黄花”吧！是那些革命烈士将它播种在天空，如今在大典的夜晚将花瓣长长地垂在天安门上！

那是“母子花开”吧！射向天际的花炮在一声巨响之下，飞出无数个小彩球，旋即又一齐爆炸，向天空抛出无数个多彩的花团。

那是七彩花！随着炮响，射入高空的花炮一声爆炸，好像从仙女的花篮里顿时倾泄出无数的七彩花朵，它是哪位女战士的英灵，她把自己的鲜血化作鲜花撒落下来，庆祝革命人民的胜利。

焰火在高空炸开，抛撒出无数闪亮的星光，与天幕上最亮的星群互相辉映，这无数亮星像无数灯火缓缓地飘然而下（灯上带有小的降落伞），像是无数先烈的英魂手执明灯，从九天之上徐徐飘来参加国庆大典的灯火晚会。

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焰火的人们，兴奋地指手划脚地说着，看着。每人对每种礼花都有自己独特的感受。毛泽东的孩子们更是欢天喜地地指着多彩的焰火让他看。

毛泽东坐在藤椅上，面朝广场，香烟不时地被插在嘴中吸上一口，然后又持在右手的中、食指之间，再用拇指固定着。从口角逸散出来的残烟，在他眼前飘绕。他有时在沉思，有时在微笑，有时凝视着前方，有时心不在焉地应付着孩子们的嬉戏。

在这开国大典的焰火之夜，在彩饰一新的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在沉思什么？

这位开国统帅没有忘记，此时，祖国的西北、华南正漫卷着解放战争的硝烟，而西南则还在蒋介石的黑暗统治之下。几十万国民党军队退到大西南，企图利用那里易守难攻的天然屏障和山川关隘负隅顽抗，以图东山再起。

第二节 首次渡海作战告捷

蒋军控制厦门外围阵地

就在开国大典之后的第 17 天上午，一份来自东南沿海的战斗捷报送到了中南海。我第 10 兵团经过两天两夜的浴血奋战，全歼了国民党厦门的守军 27000 余人，为我军渡海作战写下了成功的第一页。毛泽东阅罢电文，轻轻地舒了一口气。

此刻，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国民党残兵败将总人数仍有 200 多万人，分为 7 个主力集团，主要分布于东部沿海地区、中南地区和西南地区，台湾及东部沿海地区已成为国民党最主要的战略基地。国民党海空军的 200 多艘舰艇和 300 余架作战飞机也部署于此。

早在 1949 年 5 月，我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总攻的前一天，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就指示三野总部：“解放上海之后即可迅速进兵东南，提早入闽。”所以，我 10 兵团在解放了上海之后，很快就撤出上海，集结于苏州、常熟、嘉兴一带作短暂休整，进行紧张的入闽作战准备。

一时间，东南沿海成了整个世界为之关注的热点。

在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之前，中央军委尚未将解放台湾问题纳入行动计划。南京城解放之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根据国民党兵力部署的现实，决定立即研究解放台湾的问题。中央军委研究后认为，解放台湾，首先需要解决二大问题：一是迅速建立一支近期可以使用的空军；二是扫清屏护台湾的外围，占领攻台出发阵地。

7 月 10 日，毛泽东致信周恩来，认为：

我们必须准备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空军。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把握更大。我军空军要压倒敌人空军，短期内（例如一年）是不可能的。但仍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远方学习六至八月，同时购买飞机组成一支攻击部队……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提出了一个设想更大的计划：通过向苏联人购买作战飞机和突击培训飞行员，一年内建成一支较国民党空军略占优势、拥有 300—500 架作战飞机的人民空军部队。这一计划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

解放台湾前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扫清屏护台湾的外围，占领攻台出发阵地。为此，第三野战军陈毅司令员将其属下的 15 个军、60 多万人的 4 个兵团进行了战略划分：将第 24 军调往山东攻击由美军和国民党联合驻守的青岛；第 7 兵团准备解放舟山群岛；第 8 兵团警备宁沪杭地区并进行剿匪；最强的主力第 9 兵团在苏南休整训练准备用于以后的渡海攻台；第 10 兵团则负责进军福建，占领攻台出发阵地。我 10 兵团向福建沿海挺进后，捷报频传：

8 月 17 日，解放福州，歼灭国民党 2 个军 9 个师共 39000 人。福州解放后，第 10 兵团很快成立了福州市军管会，由韦国清担任主任，负责接管工作，叶飞率兵团主力继续南下，肃清闽南漳泉地区之敌，尔后再向厦门、金门两岛进击。

这时，蒋介石重新调整了指挥系统，撤销了福州绥署和第 6 兵团建制，

由汤恩伯接任福建省主席兼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厦门分署主任，统一指挥刘汝明 8 兵团、胡璠 12 兵团和李良荣 22 兵团；并将兵力收缩防守厦门、金门、漳州及潮汕。显然，敌人企图凭借厦门海岛的有利地形及原有要塞的永久性工事来抵抗我军进攻，固守厦门作为台湾的屏障。

第 10 兵团由福州挥师南下的目标，首先是解放闽南泉州、漳州地区。南下时，兵分两路，主力沿福厦公路行动；第 28 军两个师由海上前往。派部队由海上走，一方面是要渡海解放平潭岛，另一方面是有意锻炼部队适应海上作战。虽然部队经历了渡江作战，但渡江与渡海作战是两回事。入闽部队都是“旱鸭子”，未见过一望无际的大海，不少官兵一上船就要呕吐。

渡海作战，首先要有船只，部队还必须有航海知识，否则战斗力就会下降。在福建地下党组织和福建人民支持下，28 军于 9 月 14 日攻占大练岛，16 日攻占平潭岛，俘敌 74 军、73 军六七千人。

八九月份正值台风侵袭福建、浙江沿海的季节。正因为台风这一人类尚未征服的怪物，解放平潭时，两个团的部队登陆，突然遇到台风，刮了一整天，敌我双方的船只都被台风吹散了，都不能增援。曾经有过这样的先例，1281 年忽必烈出动 10 万之众攻打日本，是台风吞噬了这支骠悍的大军，致使全军覆没。这是日本史学家称之为“弘安之役”的著名战例。另有，1944 年 12 月，美国海军第三舰队占领菲律宾的明多罗，由于强台风袭击，险遭全军覆没，损失仅次于珍珠港事件。我军解放平潭虽然顺利，但船只却被台风刮散，这就使部队初步懂得了渡海作战掌握气象情况的重要。那时没有气象台，只能向老渔民请教。老渔民经验丰富，一辈传授一辈，他们熟知台风来临的一些预兆。

台风来袭前，一般人看不出问题，他们却把辐射状卷云叫做“扫帚云”、“马尾云”。谚曰：“马尾云，吹倒船。”台风近了，乌云滚滚，谚曰：“断虹现，天要变”。“静海起浪头，渔船快回头。”有时，大风和海浪强烈摩擦，引发“海啸”，谚曰：“东吼叫，西吼叫，台风来到鼻梁梢。”还有“海水发烫，船莫出港”，“海水发臭，台风随到”……天虽有不测风云，人们还是能凭经验预先测知的！

我 28 军解放平潭以后，9 月 17 日又攻下大小痒岛、塘屿等地，完成了预定战斗任务。

我 29 军于 9 月 11 日攻占湄州岛，16 日攻占南日岛，随后主力南下，19 日晨占领马巷，22 日攻下集美，扫清了厦门外围之敌。

我 31 军于 19 日晨攻占长泰，另一路同时攻占同安、角尾、石尾，20 日渡过九龙江攻占海澄、浮宫，25 日解放漳州，先后攻克岛美、城仔丙、东屿、高埔一线厦门外围阵地。

这一阶段，共歼敌 23000 余人，完全控制了厦门外围大陆沿海的阵地，形成了对金厦两岛三面包围的形势。这已是 10 月 1 日的前夜，总部一再催促第 10 兵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解放厦门。

老蒋令汤恩伯死守厦门

厦门岛的面积是 118 平方公里，自然形成南北两半岛。西、南、北三面临大陆，离大陆最近处一海里。岛东南多山，沿岸多海滩和断崖，北半岛为丘陵，地势开阔，沿海多淤泥和峭壁。岛上有日本军占领时期和国民党军构

筑的要塞永久性工事。

厦门岛的西南是鼓浪屿，面积只有 1.09 平方公里，距厦门岛约 700 余米，距大陆最近处约 1000 米。四周多为礁石陡壁，能登陆地段较少。

守敌为汤恩伯集团 55 军、166 师及从漳州方向逃来的 68 军余部，总兵力 3 万余人。

具体部署是：以齐装满员的 74 师 3 个团守厦门北半岛；以 181 师守东南面；以 29 师一个团和要塞守备总队、68 军残部等守厦门市區；以 29 师两个团守鼓浪屿。

在阵地编成上，分有前沿阵地、主抗阵地和纵深核心阵地，阵地内的工事大部分为钢筋水泥结构。前沿阵地铺设雷区、铁丝网、鹿砦、外壕，构成要塞环形防御体系。为了给困守厦门的官兵壮胆打气，国民党军政首脑接二连三由台湾来厦门“巡视”，还由台湾派员劳军慰问。汤恩伯、刘汝明、毛森等吹嘘厦门防御“固若金汤”，“守三五年没有问题。”

虽然福州战役，泉、漳战役顺利，但我军对渡海作战攻取厦门这个要塞，仍进行了充分准备，生怕在入闽取得一连串的胜利之后出问题。蒋介石严令汤恩伯死守厦门。过去日本人在厦门构筑的防御工事非常隐蔽，与海礁、岩石的颜色差不多，非到近处不能发现。一点不夸张地说，我军从来还没有打过如此设防的岛屿。敌人离台湾又近，又有海空军，我军却没有海空掩护。虽然当时全国形势势如破竹，但第 10 兵团的领导认识到以木船渡海登陆攻取厦门，这个任务是艰巨的，我军完全没有经验，是不能轻敌的，因为这不是在大陆作战。

我军准备了近一个月，主要是征集渡船。大军渡海登陆，需船数量很大，筹集不易。我 28 军虽有一些船，但在平潭岛吹散了大部分，只好在泉州湾继续搜集补充。29 军也在泉州湾征集船只。31 军则在九龙江征集。但大多数是江船，江船平底出海困难。因船只问题，不得不把攻击厦门、金门的时间推延了 3 天。

原定作战方案是厦门、金门同时攻击，这是兵团 9 月 26 日在泉州召开的作战会议上所确定的。

会上提出：“金厦同取”、“先厦后金”和“先金后厦”三种方案。军事上，金厦一般是并称，金门厦门唇齿相依，相邻并列，扼台湾与大陆海上交通要冲，紧紧拱卫闽南大陆，是东南海防要地。会议权衡了三种方案的利弊。

金厦并取——可以造成国民党指挥及兵力火力的分散，使其顾此失彼，可求全歼；但征集船只问题一时难以解决；

先金后厦——可以形成对厦门的完全包围，暴露厦门的侧背防御弱点，便于乘隙攻击；问题是厦门国民党军已有逃跑迹象，先攻金门，厦门的国民党军就有可能逃走，不能全歼；

先厦后金——当面敌情清楚，距离近，便于准备，攻击易于奏效，但一旦厦门攻下，金门的国民党军可能逃跑，不可能全歼敌军。

权衡再三，兵团领导认为：国民党军虽然在拼命作顽强固守的准备，但也显露其恐慌动摇的心理。

比如，汤恩伯部后方和厦门补给司令部移到小金门，巡防处也从厦门移至金门总部；军级以上指挥机关移至军舰上办公；技术兵团等撤往台湾。等等迹象来看，汤恩伯并没有坚守厦门的决心，应该趁敌军士气瓦解之际，一

鼓作气，同时攻下金厦。

会议决定：由 28 军担任攻取金门，29 军和 31 军两军担任攻取厦门的任务。

但是，10 月上旬一检查，29 军只有 3 个团的船只，31 军有 3 个多团的船只，而 28 军只有一个多团的船只！时不我待，兵团领导决心改变原定方案，先攻取厦门，而后攻击金门。10 月 7 日把这一决定电报三野司令部，三野首长指示：

……如考虑条件比较成熟，则可同时发起攻击，否则是否以一部兵力（主要加强炮火封锁敌船阻援与截逃）牵制金门之敌，此案比较妥当……请你们依实情办理，自行决定之。

第 10 兵团决心先攻取厦门。确定以第 31 军及第 29 军攻取厦门，以第 28 军攻取大、小嶝岛，并作攻金门的准备，待攻占厦门后，再打金门。

10 月 10 日，28 军与 29 军一部先后渡海攻占大、小嶝岛，歼敌 3 个多团。

15 日黄昏，我军发起攻取厦门战斗。

厦门战役是解放战争一次成功的渡海登陆作战，是在不宜于航海的台风季节里进攻有重兵防守并有永久性工事的要塞岛屿之战。厦门岛不大，长 13 公里，宽 11 公里。实际上，大岛好打，小岛难攻。岛大，防御工事不那么集中和密集，空隙很多很大，易于突破。岛小，情况就不一样，防卫严密，没有空隙。

叶飞司令员判断敌人反击部队集中在厦门岛腰部，决定渡海登陆，佯攻鼓浪屿，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纵深机动部队南调援救，主攻方向放在厦门岛北部高崎。这是叶飞司令员又一次采取鲁南突围时使用 10 师首先东进以调动敌人向东，然后我主力突然向西突围的战法。当然，这是险着，叶飞司令员一生就用过这两次。

具体作战部署是：以 31 军的 91 师并以 93 师一个加强团，担任佯攻鼓浪屿任务；以 29 军 85 师、86 师和 31 军 92 师，在集美强大炮兵群的火力支援下，从西、北、东北登船，采取多箭头，在厦门北部高崎两侧 30 里的正面登陆突破，夺取高崎滩头阵地，然后向厦门继续攻击。同时，把 28 军配置在大小嶝岛、莲河、围头沿海阵地，监视金门国民党军，并以炮火压制金门进行牵制。

“金厦慰劳团”抵达厦门

1949 年 9 月下旬，台湾省参议会举行每周驻会委员会议的例会（省参议会每半年举行大会一次，每次票选驻会委员 7 人，谢汉儒是连任的委员之一），黄朝琴议长曾作时局的扼要报告，他说汤恩伯部队已从上海撤退厦门，而在大陆被共产党军队追击败退入闽的刘汝明部队，也撤至厦门重整。于是，他宣布说，当局要由省议会、省政府和各界团体代表共同组织一个“金厦慰劳团”携带白银 30 万元，前往厦门和金门前线慰劳军民同胞，由省参议会率领。他并说目前金厦由汤恩伯坐镇指挥，局势已趋稳定。慰劳团团团长由省参议会推派，副团长则由省政府社会处长担任。同时，他希望参议会应该推派一位较为年轻的参议员担任慰劳团团团长。黄朝琴此语一出，坐在他旁边的秘书长连震东（现任“行政院长”连战之父）立即咯咯笑着直指谢汉儒说：“谢

参议员最为适当”。谢汉儒也笑着说：“这是秘书长的预谋吧”。大家就在一阵阵笑声和掌声中通过了谢汉儒代表省参议会担任慰劳团团长。

慰劳团的全称是“台湾省各界金厦慰劳团”，谢汉儒任团长，副团长是省政府社会处长李翼中（原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团员包括农工商各行业代表和随行记者大约 15 人。由于时局的紧张，解放军自挥军渡江南下之后势如破竹，因此，传说慰劳团原有参加的二三位团员临时退出。

慰劳团启程的日期，是 10 月 14 日，全团由台北出发前往基隆，拟乘搭早已起火待发的“继光号”运输船出发，但当团员抵达码头时，“继光号”船长说船发生机件障碍正在修理，要等第二天才能起航。时已近午，慰劳团迫不得已回基隆市区的一家餐厅用餐。就在这个时候，副团长李翼中夫人和家属赶到，坚持不让李翼中随团前往，面带泪水，大家目睹此景，心里都感到沉重。

翌日（10 月 15 日）下午，“继光”轮已修好，慰劳团全体

团员在基隆码头集合，但副团长已另派社会处一位科长黄震球

（其后出任台北市政府财政局长）代理。慰劳团登上“继光”轮后，大约是下午 3 时左右离港，直航厦门。当船离开基隆港时，天空晴朗，风浪不大，但入夜以后，开始摇晃震荡。谢汉儒在海上夜航，整夜不宁，难以入寐。直到破晓时分（10 月 16 日），但见天色黯淡无光，海上浪潮起伏，大家随便闲聊一阵，打发“豆腐掉进灰堆里”的时光。

经过海上整夜的颠簸震荡，未能成眠，精神略感疲惫的谢汉儒身为团长，不能不提醒自己要振作起来。

汤恩伯欢宴慰劳团

慰劳团被招待安置在厦门市大中路的大中旅社。有关官员告诉谢汉儒在厦门的活动日程的安排：当晚汤恩伯总司令在虎头山总部欢宴全体慰劳团，并邀请厦门市国民党党、政、军各界官员作陪。

第二天上午 9 时，在厦门中山公园举行民众欢迎大会，中午由厦门市各界首长欢宴。下午 2 时半，前往前线劳军。谢汉

儒把安排的日程时间转告全体团员，希望大家留意。

慰劳团全体团员，按照有关方面早已安排分配的房间，各

自卸下轻便的行装。时已下午 5 时许，他们都在旅社静候汽车前来接他们前往虎头山汤总部，应邀出席汤恩伯的欢迎晚宴。在这等候的“空档时间”里谢汉儒构思第二天在民众欢迎大会上，以及到前线劳军应该说些什么鼓励民心士气的话语。

已是夜幕低垂的时分，大约 6 时许，汤总部的副官处长派了几部轿车接慰劳团到虎头山的总部。这里原来是谢汉儒家乡邻村后坑的菲律宾侨商杨德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所建的别墅，颇为气派。谢汉儒少时在集美中学读书，周末时常和二三同学来到厦门鼓浪屿游玩，曾数度在鼓、厦往来，海上乘“舢舨”远远眺望别墅，红瓦黄墙，心向往之，可惜攀不上任何关系，无缘到别墅一览风光，心有戚戚焉。今天有缘到此，而别墅也暂作汤恩伯的总部，谢汉儒心里另有一番感受。但夜色一片迷蒙，仍然看不到别墅的风貌，至感遗憾。

当慰劳团一行抵达虎头山总部，进入别墅的大厅时，所有国民党厦门市

党、政、军、警、工、商各界领袖都已到齐，筵开数席，谢汉儒被安排在汤恩伯主人席的对面座位上，其余团员被安排在其他筵席座位。汤恩伯的左边是“东南行政长官公署”政务委员雷震（傲寰），右边座位是福建省主席方治（希孔）。宾主和席坐定后，立即端上菜看，谢汉儒不会喝酒，以茶代酒先向汤恩伯致谢忱，然后向各界领袖表示谢意。

席间气氛颇为严肃，但宾主间彼此还是谈些台湾和厦门的时局鳞爪。当上第二道菜肴时，突闻炮声隆隆如在左右，而且是若断若续的发射。慰劳团的代表，因初到此间，突闻炮声隆隆，不免有些惊愕。时雷震立即堆满笑容向大家说：“没有关系，炮击是常事，但炮弹是打不到虎头山的，大家可以安心。”大家听雷震这一说，只有装成安心了。

大约过了数分钟，在炮声仍然不断的发射中，楼上有人急速下楼向汤恩伯耳语。汤恩伯以沙哑的声音微笑着说，要到楼上听电话，马上回来。果然，他听完电话又下楼来了。这时炮声不断隆隆地响着，汤恩伯若无其事，谈笑风生，态度非常镇定。但当端上第四道菜的时候，楼上又有人来向汤恩伯耳语，汤又再度离席上楼，而在这关键时刻，炮声忽然停止了。

汤恩伯第二次上楼之后，久久未见下楼，而后炮声又起，发射过来的炮，有啾啾的声音，好像越过了虎头山，紧接着电灯全部熄灭。宴会无法继续，赴宴人员急急走出别墅，似乎有点慌乱，但还好，没人被推倒或被践踏。

慰劳团蛰守旅社候消息

出了大门，天空布满着愁云惨雾，云里似乎有微弱的月光，就是不能从云端里突围而出。慰劳团一行“身在异乡为异客”，一时不知所措，幸好汤总部的副官处长仍然用数辆轿车，摸黑把他们送回大中旅社，并且安慰他们好好在旅馆休息，万一有紧急情况时，会把他们带到安全地方。事后，慰劳团才知道，汤恩伯二度上楼后没有再下楼来，是因为前线军情告急，传闻那时共产党部队不但占领了鼓浪屿，而且已在厦门市高崎方面登陆成功，汤恩伯已离开总部前往前线指挥。

回到旅社，一片漆黑。电灯虽熄，但旅馆房间备有蜡烛。谢汉儒基于责任上应有的担当，立即集合全体团员，指出情势的严重性，紧急情况随时都会发生，希望大家在旅社静候汤恩伯总部的消息，如果在厦门有亲友的话，更希望不要外出，以免在紧急情况发生时失去联络。

谢汉儒回到房间，心情十分沉重，面对微弱的烛光，独自躺在床上，思潮不断起伏。突然忆起了对日抗战期间，日军轰炸厦门时，他从临海的大千旅社逃出时，差点被敌机扫射正着的情景，不禁打了个寒颤。晚间遭遇的，不是敌机的扫射，却是中国人对自己人的炮击，心里感觉非常复杂。

在担惊受怕中的时间似乎过得特别慢，慢的几乎使人心跳停止。全市是一片死寂，谢汉儒躺在床上，除了听到不时传来的枪炮声外，面对房间的玻璃窗外，看到时断时续闪烁着的强烈火光，谢汉儒心知肚明，那是鼓浪屿内厝澳方面激烈战况的火光闪烁。他意识到战况的激烈，也意识到危机就在刹那间，心里感到烦乱，但毫无办法。

谢汉儒看看腕表，已是深夜 11 时许，突然旅社的人叫他听电话，谢汉儒希望有好消息。原来是厦门警备司令打来的，他说：“很抱歉，让大家受惊了，请大家放心，如遇紧急情况，我们已有万全的措施。”谢汉儒谢了他，

同时立即把他的话，逐一告诉各团员。有些团员正在烛光中打“唆哈”来缓和紧张的气氛，打发时间。

慰劳团守在旅社中，把安危交给汤总部。心里暗自思量，并乐观的想道：“我们慰劳团带来了30万白雪银元的慰劳金，而且全体团员都是台湾各界的代表，即使在最危急的关头，应该在安全上有优先考虑。

外面的战况如何，慰劳团的团员们蒙在鼓里，但听到不断的枪炮声，总觉得凶多吉少。直至深夜12时许，汤总部副官处长终于来电话告诉谢汉儒，要慰劳团立刻在楼下集合，马上派汽车接送到安全的地方。谢汉儒非常高兴。然后立刻转告全体团员到楼下集合，要准时到达旅社门口。但当谢汉儒逐一点名让大家摸黑上车时，发现竟独缺《自立晚报》记者萧枫，回旅社房间寻找，也未见踪影。据团员说，恐怕是外出访友。谢汉儒心里着实焦急了，“同行同命”，也为了作为“团长”该有的责任，谢汉儒不得不商请接人车队的军官谅解，让车队稍候10分钟离开，希望萧枫闻讯及时赶上。果然，他还不到10分钟即匆忙赶到。这位先生就是李玉阶创办《自立晚报》时期的编辑，数年后，在一次友人的餐会上再度遇上，他再次向谢汉儒称谢，说谢汉儒是他的救命恩人。

车队在凌晨1时左右离开了旅社，迂缓向前行驶，不开车灯，也不能按喇叭。而在匆匆上车的紧张时刻，谢汉儒也未曾向坐在前车的军官查询目的地为何方？

沿途除了偶尔听到从远处传来的枪炮声外，只见天空密布乌云，没有月色，也没有云端的星光，厦门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死寂的城市。

谢汉儒和两位团员坐在另一辆轿车上，跟着前导车行驶，彼此默默无语。大约经过数十分钟的光景，车队在一个旷地上停下来。领导车队的军官先下车来，这里是厦门大学工学院，也就是慰劳团登陆的地方。经过察看，工学院内已是人满为患，里面尽是党政军的家属大约数百人，正准备撤退，根本没法子再容纳慰劳团员，只好人车暂时停在这里休息一下，随行的军官回去了。

看来情况已经非常不好，党政军的家属都集中准备撤退了，可能解放军已经登陆成功，战况一定相当激烈。慰劳团人车停留在工学院的旷地上，有些上年纪的团员经过整夜的紧张，疲惫不堪，多已躺在车上睡觉。谢汉儒独立在车旁，阵阵海风扑面而来，百感交集，这夜真是最长的一夜。偶尔看到发射的信号弹，五光十色，在惨淡的夜空里划下了残忍的记号。

多次转移等候“发落”

谢汉儒表面镇静，内心充满着紧张而无助的情绪，团员中有人担心地问他怎么办。他说此时此刻，只有把生命交给上苍安排。不过谢汉儒对汤总部充满了信心，汤恩伯从虎头山将他们送回大中旅社，此刻又送到这里，对慰劳团一定会有安全的考虑和妥善的安排。

枪炮声随着海风断续飘送，极目四野，大地沉沉。慰劳团就在这旷野里一分分一秒秒地挨过了漫漫的长夜。

突然之间，听到有汽车行进的声音，由远而近，原来从大中旅社送慰劳团到工学院的那位军官又出现了。他叫团员们上车，大家喜出望外，车队又继续开动起来了。慰劳团告别了岑寂的旷野，朝向更具安全性的方向前进，

但这一次的“转进”，命运如何，仍在未定之中。

车队把他们送到厦门岛东边的“何厝”地方，在军官的引导下进入一栋标准闽南建筑的民宅内，谢汉儒看腕表，是凌晨4时许。他们都站在民宅内临“天井”的屋檐下，静候那位军官的“发落”。此时此刻，大家心情舒坦多了，可以看见民宅的烛光，也有一杯热茶可以止渴。

摸黑下滩登船离厦

慰劳团在民宅逗留约10余分钟，军官又出现了。他说不用车了，让慰劳团马上上船去，大家听他这一说，心里都充满了喜悦，因为只要一上船，就是离开厦门战地了。

出了民宅，他们跟着摸黑步行，越过阡陌，走下沙滩。团员中，也许是过度紧张，当大伙儿走下沙滩时，有人跌倒，有人衣裤被某种障碍物刮破，也有位团员小腿擦伤流血。天色还是一片灰黯，在沙滩上感觉到强劲海风鼓起的隐隐约约的滔滔海浪。汽艇泊在沙滩临水的边缘，船头放下一张木制梯子供人上船。团员中，多数习惯都市生活，不谙水性。也许是正在退潮时刻，也许是风大浪大，加以上船木梯不稳，团员中有人跌入海中，变成落水鸡。好不容易，最后总算全部团员都安全上了汽艇。

破晓时分，他们终于登上一艘远远泊在厦门港外的轮船，才知道这艘名叫“锡龄号”，原是汤恩伯于上海撤退时的座轮，现作为“海上总部”之用的。

船上的负责人，引领他们到舱中房间休息。经过餐厅时，看见雷震正躺在餐厅靠边的皮凳上仰面熟睡。谢汉儒想他在昨晚“一夕惊魂”中的遭遇，也够累了。但未见福建省主席方治。经过了15日一昼夜的海上航行和16日晚的紧张惊恐，度过了“最长的一夜”以后的谢汉儒蓦然感到昏眩、口渴、心悸，全身疲乏无力，连声音也沙哑了。谢汉儒警觉到他自己未曾休息过，因此身不由己地躺在舱房中狭小的卧铺上，不知不觉中沉沉睡去……

在昏昏沉沉中，好像听见有人催请到餐厅用早餐，谢汉儒迫不得已勉强起床，和团员们一同走进餐厅。

餐厅挤着好多人。在用餐时，听见邻席的团员用日语谈话，我觉得很奇怪，哪来的日本人？后来团员告诉谢汉儒说，同席有一二个日本人，其中之一，就是日军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现在是汤总部的军事顾问。真有此事？直到几近半世纪以后的今天，谢汉儒还在迷惑中。

从鼓浪屿拉开战幕

10月15日，进攻厦门的战斗从鼓浪屿拉开序幕。

鼓浪屿弹丸之地，由于风景优美如画，素有“海上花园”之称。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纷至沓来，争相在这里划租界、开洋行、建教堂、设领事馆，鼓浪屿成了“万国租界”。

正因为如此，国民党军以两个团的兵力防守此处。

这天下午4时30分，天气由晴转阴，东北风渐起。炮兵依原令提早30分钟开始破坏射击，但命中率不高。6时，我31军两个主攻团，91师271团（即“济南第二团”）和93师277团4个一梯队营的船队，扬桨鼓帆，从

海沧湾、沙坛湾，鱼贯而出，逆风行舟，分别驶向鼓浪屿。船队出江口入海湾后，东北风越刮越猛，波涛汹涌。战士和船工协力搏风击浪，一会儿波峰，一会儿浪谷，缆绳拉断，桅杆打折，力挽狂澜，奋勇前进。船队航至距岸 200 米左右，鼓浪屿国民党守军开始以猛烈的火力拦阻。50 多岁的船工张绵娘，同丈夫和三个儿子划两只船。在离岸 100 米处，丈夫和小儿子中弹倒下，她顾不得上前去扶他们，接过船舵，一边继续驾船，一边鼓舞战士们奋勇杀敌。

9 时 30 分后，突击船队开始单船零星抵滩登陆。因为风浪大，部分船只被风吹回，大部分船只也没能在预定的突破口抵滩，整个登陆部队在滩头遭到重大杀伤。

攻破汤恩伯“海上堡垒”

11 时后，91 师组织 3 个二梯队营起渡，因为风浪大，船只大部分又飘回，只有两个排登陆上岸。尽管情况严重，突击部队的官兵仍然奋力拼搏。在济南战役中荣获“青年战斗模范班”称号的 271 团 1 连 8 班，抵滩时遭敌火力严重杀伤，班长丛华滋高喊口号，带领全班勇猛突击上岸。271 团 2 连一个排单独于鼓浪屿西南面岩石下登陆后，在副团长田军指挥下，连续炸开鹿砦、铁丝网，突入滩头地堡。这时，7 连 2 排也打上来，两个排合力继续向里突进。91 师炮 2 连在抵滩时，船只被击沉，指导员赵世堂率领 10 余名战士强行涉水登陆，突入前沿阵地，直插日光岩西侧制高点，最后剩他一人，仍然坚持战斗。

官兵们英勇顽强的战斗，果然造成了汤恩伯的判断错误，误认为鼓浪屿是我军的主攻方向，以为我军夺取鼓浪屿后，会从鼓浪屿直攻厦门市區，立即将他掌握的预备队一个师投入鼓浪屿，包围了我军登陆部队，并将其控制于厦门腰部的机动部队南调，战斗更为激烈。我军战士无愧于英雄称号，顽强战斗，直至全部壮烈捐躯，终于牵制了敌人，威慑了敌胆。官兵们洒满鲜血的阵地，以后命名为：英雄烈士山。解放后，叶飞每次去鼓浪屿，总要去凭吊一番，向烈士们表达敬意。

就在我军以有力一部强攻鼓浪屿之后，我 29 军两个师，31 军一个师的先头登陆部队，于当日午夜 12 时，分别由北、西、东北登船起航，于拂晓前登陆夺取高崎滩头阵地。

具体部署是：31 军 92 师由西段的东渡至石湖山间登陆突破；29 军 85 师由中段的高崎至西侧的石湖山和花屿间登陆突破；86 师由东段的钟宅至花屿间登陆突破。东北风对我军从厦门北面登陆是有利的，船队顺着强劲的东风，在茫茫夜色中箭一般地驶向各自预定登陆突破地点，对高崎发起一线攻击。

在西段，92 师两个营率先抵达预定登陆点石湖山、寨上。谁知这里是一片宽约 1000 米的淤泥滩，正逢落潮，一脚踩下去，淤泥陷没膝盖，又被国民党军发觉，以密集的火力封锁。274 团 3 营 8 连在副连长、排长和 7 班、9 班班长负伤的紧要关头，8 班长挺身而出，指挥全排剩下的 12 名战士，攻下山腰地堡，坚守阵地，又苦战 4 小时，打退敌军 5 次反扑，最后在兄弟连队策应下，夺取了山头。战后，这个排被授予“厦门登陆先锋排”的光荣称号。但是部队陷于淤泥，处于险境，幸好 29 军在岛两侧登陆成功，策应他们迅速通过泥滩，继续向寨上攻击。至 16 日晨，92 师有 4 个营胜利突破了石湖

山、寨上一线，占领了前沿阵地。

在中段，29军85师从高崎和神山两处同时撕开口子。高崎是扼守厦门岛北部的重要卡口，国民党军在这里以重兵据守，自吹是“海上堡垒”。但是，我军主攻部队的船队趁夜暗秘密地，在高崎东侧的白莲尾、湖莲一线抵滩，先头班越过堑壕时，国民党守军才从酣睡中清醒过来。经过激战，16日晨6时，这个“海上堡垒”土崩瓦解。同时，另一主攻团也在高崎西侧的神山前沿抵滩，随即攻克神山。

奋战两昼夜解放厦门岛

在东段，86师在钟宅、下马一线登陆。这里多陡壁，经人工削修，高达三四丈。我两个营在夜色掩护下，顺利登上陡壁。国民党军起初还以为是自己人哩！发现不对后，国民党军以坦克、装甲车为前导进行反扑。苦战数小时，258团2营只剩下50余人，仍然坚守海滩阵地。

16日拂晓前，第10兵团的突击部队在20多里的进攻正面上，全线突破了国民党军在厦门北半岛前沿一线的防御，并迅速地向周围扩张，沿岸建立了稳固的登陆场，至当日上午9时，北半岛登陆即告成功，夺取并巩固了高崎这个最主要的滩头阵地。后续部队陆续登陆，在高崎集结。上午11时，汤恩伯慌忙把已南调的机动部队北调向高崎反击，被我军一举击溃，我军即由高崎向厦门本岛追击，纵深发展。

战后，被俘的国民党74师中将师长李益智说，从我军进攻北半岛开始起渡直至抵滩登陆，国民党军一直被鼓浪屿方向的登陆战所迷惑，放在岛腰部的机动部队，始则左顾右盼，继而南调增援鼓浪屿，北半岛就只有挨打了。他还说：没有想到你们从石湖山攻下来，从来没有想到你们这样打厦门。

据说：1841年，英军进犯厦门，是从沙坡尾一线登陆；1938年，日军侵占厦门，是从五通道、浦口一线登陆。

解放军却选择钟宅至石湖山多泥滩多陡岩地段作为主攻方向，实出他们意料之外。

我登陆部队击溃敌人反扑之后，士气旺盛，不顾疲劳，乘胜猛插纵深，抢占要点，后续部队争先恐后，源源不断地从各突破口上陆。16日下午，推进到岛腰的仙洞山、松柏山、圆山和薛岭山一线。

这一线山头是南北半岛的天然屏障。抢占这一线山头，就控制整个北半岛，并可以以此作依托，向南推进。

位于中段的松柏山，是卡住厦门南北交通的咽喉。午夜至黄昏，汤恩伯调集一个师的兵力，向我反扑，即被我军击溃，敌222团团长当场毙命。最后，特务头子、厦门警备司令毛森把他的特务营用卡车运载，急速赶来松柏山，进入山口后，我军将其截住，未等他们跳下卡车，即将其全歼。

16日黄昏，被我击溃的国民党军狼狈不堪地向南溃退。我军的部队虽很疲劳，但抓紧时间喝水、吃干粮。一见敌人，就像下山虎一样，勇猛追击。

汤恩伯知大势已去，带了一部分人向海上逃去。他们用报话机直接呼叫兵舰放下小艇接应。这时，适逢退潮，船只难以靠岸，急得他在海滩上团团转，直跺脚。这情况，我军从监听的报话机中收到了，听得非常清楚。叶飞也使用报话机，命令追击部队迅速向厦门港追击，活捉汤恩伯。但是我军追击部队只顾追击敌人，不向后方联络，报话机呼叫数次不通。汤恩伯在海滩

上足足停了一个小时才喊到小艇，夺路而逃。由于我军在追击中不注意通讯联络的毛病，被汤恩伯逃掉了，真是可惜！

10月17日上午11时，战斗结束，厦门岛和鼓浪屿全部解放，宣告了16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殖民者和帝国主义列强任意蹂躏厦门的岁月一去不复返了。驰名中外的“海上花园”从此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漳厦战役自9月16日解放平潭岛开始，至厦门解放，计一个月整，共歼敌1个兵团部、1个要塞司令部、2个军部、7个师及其他部队，共5.1万余人。

金门慰劳“残兵败将”

早餐后，谢汉儒虽然疲惫不堪，但慰劳团是否就此结束回台，谢汉儒不能不找“东南行政长官公署”政务委员雷震会议。正在此时，福建省主席方治冲他而来。他劈头就说，慰劳团马上要改乘另一艘轮船，继续前往金门劳军。原来“锡龄号”轮船，仅是作为他们用早点的补给站。

金、厦一衣带水，少顷，慰劳团在金门岛登陆。

他们没有休息，立即展开劳军工作，但首先的慰劳对象却是昨晚从厦门撤退到金门来的部队，他们无所选择的，就在野草丛生的旷野上休息，有的坐着，有的正在酣睡，军装不整。谢汉儒服见这些成百成千的“残兵败将”，痛苦无以复加。

谢汉儒因声音沙哑，面对昨晚和慰劳团同遭“一夕惊魂”的部队兄弟，说不出内心的痛苦感受，只好请由副团长黄震球代表致慰问之意，同时也请方治为部队兄弟“加油”。

在金门前数天，慰劳团走遍金门全岛，所到之处，但见黄土滚滚，满目凄凉，令人伤感。为了“鼓励士气，振奋民心”，慰劳团拖着疲惫的步伐，完成了慰劳的全程。

慰劳团归返台湾，在高雄码头靠岸，正拟登岸时，有10余名宪兵上船要押解“人犯”。谢汉儒从随船来台的某军官口中获悉，宪兵上船是要“陪同”刘汝明登岸的，谢汉儒这才知道原来刘汝明是和他们同船回台的。据说刘汝明的被扣押，除了他的部队入闽时的军纪败坏被人告发外，对于厦门在一夜之间变色，也要负一部分战败责任。

回到台北，大有恍同隔世之感。仅仅一星期的音讯断绝，不但参加慰劳团团员的家属们，急得如锅上蚂蚁，就是有关机关，也是关怀备至。省参议会秘书长连震东，在音讯断绝期间，曾到谢汉儒家里慰问致意，盛情可感。凑巧的是，当谢汉儒率领慰劳团于10月16日抵达厦门时，当晚对岸率领共产党军队进攻厦门的司令员，竟是叶飞——他的表兄。

第三节 胜利之师受挫金门

捷报声中叶飞说：“此役必胜！”

厦门大捷对 10 兵团特别是叶飞司令员是一次巨大的鼓舞。叶飞司令员应厦门市委的请求，命令 10 兵团兵团部由同安渡海进驻厦门，协助厦门市委主持接管工作，并命令兵团后勤部在 10 月底以前，筹措大米 400 万斤，柴草 600 万斤，以保证部队和厦门市民的生活供应，攻击金门的战斗交由第 28 军前指执行。

素有“小叶挺”之称的叶飞司令员，由于被繁杂琐碎的地方工作牵制了大部分精力，而未能像过去历次战役一样，亲自分析、检查、准备，而且被胜利喜悦激励着的叶飞司令员，竟以如下不切实际的理由说服了对这一决定有担心的韦国清政委的疑问：“你太多虑了，我的大政委，厦门是敌人有永久性设防工事的要塞，守军是号称‘小白崇禧’的汤恩伯集团，兵力充足，有海空军支援，已被我军攻克；而金门岛弹丸之地，又没有什么坚固工事，守军名义上是一个兵团，实际上不过 20000 残兵败将，说实话，要不是蒋介石严令固守，李良荣早在我军攻克厦门之际就弃岛南逃了。我用一个主力军加 29 军的两个主力团攻金，已是富富有余了。再说原作战部署本来就是由 28 军攻金的嘛，没有必要再改变部署。我还是那句话：此役必胜！”

粟裕提醒三点事项

进攻金门的任务由我 28 军 82 师全部、84 师 251 团、29 军 85 师 253 团及 87 师 259 团共 6 个团的兵力担任。

28 军是 1947 年 4 月由原八路军山东渤海军区的地方武装升级组建的华东野战军第 10 纵队发展起来的。

29 军原是 1945 年 11 月由原新四军苏中地方武装建立起来的第 7 纵队，1947 年初升为华东野战军第 11 纵队，主力北撤山东后留在苏中敌后进行游击战争。

在解放战争中，28 军脱颖而出，以善守称著；29 军以前缺乏打大仗的锻炼，在进攻上海时，三野的首长有意将其布列于主攻方向，使其积累一些经验。总的说来，这两个军的官兵已具备了攻坚作战的能力，但这两个军和全军其他部队一样，没经过两栖作战的训练，而且，被胜利激励着的部队也没有对两栖作战的困难进行充分的论证。更为严重的是，官兵们根本不了解潮汐、船舶等因素在两栖作战中的影响力。

国民党驻守金门岛的是第 22 兵团第 5 军和第 25 军以及刚从台湾调来的第 201 师，拥有 8 个团 2 万人。其中，第 5 军原是国民党的“五大主力”之一。不过，第 5 军的老部队已在淮海战役中全军覆没，现在的第 5 军是其残余及征招新兵而重新组建的，且在厦门战役中，其 166 师已基本被歼，剩下的第 5 军军部和第 200 师约 3000 余人据守在小金门。第 25 军是一个屡战屡败的部队，早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该军即被歼于碾庄，后在福建重新建军，又在我进攻福州的战斗中基本被歼，残部逃到金门时仅缩编成一个团，之后，国民党空军又将机场警卫部队编成 40、45 两个师，与原 25 军残部一起重新成立了 25 军。

刚刚从台湾调至金门的第 201 师是原青年军部队，是抗日战争末期蒋介石以“十万青年十万军”为口号组织起来的，其待遇、装备均较其他部队优越，被蒋介石视为心腹嫡系。

此外，金门岛还有一支装甲部队，即国民党战车第 3 团第 1 营，该营于 1949 年初组建，其主要成员均是从双堆集包围圈和华北战场上逃回的装甲兵人员，该营拥有重 15 吨、配置一门 37 毫米炮的美制 M5A1 坦克 21 辆，是反登陆作战强有力的力量。

战前分析，国民党在大金门岛和小金门岛各驻军 17000 和 3000 人，其中，新兵又占多数，只有 201 师和战车营是较有战斗力的部队。当时，金门岛上虽然抢修了一些防御工事，但这些工事防御能力并不强大，多是成一线配置的野战土木工事。

28 军前指受命攻金后开始了渡海作战准备工作。然而，由于国民党从大陆沿海撤退时，对渔民的船只大肆破坏和掠夺，所剩渔船寥寥无几。这使我军准备渡海作战船只发生困难。直到 10 月 24 日才搜集到集中一次可航渡 3 个团约 8000 人的船只，这离 10 月 18 日下达的进攻金门作战的部署命令的总攻时间——10 月 20 日已推迟了 4 天。

10 月 18 日下达了作战部署命令，其时，兵团包括叶飞司令员在内的不少领导到达厦门才 4 天时间。命令要求：以我 28 军 82 师全部、84 师 251 团、29 军 85 师 253 团及 87 师 259 团共 6 个团的兵力分两个梯队进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直插小金门。这一命令所要求准备的船只实际上直到真正发起总攻时也未完成。

由于无法筹措到一次性渡运 6 个团部队的船只，第 28 军前指作出了如下一个过于理想化的预想：第 1 梯队登陆 3 个团，纵使有部分损失，船只返回时第 2 梯队、第 3 梯队还可以再航渡 3 个团，这样总共可有 6 个团大约 13000 人登陆。

这预想未料到这些新筹借的船只的船员大多是外地人，对航道不熟，又未经统一施训，故指挥调度十分困难。也未考虑敌情和海情的变化，敌人随时可能的增援，更未考虑国民党海、空军较为强大的作战能力。况且，在厦门之战结束时，金门守军已经得到了胡璉兵团 18 军的增援，岛上国民党总兵力已达 30000 人。

国民党总部不仅命令胡璉兵团 18 军增援金门岛，而且还不断派兵增援。这一态势已为 10 兵团领导所觉察。当解放金门的计划上报到主管华东野战军作战事宜的粟裕副司令那里时，粟裕曾特别强调了如下三点：

- (1) 以原敌 25 军 108 师 12000 人计算，只要增敌 1 个团也不打；
- (2) 没有一次载运 6 个团的船只不打；
- (3) 要求苏北或山东沿海挑选 6000 名久经考验的船工，船工不到不打。

然而，过于轻敌的 28 军领导和 10 兵团领导却轻率地认为，只要能在大规模增援之敌还未立稳脚跟前攻占小金门，就能赢得战役的胜利。

叶飞司令员在胡璉兵团已到达金门岛时仍以为胡璉兵团还在海上徘徊，认为此刻发起登陆进攻是一个战机，如有延误，金门的情况很可能发生变化。于是，在未审核 28 军作战命令的情况下，召集兵团作战处长、情报处长和福建省有关人员仅凭 28 军的一纸电报进行研究，仓促地批准了第 28 军于 24

日晚攻击金门的战斗。

第一梯队仓促登陆

一场并没有经过细致研究,又缺乏渡海船只的两栖作战就这样在24日晚7时开始了。

28军第1梯队登船完毕后,军前指曾一度犹豫,再次向兵团请示:是否按原计划行动?

而怀着捕捉战机心情的兵团领导传来不容变更的指示:决定不变!

24日深夜潮涨之时,由28军82师244团、84师251团和29军85师253团组成的进攻金门第一梯队分别从莲河、大橙岛、后村等地启航,原计划中的82师指挥所因船少而未参加第一梯队的登陆作战。

由于渡海前各部队没有进行协同演练,所以,登陆船队一离开码头,即与上级指挥所失去联系,而且在航渡中遭到国民党炮火拦截时,登陆船队间又缺乏协同作战的经验,一些船只已在航渡中被打散。

尽管如此,我第一梯队的3支登陆部队在25日凌晨2点分别登陆成功。左翼244团在金门岛蜂腰部北岸琼林、兰厝间登陆成功,抓获国民党官兵100余人,占领了敌十多个碉堡;中路的251团先头营在金门岛西北部的安歧以北、林厝以东顺利登陆后,后续营的登陆却遭到敌炮火的猛烈袭击,伤亡近三分之一;右翼253团在西北角的古宁头、林厝间顺利登陆后,随即向敌发起进攻,于拂晓前攻占了古宁头滩头阵地。

我第一梯队登陆是较为顺利的,但除了右翼的253团3营巩固了登陆场地外(后来的事实表明,253团3营巩固的登陆场,为整个登陆部队后来坚持3昼夜的抗击创造了极为基本的条件),3支登陆部队没有统一的指挥,在“有几个人打几个人的仗,不等待,不犹豫,向里猛插”的战术思想支配下,兵分几路向纵深处猛插狠打,在突破了敌第一道防线之后,于拂晓前攻至西山、观音亭山、湖尾、湖南高地及安歧、埔头一带,之后,又乘胜向敌第二道防线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第一梯队登陆成功之前,28军前指已分别安排了3名军部参谋负责组织船队返航。临行前,28军副军长握着3位参谋的手说:“你们别无其他任务,你们的任务就是组织和督促船队抵滩登陆后迅速返航,切记!切记!一定要迅速返航!”

可是,登陆部队成功登陆之后,船队却没有返航。

原来,第一梯队船只登陆时,在早晨2点钟左右,是涨潮的最高峰。国民党军原先设在海滩的障碍物多被潮水覆盖,许多船只冲到障碍物的上面,船底被挂住了,部队被迫在障碍物中下水,而船只却一时难以动弹,加上当时敌人的火力较猛,船工们纷纷躲避,各船抵滩也有先有后,3位参谋的叫喊声被巨大的枪炮声淹没了,只有等待我军攻占了滩头阵地后,才能将到处藏身的船工召回返航。可谁也没有想到,我军还未站稳滩头,大海就已开始退潮,而且退得极快,当三位参谋发现退潮时,潮水已经退到10米开外。

这几十艘返航的船只在离开金门岛时,就遭到敌滩头的排炮袭击,不少船只被击沉、击伤,后来,船队又遇到了国民党海军军舰的拦截,从古宁头返航的船队又莫名其妙地误驶入敌军舰潜伏区,后又被我军情报船误为国民党的增援船队,而后竟离奇地被我军布置在厦门湾、石码一线的远程炮群全

部击沉。

25日上午6时，萧锋副军长，85师师长兼政委朱云等心急如焚，已经放亮的天空一片惨烈的景象留下了：指挥员们隔海看到了在敌军轰炸和炮击中燃烧的船只，原定运送11000人登岛作战的第二、第三梯队计划已经难以实施。无可奈何之中，他们向兵团领导请求援助。请求立即派船只支援，可此时哪里还有什么船只？

老蒋不惜代价守金门

我军的强打猛攻给国民党的守军以极大的杀伤，为了保住台湾岛的前沿阵地，为了给台湾岛留下一个屏障，蒋介石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金门岛。

25日凌晨4点，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司令黎玉玺少将受命率舰队旗舰“太平”号自澎湖基地开往金门岛增援。黎玉玺到达金门之前，已令驻守金门岛的国民党海军进行海上封锁，敌202号扫雷舰、“南安”舰驶入古宁头西北岛沙水道，炮击我登陆部队，而“楚观”、“联铮”、“淮安”等舰和“203”号扫雷艇、“15”、“16”号炮艇等则开至大小金门之间，守护大金门的西侧后方。

蒋介石在派海军封锁海面的同时，于25日凌晨4点30分派胡班兵团的18军118师、19军14师、18师52团和11师的一个团在坦克和炮兵的配合下从料罗湾登陆。当时，解放军登陆部队离滩头阵地已达十多里路。胡璉看到这一情况，下死命令将该兵团主力18军投入战斗，来了个反包围，又派迂回部队占了解放军滩头阵地，切断解放军后撤的退路，并用炮火将解放军登陆部队因潮水退却而搁浅的船只全部击毁。

解放军244团团长邢永生带领全团战友一直顽强战斗到25日中午12点，在全团官兵大多牺牲的情况下仍坚守阵地。251团的主力则一直与敌激战到3点。之后突出重围，与古宁头

251团副团长冯绍堂带领固守林厝的两个班的战士，苦战了整整9个小时，打退了敌人的7次进攻。后来，为保存实力，主动突围到古宁头，与253团会合。

我三支登陆部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一齐会合至古宁头与敌激战。整整一天一夜，我官兵滴水未进、粒米未入，而数倍于我的敌人则仗着人多势众，不断地轮换着包围解放军登陆官兵，就这样，战斗一直坚持到25日的黄昏，官兵们借助于夜幕才又赢得一个有利的作战时机。至此，解放军3个团的登陆兵力已损失半数以上，据岛上步话机的报告，第244团仅剩700多人，第251团剩下1200多人，第253团剩余人数较多，但弹药却十分缺乏。而国民党军队在黄昏前又投入较多兵力，企图将解放军首批登陆部队全歼于古宁头，后被解放军借助夜幕打退。

整个金门岛战役，10月25日晚至26日天亮前的一夜是决定整个战斗成败的关键一夜，关于这一夜的重要性，国民党第19军军长刘云瀚于1980年1月在台湾出版的《中外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追述金门之战》的文章中写到：

到了10月25日入夜以后，成为最危险的一夜。因为我军经过了整天激战，所有的控制部队都投入战场，除伤亡相当大外，且多感疲劳，……甚至胜负之数还未易言。幸好由

于匪军没有船只，无法继续航渡来援，所以我们能够平安渡过这最危险的一夜。

弹尽粮绝全军覆没

当时，面对隔海的金门岛我 10 兵团和 28 军前指的指挥员心急如焚。10 兵团领导机关一面研究作战对策，一面再度派人搜罗船只。虽经多方努力，所汇集的船只只够载运 4 个连的兵力。28 军前指领导认为，以如此少的兵力“添油”式的增援，于事无补，还不如派船去尽量多撤运一些人回来。可兵团领导这时仍求胜心切，认为还有挽回局面的一线希望，基于此，28 军前指决定由已内定为 82 师副师长的第 246 团团长孙玉秀率该团 2 个连及 85 师的两个连增援金门第一梯队登陆部队，并决定

由孙玉秀负责整个登陆部队的指挥。

25 日夜间，国民党部队最为担心的就是解放军进行后援，因而派飞机在海面上巡逻，并投掷了大量的照明弹，“太平”号旗舰也率两艘炮艇往返巡行于古宁头以北的海面上，拦截一切从大陆来的船只，并不断向大陆及古宁头方向炮击。

面对如此困境，孙玉秀带领 4 个连的官兵，不顾炮火袭击，机动灵活，利用夜幕的掩护躲过了国民党海空军的巡查，终于在 25 日凌晨 3 时分别在湖尾乡和古宁头登陆成功。

4 个连分成两部分，从湖尾乡登陆的是孙玉秀带领的 246 团的 2 个连，他们一登陆即歼灭了国民党军 1 个营，随后又向双乳山一带推进，并积极与第一梯队取得联系。从古宁头登陆的 85 师 259 团的 2 个连，一上岸就走进被国民党部队封锁了的区域，他们只得利用火力占领了几个碉堡，然后依据这些碉堡顽强抗击了整整一天；打退了国民党部队的一次次进攻，直到 26 日夜间弹尽粮绝而失利。

26 日凌晨，我第二梯队登陆的孙玉秀与第一梯队登陆部队取得了联系，当时，第 244 团团长邢永生、第 251 团团长刘天祥和第 253 团团长徐博都向军前指报告，说部队受到很大鼓舞，并一致拥护孙玉秀统一指挥。

在孙玉秀的带领下，246 团的两个连很快突破了敌人的封锁，来到古宁头，与第一梯队会合，不过，由于第二梯队增援人数实在太少，众寡悬殊且四面受敌而无法改变战局。

26 日，是我进攻金门岛将士极为悲壮的一天。天亮后，岛上的情况急剧恶化，经过休整的国民党驻岛主力部队又一次在海空军的掩护下向古宁头、林厝、埔头一带猛烈反扑。据当天上午接到登陆部队传来的报告称，我 251 团、253 团现存人数不过数百人。

26 日上午，国民党第 12 兵团司令胡璉赶到金门，和汤恩伯等一起到前线督战。国民党步兵对古宁头久攻不克，胡璉、汤恩伯等要求台湾派飞机对村中建筑猛轰狂炸，再用坦克炮和火箭筒逐一抵近民房射击。即使如此，在我军顽强的巷战、肉搏战的坚持下，敌 3 个师的兵力经过整整一天反复冲击，也未能冲破我军的阻击。

26 日深夜，早已弹尽粮绝，两昼夜未进粒米的我登陆部队已难以支持。孙玉秀、邢永生、刘天祥、田志春、徐博华、陈立华在一个山沟里举行了临时作战会议，鉴于我军登陆的 10 个营已伤亡 5000 多人，已没有完整的连和营，决定将所存部队分为几股打游击，同敌人周旋到底。22 时，28 军前指

在毫无办法可施的情况下，电告我登陆部队，为保存最后一分力量，希望前线各级指战员机动灵活，从岛上各个角落，利用敌人或群众的竹木筏及船只，成批或单个越海撤回大陆，我们沿海各地将派出船只、兵力、火器接应和抢救撤回的人员。

26 日深夜之后，28 军前指与登陆部队的联系逐渐中断。

27 日凌晨，我 253 团团长徐博来电说，该团 1 营 600 多官兵已在古宁头全部牺牲，剩余的 150 多人和 244 团的 70 多人正准备到海边找船，这是 253 团最后一次来电，之后，就音讯查无了。

251 团团长刘天祥最后一次同军前指通电话说，我的生命不长了，为了革命没二话，祝首长好。新中国万岁！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刘团长的话还未说完，耳机内传来一阵爆炸声，刘团长光荣牺牲。

26 日午夜，我登陆部队在夜幕的掩护下向北突围，在海边寻船未获的情况下向东南方向转移，准备到山区与敌人长期周旋。以等待后续部队的到来。到 27 日下午，这部分官兵被敌发现，遂突围至双乳山附近，再度与敌遭遇，激战中，我官兵边战边再次完成突围。

然而，我完成突围的官兵遭到了国民党海军军舰的炮击，这些军舰绕到古宁头北面海上，用舰炮向地面炮火射击不到的死角轰击，在敌海陆武器的夹击下，我有武器的官兵一直战至牺牲，没有弹药的官兵被俘。至 27 日上午 10 时，金门战斗基本结束。

金门战斗结束后，我少数突围成功的官兵仍坚持在山区打游击战，一直到 28 日下午，我军官兵仍在山崖、浅滩处与敌军周旋。在 246 团团长孙玉秀的带领下，悄然到达沙头，遗憾的是，在沙头附近再度被国民党军队合围，在突围无望的情况下，孙玉秀负伤后自尽，其余战士全部被俘。我 244 团团长邢永生负重伤后被国民党军队包围，被俘后不久即牺牲。我 251 团团长刘天祥牺牲后，政委田志春率 50 人打游击，终因弹尽粮绝被俘。我 253 团政委陈立华在打游击中被包围，战至最后牺牲。另据台湾出版的战史称，253 团团长徐博隐蔽在山洞一个多月，靠夜间出来到农田中挖番薯过活，后经国民党部队反复搜山而被俘。

至此，我登陆部队包括船工、民夫在内的 9086 人，无一个投降，除部分被俘外，大都壮烈牺牲。据我军战后得到的消息，国民党军总计伤亡 9000 余人。

叶飞含痛请求处罚

金门之战的失利，引起了全军、全国震动，这次失利在我军战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过去战史上几次失利如长征中的湘江之战、红军西路军的失败及皖南事变损失人数也不少，但却没有一次全军覆没，而这一次，却损失了全部投入作战的 3 个团 9000 多人，竟成建制覆没。

金门失利后的第二天，28 军副军长萧锋和政治部主任李曼村面色惨白、失声痛哭地来到兵团叶飞司令员的办公室，叶飞司令员惨痛地对他们说：“哭什么，哭解决不了问题，现在你们应该鼓励士气，准备再攻金门。这次失利，我身为兵团司令员，由我负责，你们回去吧。”

萧锋、李曼村刚刚离开叶飞司令员的办公室，叶飞就收到了第 3 野战军的批评：“查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最大者，其主要原因是因为轻敌和急

躁所致。”同时要求10兵团“将此次经验教训深加检讨”。当天，10兵团即向3野报告说：“我们检讨造成此次金门作战之惨痛损失原因，主要是我们急躁，被胜利冲昏头脑，盲目乐观轻敌所造成。……直到发现胡璉兵团已开始从汕头船运增援金门。仍要求应在援敌未全部到达时予以攻击，在船只不足的情况下，未断然下决心停止攻击，这是最严重的罪行。”

10月1日，由当时的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张鼎丞、兵团司令员叶飞、兵团政委韦国清、29军军长胡炳云、29军政委黄火星、28军副军长萧锋和政治部主任李曼村参加的10兵团党委扩大会在厦门老虎山洞召开。

萧锋第一个发言：“金门战斗的失利，是领导判断失误，指挥也有失误，是骄傲轻敌的结果，是违背了毛主席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指示，也违背了粟裕首长指示的三个条件。这次失利是我对福建人民犯了个极大的错误，请求10兵团党委、3野前委给我应得的处分。”

叶飞很快就接过他的话说：“金门战斗的失利，主要责任在我，我是兵团司令员、兵团党委第一书记，不能推给萧锋，他有不同意见，我因轻敌听不进，临开船时，在电话上我还坚持只要上去两个营，萧锋掌握好第二梯队，战斗胜利是有希望的。是我造成的损失。请前委、党中央给严厉处分。”

叶飞在会后给陈毅司令员起草电报，并报中央，请求处分，毛泽东主席当时表示：“金门失利，不是处分的问题，而是要接受教训的问题。”

11月8日，毛泽东主席又提出：“以3个团去打敌人3个军，后援不继，全部被敌歼灭，这是解放战争3年多以来第一次不应有的损失。”

中央军委同时命令叶飞总结经验，接受教训，准备再次攻金。

1950年，美国悍然入侵朝鲜，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决定停止解放金门的任务，集中全力剿匪，这样，叶飞将军和我10兵团的将士失去了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

第四节 在大陆的最后时光

成都检阅频出意外

金门一役，似乎证明国民党还有抵抗力量。

尽管 10 月中旬，白崇禧集团的主力被歼于湘桂边境；11 月初，广东全省除海南岛外均获解放；到 12 月中旬，解放军的广西战役也胜利结束，蒋介石“建设台湾、闽粤，控制两广，开辟川滇”计划中的闽粤、两广尽失，只有台湾和川滇了。但蒋介石的专机仍然在台北和川西平原之间来来去去。

蒋介石此时存有幻想，他认为只要在成都平原坚守 6 个月，就可能赢得美国出兵支援，也就会致使苏联出兵支援中共，从而诱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他不但否定胡宗南迅速撤往西昌再转滇越边境的建议，而命令组织川西会战。蒋介石没有想到，他这个决定，最终导致了国民党军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战略集团共 40 余万人的胡宗南集团的彻底覆灭，蒋介石更没有想到，他最后不得不从成都匆匆逃走，永远地离开了大陆。

这是 1949 年 11 月 30 日，中美号专机再次载着蒋介石来到成都。随同前来的有黄少谷、俞济时、谷正纲、陶希圣、蒋经国、沈昌焕、周宏涛等人。

这也是蒋介石自抗战胜利去南京“摘桃子”后 5 年来第二次来成都，头一次是两个月前的 9 月 12 日。

第一次到成都，主要目的是巡视地方，拉拢四川的地方势力派，稳定四川，为他调兵遣将保卫大西南作准备。他在成都的 5 天中，频频接见王陵基、邓锡侯、刘文辉、向传义、王缙绪、熊克武、方叔轩、黄季陆、曾扩情等，并邀他们共进午餐。蒋介石还邀请成都的各界绅士 380 余人出席他的茶话会。他说：“4 年多没有与成都父老见面了，甚是怀念。我要感谢四川人民支持 8 年抗战及 4 年勘乱之伟大贡献。只要大家同心团结，必获最后胜利！”

蒋介石还接见了已故刘湘、李家钰、许国璋、饶国华等原四川军政要人的遗族，并赠若干银币表示关切。蒋介石决心经营四川，决心拉着这些四川的地方实力派同共产党、解放军进行川西决战。

此次在成都，他还调整了黄埔军校的官员，检阅了黄埔军校的学生并作了训示。但事与愿违的是他在训示和检阅中却出了洋相。

检阅前，他训示说：“我们正处在危难时期，你们是我的学生，不出几个月，国军就会实施全面的反攻，今后的党国就是属于你们的了，如今，区区共匪，何足论道，要消灭它，也不过如秋风扫落叶。”说到这里，不知为什么，他开始悲从中来：“我很伤心，我的许多学生背叛了我……希望你们这一期学生要忠于党国……”接着，他语无伦次，老泪纵横，然后喉咙哽咽，嘴也不听使唤了……

突然间，6000 多师生都睁大了眼睛：蒋介石的假牙掉了下来了。只见他张了张嘴，皱了皱眉，显得十分难堪。站在他两侧、身后的随行官员大都十分尴尬，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幸好蒋经国反映敏捷，沉着冷静，不动声色地走过去，弯腰捡起了假牙，并用眼色示意两个侍卫把蒋介石扶到后台去。担任阅兵的总指挥官见此情景，连忙跑上检阅台，调整方队队形，准备进行分列式。

蒋介石的训示就这样未完而终。不料，分列式开始后，又出了事，把他吓了一跳。

当蒋介石重新装好牙齿，擦干泪水，再次出现在检阅台上时，军校的各个方队都已准备完毕，于是，一个个整齐的步兵方队开始从检阅台前通过。蒋介石感到满意，脸上露出了笑容。步兵方队过完后是炮兵方队，这是黄埔军校的炮科学员。蒋介石在 1907 年赴日留学就读振武学校时，学的就是炮兵专业，对炮兵在兵器家族中的地位有足够了解，他希望炮兵在即将到来的川西会战中有上乘表现，便微笑着举起手来向炮队示意。他这一举手不打紧，一台炮车嘎地一声停在了检阅台前，这一突然的情况使蒋介石大吃一惊，也使阅兵的指挥官心惊胆颤，都怕发生行刺事件。

蒋介石在台上不知所措，侍卫们如临大敌，阅兵总指挥手按枪把急忙向炮车跑去。原来，开牵引车的司机见蒋介石向他举起手来，以为蒋介石要说什么，慌乱中踩了刹车，停在了检阅台前。阅兵总指挥官弄清情况后，命令炮车马上开走。可是发动机偏在这时熄了火，司机摆弄着一把电线找不着毛病，急得满头大汗也无济于事，而后面的火炮和牵引车全都停了下来，场面有些混乱。

指挥官见状，只好命令把那辆炮车推出场外，阅兵继续进行，但直到结束，蒋介石一直皱着眉头，未露笑容。阅兵完毕后，他什么也没说，默默走下了检阅台。

蒋介石是 9 月 17 日离开成都的，当他于 11 月 30 日再来成都时，更加黯然神伤，且不说那斗转星移，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宣告成立，他的中华民国已寿终正寝，也不说人民解放军已击溃了看守四川东大门的宋希濂部，重庆危若垒卵，就蒋介石等从重庆逃来成都时的情景足以使他揪心。

蒋经国曾回忆道：

当天（11 月 29 日）下午 4 点钟，父亲突然命令驾车到重庆市区去看一看。那时，重庆市内紊乱不堪，人心惶惶，大有不可终日之感；各机关的人员，纷纷准备逃难，差不多都走空了。父亲的座车首先到了卫戍司令部，谁知偌大的司令部里面，只剩了几个卫兵，还有两个副官，其余的人已跑得净光。父亲就对那位副官说：“你见到杨司令的时候，就报告他，说我已经来过这里。”从卫戍司令部出来以后，父亲又命令把座车开到抗战时期的军事委员会，一路悲凄冷落的情况，难以形容。

在日后公布的蒋经国《危急存亡之秋》日记中这样写到：

二十九日

前方战况猛烈，情势危急，重庆已受包围。而父亲迟迟不肯离渝，其对革命的责任心与决心，感人之深，实难以笔墨形容。下午 10 时，林园后面已枪声大作，我只好向父亲报告实情，希望早离此危险地区。同时罗广文自前线回来报告，知其军力已被匪部击败。而周围各兵工厂爆炸之声又四起，连续不绝。此时山沿林园前，汽车拥挤，路不通行，混乱噪杂，前所未有。故不能再事稽延，乃决定赴机场宿营。途中为车辆阻塞者三次，无法前进。父亲不得已，乃下车步行，通过后改乘吉普车前进，午夜始达机场，即登中美号专机夜宿。

关于蒋介石的“处变不惊”、“安详镇定”以及“革命责任心”问题，台湾学者李敖评论说，因为蒋介石有专机，“有了专机，自然方便异乎常人，任何地方都可以早早的来，晚晚的走，不虑走不成”其实，蒋介石在离开重

庆时还遇到了一些麻烦，蒋经国没有说，一个叫王蒲臣的大特工在悼念毛人凤的文章里透出了一点。他写道：

同年（1949年，下同），8月，我奉命由台赴渝主持训练工作，领袖（指蒋介石）和先生（指毛人凤）都在那里策划部署工作，到了12月初（应是11月底），重庆已经非常吃紧了，先生对我们说：“你们没有任务的人可以陆续先行撤退，不然，将来会走不了的。”我说：“你什么时候走呢？”他说：“领袖在，我怎能走，你们不要等我，万一局势恶化，到了不如人意的时候，我个人只有跟随领袖。”情况一天天紧张，重庆的警察已经撤退了，每一条路的车辆，都挤得满满的，就是领袖的车子也无法通过。那时，先生运用了特种技术，终于将领袖送到安全地带。

毛人凤用什么“特种技术”，王蒲臣没有明说，一般认为是使用了坦克或装甲车。不管用了什么，蒋介石逃离重庆肯定遇到了很大困难，以致在路上耽搁了好几个小时，加上重庆这个国民党陪都的失守，怎能不使他揪心、痛心？所以，11月30日，当他一到成都，就对张群、刘文辉等人说：“完了，重庆失守，那里已是一片废墟，我们离开那里时，国军正在破坏兵工厂，爆炸的声浪把我住房的玻璃都震碎了。”

蒋介石第二次来蓉，主要是布置川西会战。他多次召集顾祝同、胡宗南、王陵基等研究作战计划，虽有多种方案，但基本的想法是固守川西北和西昌，首先在成都附近打一个漂亮仗，迟滞解放军的进攻，再待国际形势的变化，以东山再起。为达此目的，他决心稳定军心民心。

首先，他命令中央银行拿出500两黄金稳定成都的金融市场，使市民可以拿已变得一文不值的银元券来兑换一点黄金（据档案记载：最后全市共兑出黄金135两，其余不知装了谁的腰包，蒋介石也上当受骗了）。

其次，他点名把一些带兵打仗的军官的眷属被拉去当人质，反而使部队更动荡不安。

第三，他命令阎锡山组织“反共救国团”，阎亲任团长，命令黄埔军校招考第24期黄埔生和17期军官训练班。

第四，他要再次检阅黄埔学生，给他们打气鼓劲，谁知这次检阅，又出了一个意外情况。

12月3日上午9时半，蒋介石在张群等人的陪同下走上了检阅台。首先是在“中华民国”“国歌”声中升“国旗”。乐声响起，青天白日旗开始向杆头爬去，歌声咿咿呀呀地唱着，滑轮吱吱呀呀地响着，当那旗就要升到杆顶时，突然，升旗的绳子从中间断了，在杆头的滑轮哗啦啦一阵猛响之后，那旗和半截绳子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一时谁也回不过神来，蒋介石也一动不动地站在台上，愣愣地盯着地上的旗子……

迷信与“国旗”

蒋介石是很迷信的，或许这同他的一些巧遇有关。下面顺举一例。

1926年，北伐军包围南昌城，在离南昌约三十几里的牛行车站，设立总司令部。附近有一小庙，庙里虽然只有几名和尚，但香火颇盛，附近人都相信此庙求签极灵。蒋为了满足一下心理上的干渴，邀参谋长“小诸葛”白崇

禧（桂系军阀三巨头之一）一块到小庙去求签。

侍卫总长宓熙带着几名卫士，走在蒋和白的后面，步进林木飒飒的神庙。众人正准备跨入大雄宝殿，殿门口已走出一位须发皆白的老和尚，乃住持僧。

蒋介石一个眼色，宓熙队长令卫士留在大殿阶下，独身一人跟随蒋总司令和白参谋长上了大殿台阶。住持僧双手合十，口念“阿弥陀佛”，将来客让入大殿。这是一个关帝庙。

蒋介石也不言语，走向香案，从签筒中抽出支竹签，也不看，脸带微笑，仍未说话，顺手递给住持老和尚。这位住持僧看了之后，也不说话，又递给蒋介石。蒋介石看时，竹签上是一首唐代刘禹锡的七绝诗《石头城》：“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蒋介石看了之后，不解何意。

住持僧问：“先生是否来问战争之事？”

蒋介石听他一言说穿自己心思，颇为信服答：“正是请问战事的胜败如何？”

住持僧突然问道：“先生是蒋总司令吗？”

蒋介石张口便答：“正是！”

住持僧竟不知何故看出了蒋介石的身分，一脸庄重之色，说：“此诗乃指明这场战事，于您是大吉大利，于敌是在劫难逃。不过，你于吉中有灾，要防剪刀叉。”

蒋介石先是一喜，继而一惊，不由急问：“老师傅，不知此诗何解，如何主我吉敌凶，又吉中有何灾？”

住持僧详说道：“请施主蒋总司令看第一句为‘山围故国周遭在’，以目前所问，正是如山一样的北伐军，以铁桶般包围了南昌。第二句是‘潮打空城寂寞回’，乃敌军本北洋军阀，而又背靠鄱阳湖和长江，正是城让人占，自己失败而回。所以主您战事定当胜利，敌军定当逃遁。但是，第三句乃‘淮水东边旧时月’，是指敌军并不甘心失败，仍要挣扎，淮水与长江，相交如剪刀，故要防此剪刀叉。第四句则‘夜深还过女墙来’，此签应在半夜有灾，要防止切断后路。这最后一句话很重要，不可掉以轻心，切记！切记！”

蒋介石听说，颇觉有理，微微点点头，让身边的随从副官江志航拿出200元钱，作为卦金，给了住持僧，转身与白崇禧率卫士和随从回营。一到司令部，就让白崇禧打电话，从预备队伍中调了两个团，速至总司令部附近宿营戒备。

蒋介石有了这一准备，仍觉得小神庙求签和住持僧之说是灵验的，又对宓熙布置，增加卫士队的实力。

不知是老和尚真能未卜先知，还是他早已知南昌城内的北洋军要偷袭。当天晚上，也就是在蒋介石将一切布置停当之后，半夜12点钟，困守南昌的北洋军阀孙传芳部将师长卢香亭，派了二个半团，从地下隧道爬出南昌城，偷袭牛行车站的国民革命军司令部。

因求签和听了小庙住持僧之言后蒋介石作好了部署，蒋介石和白崇禧的两支卫队早已森严壁垒，坚守防线，激烈奋战，顶住来犯之敌。接着，两个增援团包围上来，北洋军被打死千余人，俘虏千余人，逃走千余人。

白崇禧为了证实小庙之签，马上传讯卢香亭师守军。问“你是哪支部队？”

团长答：“南昌城内孙传芳部的卢香亭师守军”。

白崇禧问：“你们为什么从地下隧道爬出来？是什么目的？想干什么？”

团长答：“上峰下令，为南昌省城的防守，准备大规模反击，令我们出击城外，切断贵军后路。”

蒋介石看了审讯记录后，沉吟不语。攻下南昌之后，蒋介石特意命令军需长俞飞鹏，让他专程开车到牛行车站附近的小庙，送了一笔巨款，用以修缮庙宇。俞飞鹏当时未去小庙，不知路径，还亲自找宓熙，叫他派一名当时去过小庙的卫士，作为向导。

在成都期间，一些要员们有一种可笑的说法，认为国民党的惨败，不是由于它本身的腐朽和失去全国人心：共产党的胜利也不是由于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和领导的英明，最主要的原因是国民党政府的那面“国旗”犯了错误。因为它是青天白日满地红，象征国民党被共产党所包围，所以弄得满地红。他们建议，立刻把“国旗改过来，改成与国民党的党旗一样，全部是青天白日，而把满地红缩小成为一点红放在白日中间，这样做的意思是用以象征国民党包围和吞并了共产党。如今“国旗”未改，却在检阅台上当着蒋介石的面落地，岂不大大不吉，莫非“中华民国”就此完结了吗？

终于，有人想起还要进行分列式，没有这面旗子是不行的。于是升旗人员连忙放倒旗杆，重新挂好绳子，把那旗子又升了起来。分列式结束后，蒋介石走下检阅台，同受阅学员一一握手，据说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竭力“保卫”成都

晚上他又授意军校给学员们放映电影《文天祥》，以实践他的“不成功便成仁”的训示。

蒋介石此次在成都，还对美联社记者发表了长篇讲话。12月4日下午，蒋介石对美记者慕沙说：

余此次应李代总统之邀入川，正值共军渗入川东，陪都危急……余为国民一分子，并负领导国民革命之责任，唯有竭尽一切力量，不避任何艰险，协助政府，与大陆军民共同奋斗。

重庆沦陷，西南局势更步入艰苦之境，但世界民主各国人士，应和中国大陆反共战斗，不仅并未停止，反而不顾任何代价，一切牺牲，亦日益趋扩大，刻在各地结集军队，使西南反共战斗持久。在铁幕之后，长江流域、浙江、河南、山东、福建及广东等地受共匪压迫之民众，到处蜂起，反对极权主义。吾人对于敌后游击队，刻正助其组织，予以支援。中国共党在莫斯科指挥之下，企图以暴力吞并中国国家，奴役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然中国人民在青天白日旗帜之下，为独立自由而战，绝非暴力所能屈服。吾人现在战于自由区，战于匪区，战于乡村、城市、学校及工厂。

蒋介石这一大段讲话，一是想为自己入川主军主政正名，号称是应李宗仁之邀而来；二是希望美记者能对他所进行的反共战争有个“正确的报道”；三是谈了他对今后反共战争的构想。

蒋介石深刻检讨了国民党迅速失败的原因，他说：“国军”为什么会弄到今天这个信心丧失、精神解体的地步呢？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不是共产党有三头六臂，而是国民党腐败无能，是“自己的弱点击败了自己，自己的自卑感，吓败了自己”。“共产党的力量，在抗战之前，微不足道，消灭已

不成问题，抗战固然给它一个发展的机会，但连它自己也不会梦想到有今天。由于我们的弱点被它抓到了……遂演成我们今天这样溃烂的局面。”

蒋介石还说：“我们要想转败为胜，关键依然操之在我。失败由本身造成，成功亦应由本身努力，只有改造自己，重视自己，彻底更生，坚持信念，才能打败共党。”蒋介石还告诉慕沙：

吾人从未背弃民主国家，吾人在第二次大战中，始终站在反侵略阵线之尖端，吾人今日亦复如此。吾人虽遭受许多挫折，但并不灰心。圣经有云：我已宣拆，虽然自己受害，亦不更改。民主国家如低估中国反共战争之重要性，必将有害其本国安全独立与自由。吾人今后继续为国家独立自由而战，在吾人奋斗之途上或将遭遇更多之困难，但吾人深信反共战争必获最后之胜利。

蒋介石这一番话，自然是说给美国人听的，他希望能重新获得美国政府的支持。

蒋介石二来成都，十分忙碌，竭力“保卫”成都，但成都的形势却在一天天“恶化”，蒋介石不能不作逃走的打算。

12月1日，他把“财政部长”关吉玉和空军司令王叔铭叫到黄埔军校他的住处，严令二人密切配合，把成都现存所有的金银外钞立即秘密运往台湾，蒋介石的担心并非过忧。在解放军大兵压境之时，共产党成都地下组织也十分活跃，正策划炮打蒋介石住的“黄埔楼”和设法活捉蒋介石；黄埔军校也连连出事，使蒋介石担惊受怕很不安生。

由成都逃离大陆

12月5日一早，蒋介石的一个卫士进厕所时，把佩有两支日本式小手枪的腰带随手搭在便所的木门上，转眼便不知去向。有关方面怀疑是有人企图谋杀蒋介石，于是全校进行大搜查，但搜了一天，一无所获。这天蒋介石一直未出黄埔楼，原定去市区的计划也取消了，蒋介石大发了一通脾气。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天夜里12点左右，蒋介石刚刚入梦，黄埔楼下突然响起清脆的枪声，黄埔军校里一时间灯火通明，鬼影幢幢，人声噪杂，奔跑声、吆喝声响成一片，蒋介石的卫队如临大敌，倾巢而出，蒋介石也急急忙忙起了床，连问出了什么事，联想到白天丢失的两支枪，人人都以为这晚要重演西安事变中的临潼惊梦。终于，真像大白。原来是黄埔23期的广西籍学员张宗禹在蒋介石楼下不远处的门边站岗时打瞌睡，迷迷糊糊中，手指压在了已打开保险的扳机上，一梭子弹便冲天而去，使人恍惚在华清池。蒋介石得知详情后，怒火冲天，对刚当上黄埔军校校长的张耀明大骂“娘希匹”，认定军校内有专事捣乱的共党分子，饬令他彻底清查、彻底搜查。据说后来有两个与“共党”根本没有关系的学生倒霉遭殃。

蒋介石此次着实受惊不小。何以见得呢？12月7日吃午饭时，蒋介石要求军校学员立即武装起来，加强战斗训练，校长张耀明立即执行，启封枪弹发给学员，下午就在军校的北门外进行实弹试枪。乒乒乓乓的枪声把黄埔楼上的蒋介石吓了一跳，立即把顾祝同叫来问个究竟。当他知是军校学员试枪时很生气，责备顾祝同为什么要在军校近旁打实弹，顾祝同只好再把张耀明痛骂一顿，命令今后不允许以任何借口鸣枪，“违者枪毙”。当天下午，蒋

介石把王陵基找来，命令他枪杀狱中的政治要犯；当天深夜，成都西郊十二桥边传来了阵阵枪声，把黄埔楼上的蒋介石又惊醒了，他忙把成都的治安官员找去询问情况，当得知是按他的命令枪杀政治犯时，才放下心来。蒋介石的确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了。

黄埔校内虽连连出事，但对蒋介石的真正威胁却是在黄埔校外。

蒋介石到成都来是人所共知的，新闻界有详细报道。于是，中共地下党川西临时工作委员会“留蓉工作部”在蒋介石抵蓉之后，就开始策划一个“擒贼擒王”的重要行动。地下党员唐会昌等人与被策反过来的国民党军团长姜期水准备在黄埔校外的菜地草棚间安一门迫击炮，当核准蒋介石确在楼内时，就轰击黄埔楼，炸它个墙倒楼塌。12月6日，当“炮打”准备工作正紧张进行时，突然有情报说：蒋介石并不固定地住在黄埔楼，何时确在黄埔楼很难把握。“留蓉工作部”党支部书记王逸平觉得事关重大，立即召开支部会进行讨论。一致认为情况有变，冒险太大，炮打之后，无论是否打中，都将招致反动派的大搜捕和大屠杀，这与上级党指示“保卫成都，迎接解放”的根本任务不相符合，决定取消“炮打”计划，并把设在菜园草棚里的迫击炮秘密撤出。

其实，取消原计划最重要的推力是会上提出了“活捉蒋介石”的建议，这个建议的主要设想是：利用已被我地下党策反的国民党军第95军副军长杨晒轩，请其率部控制蒋逃离成都时必经的飞机场，一举活捉蒋介石。于是，“炮打”变成了“活捉”，各项工作又围绕新的任务展开。

蒋介石在黄埔楼里的情况怎么样呢？由于人民解放军二野部队在解放重庆后已到达内江、自贡、宜宾一线，正准备迁回乐山、夹江，包抄成都，军事形势十分严峻，蒋介石不得不在12月7日下令枪杀政治犯同时，命令“政府”迁往台北。12月8日下午，蒋介石最后一次巡视成都市区，沿途所见几乎全是难民和溃兵；12月9日，卢汉在昆明起义，张群、李弥等被扣留，与此同时，刘文辉、邓锡侯等在雅安、彭县通电起义，成都之敌已成瓮中之鳖了。对卢、刘、邓等人的动向，虽说蒋介石早有所料，但当消息传来时仍大为震惊，为应付意想不到的情况，9日夜间，黄埔军校校长张耀明亲到23期2总队布置任务，组织10多个学员在黄埔楼后的城墙下凿了一个洞，作为应急的秘密通道；成都新津机场和凤凰山机场的飞机时刻准备起飞。而此时的成都市内，更是乱成一团，店铺关门，溃兵滋事，想逃往台湾的达官贵人们大多上天无路，怨声载道。蒋介石则连设骗局，一会儿在报上登于8日晨离蓉，一会儿又登于10日下午2时飞往台北。其实，蒋介石一直到12月13日深夜才离开成都。本来，蒋介石还不想走，但潮水般涌来的解放军离成都只有一天路程了，机场很可能被解放军控制，于是这个基督徒也顾不得这个“13”吉利不吉利，在胡宗南派出的配备有10余辆坦克和装甲战车的大批兵力（据说是6个团，未作考证）护送下，冲破武侯祠地区刘文辉起义部队一个团的阻击，直冲新津机场而去。1988年，原军校学员蒲剑虹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们在卡车上边打边往前冲，蒋介石的轿车就紧跟在我们卡车后面，车队一刻也未停，穿过火力网，直开进新津机场”。在那里，蒋介石登上了中美号专机，那飞机迅即腾空而起，很快消失在夜幕中。

蒋介石就这样离开了成都，离开了大陆。

还需交待一句的是，地下党的捉蒋队已万事俱备之时，9日忽见成都各报的通栏新闻：“蒋总裁昨已离蓉飞台。”只好放弃捉蒋计划；10日又见

报载蒋介石于8日下午“巡视蓉市”10日下午捉蒋队再次开会，决心再行前议，正开会间，又有消息说：蒋介石已于中午在凤凰山机场飞台，地下党只好再次放弃捉蒋计划，把工作转到下一步的成都暴动上来。

蒋介石是不愿离开成都的，他大概知道会去而不返的，但他不得不离开，而且再也没能回到大陆来。

第五节 强攻海南岛

毛泽东三次电示四野

海南岛是中国第二大岛，它的面积和战略意义仅次于台湾。对其进攻的难度，远远超出金门与舟山。

首先从地理位置上看：在当时国民党军所占的4个主要岛屿中，它比金门、舟山距大陆都要远。琼州海峡是世界上流速最急的海峡之一。这给渡海航行造成困难。

其次从双方攻防力量上看：攻金门、舟山，渡海距离都在10公里之内，人民解放军的炮兵可以直接掩护航渡和登陆，国民党军的军舰只能在远处以火力拦截；金门岛上当时也没有设备完整的机场，台湾进行空中支援并非易事。可是进攻海南岛则情况不同，由于海峡较宽，不仅航渡距离远，登陆点也在人民解放军的炮兵火力射程之外，无法进行火力掩护，国民党军的军舰还可以直接到中流拦截。在而且岛上还有二十多架作战飞机，可随时直接支援守岛的国民党军作战。四野渡海兵团没有海空军的掩护，航渡工具只有木帆船，是以陆军单独向敌军陆海空三军的立体防御发起进攻。各种困难是显而易见的。

对这一次比攻击厦门、金门规模更大的渡海作战，毛泽东十分关切。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出访苏联，但是在临行前仍研究了金门作战的教训，并于12月18日在途中亲自起草了给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的指示电报。这封电报可以说是人民解放军统帅机关第一次对于渡海作战规律的系统总结。电报强调指出：

渡海作战完全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的经验不相同，即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四、五万人）的全部兵力，与三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立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

电报还举出三野第10兵团在金门战斗的教训是：

于占领厦门后不明上述情况，以三个半团九千人进攻金门岛上之敌三万人，无援、无粮被敌围攻，全军覆灭。你们必须研究这一教训。

毛泽东同时还要林彪向粟裕调查了解渡海作战的全部经验，以免重蹈金门覆辙。

在苏联访问期间，毛泽东一直关注着渡海作战的准备工作。1950年1月10日，他在苏联又致电第四野战军首长，提出“争取于春夏两季解决海南岛问题。”同时又分析了海南岛作战与金门作战的区别：

海南岛与金门情况不同的地方，一是有冯白驹的配合，二是敌军战斗力较差，只要一次运两万人登陆，又有军级指挥机构随同登陆，……就能建立立足点，以待后续部队的续进。

毛泽东电文中提到的冯白驹，是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琼崖纵队是以

1927年9月海南岛农民起义队伍为基础组建的。这支人民武装经历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考验，终于创立了以五指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到1947年10月中央军委授予它“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的番号时，其已辖3个总队共10个团约2万人的作战力量。于1950年初，已解放了占全岛面积三分之二的广大地区，成为支援我军渡海作战部队登陆海南的坚强力量。

在这封电报中，毛泽东又鼓励四野渡海兵团树立赢得海南岛作战的信心。确实如毛泽东所说的，进攻海南岛尽管在某些方面比进攻金门困难，可是也有有利条件。海南岛上的国民党军兵力虽然比金门多，但是由于岛大海岸长，守备分散，可登陆的空隙也多。金门守军胡璉部是国民党残余陆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而海南岛上国民党军的5个军虽多数是老粤军的部队（特别是过去的粤军精华第62、第63、第64军在中国旧军队中战斗力也属上等），但都是在被歼灭后刚刚重建的，装备和训练都不如胡璉部。刘安琪兵团的第32军和新建的第4军在国民党军中也只属于战斗力中等的部队。

2月17日，即毛泽东结束访苏的同一天，他又根据中共中央转到苏联的四野渡海兵团的报告发出指示：

以运输准备确有把握而后动作为原则，避免仓促莽撞，造成过失。

十万将士组成渡海兵团

四野渡海兵团认真研究了金门作战的教训后，在战前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训练。组成渡海兵团的两个军——第40军和第43军，都是有光荣历史的英雄部队，它们同第38军、第39军、第41军一样，都是第四野战军的头等主力。

第40军的前身是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系抗战胜利后进入南满的八路军山东部队组成，成立后在东北解放战争中战绩卓著，是有名的“旋风队”。第43军的前身是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该部是人民解放军历史最悠久的部队。该军第127师最早的前身是1925年成立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34团（后改称独立团，由叶挺任团长），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的一支武装力量，以后参加过南昌起义和井冈山会师，红军时期就是红四军和红一军团的骨干部队，进军东北后也是主力之一。这两支部队过去虽然从来没有水战的经验，但是部队的军事素质较高，士气高昂，在海边又进行了较长时间的实地演练，因而很快就较好地掌握了以简陋的器材渡海作战的要领。

四野渡海兵团经过精心的准备，根据海南岛的具体情况，采取了一系列新的作战方式：

吸取金门作战敌情、海情不明即仓促发起攻击的教训，进行了为时3个月的周密准备，特别是参战各部队进行了登陆和海上战斗的训练，研究了对付敌军军舰和登陆作战的各种办法。吸取金门作战船只不足即实行登陆的教训，在广东全省大量筹集船只，先后征集到4000名船工和2100余艘船只，保证了一次运载10万人以上的登陆部队还有余。吸取金门登陆部队上岸后立足不稳的教训，先以小部队实行偷渡，和岛上的琼崖纵队会合，使大部队一登陆就得到有力的接应，能站稳脚跟并稳步发展。吸取金门作战第一梯队只以少数兵力登陆，以寡击众的教训，正式开始强渡时第一梯队就使用5万兵力，带足弹药粮食，准备不依靠后援独立发展。这样第一梯队上岸后与接应部队一会合，就同岛北面守敌

兵力相差无几，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又高于国民党军，从而确保了陆上战斗的胜利。

薛岳构置“伯陵防线”

当时，国民党设在岛上的“海南防卫司令部”由国民党琼崖保安司令薛岳的属下以及逃到岛上的余汉谋部和“海南行政长官”陈济棠的部队三方组成。辖有陆军5个军共19个师、海军第3舰队及海军陆战队1个团。配备有各型舰船50艘，空军有第1、3、5、20大队，计战斗机、轰炸机和运输机42架。“海南防卫司令部”的三军总兵力约为10万人。虽然在全中国迅速被解放的隆隆炮声中，海南守敌已成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但是，薛岳自恃有海峡屏障，又占据着海空军优势，加紧部署构建环岛立体防御工事，以图长期固守。

薛岳的“海南防卫总司令部”在岛上的兵力分布为：以32军为主编成第一路军，重点担负琼东区的防卫任务；62军、暂编13师、教导师和琼北要塞纵队编为第二路军，担负琼北区的防卫任务；4军、64军编为第三路军，担负琼西区的防卫任务；63军、琼南要塞纵队和海军陆战团编为第四路军，担负琼南区的防卫任务。而其海空军的主力大部配备在琼北地区，以在战事爆发时立即封锁解放军的进攻通道——琼州海峡。

为了保证“后方安全”，薛岳命令岛上守军加紧清剿我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并毁坏我纵队的根据地和游击区。薛岳在琼岛构成了环岛立体防御体系后，曾得意洋洋地用他的字号“伯陵”将这个防线命名为“伯陵防线”，声称其“固若金汤”。

渡海作战兵团根据四野首长关于“派出少数兵力携带电台偷渡一次，取得渡海经验”的指示，决定抓住岛上敌守军抽调兵力“清剿”琼崖纵队，两翼防卫力量相对薄弱的有利时机，安排40军和43军各组织1个加强营的兵力，分别向琼东北和琼西北两侧地区进行偷渡。

1950年3月5日19时，由40军118师352团一个加强营

（共799）人，在118师参谋长苟在松的带领下，乘13艘木帆船从雷州半岛西南端的灯楼角启航。临行前，兵团副司令员兼40军军长韩先楚将一面绣有“渡海先锋营”几个大字的红旗授给该营，使肩负重任的指战员们深受鼓舞。

先遣营的13艘战船起航后，顺风顺流，直向预定目标——琼西北白马井登陆点驶去。然而，当他们距岛滩约30海里时，风突然停止了，木船只能靠人力划桨摇橹而行，航速缓慢，使先遣营按原计划于拂晓前在白马井靠岸的设想不得不改为灵活处置。

在这紧要关头，先遣营的总指挥——118师参谋长苟在松立即下令各船组织好机枪火力，做好应付敌海空军突然袭击的战斗准备。

3月6日拂晓时分，我军战士发现附近有几只国民党军帆船行驶，为了隐蔽行动，先遣营指挥员要求伪装成民船，尾随敌船队行进，当遇上敌海上巡逻机侦察时，战士们便摹仿前面敌船的做法，给予相应的回应。这一招，居然骗过了天上的敌机。

中午13时，先遣营船队终于接近了预定的登陆点，可惜，此时我军已无法隐蔽登陆意图，被岛上守敌发觉，只得与之交手。

海面上，有敌2艘军舰对船队实施猛烈炮击；空中，10架敌机俯冲扫射，

岸上1个营的敌军依托坚固工事进行阻击，妄图在我军尚未踏上沙滩之前，将其歼灭于海上。

我先遣营的800壮士，面对血与火的生死考验，临危不惧，一面勇猛地进行火力还击，一面奋力划桨，直逼岛岸滩头。

14时许，先遣营在火速赶来的琼崖纵队第8、9团的接应下，终于击溃了登陆点守敌的阻击，一举登岛。

第一个渡海先遣营的偷渡成功，不仅极大的鼓舞了渡海作战兵团的士气，而且为后续部队的偷渡及正面强渡都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4天后，由43军128师383团一营及配属的92步兵炮连共1000多名指战员组成的第二个渡海先遣营，在383团团长徐芳春的带领下，分乘21艘木帆船，于当日（10日）13时从湛江市东南方向拔锚起航，扬帆直取琼东北地区的赤水港。

这一次侧翼偷渡，虽然未遇敌海空军的海上袭击，但是却碰上了恶劣天气，当夜海面上风雨大作，狂风卷着巨浪肆虐，使先遣营船队的指战员们同样面临生死考验。

在有的帆篷被狂风撕破、有的桅杆被折断、有的船舱被巨浪击穿的情况下，经过20小时的艰难航行，将士们终于在第二天（11日）9时左右在琼东北地区赤水港至铜鼓岭一带30公里的地段上分散登陆。

43军128师383团1营组成的这支1000余人的偷渡部队登岛后，由于通信联络不便，只好就地分散隐蔽。好在负责接应任务的琼崖纵队独立团与当地群众一起，通过种种努力，设法将部队一批批带到了预定集合地点，并以勇猛动作，一鼓作气突破敌守军一个团的封锁，于12日晨到达文昌地区。

解放军两批偷渡部队的登岛，令吹嘘防御体系“固若金汤”的薛岳气急败坏。他忙调集了6个团的兵力进攻文昌，企图趁我43军渡海先遣营立足未稳之际，一举围歼之。

不久，先遣营果然在潭门一带遭到敌暂编13师1个多团兵力的钳形包围，形势的确对我不利。

战斗打响后，该营2连连长李树廷发现敌37团的团指挥所就在附近山头时，立即派出1个排向其正面发动佯攻，而自己则带领1个班从侧面冲进敌团指挥所，当场击毙该团团长。敌兵失去作战指挥，首尾难顾，在我军战士们的奋勇拼杀中，争相逃命。

就这样，该营在琼崖纵队独立团和当地群众的紧密配合支援下，不仅全歼了敌暂编13师37团的1个营，而且还击溃了这个师39团的进攻。

战斗结束后，这支第二批渡海先遣营部队，很快转往琼东根据地休整，海南解放后，43军授予该营“渡海先锋营”和该营2连“渡海英雄连”的荣誉称号。

惊心动魄的三天大血战

我军两个渡海先遣营偷渡登岛后，虽然为此次海南战役提供了宝贵的海上作战、登陆抢滩以及突破敌军围追堵截等方面的经验，但要接应整个兵团的大规模强渡登岛，仍然显得兵力过于单薄。为此，兵团指挥机构决定，由40军和43军再各派1个加强团，向琼北地区实施正面偷渡攻击。

1950年3月26日傍晚（19时），由40军118师352团主力和353团2

营及炮兵大队组成的第1个先遣偷渡团的3000名指战员，在琼崖纵队副司令员马白山和118师政治部主任刘振华的率领下，分乘81艘木帆船，仍从雷州半岛西南端的灯楼角起航，向着琼西北的临高角一路顺风而去。

但不巧的是，出航仅1个多小时，由于风力骤降，航速减慢，各船只好落下帆篷，由战士们划桨行船。到了下半夜，海面上气温下降，大雾弥漫，数米外便不见人、物，而且此刻潮水流向也发生了变化，致使加强团船队无法继续保持队形，各级指挥员只得依靠手中的指北针判定方位指挥前进。

为了坚决完成正面偷渡登陆作战任务，加强团指挥所命令各营领导，即使在失去统一指挥的情况下，也要以船为单位，只许前进不许后退，那怕只剩下一条船也要抢滩登陆，表示了誓死完成任务的坚强决心。

在一夜大雾的掩护下，到第二天上午5时至8时，该加强团各船先后在偏离预定地点较远的临高角以东20公里宽的滩头地段分散登陆。

方向的偏离，将加强团的指战员们送到了琼岛守敌正面防御能力很强的区域，使他们经受了比前两批偷渡部队更加严峻的战火洗礼。

由于远离预定登陆点，岛上的琼崖纵队一时难以接应，加之所处地形利敌不利我，稍加犹豫或行动迟缓，便有被敌聚歼于滩头的危险。

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饱经解放战争一系列重大战役锻炼的我军广大指战员，人人心目中抱着“枪声就是命令”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耳听目寻，自动朝着枪炮最为激烈的地段靠拢，使登岛部队保持了战斗力。

在战斗中，出现了多起英雄个人和模范战斗群体。其中载入史书文献的即有曾荣获“四平战斗模范排”称号的40军118师352团3营8连2排。他们在营长冷利华的率领下，在琼岛林诗港附近登陆后，立即毫不迟疑地果断攀上两丈多高的悬崖峭壁，一路猛打猛冲，掩护后续部队直向敌纵深防御体系穿插。当敌人的碉堡群的密集火力封锁部队通道时，这个排的迫击炮手朱歧芳沉着镇定地架好炮位，瞄准目标，很快炸掉1座碉堡，并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连续发射24发迫击炮弹，摧毁了这个碉堡群，为保证部队前进立了头功。

与此同时，我军准备在玉抱港附近海岸登陆的20余艘战船，遭到敌海军2艘军舰及数架飞机的猛烈攻击，情况十分危急。这时，只见352团2营4连的2只战船马上转舵，与敌军舰和飞机拼杀，将其火力吸引过来，以掩护主力船队抓紧时间抢滩登陆，这2只船上的指战员打完了最后一颗子弹，以大部分壮烈牺牲的献身精神，为解放海南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尽管担负接应加强团偷渡任务的琼崖纵队一总队和40军先遣偷渡营一时未能接到我军第二批登陆部队，但他们坚决执行命令，在原预定的登陆点与敌军展开了浴血搏斗，牢牢地牵制住敌2个师的兵力，减轻了敌人对加强团的压力，保障了登陆作战的顺利展开。

经过整整3天的血战，第一先遣偷渡团先后攻破和摆脱了敌62军、64军10多个营的层层阻击及尾追，终于在29日晚，在美厚村一带与接应的琼崖纵队一总队汇合在一起。

第一先遣偷渡团成功登陆的消息传来后，兵团决定按原计划由43军127师379团和381团1营共3733名指战员组成的第二先遣偷渡团于3月31日22时30分自雷州半岛东南端的博赊港出发，登陆点选在琼岛海口市以东的铺前港。

第二先遣偷渡团由43军127师师长王东保率领，88只战船扬帆疾驶，

但4月1日凌晨3时左右，在船队穿越海峡中流后不久，即遭到已倍加防范的敌海军1艘大型战舰和2艘小型战舰的拦阻炮击。

一时间，加强团的战斗队形被打乱了，这时与第一先遣偷渡团一样，担负护航任务的“红五连”3只火力船，迅速转舵驶向那艘敌海军大舰，根据多次“木船打军舰”的作战经验，与之展开了“贴身战”，在距离其50米左右时，3只火力船上的战防炮、迫击炮和所有轻重武器一齐开火，并将一串串手榴弹抛在敌舰的甲板及炮位上。

战斗空前激烈，我火力船上的指战员虽然伤亡很大，但他们个个视死如归，死死咬住敌舰不放，打得它火光四起、浓烟滚滚。

大舰挨了打，2艘小舰自然不敢靠近，迫使大舰不得不开足马力夺路而逃。

登陆前的“海战”以我军的继续前进而告结束。不过由于敌海军的袭击，该加强团3营8、9连的船队在战斗中脱离了编队，只顾朝琼岛驶去，却误在敌兵力较强的海口市白沙门岛登陆，结果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在与之血战1天1夜后，大部分指战员英勇牺牲。

第二加强团登陆前，琼崖纵队独立团和3总队1团已于4月1日凌晨赶到了预定接应点北创港与铺前港之间的塔市，全歼驻守滩头的敌守军2个步兵连和一个迫击炮连，紧接着又击溃敌2个团的阻击，于当晚会合加强团进至文昌地区隐蔽。

在不长的时间内，我军两批4支先遣偷渡部队均登陆成功，为迎接大兵团强攻海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大兵团强渡作战开始

1950年4月10日，渡海作战兵团指挥所决定，兵团主力分成第一、第二梯队向琼北实施大规模强渡登陆。

第一梯队由40军主力和43军一部组成，务必于4月13日前集结完毕，待有利时机起航。

第一梯队的登陆点是以海南岛北部的马袅港为界，港西为40军，以东属43军。

兵团要求，第一梯队登陆后，必须迅速夺占并巩固滩头阵地，坚决顶住敌人的反冲击，保证后续部队的登陆安全。

第二梯队由43军主力担任，其任务就是在第一梯队登陆后立即启航，紧跟着“第一冲击波”登陆上岛，协同一梯队歼灭岛上守敌。

兵团还命令琼崖纵队和先遣偷渡部队，当强渡战斗打响后，要积极主动出击牵制敌军，以策应主力部队的强渡。

1950年4月16日下午19时30分，渡海作战兵团第一梯队共5万余人，分乘350只战船，分成东、西两路编队，自雷州半岛南端各港湾同时起锚，以势不可挡的进军态势，直杀海南岛。

船队刚驶离岸边不远，便被敌海上巡逻队发觉，敌机一边打出串串耀眼的照明弹，一边对我军战船进行疯狂的轰炸扫射，渡海作战的开场锣鼓就这样打响了。

战船上的我军指战员沉着应战，除了迅速组织对空火力还击外，还对被打烂炸穿的战船及时在行进间进行了抢修。

“空战”结束后，当天下半夜，敌海军又赶来凑热闹。第一梯队的指挥员们见状，当即命令在编队两侧护航的我火力船队，迅速展开战斗队形，尽量从不同方位接近敌舰，利用其火力死角，来它个“海上拼刺刀”。这招果然颇见成效，前来偷袭拦截渡海兵团的敌舰，在挨了一顿“土炮艇”的机枪、手榴弹之后，只有灰溜溜地在远处乱放一通炮弹壮胆……

第一梯队中的40军护航火力船队的指挥船，航行中因发动机发生故障而脱离了编队，在黑夜中单船飘流，直到天亮时，才观察到1艘敌海军大型军舰追踪而来。为了避免与敌正面交火，他们用篷布将火炮遮盖起来，大多数战士下舱隐蔽，以堆满“货物”的民用运输船的面目来迷惑敌人。

经过伪装的战船主动向敌舰迎了过去，使敌舰放松了警惕。当我战船贴近敌舰右侧时，指挥员黄宇一声令下，炮手们顿时掀掉篷布向其猛烈开炮，一时间30多发炮弹雨点般落到敌舰要害部位，使之起火冒烟，掉头急逃。

“土炮艇”大显神威，居然无意间打跑了国民党海军第3舰队的旗舰——“太康”号，并使舰上的敌第3舰队司令王恩华在激战中身受重伤，不治身亡。

“木船打军舰”的奇迹，一时在我军传为佳话。该船战后被40军授予“战斗英雄船”称号。

一路血战，一夜拼杀，渡海作战兵团终于接近了琼岛。

在抢滩登陆作战中，我军广大指战员冒着敌人的炮火，在浅滩中便纷纷下水泅渡，迅速形成了攻击波。

在琼崖纵队和先遣偷渡部队的策应下，兵团第一梯队于4月17日早上6时，全部踏上预定登陆的地域。

第一梯队上岛后，各部队按战役预定方案向守岛敌军防御体系的纵深扩大战果。40军登陆部队在击溃了敌64军131师2个团的阻击后，又攻克了敌9个地堡群，拿下了临高山，并派出一部分兵力包围了临高县城。

4月19日拂晓，40军118师在美台地区包围敌64军156师师部和1个团，经数小时战斗，将其大部歼灭。同日，40军119师奔袭位于加来地区的敌64军军部，并占领了该地。

43军128师主力登陆后，当即抢占了才芳岭、桥头等战略要点，歼灭敌64军1200余人，包围了花场港守敌。

薛岳慌了手脚，抽调4个团的兵力增援福山，妄图防止我军继续推进，威胁其首府海口市的侧翼安全。

福山守敌在此之前曾欲向北出动，被我127师先遣偷渡团阻截，与128师主力一道将其击溃，一举夺取了福山。

至此，琼北地区沿岸各要点，完全处于我军控制之下，为第二梯队的登岛，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而薛岳面对我大军压境，居然仍旧认为是共军的“小部队偷渡”，尤其是他在对我128师实施了反包围之后，以为稳操胜券，甚至放出狂言“登陆共军即将被全歼”，连在海口市召开所谓的“祝捷大会”的会场也布置好了。

然而，随之而来的一连串沉重的打击，无情地粉碎了他的美梦。

10 万大军全部登岛

第一梯队的我43军128师登陆后，直接威胁到敌心脏机构——海口市的

安全。

4月19日，薛岳调敌62军集结于澄迈地区拦截，同时命海口市的敌32军252师驰援该地。

4月20日清晨，我128师在澄迈县城以北与敌252师师部及所属的2个团相遇，128师先敌动作，当即将其包围，展开攻势。这时，我43军127师先遣偷渡团已进至美仁地区，占领有利地形，准备打援。

薛岳见其252师主力被围，急令62军和暂编13师、教导师及25师的另一个团直扑我128师，又在我军外围构成了一层包围圈。

负责指挥整个渡海作战的我15兵团司令员邓华在分析敌我态势后，决定趁敌主力部队围攻43军登陆部队之际，在澄迈及其以北地区迅速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围歼战，以求将薛岳主力一举歼灭。为此，指挥部一面命令43军登陆部队坚守阵地，顶住数倍于己的敌人的反扑，一面命令40军主力战胜饥饿疲劳，飞兵东进，尽快将围攻我128师的敌军再围它一层，同时还指示琼崖纵队三总队及独立团部队，积极协同登陆兵团主力作战。

4月21日拂晓，敌62军等部在飞机大炮的支援下，开始向我128师阵地发动猛攻。128师在这种情况下，果断以少量兵力抗击外线敌军的围攻，而将主力集中于内线，抓紧时机力求尽快歼灭已被包围的敌252师主力。

为了配合128师的战斗，127师先遣偷渡上岛的379团在琼纵3总队和独立团的协同下，顽强顶住了敌62军2个团的多次轮番进攻。而先遣上岛的381团1营1连，在战斗中连续抗击了敌军从1个排到1个营的猛烈冲击，牢牢坚守住了阵地。

在向内线敌252师主力发动强攻的激烈战斗中，我军382团3营7连向敌一处核心阵地攻击，数次受阻，全连只剩下1名排长和6名战士。在这时，副师长孙干卿直接指挥，营长刘连科用机枪掩护，冒着炮火硝烟冲入敌阵，将疯狂吐着火舌的地堡一一炸毁，占领了这一敌人阵地。战后，刘连科和刘万成被43军授予“战斗英雄”称号。

在128师全师上下英勇奋战之际，40军接到兵团命令，于19日夜间即率主力7个团从加来、多文地区出发，沿途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马不停蹄地赶往澄迈县城。到达该地后，即又兵分两路北上，于21日17时抵达美亭东西两侧地区，将围攻我128师的敌军严密包围起来。

这时，战场态势出现了包围与反包围、内线与外线犬牙交错的复杂局面，在战斗中，敌我双方都不敢开炮，许多地方展开了短兵相接的肉搏战。

4月22日，兵团命40军、43军与琼纵3总队独立团向敌发起总攻。在我军强大猛烈的攻击中，薛岳这才弄清楚与之作战的并非“共军小股偷渡部队”，为避免主力全部被歼，急忙下令其残部向海口市退守。

此次场面壮观的琼北围歼战，我渡海第一梯队全歼敌32军252师，重创其62军、暂编13师和教导师等薛岳的主力部队，彻底捣毁了其环岛防御体系的核心阵地。

4月23日清晨，我40军119师一部协同43军128师，于琼山地区一举歼灭敌62军2个师的大部，击毙62军少将参谋长温轰，攻占了琼山县城。上午8时，40军118师与43军127师先遣团一道向海口市发起攻击，但敌守军已于22日夜间逃窜，我军未遇抵抗即占领了海口。

攻占海口后，渡海作战兵团第二梯队于23日19时开始启渡，于24日凌晨1时至4时左右在海口市以西的天尾港沿岸登陆。至此，参加渡海作战的

我 10 万大军全部登上了海南岛。

薛岳眼见其苦心经营的琼北、琼东各防御体系及指挥机构顷刻间土崩瓦解，溃不成军，遂于 22 日下令全线南撤。

其情势为：第一路军撤往乐令、万宁地区；第二路军残部撤往陵水、保亭地区；第三路军余部撤往北黎、八所地区；第四路军和海、空军集结于榆林、三亚地区。

薛岳在部署三军南逃方案后，同时又致电台湾，要求火速派舰船来琼接运残部撤离海南。这两道“使命”完成后，他即于当晚与岛上的军政要员们乘机开溜了。

海南之战堪称奇迹

薛岳残部分路南逃后，我渡海作战兵团即部署部队分东、西、中三路大军展开追击战。

从 4 月 24 日开始，40 军主力和 43 军 128 师、琼纵 3 总队、5 总队及独立团组成东路追击部队，经万宁、陵水两地直插榆林、三亚地区，以切断敌退路。

这场比谁跑得快的战斗，我军打得游刃有余。也许是残敌自知大势已去，几乎没有哪个部队敢停下脚步负隅顽抗，他们唯一的希望是尽快逃到海边，坐上军舰也如他们的最高长官薛岳一样，到台湾去避开这场充满战火硝烟的噩梦。

这样一来，我军在连续作战、毫无休整、极度疲劳的情况下，依然士气旺盛，个个奋勇杀敌，人人力争夺功。40 军 118 师的 1 个加强营，乘缴获敌人的汽车沿东线环岛公路展开追击，到第 2 天上午追上一股敌军，当即抓获 2000 余名俘虏，其势犹如牧民赶羊。

4 月 27 日早晨，靠“铁脚板”追击的 118 师，在万宁地区截住敌 32 军大部 and 62 军残部，并在该地的乌场港内对正在往 4 艘赶来接运的敌舰上撤退的敌军发动攻击，当即击伤其中的 3 艘，抓获敌兵 3000 余人。

40 军 119 师在大追击中歼灭敌 62 军 151 师师部及 2 个团的残部，俘虏中将副军长兼 151 师师长韩潮及其官兵 800 余人；并于 30 日上午占领了敌空军在三亚的机场。

43 军 128 师在陵水的新村港截歼候船逃跑的敌军 2000 余人，并乘胜占领了榆林、三亚两港。

西路追击部队由 40 军 118 师一部组成，水陆并进，配合中路友军追歼敌第三路军。中路追击部队由 43 军军部率 129 师及 127 师 380 团组成，该部在远距离追击作战中，克服种种困难，昼夜兼程，终于在 4 月 30 日赶至小岭、北黎、八所地区，将敌 4 军 286 师和 90 师 1 个团截住，在西路友军和琼纵 1 总队的协同下，将其全歼，捕获敌 286 师少将副师长邱国梁及其官兵 3500 人。

1950 年 5 月 1 日上午，我军占领北黎、八所，海南岛全境获得解放。

在这次解放海南的渡海作战行动中，我军共歼灭敌军 5 个师 9 个团，总计 33148 人，其中俘虏 26469 人，缴获火炮 418 门、飞机 4 架、坦克和装甲车 7 辆、汽车 140 辆，击落敌机 2 架，击沉敌舰 1 艘，击伤 5 艘。我方伤亡 4614 人，其中 400 余人是在海战中牺牲的。

第六节 万山群岛之战

指挥所决定先取马湾

1950年5月初海南岛被我军解放后，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立即紧急部署万山群岛的防御战体系。

万山群岛位于广东省珠江口外的香港与澳门之间，控制着进出港、澳的主要航线与珠江的入海口，扼广州之门户，为南方海上交通要冲，是中国南部的一个海防要地。它由48个岛屿组成，其中主要的有：垃圾尾（今桂山）、外伶仃、东澳、三门、大小万山岛和担杆、佳蓬列岛等。

桂永清将败退的国民党海军与原驻守该群岛的地方部队纠合组成“万山防卫区”。司令部设在垃圾尾岛，由原驻守海南岛的国民党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齐鸿章指挥。计有护卫舰、扫雷舰、登陆舰和炮艇30多艘，其中大部分舰艇和陆战队主力集中在垃圾尾岛，部分驻守担杆列岛，李崇诗的“广东突击军”的1200余人则分驻担杆列岛、外伶仃、大小万山和东澳等岛屿。他们企图依仗其海上优势兵力，“控制万山，封锁海口，策应大陆，准备反攻”。

根据中央军委和中南军区关于解放万山群岛的指示，负责万山群岛战役的联合指挥所由131师师长刘永源、副师长邵震、参谋长张怀礼、政治部主任李长如和广东军区江防部队副政委黄若萍、参谋长李怀章、政治部主任邓楚白等人组成。第15兵团副司令员兼广东江防部队司令员洪学智担任总指挥。指挥所设在中山县唐家湾。

参战部队有：四野44军之131师392团、393团、132师炮兵营、广东军区江防部队、珠江军区炮兵团、中南军区炮兵100毫米加农炮连、50军无坐力炮连和130师炮连，总兵力为10000余人。

此外，海上作战力量的配属有炮艇5艘、登陆艇16艘、运输船8艘，总吨位不足1000吨。尤其是广东军区所属的江防部队，可称得上“军舰”的舰艇，一为原美国制造的步兵登陆舰——“桂山”号，排水量358吨，舰上装有40毫米火炮2门；另一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制造的登陆舰——“国楚”号。其余的都是型号不一的小炮艇和小登陆艇，有些炮艇上连航海仪器、海图和通讯工具都没有，只好分别用指南针、普通地图和陆军用的报话机来代替。而艇员则大多数来自陆军部队，他们不仅不懂航海登陆作战的战术技术，有的甚至连大海也没有见过。

第15兵团领导人分析了敌我形势，认为岛上的国民党军大部为刚从海南岛溃退下来的，立足未稳，难以形成统一指挥。我江防部队虽是新建的，力量薄弱，缺乏海战经验，但有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登陆部队是广东战役的胜利之师。于是决定：乘岛上国民党军立足未稳，迅速集结部队，积极准备登陆作战，力争早打快打；首先使用舰艇部队，利用夜航奔袭敌舰泊地，实行近战、夜战，将其打乱；尔后掩护登陆部队登陆前沿各岛，逐岛攻击，依岛攻岛的打法，战胜优势装备的国民党军，解放万山群岛。

联合指挥所根据战区的敌情地形，制定了突然奔袭，逐岛攻击，稳步推进的作战方案，战斗分三步实施。

孤军突入猛然袭击

垃圾尾岛是万山群岛中的一组重要岛屿，位于珠江口东侧，是广州、黄埔及珠江各港出海的门户。拉权尾岛有个天然良港——马湾，国民党守军的主要舰艇都停泊在此港湾。因此，攻击该岛是解放万山群岛之关键战斗。

5月25日凌晨2时，第131师之第392、第393团各1个营、山炮1个连及配属的火炮10余门，乘16艘舰艇和8艘民船，组成火力船队和登陆运输船队，由唐家湾隐蔽出航，直逼敌占岛。

分别担任火力船正副队长的392团副团长郭庆隆和江防部队炮艇副队长林文虎，率领步兵登陆舰“桂山”号和炮艇“先锋”号、“奋斗”号、“解放”号、“前进”号、“劳动”号，兵分两路同时进攻垃圾尾岛敌海军舰艇锚地，以掩护步兵船队在该岛附近的青州、三角岛登陆。但是，由于船队指挥员缺乏经验，加之航海通讯设备不齐全，航渡中，各船队先后失去了联系。

凌晨4时许，担任掩护登陆运输船队的火力支援舰“解放”号在后续舰艇没有跟上的情况下，首先突入垃圾尾港内。在敌我力量异常悬殊的情况下，担任“解放”号指挥的林文虎，果断指挥该舰隐蔽地冲进马湾。

此时，正值黎明前的暗夜，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解放”号顺利地驶进了停泊着30多艘国民党海军舰艇的马湾港内。

林文虎利用出敌不意之机，突然对国民党海军舰艇实施近战猛烈袭击。集中火力向国民党海军第3舰队的旗舰“太和”号射击。“太和”号排水量为1240吨，装备有40毫米火炮8门、20毫米火炮12门。而“解放”号是一艘小炮艇，排水量只有28吨。“解放”号由800米打到100米左右，打得“太和”号舱面中弹起火，国民党第3舰队代司令兼万山防卫司令齐鸿章被击成重伤。战斗中，国民党海军登陆舰“中海”号也中弹起火。火光中，只见被击伤舰艇的甲板上，国民党海军官兵慌乱成一团，舰艇被打得倍头转向，仓皇外逃。

这时，由392团副团长郭庆隆指挥的我军步兵登陆舰“桂山”号闻声赶入港口，郭庆隆当即组织舰上火力对准备外逃的敌艇实施阻截。

天明雾散后，港内国民党军发现港湾内只有解放军的2艘小艇，便立即组织港内舰艇上和岛上的火力进行还击，受伤逃到港湾口的“太和”号和“中海”号，也调转头来向“解放”号射击。

“解放”号在敌人密集火力轰击下，艇身多处受伤。战斗中，当艇上的无坐力炮的炮架被打坏时，炮手张和鸣毅然以自己的身躯支撑着的人的炮身，保证火炮的连续射击。然而，很快艇上的前主炮又发生了故障，炮手张云飞在战位上排除故障时不幸中弹倒下，林文虎见状独自冒着弹雨上前抢修，但也壮烈牺牲。

“解放”的19名人员，这时已伤亡了13人。艇长梁魁庭不顾自己负伤，镇定地驾驶着炮艇边打边撤，巧妙地冲出密集的火网，安全返航。

“解放”号冲出重围后，“桂山”号便遭到国民党军舰艇的集中炮击，在舰体多处中弹严重受伤的紧急情况下，郭庆隆当机立断，决定抢滩登陆，“桂山”号冒着弹雨，拖着浓烟，冲向滩头，终于在垃圾尾岛钧庭湾抢滩成功。

“桂山”号上的50名陆军指战员，跳海登陆。随即同岛上国民党军陆战队展开了战斗，突破了守军的前沿防御。郭庆隆指挥战士们冲上岛岸，与国民党军激战，攻下了一个个地堡，并击溃守军的多次反扑。尔后，守岛的国民党军第208师，连续组织大部队反冲。二连副连长康绍文在腿被打断后，

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郭庆隆在多次负伤的情况下，仍然挣扎着开枪射击，最后英勇牺牲。登陆的解放军虽经多次英勇拼杀，最后子弹和手榴弹打光了，就同国民党军展开肉搏战，终于寡不敌众。26日晚，第392团趁敌海军舰艇主力从垃圾尾岛港湾撤走之机，迅速占领了垃圾尾岛。

27日，第392团以1个加强排，配属2门山炮，攻占了大头洲岛。

28日，第392团又相继攻占了赫滩岛和大、小蜘蛛岛（今大、小蜘蛛岛）。

至29日，解放军胜利完成了万山战役的第一步作战计划。攻占了上述岛屿后，随即进行抢修工事，并投入第二步作战的准备工作。

攻占大、小万山诸岛

垃圾尾海战后，台湾国民党当局企图迫使解放军撤出，一面命令其受伤舰艇返台，同时又增派10余艘舰艇，由马壮谋任指挥，增援万山群岛，企图封锁海面，袭击解放军运输船队，切断运输线，以阻止解放军攻占其他岛屿。

29日23时，我江防部队509号登陆艇为登岛部队运送物资航行至青洲、三角山岛西北海面，遭到国民党海军舰艇拦截。509号艇指战员，当即开炮还击，迫使对方后撤。

30日下午，国民党海军又派4艘舰艇进至三角山岛以西海面，向解放军守岛部队进行炮击。解放军守岛部队沉着应战，将国民党军舰放进来，在进到距2海里距离时，一齐猛烈开火，击伤了国民党海军舰艇3艘。敌军舰见事不妙，赶快狼狈撤退。

31日，解放军第393团以1个加强排的兵力，占领了东澳岛。

6月5日，解放军第393团以2个连21个排之兵力，于7时向大、小万山岛发动攻击，战至12时，占领了大、小万山岛。当日，该团又相继攻占了白沥、竹洲和横洲岛。

至此，解放军第二步作战计划亦胜利完成。国民党海军舰艇被迫缩到外伶仃岛和担杆列岛海域。

解放军占领大、小万山岛后，进一步控制了一部分海域。为夺取最后胜利，6月上、中旬参战部队进行了短期休整，吸取垃圾尾海战中舰艇相互失去联系的教训，总结前一段作战的经验。为了统一协同动作，组成了有步兵、炮兵和舰艇指挥员参加的联合指挥机构，实施渡海登岛作战的统一指挥。为创造作战有利条件，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舰艇部队调整了军政干部，充实了战斗骨干；

加强了已占领岛屿上陆军部队的火力；

分别在4艘艇上架设山炮或57毫米战防炮；

在1艘趸船上架设100毫米加农炮，用拖船拖带机动作战；

加强了对国民党海军活动的侦察工作，注重掌握国民党海军舰艇的活动规律。

6月10日，第392团以2个排的兵力，配属2门山炮，攻占隘洲岛。随即在隘州、大小蜘蛛等岛上，设置了观察哨所，经过10多天的反复侦察，掌握了国民党海军舰艇的活动规律。据此，决定第三步作战的行动方案是：首先派舰艇利用夜暗驶抵三门岛，设下伏击圈，然后诱敌靠近后，即以岛上和舰艇上的火炮，集火射击，给国民党海军舰艇以致命打击，尔后攻占外伶仃

岛。

6月26日晚11时，按预先作战计划，我炮艇“奋斗”号在黑洲岛左侧担任警戒。我2艘登陆艇，载运392团2个加强连，及配属的山炮5门，从隘洲岛隐蔽起航，在岛上火饱和4艘舰

艇上的火力掩护下，于27日凌晨占领三门岛。同时，江防部队的舰艇亦进至海湾伏击位置隐蔽待机。

27日5时50分，国民党军“永”字号扫雷舰，按惯例从外伶仃岛向南行驶。三门岛上解放军炮兵，待“永”字号进入火炮有效射程内以后，集火射击，当即将“永”字号击伤。

与此同时，趸船上的100毫米加农炮和舰艇上的火炮，一齐向停泊在外伶仃的国民党海军舰艇射击，当即击沉其炮艇1艘，击伤2艘。

7时许，国民党海军驱逐舰“信阳”号、炮舰“营口”号、“太”字号护卫舰、2艘“永”字号扫雷艇，急忙从外伶仃岛东南开了出来，企图寻机报复。我“福林”号、“国楚”号舰和509号艇，与三门岛上的炮兵密切注视着这些国民党军舰的动向，等待其进入伏击圈后，突然开炮，第一个集火射击，便把国民党海军舰艇的火力压制住了。一串串怒吼的炮弹飞向敌舰，打得

国民党军驱逐舰“信阳”号中弹后逃跑，1艘“永”字号扫雷舰受重伤起火，舰上国民党军官兵纷纷跳水逃命。

11时许，在横岗岛西南海面上，我“国楚”号舰，与国民党军1艘“永”字号扫雷舰遭遇，当即将“永”字号击伤。

这次海上战斗，持续了5个多小时，经过激烈交战，获得了击沉国民党海军炮艇1艘，击伤5艘（驱逐舰1艘、扫雷舰

2艘、炮艇2艘）的战绩。解放军只有“国楚”号舰中弹1发，3人负伤的极小代价。

7月1日凌晨5时，我江防部队以8艘登陆艇，运载392团2个加强连和珠江军区炮兵团1个连，乘胜一举攻占了外伶仃岛。

最后只剩下担杆列岛，该岛是国民党“广东突击队”第8特务营孤守。

8月3日，解放军以3艘登陆艇，载运第392团2个加强连和配属的2门山炮于15时起航，在“先锋”号炮艇和“奋斗”号掩护下，一举攻占了担杆岛，俘虏了国民党军上校以下官兵140余人，缴获武装艇1艘。

8月4日，解放军又进占了佳蓬列岛和直湾岛。

至此，万山群岛（除蚊尾洲外）宣告解放。

万山群岛战役，从1950年5月25日开始至8月4日结束，历时72天，共歼灭了国民党军700余人，其中俘虏192人，击沉击伤国民党海军舰艇16艘，缴获艇船11艘、火炮11门、大批军用物资。万山群岛战役的胜利，清除了台湾国民党当局在华南沿海的最后立足点，打破了国民党军对珠江口的海上封锁。这对于巩固海防和保证海上渔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之安全，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战后，为表彰烈士的英雄事迹，海军南海舰队第一舰队政治部在江防部队所在地贡埔岛上，为人民英雄林文虎烈士建立了纪念碑。广东省人民政府为了表彰“桂山”号指战员的英雄业绩，在战后将垃圾尾岛改名为桂山岛。在钧庭湾的一块大岩石上，镌刻了“桂山号英雄登陆点”八个大字，并立了

一座纪念碑，碑上镌刻着“解放垃圾尾岛烈士永垂不朽！”第二章

高原古城风暴骤起，毛泽东指示：进藏宜早
不宜迟。邓小平点将张国华，十八军挥师雪域。

在当代，中国的藏族产生了许多新民歌，其中歌颂解放军、歌颂汉藏团结、歌颂共产党的占很大比例，而歌颂中国各族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更是不可胜数。如那首曾经风靡大江南北的《北京有个金太阳》这样唱道：北京有个金太阳，照得大地亮堂堂，那不是金色的太阳，那是领袖毛主席，发出的光芒……

这首歌是藏族人民对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真挚感情的天然流露。

回顾西藏当代历史便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们一直关心藏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现代藏族的进步与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紧密相关，并因此而衍生出许许多多感人的故事。

第一节 进军西藏

西南边陲的明珠

这仅仅是开国后的第二个月，新生的共和国统帅便打点行装，开始了首次出访。

1949年12月6日，出访苏联的毛泽东的专列出发了。列车的编号是9002，共三节车厢，第一节是警卫连，后面是备用车，毛泽东和他的随从人员都在中间的车厢里。毛泽东的随员有中央候补委员、主席的政治秘书陈伯达，翻译师哲，机要秘书叶子龙，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警卫团团长汪东兴，在中国帮助工作的苏联总顾问柯瓦略夫也在陪同之列。负责中国段沿途保卫工作的有铁道部长滕代远，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铁道部公安局局长冯纪等。从北京到“国门”满洲里，沿铁路线每一公里一个岗哨。周恩来总理给沿途各地党、政、军第一把手打了招呼，一定要保证毛泽东主席的绝对安全，万无一失。

下午5时，专列缓缓地停靠在山海关车站。

望着那气势雄伟的“天下第一关”，毛泽东深深地呼吸了几口新鲜空气，决心下去看一看。

他身着呢大衣，脚踏方口布棉鞋，手执香烟，从车厢的中间走到杨奇清跟前，笑容可掬地说：“公安大臣，这里停多久！”

“半小时。”杨奇清回答。

“嗯，下去看看可以吧？”毛泽东用商量的口吻说。

杨奇清见毛泽东要下车，便对一旁的汪东兴说：“外面风大，你帮主席加点衣服！”然后又与车厢里滕代远、冯纪等打了个招呼，便第一个走下列车。

车站由于专列的停靠，顿时显得十分活跃。

在月台上、车站上值勤的工作人员，一眼望见走在中间的体格魁梧的首长，朝他们频频点头致意。啊，毛主席！是毛主席！一股幸福的暖流顿时涌上他们的心头，他们真想呼喊起来，但望着前面的卫士长那平和中透着严谨的目光，和他那紧紧抿着的嘴唇，他们会意地把千言万语凝聚在心头，只是用目光向领袖传去纯真的崇敬之情……

毛泽东沿途请各地负责同志上车，做调查研究。

他谈笑风生，完全置个人安危于度外！

12月9日，毛泽东的专列到了满洲里市，列车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停了下来，因为中国铁路是窄轨，苏联铁路是宽轨，所以要换车。

在苏联国境线的车站上，早已停好了迎接毛泽东一行的高级专列。这是一辆设备很好的专车。车上设有会议室、卧室、休息室和浴室，显得气派堂皇。苏方赤塔州的党政军领导人和苏联外交部一位副部长来到边境线上迎接毛泽东的到来。毛泽东亲切地上前和他们一一握手，互致问候后，又登上了苏方的专列。

“呜——”汽笛高鸣中，草原上的这列专车驶离了边境线，在苏联国土上奔驰起来。

西伯利亚的寒流是有名的，对于初来乍到的中国客人也毫不留情，车顶上，车窗前已开始挂上了一道道晶莹的霜花，星星点点，不停地抖动着。

望望车窗外的皑皑白雪，毛泽东弹了弹烟头上长长的烟灰，喃喃自语：“西伯利亚……千里冰封呵，西藏大约也如此吧

毛泽东的思绪从满洲里到达喜马拉雅山，像一条对角线斜跨中国版图。

西藏——这颗祖国西南边陲的明珠。对于很多不了解她的人来说，它常常与冰天雪地、荒草漠漠、高寒缺氧、凄凉恐怖等字眼联系在一起。其实，西藏是一个多姿多彩、引人入胜的“世外桃源”。

从地理地貌和气候条件来看，面积 120 万平方公里的西藏高原大致可划分为喜马拉雅山山区、藏北草原、藏南谷地、西部高原和东部三江流域。每一个地区都有其独特的自然景观，情致殊异。

在西藏南部边缘，喜马拉雅山脉群峰耸立，气势磅礴。在全世界 14 座 8000 米以上的山峰中，有 9 座集中在这里。其中，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矗立群山之上，雄冠天下。

广袤的藏北草原平均海拔在 4500 至 4800 米之间。高海拔造就了一望无际的草原、绵延不绝的荒漠及西藏独有的草地羊和牦牛。高海拔也造就了这里漫长的冬季和“短命的夏天”。即使在盛夏 6 月，下雪也是常见的事。

藏北草原是世界上著名的高原多湖区，面积大于 400 平方公里的湖大约就有 30 多个，其他小湖泊更不计其数。这些湖泊海拔都在 4000 米以上，因此也是世界上最高的高原地区。

古代西藏称吐蕃。从吐蕃法律开始一直到《十三法典》、《十六法典》，历代旧西藏封建法律都规定：

“人有上、中、下三等，每等人又分为上、中、下三级。”其中上等人包括藏王、大小活佛和贵族等；中等人包括商人、牧主、职员等；下等人包括农民、铁匠、屠夫等。

“人有等级之分，因此命价也有高低。”王者的命价，法律规定：“胡（尔）人杀害雅孜王，命价按尸量黄金；农民杀害格萨（尔）王，抵偿命价算不清。”中等人的命价，法律规定“三百两至四百两黄金”。下等人的命价，法律规定：“猎户、铁匠、屠夫等，被杀命价一草绳。”

在刑事法律关系方面，“卑贱与尊贵争执者拘捕”。（《十三法典》第三条）“伤人上下有别：民伤官，视伤势轻重，断伤人之手足；主失手伤仆，治伤不再叛罪。主殴仆致伤，无赔偿之说。”（《十三法典》第八条）《十三法典》第四条重罪肉刑律中规定有：挖眼、刖足、割舌、砍手、推崖、溺死、处死等，这些残酷的肉刑都是用来镇压农奴和奴隶的。进入过藏区的人，有机会可以看到用人皮做成的鼓面，用 18 岁女奴的腿制成的笛子，用奴隶的头盖骨镶金边制成的溺器。

据过去的国民党官方统计资料，西藏有人口约 100 万。他们可分为两个对立的阶级：一是约占人口百分之五的农奴主阶级，即藏民称之为官家（封建地方政府）、寺庙、贵族三大领主，这三大领主在西藏广阔的高原上建立了上千个庄园和牧场，占有西藏的全部土地、草场和绝大部分牧畜和全部奴隶；一是约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奴和占人口百分之五的奴隶，农奴没有土地，只有依附在农奴主的土地上，被迫为农奴主进行繁重的劳动，担负着沉重的差役和租税；奴隶不仅没有土地和牧畜，而且没有丝毫人身权利。

农奴主将一部分肥沃的土地留作“自营地”，利用农奴的无偿劳役进行耕种，或者由奴隶耕种；另将一部分土地作为“差地”，以实物地租和劳役地租的形式，租给农奴耕种。农奴被束缚在农奴主的土地上，除向农奴主缴

纳苛刻的实物地租外，还要担负繁重的差役和捐税，许多农奴和奴隶忍受不了剥削压迫而逃亡流浪，他们被抓回来就遭到剁手、挖眼、砍足、抽筋等酷刑。

西藏的高利贷是非常惊人的。据拉萨、山南、黑河、昌都、江孜等地区的调查，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农奴都是欠债户，有的地区欠债户达百分之九十以上。寺庙是最大的债主，利率一般是借四还五（百分之二十五）。

西藏就是这么一个政治、经济制度。这种极端落后野蛮的封建农奴制度，能够允许继续存在下去吗？不！毛泽东坚定地摇了摇头。此时，数月前发生在西藏的驱汉事件，又萦绕在他的脑海。

“ 驱汉事件 ”

1949年7月8日，初夏的拉萨凉爽宜人，八角街转经朝拜的人群懒散地游荡着。突然，一队全副武装的藏军，气势汹汹地冲开街头摊贩，跑步来到一幢三层楼藏式建筑前，匆匆布岗设哨，团团包围了这个国民党政府驻拉萨办事处。

领头者气汹汹地冲进了办事处院内，提出要会见国民党政府驻西藏办事处主任陈锡璋。

闻报而出的陈锡璋强做镇定向藏军领头人发话：

“ 请问，你们是奉谁的指示，未经允许就闯入中央政府办事处的？ ”

“ 别说那么多了，我奉噶厦（即西藏地方政府）的命令通知你们：所有汉人在拉萨的机构和人员，必须立即离开拉萨，限期返回内地！ ”

“ 什么—— ” 陈锡璋呆住了，他根本没料到西藏地方政府竟对自己下了这样的逐客令。

“ 噶厦的命令，不容违背！ ” 藏军领头者说完转身就走。

陈锡璋茫然不知所措，呆呆地站在那儿……

与此同时，一些汉族官员、国民党谍报人员以及个别经商汉人的住宅，也闯进了藏军官兵。这些不速之客在完成了粗暴地盘问、搜查后，毫不客气地下了通牒：必须立即离开拉萨返回内地！

国民党政府也曾重视西藏

国民党政府驻藏办事处是于1934年筹建起来的。在此之前，国民党政府并没有在西藏设立正式机构。民国初年，西藏的达赖喇嘛曾一度亲英而与内地政府关系暧昧。至1925年，由于达赖与班禅争权，班禅被逐，流亡北京，并受到北洋政府的保护。达赖对此颇有顾忌，为制约班禅，他又恢复了同内地的关系。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设置了蒙藏委员会，经同藏方再三交涉，十三世达赖方才在1929年派了一名长驻南京的代表，以作联络。而西藏内政，达赖仍自行其是，不接受中央方面的政令。

1934年，十三世达赖逝世。国民政府乃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黄慕松去藏吊唁，双方高级官员这才有了正式接触。经商议，藏方同意黄慕松留下随行的代表团参议刘朴忱及一随员常驻拉萨，作为双方间的接触渠道；另在常驻代表处设一无线电台，以便与内地联络。

在寻觅十四世达赖转世灵童问题上，国民政府利用当时西藏上层僧侣集

团间的争权斗争，依靠亲国民党的摄政热振呼图克图，由他亲自去青海湟中接来一个灵童，宣称其身分完全符合十三世达赖圆寂前的遗言，而后中央政府又委派蒙藏委员会新任委员长吴忠信来拉萨，在布达拉宫用金瓶抽签，决定了该灵童为十四世达赖喇嘛（即今流亡在印度的达赖）。坐床大典在 1940 年 2 月 23 日举行，由吴忠信亲临主持。事后吴忠信征得西藏方面的同意，在拉萨正式设立了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隶属于蒙藏委员会，由孔庆宗任处长。这时，国民政府驻藏机构才正式建立起来。

当时内地同西藏之间交通极不便利，内地无一条公路可通到拉萨，康定至昌都历来仅有一条便道，却也不畅通，而西康又掌握在四川军阀刘文辉手中，青海的玉树本来也是进藏的一个通道，但又被“西北王”马步芳拥兵割据，不容外人出入。再说这些地区多民族杂居，纷争不已；且气候恶劣，山道崎岖。即使人能通行，也是困难重重。因此那时从重庆前往拉萨，只能假道印度。然而，假道印度还须得到英国驻华使馆的签证。这样，英国方面非但能掌握中国官员出入拉萨的动态，有时甚至还借口西藏方面不同意而作难。身为中国的政府官吏，欲去属于中国的另一块领土，却不得不绕道他国，且受制于人，单从这一点看，当时西藏同内地的隔绝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了。如果说西藏那时实际上成为中国政府管辖不及的化外之域，这也是不足为奇的。

1942 年 2 月蒋介石访印回国后，鉴于英国在亚洲应付印度独立运动尚不闲暇、更无力量去干涉西藏事务的有利时机，便想重新经略西藏。

到 1944 年，国际形势发生更大变化。蒋介石决定遴选一位自己所信任的官员到拉萨去完成上述使命。经考虑再三，蒋最后看中了侍从室第四组秘书沈宗濂。

沈宗濂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曾留学美国。在蒋介石的印象中，他为人精明干练，富有谋略。在郭泰祺任外交部长时，沈任其总务司长。1941 年末，郭因官风不正被蒋介石免职。部长一职暂时由蒋自兼，经陈布雷签证，由侍从室秘书李惟果调任外交部总务司长，而沈宗濂则调入侍从室第四组为秘书。

沈宗濂进入蒋介石幕府后，潜心研究各类问题，几年来为蒋出谋献策，颇多建树，深得蒋的赞赏，其中有一份意见书，就是进言蒋介石利用当前时机，加强与西藏的关系。这一意见正中蒋的下怀。此外，沈宗濂在外交部任内，曾随戴季陶特使出访过缅甸和印度，对印度情况相当熟悉。戴曾在蒋的面前夸赞沈宗濂思考周密、有胆有识。这也给蒋介石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所以这次委派沈宗濂出使西藏，也是有缘故的。

1944 年春，国民政府关于委派沈宗濂为新任驻藏办事处处长的任命公布后，蒋介石即召见沈作了一次详谈。谈话中，蒋特别强调了沈此番去藏工作艰巨、使命重大，要沈在不引起英印当局疑虑的情况下，很好地完成下列四项任务。

其一，宣扬中央的实力和统一中国的决心。指出中、美、英、苏，已结成同盟，抗日必胜，中国业已成为当今世界四强之一。在此基础上，向西藏地方政府说明蒋介石统一中国的坚定意志和必达目的的信心。

其二，强调中央政府对藏民的一贯友善和尊重态度。指明英国正受印度独立运动的困扰，今后必然无力再扶助西藏。西藏只有加强同内地的联系，与之结成一体，方能有光明前途。

其三，要求西藏方面同意履行前经由中央政府派员勘察康藏公路的修筑路线。一俟战争结束，即动工修筑，迅速打开内地和西藏之间交通隔绝的局面。

其四，为加强双方间的友好合作，计划在拉萨设立电报局、银行、医院等，并扩大或充实拉萨原有小学校的规模和数量。

此外，蒋介石答应拨出一笔特别款项，以黄金、外币计算，作为沈宗瀚此行的活动经费。凡遇重要机密事宜，沈可直接致电蒋本人请示，不必再经过蒙藏委员会。为此，侍从室机要组专门发给沈一密码本供其使用。

从以上可以看出，沈宗瀚出使西藏不同于往常一般的任命。虽然在名义上仍袭用过去驻藏办事处处长的称谓，盖恐使用特派员的称呼容易引起英印当局和西藏地方政府的疑虑而已。

1944年4月中旬，沈宗瀚一行分两批由重庆乘坐中航客机抵达印度的加尔各答。随后，沈宗瀚便带了一名随员前往新德里访问，当时印度尚未独立，中国在那里设了一个驻印专员公署，代行大使馆的事务。当该公署二等秘书沈昌焕陪同沈宗瀚前去会见了英印当局的外交部长、英国人卡罗爵士（Sir Olaf Caroe）时，受到了殷勤的接待。谈到西藏地位时，卡罗仅承认中国对其有宗主权，而沈宗瀚则强调中国对西藏行使的是领土主权而非宗主权。

当时中国是反法西斯四大盟国之一，中国将取得的抗日战争完全胜利，必然对印度独立运动以及整个亚洲形势产生直接的巨大影响。所以这时英印政府一改以往的冷漠态度，十分重视国民政府派沈宗瀚驻拉萨之举。

沈宗瀚从新德里返回加尔各答不久，便经噶伦堡到达了拉萨。

沈宗瀚由已驻藏10余年的办事处藏文科长李国霖陪同，逐日分别拜访了西藏地方政府称为噶厦的主要官员、三大寺和上下密院的堪布（喇嘛寺内掌权的僧官）、大小活佛等等，赠与他们礼物，有的还个别邀宴。此外，对三大寺和两密院的僧众颁发了布施。最后，约期前去谒见了达赖。沈宗瀚当时在藏甚是活跃，身手确实不凡，颇令拉萨上层人物刮目相看，汉藏之间的感情也因此较前有了好转。

还有一事也值得一提。沈宗瀚到任后的第二年，正是他推进内地和西藏的关系达到高峰的时期。8月14日，电台传来了日本投降，中国抗战胜利的喜讯，办事处顿时鞭炮齐发，屋顶升起了国旗，四周还满缀各色彩旗和万国旗。留居拉萨的汉回同胞约400余人，奔走相告，自动聚集到办事处大院欢呼祝贺，并举行火炬游行，环绕大昭寺一周，直至深夜方散。次日，沈宗瀚举办庆祝宴会，西藏地方政府的摄政、噶伦、各大寺的堪布和活佛莫不前来参加，驻拉萨的英印、尼泊尔代表也率员赶来祝贺。

沈宗瀚在志得意满之时，又想到了卡罗爵士关于主权问题的那一番话，更深切地觉察到了个中滋味。因此，他决心把握时机，趁热打铁。不久，一封交蒋介石亲自审阅的绝密电文便自拉萨发往了重庆曾家岩侍从室。

经深思熟虑，沈宗瀚在电文中大胆提出了两点重要意见：

第一，为加强同西藏的联系，应切实控制住西藏，使其不致倾向英印方面。当务之急是要迅速修建那条与滇缅公路相仿的康藏公路；而欲进行这项重大工程，又必先消除刘文辉割据西康的局面，并在彻底改组四川省政府的基础上，将西康省并入四川；派中央大员（例如吴忠信），率一支中央军（他建议使用胡宗南的一部分军力）坐镇成都、西昌、康定一带，再借用该部队力量加速修通这条公路。第二，利用蒋介石前次访印的影响，在

联合国支持印度独立。同时由国民党中央派员同印度国大党会谈，订立君子协定，澄清印度独立后与西藏的关系，要其承认西藏为我领土的一部分。

蒋介石阅毕，将电文交与陈布雷，要陈会同宋子文、戴季陶、陈果夫、张群等作仔细研究。以后，宋子文去伦敦参加中、美、英、苏四国外长会议时，乘机探询了英国对西藏问题的态度。而英国仅表示，印度独立问题是它面临的重大问题，无暇再计及其它。

蒋介石无暇计及西藏

实际上，那时真正无暇计及西藏问题的倒是蒋介石。抗战胜利后，国内形势的发展颇出乎国民党的意料，蒋介石一面依靠美国调停国共内战，一面却又在作重打内战的准备。况且当时东北、新疆、内蒙问题也日趋突出，这样，蒋如何还有心思去顾及西藏呢？

数月后，蒋介石嘱陈布雷复电沈宗瀚，谓：

奉委座指示，目前内地局势复杂，故西藏问题只能维持现状，不宜多事更张。吾兄才华卓著，年来在藏多有建树，弟所钦佩；唯按之现实，只能以无事为大事，以无功为大功。区区愚见，谅蒙明察。

沈宗瀚是聪明人，接到这个复电后，知局势既已如此，事已断不可为。自此他也就无心恋栈，而亟谋脱身之计。当初一番雄心，只能付之东流了。

沈宗瀚虽萌退志，然以他好强之个性；仍欲作最后建树，以陪衬他的引退，也好向南京政府有个交代。

那时国民党政府决定在 1947 年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并布置各省市推选出席代表，沈宗瀚于是就积极活动拉萨当局，请他们派出西藏地区的代表去南京，一来向中央祝贺抗战胜利，二来等候参加“国大”。此举若是成功，必然会使中央和蒋介石满意，从而更赏识沈的处事能力。这样，他也就不虚此行了。这是沈宗瀚的想法。

诸事布置就绪，沈宗瀚便发电报告南京，说明西藏方面已决定派两名代表来中央庆祝抗战胜利并参加“国大”，因事关重大，应由他亲自陪同来京。蒋介石复电照准。

1946 年春，沈宗瀚偕同西藏代表团到达南京，受到蒙藏委员会的隆重欢迎。未几，沈陪同代表团谒见了蒋介石，又得到了蒋的嘉勉。在这以前，他还去拜访了戴季陶和陈布雷，详谈了去藏一年多的工作经过以及他对西藏问题的见解。他表示，既然目前藏事不能有所作为，自己又患有心脏病，不宜久居高寒地带，故要求陈布雷向蒋转达自己的辞意。蒋介石的回答是：暂不妨休息，以后将另有任用。到了 1947 年初，上海市长吴国桢邀请沈宗瀚到上海市政府任秘书长，这自然是蒋的授意，加上吴国桢同沈是清华及留美时的老同学，一向交情甚好。

日后，原蒋介石侍从室的人员相聚，沈宗瀚谈到奉派入藏时，喟然叹道：“国力不逮，内部分裂，我们对西藏是无能为力的了。”以此为他自己铩羽而归解嘲并作结。

在沈宗瀚调离后，国民党政府又决定由办事处主任秘书陈锡璋代理主任

一职。

但是现在，这位堂堂的主任竟然面对被赶出西藏的危险了……

愚蠢的“先发制人”

陈锡璋急忙赶到布达拉宫前的噶厦办公楼。在家主持政务的噶伦（相当于“政务委员”）然巴、索康和嘎雪已接见了他们。

双方坐定，看着陈锡璋满脸焦虑的样子，首席噶伦然巴说：“现在，国共内战甚烈。国民党在哪里共产党就追到哪里，为避免在藏国民党官员把解放军招引进来，西藏官员大会决定：西藏政府与国民政府暂时断绝政治关系，请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人员两周内离藏赴印，转道回内地。”

这简直是晴天霹雳！在藏供职5年，阅历丰富的陈锡璋，面对这些脸色铁青的地方政府高级官员，一时惊呆了……

“据说西藏境内的汉人和康巴中有共产党，我们也分不清究竟谁是共产党；西藏是佛教圣地，绝对不容留共产党的！”见陈锡璋没有出声，然巴接着补充说。

“你们的决定实在突然，我将电告中央政府，候得复电，当再答复。”陈锡璋如梦初醒，气愤地回答。

世故颇深的然巴摆摆手说：“你不必再去电了。国民政府方面，噶厦已直接去电通知。况且现在所有电报邮件已封锁，你也无法通信了。”陈锡璋仍坚持道：“我没有得到上级命令，这样撤退，是不对的。”

噶厦出来，时已傍晚，拉萨街头冷冷清清。陈锡璋得到的消息证实：交通部拉萨无线电台已有藏兵把守，电台发电机亦已拆卸，同内地联系已经不可能了。

就在同一天，大批手持英式枪的噶厦兵，包围了学校、测候所，那些“共产党汉人”嫌疑人员，更是依照秘密提供的名单被一一拘留。

从拉萨到西藏各地，乃至严密布防的藏东重镇昌都，无不刮起一股驱逐汉人的黑风。国民党驻藏机关的官员眷属和其他汉族人员200多人，被严密监视，于7月11日、17日、20日分三批驱逐出西藏，送往印度，再经海路遣返回内地……

这便是震惊中外的“驱汉事件”。

消息传到内地，摇摇欲坠的国民党政府大惊失色。国民党《中央日报》在8月19日刊登新闻，作了如下报道：

7月8日，拉萨发生了变乱。拉萨与外界的电讯中断，中国政府驻藏办事处全体人员限两周撤离，交通部在拉萨的无线电台被捣毁，席台长遇刺受伤。所有在拉萨的经商汉人皆遭驱逐，连寺院里的汉籍喇嘛亦无幸免。这消息很使人诧异，拉萨哪里有如许多的共产党势力？为什么我国驻藏的所有机关学校人员甚至和尚皆遭驱逐出境？这是一个难解的谜。

其实，这个谜并不难解。1949年下半年，以摄政达扎为代表的西藏少数亲帝分子，与那位蓝眼睛白手套的外交官——大不列颠帝国在印度的重要人物、印度驻西藏总领事理查逊暗中勾结，千方百计策划“西藏独立”，以阻止国民党失败后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的解放事业。

有一天，里查逊向噶厦“外交局”局长柳霞·土登增巴、索康·旺钦次登透露了一个“消息”：拉萨有许多共产党的人，留他们在这里，将来会充当内应，把解放军引进来。这两位“局长”听了，大吃一惊，急忙问：“我们不知道拉萨有共产党，他们在哪里？”于是，里查逊煞有其事地开列了一个名单和住址。两位“局长”甚为感激，答应马上把这些人赶走。为了阻止解放军进军西藏，彻底“割断”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噶厦决定，连同国民党驻藏办事处人员和所谓的共产党，一律限期“驱逐”离藏。

跟这位理查逊先生遥相呼应，紧密配合的，是美利坚和英吉利的无线广播电台：

——美国合众社电讯：“西藏利用国民党的行将崩溃，完全可能脱离中国政府之主权。”

——英国通讯社专稿：“英国从未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并受中国管辖的说法。”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评论员”，英国政府派来的“工程师”，在拉萨活动着……

拉萨原有的通讯联络电台，很快变成了“西藏广播电台”，昼夜使用藏、英、汉三种语言向外界播音。它起劲地传播：“汉藏关系只是宗教上的供施关系，西藏在历史上就没有属于过中国”，“解放军违背神的意愿，与西藏政教水火不能相容”，煽动西藏僧俗人民“要男死女顶，前仆后继，”对解放军“坚决进行武装抵抗！”

同样是这位颇有绅士风度的理查逊先生，对年迈昏庸的西藏摄政达扎说：“不能坐喊独立，应当向联合国写信呼吁”。于是，噶厦政府草拟了《西藏独立宣言》，由理查逊先生亲自修改定稿，并译成英文本，决定派遣达赖的二哥嘉洛顿珠和孜本（审计官）夏格巴去联合国呼吁，请求支持。

此后，理查逊先生又伙同来自美利坚的神秘人物劳威尔·托马斯，和摄政达扎等秘密商定，组织了一个由6位官员组成的所谓的“亲善代表团”，打算分别派往美、英、印（度）、尼（泊尔）4国，请求援助。各位代表都携带盖有达赖喇嘛和摄政达扎印鉴的书信，信中称：共产党已占领内地多数省，业已临近藏界，请求4国指导我们如何作战，并希望派来一批有技术专长的人员，借贷一批美元，为实现西藏独立、加入联合国组织给予支持……

他们的阴谋一旦得逞，面积相当于12个浙江省的棕色土地，将从中国的版图上冰裂而去。那片环抱1000多个湖泊的美丽高原，那些蕴储无数宝藏的崇山峻岭，特别是跟华夏各民族血肉相连的百万藏族兄弟，都将沦入异邦异族的手中；原本是祖国最可靠的西藏屏障的喜马拉雅山脉，也将被利斧斫裂而去了……

藏与华夏古族是同源同种，同胞骨肉。他们土地相连，文化相融，共建共拥东方第一大国，也已历经700多个春秋了。现在，当自己的祖国如醒狮一般将要跃起于世界的时候，这片第三极地，难道将要发生令高山扭痛、大河淌血的离心的裂变吗？整个世界注视着西藏，毛泽东的眼光也注视着西藏。

1949年9月3日，新华社发表社论，严正指出：“西藏地方当权者驱逐汉族人民及国民党驻藏人员的事件，是在英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印度尼赫鲁政府的策划下发动的。”解放军将“不容一寸土地被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之外”。

仅仅隔了4天，9月7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号召西藏人民团结起来，迎接解放。

但是，封闭于雪山峡谷中的噶厦地方政府，对来自北京的忠告和规劝充耳不闻。他们受那些蓝眼睛白手套的蒙蔽太深了，对自己的力量也估计得太高了。从拉萨通往藏东重镇昌都的驿路上烟尘滚滚，7000大军被调往金沙江西岸，他们将要凭据天险和神符，顽固抵抗解放军进入西藏。

藏同胞盼望解放

逆历史潮流而动，背全国人心所向的所谓“西藏独立”的阴谋，受到中国各族人民的一致谴责和声讨。

首先对“西藏独立”阴谋表示极大义愤的，是藏民族各阶层爱国人士和甘、青、川等藏族聚居省的人民。

1949年10月1日，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一天，西藏黄教两大教主之一的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从青海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声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禅谨代表全藏人民，向钧座致无尚崇高之敬意，并矢拥护爱戴之忱。”

在瑞雪飘飞的1950年1月的最后一天，班禅堪布会议厅再一次代表西藏爱国人民致电中央人民政府：

顷闻西藏拉萨反动当局，以“亲善代表团”名义，派遣非法代表，赴英、美等国活动，表示“西藏独立”，企图勾结帝国主义，反抗人民政府，以达其脱离祖国、出卖西藏的阴谋。西藏系中国领土，为世界所公认，全藏人民亦自认为中华民族之一。今拉萨当局此种举动，实为破坏国家领土主权完整，违背西藏人民意志。谨代表西藏人民，恭请速发义师，解放西藏，肃清反动分子，驱逐在藏帝国主义势力，巩固西南国防，解放西藏人民。本厅誓率西藏爱国人民，唤起西藏人民配合解放军，为效忠人民祖国奋斗到底。

早年从西藏逃亡内地的爱国势力“热振派”的代表益西楚臣，在西宁拜见中央代表，痛哭流涕地再三“敦请中国人民解放军尽快尽早进军西藏，拯救同胞于水深火热，使西藏回到祖国怀抱”！

1949年11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复电班禅，电文中说：

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意愿。

当1950年的春天来临的时候，人民解放军的施旗所向，四川、青海、甘肃、西康、云南5省境内藏族聚居地区已全部解放，新生的人民政府相继建立。

与此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近一年的时间内，在帝国主义分子的策划和挑唆下，西藏一小撮反动上层已经在分裂的道路上越滑越远了。

继“驱汉事件”之后，美利坚合众国的间谍分子进入西藏秘密活动，鼓励西藏成立一支有技术的部队，接受他们的技术训练，抵抗人民解放军进入

西藏。西藏当局即向美国要求提供“十亿美元”的援助和给予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用的武器。接着，第一批美国武器经印度加尔各答运到了拉萨，藏军司令亲自带人到江孜印度兵营接受训练……

毛泽东万里传信电

由于国际反动势力的插手，西藏问题一开始便错综复杂，而又迫在眉睫。在隆隆的车声中，毛泽东不断抖落烟灰。他翻看着带来的西藏材料，构思给中央的信件：“为不失时机地解放西藏，打击帝国主义侵略扩张野心，促使西藏向内地转化，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越早越有利，否则，夜长梦多。”

信函很快转到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军区的彭德怀手中。

彭德怀焦虑到了极点。因为在毛泽东出访前（11月23日）已经给他下达过进军西藏的电令：西藏问题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就现在情况来看，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负第二位的责任。因为西北结束战争较西南为早，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据有些人说平坦好走，班禅及其随从又在青海。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是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打西藏大概需要3个军，如何分配和何人指挥现在还难决定。但西北局现在即应于藏民干部准备问题及其他现在即应注意之问题作计划……

接到电报后，一向果敢，打过不知多少大仗恶仗的彭德怀却望而止步了。他没有害怕困难的经历，也没有掩饰心情的习惯。他发脾气了，周围的人踮着脚尖走路，躲着他的目光。他在叫联络部长范明调查后，更加坚信，历代从西北进藏的军队还没有成功的先例，在这样仓促的条件下，我们又有几分取胜的把握？

毛泽东的信电灼热烫手，彭德怀嘴上起泡。他在房间里背着手来回不停地走，于12月30日据实禀告：

中央并报毛主席：

……从于田、和田翻越昆仑山至西藏边境黑河由盐湖需行17天，纯小路，骡马不能通行，人烟稀少。据闻由黑河由盐湖至拉萨骑行需要40天，一说需两个月。从南疆入藏是为困难，飞机飞越昆仑山亦需特种装置。另喀什噶尔经蒲犁、帕米尔高原东腹道驮马可行，唯须经印度境内，东行入藏。北路好走，但因政治限制，故不可能。……如入藏任务归西北，须在和田、于田、玉树屯兵屯粮，修筑道路，完成入藏准备，需要两年……

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因为和斯大林的想法没有沟通，精神不愉快，对着苏方的联络员发了一通脾气，说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什么事也不办，我是干什么来的？难道我来就是天天在这里吃饭、拉屎、睡觉吗？英国通讯社还造谣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毛泽东接到彭德怀的电报，连连看了几遍，心事重重。彭德怀经过调查的东西他相信不会错，由西北入藏不可能，只有从西南进军了。可是刘邓进驻西南，立足未稳，目前又忙于剿匪。但西藏的国际地位极其重要，必须解放，只有有劳刘邓贺了。1月2日凌晨4时，当警卫撤走第二个丢满烟头的烟灰缸时。毛泽东伸了伸懒腰，把拟好的电报稿交秘书火速发回国内。

电报是给中央、彭德怀，并转发小平、伯承、贺龙的：

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和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我意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4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10月以前解放西藏。为此，建议：请刘邓贺三同志于最近期内（例如1月中旬）会商一次，决定入藏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并立即开始布置一切……

毛泽东也觉过意不去，在电报最后，特为赘了一句：

西南刚才解放，西南局诸同志工作极忙，现又给此入藏任务，但因任务重要，且有时性，故作如上建议。这些建议是否可行，请西南局筹划电复为盼。

邓小平点将张国华

重庆曾家岩。刘伯承和邓小平接到毛泽东的电报，来回传阅了两遍。刘伯承把手插在袖管里，邓小平则不停地抽烟。这两位二野的最高领导人，平时看起来好像把职务安反了。刘伯承比较“文”，休息时也是手不释卷，依在一块石头上能看上两小时。有人戏称他是“老妈妈”，当然是仅就外表而言，其“独眼战神”之称早已闻名遐迩。邓小平则是一股英武之气，目光如电，对部下要求严厉。他和战士打牌、顶牛、掰腕子时，刘伯承就拿本书往他旁边一站，眼睛全盯着书，好像要感受那股气氛。按现在的话讲他俩还真是“黄金搭档”。现在俩人也有点犯难：派谁出兵西藏呢？

二野的部队的确不少：3个兵团，9个军。可目前已经占领西康省会雅安的，不是二野的老部队，而是贺龙的62军。从地理位置和经济、时间上看，最合适的是这个军。但他俩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最艰苦的工作还是由自己的部队来执行妥当。他们又将自己的9个军一个个拨拉，认为10军的战斗力最强，派他们去合适。遗憾的是军长杜义德身体近来差些，进藏困难。

“让‘地主’去吧！”邓小平烟抽得舌头发麻，忍着把烟头揷灭，挥赶着烟雾，说了一句“怪话”。

刘伯承被说糊涂了，忙问：“谁？”

“张国华。”

刘伯承欣喜地笑了：“我也正在打他的主意，好，就叫他去。”

刚满15岁参加红军，经过长征，曾与10倍于己的蒋介石部队周旋，战功赫赫，又有开辟新区丰富经验的18军军长张国华，怎么又成了“地主”了呢？

这要从18军的干部队伍说起。这个军有相当数量的老红军和抗战勇士，还有不少做过地方工作的干部，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南京解放后，需要一批干部去接管，但多数部队还在打仗，抽不出人。刘邓决定由各军随营学校来接管南京。在部署会上，当18军随校政委林亮说到该校人员有4500人之多时，全场哗然。因为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其他各军随校人数的总和。有人小声窃窃：“张军长如此富有，真是‘地主’！”遂决定接管南京的任务由18军随校单独承担。虽然后来又有变化，随校编入5兵团去江西、湖南、贵州征粮去了，但张国华“地主”的绰号却不胫而走，连邓小平说到干部问题时，也要开玩笑地说“18军的干部不必考虑，张国华是‘地主’嘛！”

可这时的“地主”差不多已归了地方了。张国华正带领他的部队开辟川

南新区，大批干部已被派往川南各地担任县市领导，政委谭冠三已喝过 18 军的送行酒，就要去自贡市当市委书记了，张国华也已就任了川南行署第一任主任。部队在进驻防地。1 月 8 日，传来了刘邓首长的电令： 18 军就地待命，张军长及各师主要领导干部速来重庆。

张国华一惊，立即意识到：任务有变！

他驱车火速赶往重庆，一路琢磨：是去哪里呢？云南？是 4 兵团的地盘；西康？18 兵团已经进驻；打台湾？有三野，看来十之八九，是要去西藏，因为只有那一片空地了。他的估计没有错。一到曾家岩，刘邓就把毛泽东要二野进军西藏的情况说给张国华听。在这期间，刘邓也觉得 10 军军长不去西藏，而让 10 军部队受张国华领导去西藏，弯子不好转，已明智地作了决定：让张国华在二野所有部队中任意挑选 3 个主力师，组成 3 万人的一个军。

刘伯承见张国华不言语，问：“你的意见如何？”

张国华陷入深思。他很清楚，这样组成的军战斗力不成问题。可是进藏不只是打仗，更多的是政治斗争，这对一支不熟悉的新军来说是最担心的。可他自己的 18 军思想弯子也不好转。本来要去贵州，刘邓考虑 18 军过江以来跑路最多，吃苦最大，中途又让 18 军改进天府之国的川南。官兵们对此尚未尽兴，又要来一个 180 度大转弯，从风和日暖的天府之国到冰天雪地的神秘兮兮的西藏。但是，他更相信这支归建二野以来一直跟随他的老部队。他下了决心，便仰起头，目光直视刘邓：“我还是想带 18 军担负进藏任务。”

刘伯承以目光征询邓小平的意见。邓小平转而问张国华：“你觉得有没有把握？”

“问题不大。”

邓小平看了一下刘伯承，刘伯承笑而不答。邓小平知道他也同意，指示张国华：“那就这样定了。我们马上报告中央。你还有什么困难吗？”

“现在还没有想到。”

刘伯承叮嘱他：“有困难要说话。全二野都会支援你们。”张国华走后，刘邓马上给远方的毛泽东发电，毛泽东也立即复电：

完全同意刘邓 1 月 7 日电之进军西藏计划。现在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认我们，对于进军西藏是有利的。按照彭德怀同志所称 4 个月进军时间是从 5 月中旬（我前电写成 3 个月是写错了）只要刘邓贺加紧督促张国华及 18 军等部，在时间上是来得及的……

新中国面对着艰难而严峻的考验

1950 年 1 月，美国合众社向世界发出电讯：“西藏将派出亲善使团分赴英、美、印、尼和北京表示独立”。

1950 年 1 月 20 日，新华社发表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的谈话，严正指出西藏是中国神圣领土的铁定事实，声明西

藏无权擅派任何使团，更无权表示所谓的“独立”。

但是，西藏反动当局已经利令智昏，迷途难返。雪域之地

上法号凄厉，喇嘛们在寺庙里念咒经诅咒解放军， 16 岁以上，60 岁以下的男夫陆续被征召入伍，藏军急剧膨胀了一倍，各种兵

员和辎重源源不绝运往藏东。英国报务员福特从那里的藏军兵营，不断向太空拍发神秘的电波……

新生的共和国面对着艰难而严峻的考题。

在新华社发表声明的头5天（1月15日），刘邓要接见18军师以上干部，4天前，刘伯承先期接见军长张国华和政委谭冠三、副政委王其梅等军的领导。“小平同志有个重要会议，让我先问同志们好！”刘伯承操着一口四川话，依次握手。张国华第一次站在他的面前。刘伯承扶了扶眼镜：“你没得40岁吧？”张国华挺起的胸脯往回收了一下：“36啦！”

刘伯承满意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嘛，很年轻嘛。36按虚岁是属兔的，兔子灵活，跑跳都很行，特别是爬山。”

张国华笑了：“已经开始走下山路罗。”

“下山？还早得很呢。”他又握着谭冠三的手说，“这里除了我和你，他们几个都是三十来岁的年轻人嘛，朝气蓬勃，手脚灵活，又都是红军时期的，准备叫你们挑重担子。”

“请司令员下命令吧！”军领导们异口同声地说。

刘伯承敛起笑容：“这次是交给你们一个非常重要、非常艰巨、非常光荣的任务。党中央毛主席决定18军担任解放西藏的任务。”

张、谭等都表示坚决完成任务。

刘伯承点点头：“好，很好！共产党员就要有这股子劲头，

这就叫做党性。”15日，刘伯承再次用他那幽默的四川话说道：“你们都很年轻，是进军西藏的各路诸侯。西藏这个地方非常特殊、敏感，历史上一些帝王将相多次用兵，有的翻了船，损兵折将，有的不战自退。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要处处体现出王者之师，仁义之师的形象。”

邓小平又从西藏的历史与现实的比较中进一步阐述。他说西藏是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有其特殊性，政策性很强，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但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从历史上看，对藏多次用兵未解决，而解决者亦多靠政治，如唐朝和吐蕃，以后用兵均未成。在宗教问题上。达赖是其中有力量的，但其力量不会很大，要团结达赖、班禅两大派，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军事政治协同解决，必须解决补给之公路，我需相当兵力，但力量过大，则引起以后问题不好解决，兵力确定入藏3万人，力求精干，补给线上1万，加强兵站线。为什么要18军干？邓小平望了一眼张国华，笑了：“主要是干部问题，你们是地主大户嘛！”

十八军动员整顿

去西藏的消息传开，刚从战场转入和平的18军官兵虽然有各种想法，并且多数人都愉快地表示服从，然而个别部队逃兵数量猛增。严重的一天一个班只剩下班长、副班长，急得连干部夜里不敢睡，轮流把门，营团领导天天晚上追问当天逃兵数。对于拍着胸膛无条件接下任务的高级将领来说，更是有苦难言：这支打日本、打老蒋的光荣部队，即使在挺进大别山那样艰苦、那样残酷的环境中也没有发生过逃兵现象。似乎是一夜之间，这支队伍变了！

最急的当然是军长张国华了。

他虽然是个军事干部，却颇有儒将风度，平时话不多，也很少发火；即使发火，也骂不出粗话脏话。如今看见有人开溜，气得虎眼圆睁，嘟起薄薄

的嘴唇，双手打着膝盖骨，恨得直跺脚：“这些兵为什么要这样坏？去，把他们都给我抓回来！”

下面的干部就等军长这句话。所以命令一出，“抓兵队”四面出击，一会儿就绑回来一串逃兵。憋了一肚子气的连干部有的就抽下了皮带，先是噼里啪啦敲桌子，没有效果就在逃兵背后、屁股上找突破点。

最使张国华痛心的是干部队伍里也出现了“逃兵”。本来他熟悉的原18军炮兵营政委、后提升为52师154团副政委的刘结挺（即“文革”中在全国都留有恶名的张西挺之夫），第一个向他和谭政委提出身体不好，不愿进藏。张国华拿信的手都抖起来了。眼睛闪闪地像烧着了什么东西，都不知道该用什么办法去解恨了。说实在的，本来他还觉得刘结挺那副文静的样子，有知识，也聪明能干。他已经准备要提升他当政委了，并已兼任了宜宾县委代书记，张国华气得话说得不知是问还是答：“这刘结挺太坏了，想不到他这样坏！他为什么会这样坏？这一辈子不想再见到他！”

“不！”谭冠三也气得七窍生烟，接过话头，“他不去就这么便宜他？给我把他捆来！不去？我把他捆到西藏！我到哪儿，就叫马把他拖到哪儿！”老将发火了。说他老，其实他也不过四十有二，也是正当气盛。

刘结挺是给捆回来了，可张国华思考再三，觉得进藏是件光荣的事，不能让这些人败坏18军的名声，便规定凡是逃兵一律不准去藏，就地转退地方。新生的共和国和军队的历史，把“荣誉”两个字浇铸得十分鲜亮，多数人还是把荣誉看得比生命重要。另外地方也特别看重历史，“思想有问题的人”是不受欢迎的，今后翻身都难。于是开过小差的人们急了，生怕被裁减，给自己或后代留下抹不掉的污点。所以表决心，写血书的人纷至沓来，干部们又转过来做安心留在地方的工作。逃兵还是一个不要。

毕竟18军的官兵多以事业为重。像参谋长李觉就是在得知部队要进藏后主动放弃大城市生活，向老首长刘邓提出归队的；副政委王其梅幽默地提出，要做共产党在西藏的“一世祖”。

动员会的时候，人们好奇地发现台上的张国华军长怀里坐着个不满3岁的小女孩，她是张国华的第一个孩子难难。张国华与樊近真1946年6月结婚，33岁才得子，自然视为掌上明珠。孩子天真可爱，也不怕人，见爸爸在台上讲话，她戴着个扇形小帽，站起来向台下敬礼，翘着小嘴说：“叔叔，阿姨，我给你们唱支歌！”说着就咿咿呀呀唱起来。台下的人都欢喜地鼓起掌。此刻张国华把孩子带进会场，一方面是疼爱，另一方面也有“背女出征”的味道。人员坐齐后，他把孩子交给旁人，站起来继续讲话：

“过去我们能协同兄弟部队解放一个省会，消灭几万敌人，就兴高采烈，觉得很了不起。而现在进军西藏是以我们18军为主，不只是解放一个省会，而是解放全西藏，把帝国主义势力赶出西藏，完成统一祖国大业。还要由我们到那里去建党，开创党的工作，这还不值得我们自豪吗？”

台下的军人们鸦雀无声。军长的话很有些鼓动性。

“你把西藏看成不毛之地，可英帝国主义却从不嫌它荒凉，长期以来拼命往那里钻。现在美帝国主义也在积极插手。难道我们对自己的国土反倒不如帝国主义热心？！一省不保，四省不安，如果西藏真被帝国主义分割出去，我们的西南边疆后退到金沙江，恐怕我们在四川也坐不安稳吧！”

台下出现一些轻轻的骚动，谁能说这番道理不对呢？可多数人更担心的是切身的家庭、婚姻。军长的话锋一转，紧锣密鼓地敲到了人们心坎：

“个人老婆问题的解决，有句老话，叫做‘自古美人爱英雄’，我们去完成解放西藏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可以说大家都是英雄。我们只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精神愉快地进藏，找个老婆是不成问题的；不管是农村或城市的姑娘都会爱你们的。有人提出能不能和藏族姑娘结婚？大家都知道，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就有文成公主和金成公主先后与西藏王松赞干布和赤德祖赞结了婚。现在我们到了西藏，也可以同西藏姑娘结婚，而且藏族姑娘都非常勤劳和善良，也很漂亮。结婚条件，过去，由于战争环境的限制，应当严一点；一两年后，我们国家实行薪金制，条件就会放宽，就可以允许干部带家属；战士婚姻问题，随着义务兵役制，也就很好解决。”

不知是谁起的头，会场里鼓起掌，掌声越来越热烈。许多紧绷的脸随之舒展。张国华用手势压了压掌声，脸色又严肃起来：

“必须看到，我们这次进军西藏不同于红军长征，那时我们是作战略转移，蒋介石派兵在前面堵截，后面追击，天上飞机跟着轰炸。而这次有全国人民支援，还有苏联人民的支援和帮助，比长征时的条件好上千百倍；比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也优越，我们的装备和供应将是建军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我知道还有一些老一点的同志不想去，认为胸前已经有了两三枚光荣纪念章了，就想躺在光荣上面睡大觉，不想再前进了，这是不对的。干部要起带头作用，所有的人思想都要通，要高高兴兴地去西藏！”

邓小平为十八军题词

邓小平认为张国华这次动员讲得好，愉快地给18军将士题了词：接受与完成党给予的最艰苦的任务，是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军人无上的光荣！

题完词，邓小平让张国华坐下来，告诉他，18军入藏部队以3万人为限。一切不健全之人员应清理下来交川南接管。非战斗组织必须减少，或根本不要，“有些组织比如文工团，可以在打开局面之后再开，以免增加不必要的吃饭人数。还有，听说你们要给每个师配个军乐队，我看不必。”

张国华急得从椅子上站起来，请求说：“政委，我还是希望保留这两支队伍。”

“根据现有的材料，你们每一战士的背负量将要达40斤以上，到60斤。光军械科所需的部分皮件，即达4万余斤，需要200多匹牲口驮运，这怎么行！再加上那些吹吹打打的，运输困难太大，你回去再考虑考虑……”

临走时，邓小平又问：“你对西藏了解得怎样？”

张国华抽空已经看了不少有关西藏的材料，却回答说：“印象深的还是唐僧西天取经，过火焰山、通天河……”

邓小平叮嘱张国华：“你必须立即成立一个政策研究室，要调查西藏的情况。同时各级都要动员起来学会几句藏话，以便应酬宣传。要沟通和藏民的语言，便于接近他们，了解他们，便于开展工作。不懂藏话，一到西藏你就成了聋子，就要吃亏。”

回到军部，张国华和其他领导研究开来。秘书打来电话：“军长，难难病了。高烧不退，您是不是回来看一下？”

张国华怔了一下问：“什么病？”

“可能是肺炎。又咳又喘。嘴里不停地叫爸爸……”

张国华心口一热：“我抽不出身。你安慰她两句。”张国华挂上电话，

又钻进烟雾缭绕的会议室，继续人员安排的话题。他当过文工团的政委，深知这支队伍在战争中的作用，所以坚持军乐队可以不要，但文工团减不得，更不能没有。他主张给刘邓贺打报告，申明理由。刘邓贺最后同意了他的要求，保留 18 军的文工团以及各师的文工队。他们又研究起其他事项。警卫员慌慌张张来找，说难难情况不好，叫他快去。

张国华火了：“3 万多人要进藏，百事都要有个谱，在这动辄千军万马之际，我这个军长能离开吗！”警卫员瘪着嘴，急急忙忙又往医院赶。

会议继续进行。晚上张国华稍得一点空，就催车去医院看一眼，告诉孩子就要到西藏去看火焰山，找孙悟空。走进医院门口时，他就发现气氛不对，有些熟悉的医生也躲着他。他快步往病房里走。当他站在病床前，似被五雷轰顶，惊呆了！这种痛苦是那样锐利，又那样复杂，那样沉重。难难，这个总是睁着好奇亮眸的孩子，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手脚冰凉。

樊近真坐在一旁，已经哭得泣不成声。她是山西平定人，1936 年在平定师范学校时参加革命。她怀了难难后还接受组织的派遣，去开封执行打进国民党银行的任务。她化装成农妇，路过一个村庄时被敌包围，正好临产，只好躲在老乡的牲口棚里分娩。那情景她后来在日记里描绘过：“瞎灯灭火，冷风习习，举目无亲，一边是驴的叫声，一边是我疼痛欲绝的呻吟声，真是难呀！”不久敌人进村了，她用被子把孩子一裹。放在床上。进来的敌人以为被子里裹着好东西，伸出刺刀就刺。樊近真急得心都跳到口里，又不好喊叫。房东大娘也急得扑通一下跪下哭喊：“里面是我的孙子呀！”敌人总算走了，两人急忙打开包被，好在刺刀只刺破旧被子，没伤着孩子。军营里的人们都爱叫她“南南”。孩子死了，她呜咽着告诉别人：“其实她的名字是小难，我起的。她爷爷觉得难字不吉利，说我们是南方人，就叫小南吧。我之所以给她起这难字，是要让孩子记住生她带她之难，记住共产党人度过的那些个艰难岁月……”

她在川西银行当业务科长，又怀了孩子，本不想去西藏。张国华动员她：“一块去吧。把小军（一岁多的儿子）留下，怀着的带上。”她还没下定决心，正值此时西南财委书记刘岱峰决定去西藏筹建银行，她只好服从组织决定，全身心地投入了进藏准备工作，没日没夜地开会，根本顾不上孩子难难。

张国华强忍着咽下苦涩的泪水。他能说什么，只好把这作为进藏的第一个牺牲，只好用忙无头绪的工作来抵住痛苦的回想。唯一指望的是更多的人能振作起来，工作能顺利一点。

斗争十分复杂。张国华本人也不安全。政策研究室成立后，由王其梅负责。张国华常和他们一道研究，调查。一次，张国华和王其梅从新津到成都，有几个研究室的专家同行。汽车一出新津，就遇到土匪的袭击。紧急关头，张国华一面指挥护送部队反击，一面叫人保护专家、干部。这伙亡命之徒盯着张军长的车穷追不舍。车一停，他们就分散后撤，车一开动，他们又聚齐来打枪。张国华瞻前顾后，走走停停，边走边打。40 公里的路途整整走了一天，打了一天。直到接近成都郊区，与来接应的部队会合，方得脱险。张国华摘下帽子，感叹：“这还没进藏就险象环生，今后的困难可想而知！”

1950 年 2 月 3 日，由王其梅副政委、李觉参谋长率领的进藏先遣部队出发了，张国华把他们送出去很远，再次提醒部队要坚决执行毛主席“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特别要尊重当地人民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保护寺庙，不住寺庙，不住藏民家中的经堂，即使风雨交加，冰雹乱舞，也不要

进寺庙干扰喇嘛诵经，最多到寺庙的房檐下暂避一下。”

两位领导不多言语，心里有数。后来，进到甘孜的北路先遣队，由于交通困难，粮食补给不上，就靠挖野菜，捉地鼠充饥，长达一个多月，半饥半饱地修路，学藏文，为群众做好事。

张国华把上述情况汇报给邓小平时说：“连康区藏族头人夏格刀登都说，下大雨，不让进就不进，不让住就不住，你们的政策太宽了。”

邓小平坚持他在一次会议上讲过的话：“就是要宽一点，这个宽是真的，不是假的，是要认真实行的，是为了团结少数民族。有些地方听到我们的政策，他们也相信。有些地方如黑水、芦花、川西的松潘地区，现在还半信半疑。这有历史上的原因。国民党过去在民族问题上给我们上了许多烂药……我们抛弃了大民族主义，就可以换得少数民族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两个主义一取消，团结就产生了，我们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这个。”

刘伯承扶了扶眼镜，讲了一句最普通的真理：“积几千年之经验，人不吃饭是会饿死的。要有饿肚皮的思想准备呀。”

贺龙提出：进藏部队需要什么，就支援什么！并亲自跑到部队去了解情况。一次就决定抽调 9000 名精壮士兵、100 门九二步兵炮、1000 匹骡马充实 18 军。

进藏也牵动着中南海。

毛泽东听完邓小平的汇报，久久不语。他为这次异常艰巨的进军所遇到的种种困难而焦虑不安。

5 月 13 日，毛泽东看了转来的张国华关于西藏的汇报材料后，发现北京当时开播的藏语节目不利于对上层宗教人士进行统战工作，当即将报告批转统战部长李维汉，请他“负责审查藏文广播，并规定该广播内容及宣传方针”。

稍后，张国华、谭冠三率领 18 军主力部队开拔，踏上了进军西藏的艰险路途。

第二节 格达活佛被害

进藏部队路途艰难

部队越往前进，运输和补给越困难。在高原缺氧的山路上，有的人走着走着就一头倒了下去，不再醒来。有的军马眼看着嘴鼻喷着白沫，直挺挺地倒了下去，片刻之间就断了气。7月初，18军终于抵达稍微富裕一些的甘孜。在甘孜城外约35公里的地方，有一座远近闻名的白利寺，座落在一片松影密林之中。张国华等马上去寺里拜望格达活佛。

格达是一位出身贫苦的爱国活佛，当年红军长征路过时，他曾任博巴（藏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与朱德总司令建立了友谊。

获悉张国华等人的到来，格达活佛穿上崭新的黄袈裟出寺远迎。一直把他们让到经堂里，立即派人去张罗粮草。这位自称跟朱德是好兄弟的活佛，听说张国华长征时也到过此地，越加活跃，朗朗说道：“你们这些无神论者又来了，可是我这个有神论者要热烈欢迎你们，拥护你们。”张国华抬头一看，活佛在抗战时期派人到青海买的一张《八路军山西奋战图》还一直挂在经堂里。他从佛龛里找出多年珍藏的红军布告、标语等物，说起那段民主生活，说着说着放声哭了起来：“毛主席再不派队伍来，我们西藏民族快给毁灭了。”说罢用袈裟拭泪，连连向东方合掌念经祷告。

张国华向格达活佛说，政府已多次通知拉萨当局派代表来京谈判，却被置之不理。格达活佛自告奋勇，愿亲往拉萨劝和。

三支劝和团的遭遇

新中国领导人始终在耐心地等待着西藏地方当局的觉醒，希望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放中国大陆最后一块土地。为此，曾经做过多方面的努力。

早在1950年春天，在弯弯曲曲的康藏山路上，有一支小小的人马在行进着。被护卫在中间的那位披着袈裟的法师，在颠簸的马背上还诵经祈祷。他就是有名的密悟法师。他率领了一支劝和团。这支小小的劝和团从成都启程时共有5个人，即密悟和他的两个徒弟——如意、胜兴，以及贾题韬和阿旺嘉措。

这支劝和团自己联系了一支马帮商队，同他们一起走。到了甘孜要过金沙江了，他们没有马牌（通行证）过不去，就搭起帐篷住在江边等候。

这时，甘孜白利寺大活佛格达率领的第二支劝和团也来了。他在西康威望很高，顺利地过了金沙江。密悟法师一行还是过不去，只得望江兴叹。

第三支劝和团——青海劝和团于1950年5月组成，由达赖的哥哥当才活佛任首席代表，青海黄南州的活佛夏日仓呼图克图、大通县的活佛先灵任代表。

青海劝和团于7月份分两路自西宁和同仁起程，8月在柴达木盆地的大河坝会合，一同赴藏。

劝和团到达那曲后即被扣留，迟玉锐等4名汉族干部被藏军押往山南软禁。

在各路赴藏劝和团中，影响最大的要算甘孜白利寺格达活佛那一支了。为了使西藏早日和平解放，格达活佛致电朱德总司令，要求去拉萨促进

和谈工作。朱总司令复电，对格达活佛的爱国热情深表嘉许。

7月10日，格达活佛以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分，由甘孜启程赴藏。那天有很多当地群众前来送行，有些老人还跟在后面，高声为他祝福，不料格达活佛竟在昌都遇害身亡了！

原来，格达活佛一行是7月24日到昌都的。他广泛接触了僧俗各界人士，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介绍解放军进驻甘孜地区后，如何尊重藏族群众。在昌都的亲帝分裂主义分子对他又恨又怕。特务分子在格达活佛喝的茶水里下了毒药。活佛中毒后，即腹痛、头痛、口吐黄水、鼻孔流血流脓，第二天——8月22日就圆寂了。死后全身乌黑，皮肤手触即行脱落……

杀害格达活佛的间谍

1951年春，重庆。

薄雾笼罩着歌乐山，山谷中隆起一处台地，常青的松柏簇拥着一所白色的别墅，高高的院墙隐约看得见电网的支架，荷枪的士兵在肃静的大门边来回巡逻。这所别墅便是有名的“白公馆”。

抗日战争期间，美国代表梅乐斯与戴笠达成协议，在歌乐山下设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后来，国民党政府将“白公馆”和“渣滓洞”等地均辟为集中营，不少革命者和民主人士，即在此牺牲。解放后，西南公安部门因地制宜，也在此设立看守所，关押了大批国民党战犯。当时在这里被关押的有王陵基、曾扩情、徐远举、沈醉等百余人，其中有一名是外国犯人，格外引人注目。此人名叫福特，是英国皇家陆军中校，间谍，正是他参与谋杀了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格达活佛。

福特长得又高又壮，一头浓密的灰发，下巴和上唇的胡须修剪得整整齐齐，当年只有30多岁。他出生在英国一个殷实富裕、享有声望的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学的是无线电专业。大学毕业后，福特不愿重复老一辈的生活模式，渴望新鲜和刺激，直到有一天加入了谍报机关，成了皇家情报部门的军官。

1949年初，红色风暴席卷了亚洲大陆，炮火连天，许多谍报员都不愿再去远东。遥远的东方，福特在读书时就十分向往，冒险的诱惑使他更想去周游一番，于是便主动请命前往。

在他抵达德里后，受到了英国驻印谍报头头的召见。这位头头以赞赏的口吻说道：“把我们最得力的人员派往西藏，是大英帝国利益的需要。”接着又说，“你一定知道，失去美国支持的国民党政权，眼看就要垮台。我们对这个倒霉的政权不感兴趣，关心的只是西藏的归属，它的面积比好多欧洲国家都大。”

“我来德里之前，有人已经给我上过这堂课了。”福特满不在乎地说。

谍报头头盯着福特说：“你看过的那些材料，都是5年前的旧东西了。西藏是个相当复杂的地区，那里的当权者分成几个派别，各行其是。不过，只要他们还愿意源源不断地运出当地的物产，英国的工厂就能获得充足的原料。我的意思可以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你必须竭尽全力，保住西藏这个前哨。”

“我得去多长时间？”福特提出了第一个问题。

“这很难说，也许一年，也许更长。”

“我可以得到哪些装备？”福特又问。

“电台、枪支，外加两名印度报务员，他们会说藏语。”

福特又提出了第三问题：“有后援吗？”

“明确地说是没有。西藏交通不便，经常派人去是不可能的，皇家空军也不愿每月派飞机去飞越危险的喜马拉雅山。”

“我要签订一份合同，使我的后半生得到保障。”福特思索了片刻，提出要求。

“当然，可以接受。这样吧，你的年薪为两万英镑，各种津贴除外，怎么样，你认为满意吧？”对方咧开嘴笑了。

半个月后，以贸易代表身份为掩护的福特进入了西藏，受到亲英的西藏地方政府的接待，并视之为上宾。

在拉萨，福特从不打扮过头，从月初到月末，穿的都是便装，难得系一次丝绸领带。他经常四处走动。还在街头给衣不蔽体的穷孩子分发巧克力，久而久之竟得到了善男信女们的好评，被当地老百姓视作好心人。

凭着名声，福特在拉萨自由往来，不断结交和款待“新朋友”，特别是从西藏地方政府的中、下级官员口中，获取了许多藏军在各地的布防和军需情况。在拉萨的一所石头建筑的堡垒式住宅里，两名印度报务员轮流操作收发报机，将福特搜集到的各种机密情报迅速传递出去。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后，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西藏政局也日益不稳，不少富有的贵族打算逃到印度去，因那里的习俗与西藏接近。然而，那些西藏地方政府的头面人物却不愿走，丢掉了地盘，就意味着成了无根的树，到哪儿都长不了。于是他们想起了福特，把他当作救命菩萨一般请进金碧辉煌的布达拉宫。在那里，福特与主持西藏政教事务的摄政大札经过长久的密谈，酝酿出一个欲盖弥彰的阴谋。

然而，国民党分子撤走了，西藏地方政府的“声明”也发表了，但并未能阻止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不断向西挺进。入冬，当青藏高原一片银装素裹的时候，解放军的先遣部队已陈兵甘孜，仅隔一条金沙江，随时都可以开进西藏。

为了就近观察局势，福特离开了拉萨，前往藏东边城昌都，他就像赌徒一样，把自己的使命和前途都押上去了。

昌都城一片混战，贵族们家家户户洞开，忙着搬迁逃难，沿街已有许多辆牛车歪歪斜斜地上了路，开始了漫长的迁徙。7个团的藏军和民团携带着老掉牙的英国造单发步枪，正在集合队伍，准备开往金沙江畔布防，忙乱中不知是谁的枪走了火，立刻引起恐慌，于是更多的牛车轧轧地冲出了城门。

福特走进西藏当局设置的昌都总管府。它实在算不上是什么体面的建筑，门柱上挂满了蜘蛛网，庭院里到处是鸽子粪，墙的一角早已坍塌，几个壮汉正在屋檐下喝酒抽烟，另外几个人则躺在青稞袋上打鼾。

总管大人拉鲁一见来的是个洋人，马上睁圆了眼睛，客气他说：“请坐，先生，我能为你做点什么事吗？”福特说：“我想在昌都住一段时间。我在这里有一笔生意。”

拉鲁装出愁眉苦脸的样子：“哎呀，现在昌都很不安全，连我都提心吊胆，生怕挨黑枪。不过话说回来，先生要是舍得破费一点，几个保镖还是找得到的。”

“大概得花多少钱？”

福特脸上露出了笑容。他掏出了钱。望着崭新的钞票，拉鲁笑眯了眼：“先生虽然是个外国人，但从今以后，就跟我的亲兄弟一样，有事尽管来找我。”

当夜，神秘的电波升上了天空。福特向德里发出了电报：藏军正在布防，打算阻止解放军越过金沙江，西藏地方政府尚无与共产党接触的迹象，至少目前还看不出来。

随即，回电传来：继续观察局势。

昌都早年就来过外国传教士，因而福特的到来并未引起当地人的惊诧，甚至以商务名义在昌都公开设立地方电台也无人多问。加之福特的藏语学得不错，借助于手势，可以了解到许多英国情报当局所需的当地政治、军事、地理、人文等情报资料。

1950年春，西藏当局派出所谓的“亲善使团”，分赴北京以及英国、美国、印度、尼泊尔，表明其“独立”的愿望。中国政府立即发表严正声明痛加驳斥，为反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并请藏族高层宗教人士格达活佛入藏，以争取达成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

7月下旬，格达活佛及其随员一行多人，从甘孜到达昌都，并拟继续西进。下榻旅馆后，格达活佛一连几天约见昌都总管拉鲁等当地官员，反复宣传新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劝他们不要与解放军为敌，但拉鲁等人却置若罔闻。

格达活佛滞留昌都达半月之久，和谈之事毫无进展，使他十分焦急。8月13日这天，格达活佛欲拍几份电报到拉萨，直接与西藏当局协商，并致电拉萨友人，共促和谈。为此，他亲自到昌都地方电台，接洽发报事宜，谁知这却给福特带来了机会……

那天，福特以电台台长的身份出面，殷勤接待格达活佛。当他得知格达的来意后，便借口修理发报机，寻机将此事通知了拉鲁和德里方面的上司。

拉鲁总管闻讯赶来，沉着脸问格达：“听说你一定要去拉萨？”

“是的，我受中央人民政府委托，当然要去拉萨见各位大臣。”活佛答道。

“那我就挑明了对你说，摄政大札本人可不愿见到你，因为共产党要毁灭宗教。”拉鲁蛮横地说。

“不对！我知道共产党是主张民族区域自治，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我和他们打过交道。”格达手执念珠，毫不退让。

此刻，在楼下的福特已收到德里方面的密电，指示他借此挑起藏汉对立，甚至引发武装冲突，以后才有文章可作。

读过电文，复杂的局面使福特面临选择：倘使格达活佛横尸街头，藏军与解放军展开恶战，各地的寺庙被焚烧，众多教徒群起暴乱，外国军队堂而皇之地开进请求“保护”的西藏，福特便会作为有殊功的特工人员，飞黄腾达；然而若要去行刺格达，活佛身边的那群剽悍的侍卫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经过一番紧张思索权衡，福特决定采取杀人不用刀的办法，暗害格达。

福特从行军床下拖出皮箱，从中取出一只标着“剧毒”字样的药瓶。

这是美国制造的延缓性毒药，服后一周内才见效。他亲手调制了三份加奶的红茶。并在其中一份中下了毒。

福特手端托盘进屋的时候，活佛的两名贴身侍卫根本没注意他有什么异常。格达活佛不愿听拉鲁总管的胡言乱语，只是坐在毛毡上，双目紧闭，喃

喃念佛，希望菩萨能宽恕拉鲁。

“活佛，请用茶，有话慢慢说。”福特放下托盘，把有毒的红茶放在格达面前，另两杯留给自己和拉鲁。

格达睁开了眼睛道谢，贴身侍卫取来盛水的水钵，让活佛净手。

“吉祥如意，活佛。”福特说道，举起了自己的杯子，拉鲁也几口喝干了他的那杯。

格达活佛嗅了嗅红茶，毫无防范地一小口一小口呷尽了这杯毒汁。

当日午后，格达活佛间歇性发作头痛腹痛，只得暂住福特处。几天后，活佛虽已卧床不起，但仍然念念不忘肩负的重任，他对随行人员说：“大军和藏族人民是一家人，我们要协助他们顺利进藏。”

一周时间过去了，拉鲁派他的私人医生前来“诊断”，又开了药物一剂。格达活佛服药后即不能言语，于8月22日上午去世，年仅47岁。

格达活佛死后，全身发黑，七窍流血流脓，皮肤开裂。福特和拉鲁等人为了推脱干系，很快焚尸灭迹，并将活佛的随行人员送往拉萨“主持超度”，想回甘孜报丧的人员被拉鲁软禁在昌都。

第三节 解放昌都

新的挑战

格达活佛遇害，激起各族人民的极大义愤。

18 军官兵更是群情激愤，向隔江对峙的藏军挥拳怒骂。

紧接着又一个挑战来了。当张国华的部队进到康北竹庆地区，周围的喇嘛寺忽然响起了钟声，一群持枪骑马的人簇拥着一个穿红袍戴狐皮帽的人，奔上山岗，吹起法螺，顿时不明真相的喇嘛群众向解放军开枪射击。张国华叫部队停止前进，带上翻译去和拦路的人谈话，总算阻止了枪击。到了晚上，那一伙人卷土重来。张国华气坏了。眉头一皱：“把那个为首的家伙给我抓来！”

战士们一会儿就捉来一个穿红袈裟的指挥官。一审问，这个一身上层喇嘛打扮的人却是个汉人——陈立夫的亲信。他供认：1949 年冬天，就有一些美国人和英国人在拉萨当局的便衣武装护卫之下，从大风大雪里跌跌撞撞地过金沙江来了。他们利用喇嘛寺的钟声法鼓煽动群众，要截断解放军的进藏道路。现在西藏反动派在帝国主义直接策划下，将原有的 14 个代本（相当于小团），扩充为 17 个代本，从外国运进大批军火、美国电台，请来英国教官，调动、训练各地藏军。并下令各寺院念经诅咒解放军。不但关闭了和谈之门，又企图以金沙江为天险，要 18 军就此止步。

18 军的将领们都认为，不打难以前进了，西南局根据张国华的报告，向中央请示实施昌都战役。毛泽东在 3 天后电告：英国原不许西藏代表团来京，现已允许。如我军能于 10 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当然也有别种可能）……你们于占领昌都后只留 3000 人在那里过冬，今冬不进拉萨，并将主力撤回甘孜，在西藏方面看来，可能觉得是我们向他们表示好意的一项措施。毛泽东还细致地查问着一切有关事宜：你们 16000 人由甘孜向昌都进军，粮食全靠部队携带及牦牛载运，其中 3000 人须有过冬粮食，准备撤回的主力 13000 人至少须有往返期间 3 个月粮食，部队及牦牛是否有这样大的运输力，仍望查告……

25 日中央军委批准了昌都战役的计划，26 日西南军区下达《昌都战役的基本命令》。

战争之神的正义之剑，将要划出霍霍闪电了。

8 月 28 日，张国华率领 18 军主力第一批人员 380 余人，携带先遣支队的被装及粮食，从新津出发。他的行军生活变得非常简单，一杯开水，几块压缩干粮，就是一餐。山坡上也能睡一觉。遇到寺庙，他还会不顾辛苦进行造访，遇到藏族同胞，他还会用刚学会的几句藏语和同他们交谈……

路上，官兵饿得实在受不了，就向张国华叫苦。张国华也不忍心看着部下挨饿。咬了咬牙，宣布每人每天增加二两粮食。可西南军区后勤部长余秋里又犯了愁，他哪里支得出这二两粮食，不得已，大家只好勒紧肚皮，少吃二两。到拉萨的时候，大军只剩 3 天的口粮了。张国华仰天长叹：“怪不得刘邓首长老说人不吃饭要饿死，这简单的真理竟如此灵验！”

新任总管阿沛·阿旺晋美

昌都，位于西藏东部澜沧江上游扎曲和昂曲两大支流交汇处，当时居民有 3000 余人，扼进藏南、北、中三路之要冲，噶厦在此建立了总管府，指挥着占藏军总兵力三分之二的九个代本（团）和民兵 8000 余人。这 8000 余人分布在沿江 1000 多里正面防线和昌都附近宽 700 多里的纵深地区。

当解放军临近金沙江东岸的时候，原昌都基巧（专员、总管）拉鲁·才旺多吉任期已满，他上书噶厦请求准予回拉萨。按照旧例，昌都总管必须由一名现任噶伦出任。但在拉萨的 3 位噶伦谁也不愿在这种时候赴任昌都。文武官员更是畏缩不前。于是，摄政达扎决定，突破清朝给西藏设立 4 名噶伦的定制，提升孜本（人事审计官）阿沛·阿旺晋美为增额噶伦，前往昌都接替拉鲁。42 岁的阿旺晋美临危受命，慷慨赴任，很有点悲壮的味道。

清朝皇帝退位的那一年——1911 年，在拉萨以东 100 多里路的甲玛沟，有一户贵族世家诞生了公子，他便是阿旺晋美。阿旺晋美从小就聪慧过人。在别的藏族小孩还在玩羊拐骨的年龄，阿旺晋美被送到拉萨的一家私塾学习藏文去了。14 岁那年，他拜在一代佛学大师喜饶嘉措门下，学习文法、诗学、历史和哲学。喜饶嘉措大师学问渊博，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为人刚直有如青枫，在藏区享有盛名。阿旺晋美跟着大师，暮鼓晨钟苦学 3 年，又拜东藏神秘灵异之地——三岩地区红教派的大苍活佛为师，习诵佛学经典，度过两个寒暑。当他 20 岁那年重返故乡甲玛沟时，已经称得上是满腹经纶了。

甲玛沟是个只有一百四、五十户人家的农牧结合的山乡。20 岁的阿旺晋美接替母亲管理自家的庄园。他在读书之余，同农奴们一起收割青稞，一起放牧牛羊。凄惨的现实使他萌生了最初的民主思想。他越来越认识到西藏的制度需要改进……

对于这项任命，有的人认为凶多吉少，实在不是一个好差使，但阿旺晋美处之泰然，他面见摄政达扎，居然陈述了一条令满庭皆惊的意见：

“上司抬举我，委以重任，我愿从命。但是现在人民解放军已向昌都方向前进，也许指日可到。我们迟早总是要同解放军接触，总是要谈判的。请上司给我权力，我去昌都后暂不接任总管，而是直接去找解放军谈判。‘找水源，去雪山。’我一路东行，找到解放军为止。”

摄政王达扎惊得半晌无活，满庭文武大员脸色千差万别，各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官员扩大会议讨论的结果，向噶厦提出意见书，支持阿沛的要求。这简直像三月里草原的风一样，刮遍了圣地拉萨。但是，风再大，扬起一层沙灰又打着旋子折了回来。官员扩大会议在给噶厦的意见书里又认为，阿沛已是堂堂噶伦，不宜贸然与解放军谈判。先责成在印度的孜本夏格巴等人同共产党接触，待时机成熟，再由阿沛出面谈判。噶厦和达扎批准了官员扩大会议的意见书。

8 月 28 日到达昌都，阿沛披两肩征尘，顾不上休息，便亲自巡查江防，考察民情，亲随和卫士们常见他眉头紧蹙，一言不发。一周之后，他致电噶厦：“因时世浑浊，民不堪命，这里有的宗（县）内仅七、八户还有糌粑，其余全以圆根（即蔓菁，一种类似萝卜的蔬菜）为食，乞丐成群，景象凄凉。”针对噶厦命令他进攻玉树一事，他建议“停止进攻，汉藏双方最好和平解决，如果不行，也应先从边境一带撤出所有部队”。

可惜，噶厦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毛泽东关注着西藏动静

关于昌都战役，毛泽东胸有成竹、他曾指示“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他要在藏军心理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毁灭其全部有生力量，避免以后再与藏军漫山遍野地打游击与消耗战。他要使噶厦全面丧失抵抗能力。

8月31日，毛泽东批示：“购30架高空运输机，支援西藏进军。”

当时，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刚刚诞生10个月，彭德怀挂帅出征朝鲜战场正打得炮火连天，鸭绿江那边硝烟弥漫的天空更需要人民中国的战鹰。但是，毛泽东还是咬咬牙，把30架飞机批给进军西藏的部队。而西藏在毛泽东心目中的份量，岂是“30架”高空运输机所能承载的！

以后周恩来总理又批准将刚从苏联购进的吉斯—150运输车拨出200辆专供修甘孜机场用。

10月7日，执行迂回包抄任务的右路部队52师154团，渡过金沙江，溯江而上，开始翻山越岭。

由于高原空气稀薄，炽烈的太阳在雪地上的反光刺坏了战士的眼睛，几乎有一半人因雪盲而暂时失明，双眼红肿，疼痛难忍，人们把绑腿布连起来一串一串牵着走。涉渡冰河更艰苦。横断山区条条山条条水，湍急的水流冲击着冰块，像锋利的刀刃划破了人们的皮肉。有的战士因腿伤不愈，加上急行军和恶劣的气候，整条腿坏死，被迫截肢。

饥饿的威胁也极为严重，整个参战部队都受到了粮荒的困扰。154团从玉树补充的粮食很快就吃完了，中央在重庆订做的高营养食品蛋黄蜡和代食粉因资本家偷工减料被大大打了折扣，按原定指标每人每天12两就足够补充消耗的热量，但发到战士手中，12两仅够他们吃一顿。由四川运来的大米因长途跋涉、风吹雨淋，早已霉料变质。缺粮，沿路又是茫茫雪山，没有野菜和草根可食，有的战士撕吃自己棉衣中的棉花，吃粉状的细土，吃骨头和牛角烧成的灰烬。

最惨的是随军的战马和驮畜，这些“无言的战友”眼望无尽的群山目光暗淡，有的连眼睛也没有——被冰雹打瞎了。饿急了，它们就“咔嚓咔嚓”啃食冰雪。夜间，饥寒乏力的马儿把头拱进战士的帐篷。低垂的头颅贴在战士的胸部，战士醒来，把自己的口粮偷偷喂它一把，抱着它的头流下了眼泪。马匹不断倒毙，几百里路倒下的牲畜成了无意中设置的路标，到昌都战役结束，几千匹牲畜所剩无几。饥饿的人们硬着心肠吃饥饿而死的牲畜，马倒一匹人吃一匹，吃了马血马肉，还要吃马皮，恨不得连马骨也要烧成灰咽到肚子里。

在千里迂回的急行军中，154团和青海骑兵支队有三分之一或更多的人掉队。10月16日，跑在前边的只剩下百余骑兵和百余步兵，他们以日行170华里的惊人速度先敌4小时抢占恩达，切断了昌都藏军西退之路。

南线解放军两个团攻克盐井、宁静、邦达，堵住了藏军逃窜察隅之路。

解放军攻占昌都

此刻，昌都正陷入一片混乱。

当解放军渡江的消息风传全城时，士兵、喇嘛和居民在昂曲河边汇成一

片。持枪的士兵们东逛西窜，不知如何是好。

10月12日，从昌都以南的宁静（芒康县），传来藏军第九代本德格·格桑旺堆率340余人宣布起义的消息。霎时间，昌都藏军的军心崩溃了。

10月16日夜，总管阿沛得知解放军已逼近昌都，类乌齐一带后方也出现了神出鬼没的汉人军队。早就不愿抵抗的总管命令：翌晨弃城西撤。17日，弹药库的爆炸声震得昌都城颤抖不已。随之，藏政府官员、士兵们拖儿带女顺着西边的山路仓皇离开昌都。乱兵沿路抢劫，为解放军赢得民心铺平了道路。

整个昌都战役过程中，解放军只在小乌拉、岗托等三处遇到了较强硬的抵抗。岗托渡口，攻击藏军十代本的是由军工兵营、侦察营和52师炮兵连组成的左路部队。10月7日，东岸解放军开始抢渡金沙江。一瞬间，重机枪、迫击炮向对岸藏军猛烈轰击，阵地上一片火海，藏军躲在石缝中顽强抵抗。解放军的牛皮船驶进激流，向对岸奋力划动。江面上，枪林弹雨交织成严密的火网，有一只牛皮船被枪弹和激流掀翻，船和人刹那间葬身水底。

两小时后，被巨浪冲向下游的牛皮船靠上西岸，解放军跃上江边乱石，开始向对面藏军阵地逼近。同时，炮火和枪弹暴雨般倾洒到山后的藏军队伍里，牛皮船上和两岸的解放军发出了吼声，藏军弃地撤退，夺路西逃……

对于俘获的负伤藏军官兵，解放军全部收容并予以医治。对投诚的官兵、家属每人给8元以上的银元作路费，每三人发一匹马。当解放军的粮食运到以后，还发放给藏军官兵，使他们手中有钱，袋中有粮，并有马匹驮运衣物，走上返乡之路。被遣散的人员无不感谢解放军的宽大政策，有的叩头流泪，对解放军干部说：你们解放军是菩萨兵，是救命恩人，返回家乡后，再不替噶厦卖命了。

昌都战役于24日结束，历时18天。经过大小战斗20余次，全歼昌都藏军总部及三、七、八、十等6个代本全部和二、四、六代本之大部，并争取第九代本起义，共计歼敌5700余人，占当时藏军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俘代本以上文武官员18名，英印特务福特等4名，缴获山炮3门，重机枪9挺，轻机枪48挺，各种冲锋枪、步枪3千余支及其他军用物资部分。

昌都战役的胜利，正如刘少奇所说的那样，“是解放西藏的淮海战役”。整个西藏被解除了心理和实力上的抵抗，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和平谈判。

达赖喇嘛亲政

昌都一役，予藏军以毁灭性的打击。从那片雪城高原上反弹而起的石子落进了印度洋，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1950年10月21日，昌都战役尚未熄火之际，印度政府就给中国政府送交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说：“假如因为中国在西藏的军事行动而使反对中国参加联合国的国家有机会来歪曲中国的和平目的，那么中国的地位将会因此而削弱。”

印度洋的大波很快涉及到大西洋。11月1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诬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的行动是“侵略”。11月15日，萨尔瓦多驻联合国代表向联合国秘书长赖伊提出所谓“入侵西藏”问题提案。萨尔瓦多是中美西岸的一个国家，它的政府一向是在美国控制下的。据国民党“中央社”成功湖15日消息，成功湖方面也都认为萨尔瓦多的提案

“是出于美国的主使”。1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短评：《斥美国对西藏的阴谋》。

正义终于使横暴者却步了——11月24日，联大总务委员会讨论决定：延期审理此案。

昌都战况传到拉萨，噶厦立即召开了由重要官员和三大寺堪布参加的大会。与会者大都垂头丧气，怀着对解放军无可奈何的愤怒。东藏一败涂地，战无可战，讲和又不甘心，到底何去何从？人们在会上争来吵去。对时局却没有提出任何可行的对策。达扎摄政的脸色越来越暗，最后长叹一声，决定请乃穷、噶东二位护法神指点迷津。

在拉萨西郊哲蚌寺下面，有一个专供护法神的乃穷寺。意为“永恒不变的妙言小岛”。供奉着西藏的主要护法神“佩阿甲布”。而乃穷曲均则是护法神预言未来的使者。噶东寺的曲均也是这样的使者。上千年来，西藏每逢重大的决策，都要向这些预知未来的神巫请教。这一次自然更要求教于他们了。在神秘庄严的气氛下，乃穷和噶东两寺的曲均被请到降神的佛殿。乃穷曲均身穿红色锦缎的裤子，内外八套衣袍，重逾百斤。足蹬前面翘起的齐膝皮靴，胸前挂着一面金质护民镜，四周点缀着绿松石，环衬出一块紫水晶，紫晶的核心是耀眼的银片，上刻有密宗神的祈祷词。

仪式开始。

乃穷曲均跳演了一阵，只泛泛地说要竭诚礼拜，多念经文，方能保民平安。

“那么，下一步是和是战？应由谁掌管全藏政教大权？”守在达赖佛殿的官员急切地问道。

“还是要多念经文，竭诚礼拜。”乃穷曲均依然含含糊糊。“尊贵的乃穷神啊，为了西藏的政教大业，请问是战是和？谁来执掌大权？”大员们都瞪着眼睛盯着乃穷曲均，乃穷曲均头上冷汗淋漓，避过他们犀利的目光，终于承认“不灵了”。看来，只好请教噶东神了。

噶东神汉折腾好一阵，趁人们不注意想溜走，仲译钦波（秘书长）群培土登上前拦住了他。群培土登神情激动地说：“这次请求指点的，是关系到西藏政教存亡、众生命运的大事，我们肉眼凡胎难以决定，请神睁开慧眼，明示今后怎么办才好。”噶东曲均转身使劲跳起来，一会儿拔出腰刀左杀右砍，吓得噶伦们忙向一边躲；一会儿就地跳起，掀起一片尘土。最后，他突然伏跪在达赖喇嘛面前，做出要哭的样子说：“达赖喇嘛是全体僧俗人民的智慧和至宝，只要你亲自执政，就能给西藏众生带来幸福。”在座的摄政达扎闻言脸色惨白，神态沮丧。

1950年藏历10月8日，达赖喇嘛举行了亲政典礼。17岁的达赖喇嘛在这多事之秋，挑起了掌管全藏政教事务的重任，而如何收拾这败后残局，他却一筹莫展。

第四节 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签定

阿沛信使急驰拉萨

一场大战过后，金沙江又恢复了往日的寂静，在秋日的蓝天下，像澄静的练带。

此时此刻，住在昌都解放军指挥机关的阿沛，眼前却有点迷迷茫茫。

他住在一幢藏式楼的底层，不再穿绸缎的官服，而是一身黑毡爸藏装；他孑然一身，围着他的不再有护兵和侍从。

眼下的这个结局，其实在他衔命赴任的时候就预感到了。要不然，当初拉萨的三个现任噶伦为什么都死活不肯来呢。但当预感真的变成了现实，他还是感到震惊、痛疚、惶恐、迷茫。想到雪域西藏的命运凶吉未卜，他心头隐隐作痛起来。

大战之后的昌都城是宁静的。特别是深夜和清晨。一年多来，这座东藏名城被各种喧响所困扰，在白天与黑夜交替之际发出震天巨响。现在呢，一切都寂静了。怒吼的山炮轰鸣之后，一切繁琐的音响都归于沉寂了。

阿沛这天早晨起身后不久，康巴汉子平措旺介看望他来了。平措旺介身穿解放军军装，高大健壮。这位 28 岁的康巴汉子是昌都解放后 13 天赶到的。一年前噶厦在驱汉运动中，将他也以“共产党嫌疑”的罪名驱逐出境，此人现在成了共产党的大长官，他会不会报一箭之仇，来一个报复呢？不可不防！

康巴汉子平措旺介此时身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8 军民运部长、昌都工委副书记，与去年被押送离开西藏的狼狈样子相此，简直是天上地下了。康巴人凶猛好斗，尤善复仇。为了复仇，不惜子子孙孙打冤家。平措旺介如果要对噶厦的要员阿沛等人施行报复的话，应该说是不费力的。但这一次，康巴人平措旺介态度谦恭，他请阿沛噶伦从这间底楼的小屋搬到对面楼房的二楼去住。

高楼上轩敞洁净，落地窗十分明亮。远眺青山，近观绿水，使人心旷神怡。

很快，又送来了他原先穿的绸缎官服。在昌都战役中投诚的近 40 名藏军高级军官，也都重新穿上他们的官服。

18 军副政委王其梅和其他解放军将领不断地来看望阿沛。有一次王其梅与阿沛长谈，谈到这次两军对垒，枪炮无情，双方伤亡都很大，许多藏族和汉族兄弟都倒在战场上。讲着讲着，王其梅不禁热泪盈眶，嗓音哽咽。阿沛十分惊愕，他被深深地感动了。

昌都地区的大活佛，大贵族，前昌都藏军的高级军官，更是络绎不绝地前来拜望阿沛。阿沛从他们的眉宇神态、谈吐和笑声中明白了他们目前的处境。

对照过去像瘟疫一样散布在藏区的关于共产党解放军的种种流言，阿沛十分感慨，他心头的疑雾慢慢淡散了。

阿沛居住在楼上夜间灯火不熄。共产党大首长与他盘膝对坐，一谈就是大半夜。

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那幢楼上的灯光总是明亮的。卫兵们只记得半夜时分，炊事员还要登楼去送酥油茶和夜餐。

每天早晨的太阳，将温暖宜人的阳光射进那幢高楼。玻璃窗户反射出一

片光华。

就在拉萨的上层亲帝势力策动达赖外逃，乱成一团之时，阿沛从昌都派随员金中·坚赞平措和噶准桑林，星夜兼程赶来拉萨送信。他们快马加鞭，日夜赶路，马跑累了，又支不到驿站的差马时，就身背马鞍，徒步前进。2000多里路程，他们只用了16个昼夜就赶到了。

金中和桑林向噶伦们呈上昌都总管阿沛给达赖喇嘛和噶厦的信件。噶伦们急不可耐地询问昌都的情况，解放军的动向和兵员多少等等。当两位信使汇报到解放军离昌都还有三天路程，结果一个晚上就突然出现在面前时，首席噶伦然巴连声惊呼：“啊啧啧！啊啧啧！”并且叹息说：“敌人像钢铁般坚硬，我们像糌粑一样松软呵。”索康噶伦询问了昌都总管署全体官兵的近况，然后说：“阿沛·阿旺晋美受苦了，我们并不责怪他。我们的军队太糟糕，确实不能上阵。如今只好耐心等待，世界形势总会起变化的。”

金中和桑林送到拉萨的，是阿沛·阿旺晋美等40名官员给达赖喇嘛的信。这是一份十分重要的文献。它禀报了昌都之战失败的经过，以及投诚后广大官兵受到的良好待遇。其重点自然还在后半部分：

在下昌都总管阿沛噶伦、三名在职大小堪布和第三、第八、第九、第十等五个代本为首的四十名政府文武官员顿首叩拜、三门虔诚启禀：

.....

目前进行汉藏和谈是个时机。共产政府所规定的基本作法是，对外五族团结一致；对内各大小民族自治政府，其工作人员根据单一民族和多种民族人数多少来确定；大民族绝不压迫小民族，特别是对西藏要采取特殊政策，首先是对大教主全知佛王达赖今后仍然主持政教，救主摄政活佛及各僧俗官员照常供职；保护宗教、寺庙和经堂；西藏现行政治和军事制度均不予变更；藏军改编入国防武装之内；帮助西藏人民发展文化教育和农牧、工商业。今后凡是为发展政治和谋求人民幸福的一切办法措施需要改革时，要与人民及其主要领导人协商，在大家同意的原则下进行决定；尊重宗教信仰和地方风俗习惯，过去与英美两国及国民党的一切关系，不予追究。.....目前汉藏和谈很快进行的话，汉政府提出的各条款中有不适西藏情况的可将利弊详细说明，共产政府方面绝不存在举剑威吓、强迫或压制不让申述利弊的作法，一切可以心平气和地进行商谈决定。在下我等再三思索回顾，确无强迫命令的想法和作法。此事包括共产政府在内的和在下四十名文武僧俗官员敢作担保。.....

噶伦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40名文武官员，可算是噶厦的重臣良将。昌都一战，全部归顺了共产党，而且都得到妥善的安排。阿沛本人更是被待若上宾。这使噶厦内外大为震动。一连几天，拉萨城的街头巷尾都在议论这件事。看来这些汉人解放军，既不同于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军队，也不同于前清川边总督赵尔丰的兵丁，更是不同于1904年打进拉萨来的英国人荣赫鹏的洋兵。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呢？阿沛来信的内容真靠得住吗？

金中和桑林两位信使在拉萨成了新闻人物。他们却因旅途劳顿困得要命，只想睡觉。

不料，几天之后的一个清晨，两位信使一觉醒来，忽然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如意至宝”达赖喇嘛已经在头天夜里简装轻骑，逃往亚东去了！这是1950年藏历11月11日。

达赖喇嘛还将从亚东逃往印度！

达赖喇嘛滞留亚东

原来，对于阿沛等 40 名官员的来信，噶厦大员们半信半疑，还有人又气又怕。他们感到，如果继续与解放军作战，已没有力量：派代表和谈吧，又有点于心不甘。于是，就在神前打卦抽签，问达赖喇嘛是留在拉萨，还是前去印度。结果，卦签上写着的是“出走”。因此，便秘密拟定了出国计划。

噶厦给留在印度的孜本（审计官）夏格巴发报，通知他昌都失守，拟请达赖出国，令其选择驻锡之地。几天后，夏格巴回电称：对达赖出国之事英美等国答应协助，印度将派兵接应。

藏历 11 月 11 日凌晨，达赖喇嘛临时任命大堪布罗桑札喜和孜本鲁康娃为司曹，代理摄政职务，自己则换上普通服装，离开了布达拉宫。

达赖骑着一匹灰色良种马，带着 40 名贵族官员和 200 名藏军，沿着拉萨河谷，在曲水宗的江村渡过雅鲁藏布江。不料经江孜抵达亚东后，世界形势却发生了变化。印度政府慑于国际舆论的压力和中国政府的警告而收回了承诺；英美等国又怕达赖出国后失去现有地位，班禅掌管西藏大权。所以，当噶厦请求印度政府迎接达赖时，印度政府的回答竟然是：按照国际公法，达赖喇嘛为求得生命安全，印度准许其避难，但只能作为难民对待。印度的回电传到噶厦官员手中，全场哗然。当难民，那是他们无法接受的耻辱，但无功而返又没台阶下，达赖一行就此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就在达赖喇嘛从拉萨出走的同一天。人民解放军向在类乌战役中漏网的七代本普隆巴发起追击。普隆巴跑到洛隆宗（县）后，以一部分兵力控制了怒江上的嘉峪桥，同时收集散兵游勇和被解放军遣散的藏军 200 余人，扬言要进行“反攻”。为消除隐患，巩固前进阵地，52 师师长吴忠命令 154 团歼灭该敌。团长郑晋武亲率一个加强连，奔袭 200 里，于 11 日傍晚 18 时突然出现在嘉峪桥头，夺取了被破坏的嘉峪桥，突破怒江天险；在宗本代理人和本地农牧民的协助下，他们又行军 180 里，于 12 日凌晨包围了洛隆的藏军。七代本普隆巴从梦中惊醒即被活捉。

1951 年元旦，昌都人民解放委员会成立，辖西藏东部两个办事处 28 个宗（县）。主任为王其梅，副主任和委员中有阿沛·阿旺晋美、平措旺介、大活佛帕巴拉、德格女士司江央白姆等人。同时成立的还有昌都地区僧俗人民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工作委员会，主任为阿沛·阿旺晋美。因为中共中央确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战略，解放军便在昌都附近待命，等着达赖方面的选择。

周恩来与夏格巴

在与昌都遥遥相对的世界屋脊的另一端，阿里高原的扎麻芒保，新疆骑兵支队先遣连，已经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群众工作。他们散发毛泽东画像和藏语传单，帮助群众放牧、打柴、背水、治病、拣牛粪。当时先遣连的供应十分困难，他们仍然节衣缩食，拿出自己的布匹、衣服、粮食、茶叶、块糖等物品来救济贫苦牧民。与他们接近的藏民逐渐增多了。先遣连在阿里的群众工作与和平谈判是成功的。今天，我们从历史档案里还能翻出阿里那日过力松木区代表才旦朋杰、扎西才让致毛泽东的电报：

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

敬启者：中央人民政府军官李狄三，抵达那日过力松木区，同我们结成了朋友并听从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因此没有引起一点战争，很好的和平实现了。这次我们的两个邦保申请达赖活佛，让藏政府和中央人民政府和平协商，听从中央人民政府命令。……

令人遗憾的是，西藏上层人物中，并不都是如阿里两邦保那样，诚心诚意地愿“做中央人民政府的老百姓”，他们中有那么一些人总想煞费苦心打出一面“独立国”的小旗，与中央人民政府对垒。

早在1950年4月，就有一封电报从印度加尔各答发给“毛泽东阁下”，要求中央人民政府派代表“赴港商谈”。署名者之一是“孜本·夏格巴”——20多年后，此人以一本《西藏政治史》鼓吹“西藏独立”，颇获得一些人的喝彩。过了一个月零八天，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发了一封复电：“你们的代表团是西藏地方政府派至中央人民政府商谈西藏地方事务的代表团，不能称为西藏派赴中国外交代表团，谈判的地点必须在北京，不能在香港。”

夏格巴先生和他的同伴接电后便陷入了沉默，加上蓝眼睛朋友的阻挠，迟迟未能成行。

1950年8月2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复电驻印度大使馆申健代办，指示其坚持“中央政府对西藏代表团之方针：西藏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我不能承认该代表团为西藏之外交代表”；“由印经香港去北京既有困难，请考虑转回西藏经由国内其他路线如青海、西康、云南等地前往北京”。

1950年8月19日，周恩来总理再次致电驻印度大使馆申健代办，传达了极其重要的信息：

……印度政府承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并经过其驻北京大使表示印度政府对西藏从来没有现在也没有任何政治或领土野心，并说其他国家也不会干涉西藏……印度政府曾向我国大使馆表示甚愿我西藏代表团早日到达北京，并闻英国政府已撤消其拒发签证的决定。如此，西藏代表团更可早日动身……你们以极关心和极友好的态度助其早日成行，并予以很好招待为要。

周恩来的电报，如在布满阴云的西藏天空划亮了一道闪电，若是夏格巴等人顺利成行，和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在京举行谈判，虽然决不会像后来的阿沛五代表那样取得圆满成功，但是，必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后来的历史进程。

但是，就在夏格巴代表团拟于6月5日由加尔各答搭机经香港去北京谈判之际，他们的英国朋友临时取消了签证，到使他们未能成行。

夏格巴被历史轻轻抛弃；
历史在选择新的人物；
这个人物正乘马匆匆赶来；
历史将使他倏然间闪闪发光。

达赖授权五人代表团

滞留在中印边界亚东“东噶寺”的达赖喇嘛，整天在一种进退两难的窘迫中打发日子。

1951年1月11日，滞留在亚东的噶厦召集官员会议。这是西藏地方政府的一次重要会议。在喜马拉雅的那个边境小镇上，他们反复权衡利弊，给达赖喇嘛上了一篇呈文。呈文引用印度外交大臣梅农博士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会见西藏代表时的话说：看来西藏政府通过和平谈判是上策……

这次西藏噶厦的一些“洋朋友”几乎是众口一词地劝说噶厦，又不约而同地伸出手来，把它推向谈判桌。想想一年多以前，“洋朋友”那样起劲地鼓动噶厦驱汉；想想三个月前那样卖力地支持噶厦凭据金沙江顽强抵抗；再想想……如今噶厦不能不感到一种深深的失落和孤独。

1951年1月18日，达赖喇嘛派员给新德里的中国大使袁仲贤带去了哈达、礼品和一封信。信中说：

过去，在我年幼未掌权期间，藏汉之间的友好关系屡遭破坏，对此深感遗憾。……近日已通知阿沛及随员从速启程赴北京。但因路途遥远，不易及时赶到，为争取时间，我们将再给阿沛派去助手，经印度前往北京。我现派出信使扎萨索康苏巴和堪仲曲配土登。他二人带去全体噶伦、西藏会议及人民的详细书面报告，向您呈报。请您将增进藏汉友好关系的纯正善良愿望，向尊敬的毛主席及时转呈。并请及时回复，以便使我放心。附赠哈达一条，上等地毯一床。

与此同时，西藏官员大会也给袁仲贤大使写了一封同一内容的信。

由于达赖喇嘛和西藏官员大会的人们这一次态度是诚恳的，行动是积极的，因而很快得到了满意的回音。仅仅13天，前往新德里的曲批图丹（曲配土登）和扎萨索康就带回了袁仲贤大使给达赖喇嘛和西藏官员大会的复信。

袁大使在信中，对收到达赖喇嘛的信和礼物表示“衷心欣慰”，说“毛主席令我代表祝贺你的执政”，“中央同意而且欢迎你加派代表经印度乘飞机到香港转广州赴北京。我们驻印度大使馆给以一切旅行上的便利和帮助”。

喜马拉雅的上空，逐渐“阴转多云”。早春的暖风开始吹拂冰封的高原。亚东的东噶寺庙里达赖喇嘛向佛祖问卜祷告，终于批准派遣一个5人代表团赴北京进行谈判。

达赖喇嘛批准噶厦任命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谈判代表，任命堪穷（四品官）土登列门，代本桑颇·登增顿珠为代表，三人由陆路赴北京；任命在亚东的藏军总司令凯墨·索安旺堆和僧官仲译钦波（秘书长）土丹旦达为代表，由印度乘飞机经香港进京。噶厦给每个代表颁发了一份盖有印章的全权证书，注明西藏全权谈判代表5人每人的姓名和身份。里面有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等内容，可答应每年向中央政府进贡，此外不能做任何许诺等字样。这些全权代表的领衔人物，便是西藏地方政府的噶伦、昌都军政总管——阿沛·阿旺晋美。

1951年3月29日，阿沛·阿旺晋美首席代表启程去北京。昌都军民数千人夹道相送。

阿沛的颈项上挂满了洁白的哈达。他骑在马背上凝望着身前身后的同胞，把马步放得很慢很慢。

这位42岁的首席全权代表，湿润的眼角在莹莹发光。

周恩来、朱德亲迎贵客

山城重庆的春晨多雾。4月20日的晨雾淡散后，一架飞机升上晴空，载着阿沛代表一行飞经西安去北京。

中央人民政府关注着这架载有重大使命的飞机。中午12时15分，飞机降落西安机场加油，中央民委李维汉主任电话通知：因北京风大，请西藏和谈代表团改乘火车来京。早已迎候在那里的中央民委副主任汪锋，细致妥贴地安排了西藏代表在古城半天的活动，举行了丰盛的晚宴。晚宴上西藏和谈代表们意外地遇到一个人，这便是青海的喜饶嘉措大师。他原是阿沛求学时的老师，现在是青海省人民政府的副主席。喜饶嘉措大师是享有盛名的佛学大师，在全国藏区名闻遐迩。阿沛在这里见到自己的老师，真是又惊又喜。喜饶大师是个爱国活佛，为了劝说西藏地方当局与中央人民政府早日和谈，曾经在电台发表过藏语讲话。因此，他对自己的得意弟子阿沛率领西藏代表赴京和谈十分赞赏。席间谈笑风生，对阿沛多有勉励，阿沛很受鼓舞。

当晚11时35分，在汪锋的陪同下，阿沛等西藏部分代表乘坐列车离开西安。

1951年4月22日傍晚，北京车站的迎客站台上簇拥着数百名欢迎的人群。19点10分，当阿沛·阿旺晋美和其他西藏代表走下列车的时候，他们很快便被鲜花和儿童包围了。引领着儿童和鲜花的，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周恩来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还有中央各部委的部长和主任们。共和国总理目如朗星，解放军总司令威武而和善，他们有力的大手一一紧握着雪域高原和谈代表的手。他们朗朗的笑声，亲切的问候，驱散了北国春夜的寒风。阿沛代表一行刚刚踏上北京的土地，就感觉到了春花的芳香和春意的浓烈。

游龙般的车队在星夜灿烂的长安街上行驶，西藏代表们被送进豪华的北京饭店。

4月28日晚上，周恩来总理、李济深副主席、陈云和黄炎培副总理等宴请西藏和谈代表。周总理身穿深灰色呢制中山装，浓眉如雁翎高耸。双目似彗星四射，祝酒词像敲击燧石一样，点燃人心头的一盏灯，一团火。共产党里的大人物真是一个个都像夏夜天空的大星那样让人敬仰啊。

历史性的记载

4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第一次谈判，在北京军管会交际厅举行。

中央人民政府的全权代表有4名：首席全权代表李维汉，全权代表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

李维汉是中外闻名的老共产党人，党内的统战和民族问题专家，时为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兼中央民委主任。张经武是井冈山时代的红军师长，开国后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同时还兼任军委人民武装部部长。青年将军张国华其时尚未到达北京。他是5月15日方才赶到的。孙志远是西南军政委员会的秘书长，戴着度数很深的眼镜，看上去像个文质彬彬的教授。

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有5名：首席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全权代表凯墨·索安旺堆，上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

除了阿沛之外，凯墨·索安旺堆就是西藏代表里最有实力的人物了。他身为藏军总司令，握有兵权，又是噶伦索康的叔叔，而且他从亚东达赖的身

边来，噶厦对他面授机宜，他的权威性自然是不容忽视的。土丹旦达是一名僧官，译仓的大秘书长，为人耿介，在西藏有一定威望。土登列门系达扎摄政的副官长，是个实权派人物，噶厦的一些大员们见了他都笑脸相迎，避让三分；桑颇·登增顿珠是个贵族公子，藏军第二代本——团长。

此外，还有两位列席谈判的干部，这就是平措旺介和乐于泓。乐于泓后为西藏工委宣传部长。担任翻译工作的是中央民委干部彭哲，由于他的青海口音较重，后来平措旺介也帮助进行翻译工作。

第一次谈判气氛舒缓而融洽。双方代表互相验看了全权代表证明书后，未谈具体问题。只是洽谈程序、步骤。李维汉说：“我们是一家人，大家商量把事情办好。”谈判桌上散发了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和平谈判的十项条件，即西南局为进藏部队制定的“十项公约”，供代表们参考。同时还研究了关于“五·一”节请阿沛和班禅上天安门主席台的问题。最后阿沛首席代表提出：黑河、新疆解放军均在推进，达赖能否留住西藏已成问题。希望解放军不再推进，他们将以代表团名义电告达赖，请他勿去印度。李维汉首席代表答应请示中央。

5月2日下午谈判继续进行。

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与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为了寻找一个共同点，在进行坚韧的努力。

西藏代表表示接受中央关于和谈的十项条件。但认为进军问题是焦点。因为噶厦政府曾交待不得许诺，所以这个条款不能接受。

李维汉指出：进军西藏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中央人民政府帮助少数民族解放，免受帝国主义侵略，西藏是我国西南国防的前哨阵地，更需要有强大的国防军驻守。

在休会的两天中，中央政府的代表和工作干部耐心细致地向西藏代表介绍解放军的宗旨和优良作风，并拿出清代历史文献，证明中央有权派军队入藏，而且早有先例。说明巩固国防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希望他们消除顾虑，积极协助就人民解放军进藏问题达成协议。

阿沛首席代表经过反复考虑，首先接受了中央人民政府代表的意见，他劝说其他代表也逐渐接受了这一意见。

5月7日，举行第三次会谈，双方代表确定了进军西藏、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

随着和平谈判的深入，难题一个一个的解决，中央和谈代表重新将维持班禅的固有地位及职权这一问题提到议程上。但是，西藏和谈代表认为这一次是来谈和平解放的事情的，不是谈班禅问题的；而班禅的合法性噶厦政府还未承认呢。

中央政府代表李维汉拿出了原国民党中央政府李宗仁代总统给十世班禅的封文，还有班禅在青海塔尔寺坐床的一些照片。”西藏代表终于承认了班禅的合法地位。

既然承认了班禅大师，就得恢复班禅大师固有的地位及职权，就必须把这一条写进《协议》里法定化。西藏和谈代表表示还要发电报向在亚东的达赖喇嘛请示。

直到5月28日，和谈代表团接到达赖来电，表示完全同意班禅问题列入协议，至此，代表团全体成员心里的一块石头方才落地。

20多个日日夜夜，周恩来关注着谈判的一切。他精细入微地听取汇报，

亲自安排西藏和谈代表的参观活动，嘱咐要把协议的藏文本翻译好……

黄河与长江的大波推出了这样一个日子，喜马拉雅的石壁上镌刻着这样一个日子，中国大陆的解放史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日子——

1951年5月23日。

下午4时许，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字仪式。主持签字仪式的朱德、李济深、陈云肃立在巨幅五星国旗下，他们的左首站立着中央和谈代表团李维汉等4位代表。坐在长桌前签字的是阿沛·阿旺晋美等5位西藏和谈代表。他们使用着书写藏文所特用的竹笔。

5月24日晚上，为了庆祝协议的签订，毛泽东主席举行了盛大宴会。应邀出席的有班禅大师及其堪厅随员；西藏地方政府的5位全权代表及其随员，中央人民政府的4位全权代表及有关人员。应邀作陪的，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李济深，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以及首都各界著名人士180余人。

宴会的气氛十分热烈，毛泽东、班禅和阿沛都在宴会上讲了话。毛泽东兴致勃勃讲了很多，他着重强调了团结。他说：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满清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和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今后，在这一团结的基础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

5月28日，《人民日报》用藏汉两种文字公布了协议全文，发表了社论，并报道了谈判经过。辽阔的中国大地上，有许多地方群众集会或游行，热烈欢庆祖国大陆全部解放。班禅大师也发表声明，表示拥护“十七条协议”。

1951年7月13日上午，在距离亚东半日路程的国境界山乃堆拉山口，出现了一行穿着各式服装的人。为首的是一个身穿灰色制服的清瘦的中年人。他，便是从北京出发，飞经香港、新加坡、新德里，星夜兼程赶来的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全权代表张经武将军。他带来了毛泽东主席给达赖喇嘛的亲笔信。在张经武代表的亲切劝说下，同时也在护神吉祥天女“神卦”的指引下，十四世达赖丹增嘉措于7月21日启程返回拉萨。

协议签订后，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人民解放军分四路向西藏挺进。1951年10月至12月，先后到达古城拉萨，以及江孜、日喀则、亚东、阿里等边防重地，把五星红旗插上了喜马拉雅山。至此，祖国大陆全部解放。

第三章

扬长避短，共和国勇士首次出证。克拉克上将痛苦表示“我成了历史上签没有胜利停战条约的第一个美国陆军司令官”。

第一节 从台湾战役到抗美援朝

三八线上炮声隆

1950年6月25日，寂静的“三八”线两边，朝鲜南北双方的士兵正在隔着这条临时军事分界线相互对视着。突然，一声尖锐的枪声划破夜空。紧接着，震耳欲聋的炮声平地而起……历时3年又一个月的朝鲜战争终于爆发了。这一天，蒋介石正在吃早饭，负责给蒋介石递送情报的蒋经国匆匆走进。“什么事，这样慌慌张张。”

蒋经国连忙站住：“我们收到一些情报，说南北韩之间发生了战争。”

蒋介石接过简报，只见上面零星混乱报告了有关战事。“命令所有情报部门加紧对韩战的情报收集，通知美国和日本使馆密切注意美国政府及远东美国的动向，有什么情况立即报告。”蒋介石激动地下达了一连串命令。

直到深夜10点，始接到国民党台湾政府驻南朝鲜大使邵毓麟的首次报告，才了解大致的战况。

令蒋介石望眼欲穿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似乎终露端倪。他对朝鲜战争的反应，大致与邵毓麟在报告中的分析不谋而合。邵说：

韩战对于台湾，更是只有百利而无一弊。我们面临的中共军事威胁以及友邦美国遗弃我国。与承认匪伪的外交危机，已因韩战爆发而局势大变，露出一线转机，中韩休戚与共，今后韩战发展如果有利南韩，亦必有利我国，如果韩战演成美俄世界大战，不仅南北韩必然统一，我们还可能由鸭绿江，由东北而重返中国大陆。如果韩战进展不顺而不利南韩，也势必因此而提高美国及自由国家的警觉，加紧援韩决不致任今国际共党渡海进攻台湾了。

果不出所料，朝鲜战争一发生，美国立即派第7舰队协防台湾，台湾因此而喘了一口气。对于美国公然武装入侵我国领土台湾，直接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动，中国人民表示了极大的愤慨。1950年6月28日，毛泽东主席发出号召，提出：“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随后，全国开展了“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这一运动不久以后发展为抗美援朝运动。

美国出兵台湾，使新中国面临的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6月30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向海军司令员肖劲光传达了中央新的战略方针：“形势的变化给我们打台湾增添了麻烦，因为有美国在台湾挡着。”“现在我国的态度是，谴责美帝侵略台湾，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军队的打算是：陆军继续复员，加强海、空军建设，打台湾的时间往后推延。”

军事重点由南向北

自美国出兵朝鲜和台湾后，新中国在东北和台湾海峡两个方向都受到严重的军事威胁，而当时的东北是中国的工业中心，战略地位更为重要，所以中共中央在军事上的注重点自然转到东北边防问题上。7月上旬，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7月13日，中央军委任命粟裕、肖劲光为东北边防军的正、副司令员，邓华为第13兵团司令员（当时准备将东北边防军建成一个下辖几个兵团的大单位）。尽管粟裕、肖劲光二人因故都未到职，但是中央军委决定这两位原定的台湾战役的主要指挥员到东北边防军任职，这本身就说明了中央军委战略重点的转移。

在推延攻台计划的同时，中央军委对于是否攻击金门等沿海岛屿的问题还一时未最后决定。6月下旬至7月下旬，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部队对美国介入台湾海峡的程度采取密切注视的态度，攻金准备工作一时还未停顿。原定入闽配合第10兵团进攻金门的第24军、第25军和炮3师继续按原部署于7月间入闽。7月上旬，人民解放军华东海军协同陆军攻占了浙江东北部海域的部分岛屿，7月12日解放军华东海军又突袭了浙东的披山列岛。7月下旬，福建军区发现金门守军有撤退迹象，于是派遣1个营渡海对大担岛进行武装侦察（因遇7级大风侦察失败）。在7月下旬以前，美军的舰只是在台湾海峡中巡逻，还未直接支援华东沿海岛屿上的国民党守军，这些岛上的国民党军仍准备撤退台湾。胡班在1976年8月在台湾发表的《金门旧忆》中也公开承认说：

七月中旬我军曾有放弃金门的计划。后经东京美军当局的劝告“与共产党斗争，寸土不让”，我乃仍坚守不放。正当决定撤守并准备实施时，7月23日，国防部忽派专员送命令来——仍然准备在金门作战。

7月13日远东美军司令麦克阿瑟率16名高级官员组成的代表团抵达台湾，次日和蒋介石签订了“保卫协定”；8月4日，美国空军第13航空队司令抵达台湾，并成立台湾前进指挥所。由于美军的直接干涉，国民党军停止从金门撤军，并又进占了刚刚放弃的浙东部分岛屿。

考虑到美军介入台湾海峡后的形势，8月11日中央军委致电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同意陈毅的意见并指示：台湾决定1951年不打，待1952年看情况再作决定。金门可决定在1951年4月以前不打，4月以后待命再打。随后，人民解放军停止了攻击金门和沿海其它岛屿。当时，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空军，麦克阿瑟又预料人民解放军会在台湾海峡进攻，在那里做了充分的准备。据美国军方后来公布的材料说，“麦克阿瑟特别关心福摩萨（台湾）问题。他发誓说，如果赤色中国愚蠢地去进攻那个岛屿，他将火速赶去指挥。”麦克阿瑟甚至说：“我每个夜晚都祈祷赤色中国能这样做——我常常是跪下来在那里祈祷。”在这种情况下，人民解放军再实行渡海作战显然是以我之短击敌之长，而选择陆地战场同美国侵略者进行较量，则能充分发挥我军的优势。

毛泽东收到一份不合宜的“礼物”

1950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纪念日。在北京的街头巷尾，到处是一片欢乐的节日气氛，一派和平的景象。

然而，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却在这喜庆的日子里，收到一份不大合宜的

“礼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首相和朴宪永外务相打来的加急电报。内容大意是：

毛泽东同志：

……自9月中旬美军在仁川登陆以来，对我们已造成了很不利的情况。敌人利用上千架的各种飞机，不分昼夜地轰炸我们的前方与后方，我们兵力和物资方面的损失是非常严重的。敌人登陆部队与南线部队已经连接在一起，切断了我们的南北部队，如果敌人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此危机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及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北京的国庆焰火尚未熄灭，欢乐的人群还未完全离开天安门广场时，中南海颐年堂的会议厅，毛泽东主席在紧张严肃的气氛中开始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面临的严重局势。

是日夜间，南朝鲜陆军第3师开始越过“三八线”向朝鲜北部进犯。10月2日清晨，麦克阿瑟又根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定下达了“联合国军”第2号作战命令，命令正在“三八线”南侧集结待命的“联合国军”部队立即从陆地和海上同时越过“三八线”向北进攻。于是，在“三八线”两侧，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攻防战斗。但是，朝鲜人民军因火力、人力大大逊于“联合国军”而陷入劣势，被迫向北撤退。顷刻之间，装备有大量飞机大炮和坦克的“联合国军”猖狂北犯，将侵略战火迅速烧向中朝边境。

鉴于这种严重局势，毛泽东主席左思右想之后，于10月2日凌晨2时，给高岗、邓华发出紧急电报称：

- (1) 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行动身来京开会；
- (2) 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
- (3) 请邓华将准备情况及是否可以立即出动即行电告。

10月2日午后，高岗匆匆飞抵北京，他早已预测到，毛泽东此次紧急召他进京，无疑是出兵援朝问题，所以他内心已定：这次无论如何再也不能强调边防军准备不充分了。下午3时左右，毛、朱、刘、周、高及代总长聂荣臻等在颐年堂开会。毛泽东一开始就拿出一份电报对高岗说：“这是金日成来的急电，我们都看了，给你看看。”稍后，毛泽东说：“朝鲜的形势已如此严重，现在不是出兵不出兵的问题，而是马上就要出兵，早一天和晚一天出兵对整个战局极为重要。今天先讨论两个迫切的问题，一是出兵时间，二是谁来挂帅。”高岗首先插问：“挂帅人选不是已决定林总吗？”毛泽东略显急躁地答复说：“挂帅人选原先考虑派粟裕同志，但粟裕确实有病，正在青岛休养，前些日子他托罗瑞卿给我带来的信中谈到病情仍很重，我回信就劝他安心休养吧。后来由于美军和其他帮凶国家的军队大批进入南朝鲜，飞机、坦克大量增加，形势越来越严重，我们认为出兵援朝已不是几个军就能够解决问题的，可能各个野战军将来都要参加援朝作战。根据这一变化，常委几个同志又考虑派林彪同志来挂帅，谁知林彪认为我们国内战争刚刚结束，各方面都未就绪，他强调美国是最大的工业强国，军队装备高度现代化，1个军就有各种火炮1500门，而我们1个军只有36门。美军有强大的空军

和海军舰艇，而我们海、空军才刚刚开始组建。我军入朝作战既无空军掩护，又无海军支援，他认为在敌我装备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如若贸然出兵，必然是‘引火烧身’。其严重后果不堪设想。”

毛泽东吸了几口烟后接着说：“前些日子我找林彪谈了一次话，说明我们为什么冒险出兵，不出兵将来会有什么结果，出兵有哪些有利条件，对美帝国主义应该采取什么对策，可是林彪表示说他每晚失眠，身体虚弱多病，怕风、怕光、怕声音，哎呀呀，他有这‘三怕’怎么率兵打仗呢！”

鉴于朝鲜战争发展变化的实际形势，中国派兵援朝的必要性紧迫性越来越突出，中国援朝志愿军的挂帅人选问题对毛泽东的困扰也就越来越大。经过两昼夜的反复思考后，他考虑到了彭德怀。

彭德怀临危受命

10月的北京，几场秋雨过后，路旁的杨柳，虽枝叶茂盛，但已略显枯黄。

4日下午4时10分，一辆汽车由西郊机场飞速地直奔西直

门大街，大街上熙熙攘攘，一派节日的和平景象。旧式的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地穿来穿去忙个不停。彭德怀从车内注视着街道两旁的机关、学校门楼上的大幅标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他感慨地说：“咱们的新中国已经满一周岁了。新中国的诞生真不容易呀！这是千千万万的生命换来的！这是我们党奋斗了几十年才取得的成果。”听了彭德怀的话，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处长李树槐也说：“是呀！去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当时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热烈沸腾，中央和各大区的领导人差不多都来到北京参加开国大典了，可惜你没有亲眼看看当时欢乐的场面。”

彭德怀若有所思地说：“去年新中国成立时，我正在甘肃武威指挥部队进军新疆哩！不是不想来，而是前线离不开呀！”

汽车通过具有民族风格的西四牌楼，很快就进入中南海的西门，然后汽车停在“丰泽园”门前，彭德怀急忙下车，随李树槐向后院的颐年堂走去。

当他来到颐年堂前时，周恩来总理首先迎出来与彭德怀握手。周恩来解释说：“彭总，会议下午三点就已经开始了，来不及等你，因为政治局会议定得很仓促，昨天就准备派飞机去接你，可是天气不好，只好推迟到今天。搞得你很紧张吧？吃过午饭了吗？”“吃过了。”彭德怀一边回答一边随周恩来进入会议厅。

毛泽东主席和政治局委员们见彭德怀赶来参加会议，都站起来和他握手。

毛泽东发话道：“老彭，辛苦了，你来得正好！美帝国主义军队已越过三八线了，现在政治局正在讨论我国准备出兵援朝的有关问题，大家正在发表意见，请你也准备谈谈你的观点。”彭德怀坐定之后，猛然发现会议气氛很严肃，包括和他同舟共济，在戎马生涯中度过了几十年的朱总司令见了他也没说几句话，有的同志更是只握手不说话，使他立刻感到这是一次不寻常的政治局会议。由于他来京前，满脑子里装的是如何建设开发大西北的经济问题，对中央召开这样的紧急会议，思想上并无准备，所以他只好侧耳静听。从几个同志的发言中，他才知道对出兵支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有些不同意见，有的主张不出兵，有的主张暂不出兵，共同的理由是：

(1) 我国经过了几十年战争的摧残，战争创伤急待恢复，而财政又十分困难；

(2) 国内还有部分边远地区和沿海岛屿尚未解放，约有 100 万国民党残余部队和土匪尚急待肃清；

(3) 广大的新解放区尚未进行土地改革，新建的政权也还不巩固；

(4) 我军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的装备，更无制空权和制海权；

(5) 由于长期战争的艰苦生活，有些干部和战士产生了和平厌战思想情绪，等等。

参加会议的大多数同志认为目前我国的情况是困难重重，出兵问题应慎重从事，聂荣臻元帅后来在回忆这次会议的情况时写道：“总之，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

毛泽东听完与会者的讨论后，对我国是否应该出兵援朝问题，在会议最后讲了以下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因为彭德怀是在会议开了两小时后才赶到会场，还不了解会议进行的全部情况，对这事关国家命运的大事，他也就没有轻易发言表态。

第二天上午 9 时左右，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来到彭德怀下榻的北京饭店。他和彭德怀两人在房间交谈约 1 小时后，即同车去中南海。因为在昨天下午政治局的会议上，彭德怀未曾发言，毛泽东不知道他对出兵援朝是什么态度，而且常委已决定派彭德怀率军入朝，因此想亲自听听他的意见和看看他是什么态度，所以特派邓小平接他来中南海个别交换意见。当彭德怀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两人在沙发上坐下后，毛泽东点起一支烟用力吸了一口说：“老彭，据朝鲜来的情况，美军和南朝鲜军队正大批越过‘三八线’，因此政治局今天下午还要继续开会，在昨天的会议上，你没来得及发言，可你都听到了吧，大家摆了很多困难，当然，我们现在确实存在一些困难，有些是严重困难，但是怎样战胜困难，克服困难，我们还有哪些有利条件？不知道你彭老总是怎么考虑的！”

彭德怀喝了一口茶，望了望毛泽东疲倦的眼神，直言坦率地说：“主席，昨天晚上我几乎没有睡觉。我把你讲的四句话，反复思考了几十遍，我体会到这是一个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问题。如果我们只强调困难的一面，不同美军正向鸭绿江进犯的危急后果联系起来考虑，不仅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难保，就连我国东北边防也直接受到威胁。出兵有利还是不利？经过反复考虑后，我拥护毛主席出兵援朝的英明决策。”

毛泽东听着彭德怀的话一边赞同地频频点头，一边兴奋地说：“嗯，好哇！还是你彭老总战略远见，看来你是百分之百地支持我的意见罗！”然后毛泽东又仰躺在沙发上高声说：“我们有些同志，只看眼前，看不到将来，更有人被美国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我们过去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争，不都是以劣势装备战胜了优势装备的敌人吗？”毛泽东的话音越来越高，他的话，显然是有针对性的。

两人又沉默了一会儿后，彭德怀将话题接过来继续说：“我们确有许多困难，大家摆的情况也是事实，但是，敌人也有困难，他们兵力不足，补给线长，从美国本土离朝鲜大约 5000 多海里，我们应全面观察问题。但如果让敌人占领了全部朝鲜半岛，这对我国威胁很大。过去日本人进攻中国，就是以朝鲜为跳板，首先进攻我国东三省，然后又以东三省为跳板，大举向关内

进攻的，这段历史教训不能忽视。这次我们的作战对象，虽然是在武器装备方面占绝对优势的美国侵略军，我们既不能轻视敌人，但也不能过低估计自己。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他的兵力是24万人，有空军支援，武器装备几乎都是美式的，比我军装备不知要好多少倍。我军只有25000人，只占敌军的十分之一，武器落后，每枝枪平均不过几十发子弹。陕甘宁边区地瘠民贫，人口才100多万，为什么我们能打败了胡宗南？一是我们是正义战争，是自卫战争；二是边区群众的大力支援；三是靠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现在我们已取得了全国政权，有几百万军队，有全国人民的支援，我们有对付优势装备敌人的经验，只要我们在战略战术上不犯重大的错误，我们就有信心打败美国侵略军。”

毛泽东聚精会神地听完彭德怀叙述的观点后高兴地用手捶了一下沙发大声说：“你分析得对喽！看来我们是想到一起了。现在美军、英军和南朝鲜军队正越过‘三八线’向平壤接近，麦克阿瑟已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出最后通牒，朝鲜已处于危急时刻，金日成同志要求我国尽快派兵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当前出兵援朝已是关键时刻，如让敌人前进到鸭绿江边，其后果不堪设想啊！”

彭德怀同意地说：“主席分析得很对，我们现在就是要和敌人抢时间，不能再举棋不定了。”话题至此毛泽东一面吸烟，一面侧过身来对彭德怀微笑说：“老彭，你看，带兵去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这样艰巨的任务，派谁挂帅合适呢？”

彭德怀急问：“我听说中央不是早已决定派林彪同志去吗？”

毛泽东即刻紧锁双眉两眼一闭，若有所思地叹了一口气：“是啊，前些天我和恩来、少奇、朱老总商量的一致意见是派林彪去，因为他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是东北地区的领导人，是东北第4野战军的司令员，现在集结在南满的4个军都是原东北地区的部队，一旦打起仗来，首先也要靠东北地区支援。我国长白山地区的地形特点，民情风俗和朝鲜北部的情形大体相似，从各方面考虑，派他去率军援朝，是很合适的。可是，我前些天去征求他的意见时，他精神有些紧张，强调身体不好。每晚失眠，怕光、怕风、怕声音，硬是不接受任务。”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继续说：“现在很明显，这场战火很快就会烧到我国的大门口，情况危急哟！我们必须当机立断，马上出兵。既然林彪说他有病不能去，常委几个同志商量的意见，这副重担，还是请你彭老总来挑，这是一场比保卫延安更艰苦复杂的战争，不知你的身体情况怎样？你可能思想上还没有这个准备吧，你考虑有什么困难？”

说到这里，毛泽东两眼注视着彭德怀。此时，屋里呈现短暂的沉寂。片刻之后，彭德怀面对毛泽东，两道浓眉一扬，刚毅果断地说：“主席，我这个人的脾气你很了解，我服从中央的决定！”“还是你老彭在中央为难之时，坚决支持和服从中央的决定，这我可就放心了。现在美国已大批向北冒进，我们不能再等待，要尽快出兵，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说说你对出兵援朝的意见，摆摆你的观点。”深为感动的毛泽东略带感叹地讲。

10月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继续在颐年堂开会，对是否出兵援朝问题再次进行讨论。在发言中，仍有两种观点，即强调国内困难很多，主张不出兵或暂不出兵，彭德怀对出兵援朝问题早经过反复考虑，遂胸有成竹地讲了自己的观点，即：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就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

年就是了。如让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如等美国占领了朝鲜半岛，将来的问题更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这样对国内外的反动气焰和亲美派也是个沉重打击。

在彭德怀发言后，毛泽东显然心中早已有数，他向会场环视一周后，用手敲打着桌面说：“我们国内当前存在着一些困难，这是事实，但我认为今天老彭的发言是一针见血，很有说服力。现在是美国人逼着我们打这一仗的，犹豫退缩、担惊害怕都没有用，这些心理和情绪正是敌人所希望的。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在敌人进占平壤之前，不管冒多大风险，有多大困难，必须立刻出兵朝鲜。关于由谁挂帅的问题，既然林彪说他有病已前往苏联养病，我提议由彭德怀同志率领志愿军入朝，协助朝鲜人民军抗击敌人。至于志愿军入朝具体部署和细节，会后我们再和彭德怀同志研究。”

在毛泽东发言之后，会场上严肃紧张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大家都以尊敬的目光投向彭德怀，一致同意由彭德怀挂帅率军援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此，彭德怀没强调任何困难，立即站起来表示：“我还是那句老话，服从中央的决定。”

10月6日上午，彭德怀又参加了由中央军委周恩来副主席主持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就志愿军入朝方案，更换武器装备，后勤供应办法和抽调干部组建彭德怀指挥所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作出了有关决定。会议还决定，议定的各项工作均由代总参谋长聂荣臻负责筹办。紧张的抗美援朝临战准备工作，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朝鲜战场日益严重的局势，使彭德怀不能在北京久留。

10月7日吃过早饭后，他指示秘书把从西安带来的全部文件，清理登记后，马上移交给中央办公厅保密室保存，然后准备出发。当天，彭德怀到中南海毛泽东住处，和高岗一起共同研究志愿军出国第一步作战方案和后勤供应问题，关于彭德怀指挥所设立的位置，毛泽东的意见，为保证安全，免遭敌机轰炸可设在鸭绿江北岸一个隐蔽位置。但彭德怀不同意，彭主张过江入朝与金日成在一起，以便协调两军统一指挥作战。关于志愿军出国作战前后的宣传报道问题，彭德怀向毛泽东提议：“在战斗打响之前，应绝对保密。打响之后，新华社在报道和广播方面也应注意分寸。要设法转移敌人的视线，使其产生判断上的错觉，以便我军各路部队迅速隐蔽过江投入战斗，取得战斗的主动权和有利战机，力争初战的胜利，以提高士气，稳定人心，扭转被动局面。”

千斤的重担，紧张的工作，使彭德怀废寝忘食地忙碌了一天，直到晚上才赶回饭店。因为次日就要离京，他首先进屋看了这两天接来和他短暂团聚的侄儿侄女们，此刻他意识到，这次离别后，何时再见很难预测，遂把他给孩子们买的衣物分给每个人，然后语重心长地说：“伯伯明天就出发执行任务去了，你们要好好学习，不要想家，要经常给妈妈写信，把你们在北京的情况告诉妈妈。”幼小天真的孩子们立刻反问：“伯伯，你明天到哪里去？还是回西安吗？”彭德怀拍拍孩子们的肩膀笑道：“等你们长大了就会知道的，你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接着他叫来秘书吩咐说：“你和小郭把我们带需要带的东西今夜准备好，明晨出发。”

10月8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以特急电报发布命令，内容如下：

1. 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籍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2. 中国人民志愿军辖 13 兵团及所属 38 军、39 军、40 军、42 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所属之炮兵 1 师、2 师、8 师，上述各部须立即准备完毕，待命出动；

3. 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4. 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和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

5. 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

6. 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

同一天，毛泽东还亲自起草了发给我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倪志亮转金日成同志的特急电报，电文如下：

1. 根据目前形势，我们决定派遣志愿军到朝鲜境内，帮助你们反对侵略者；

2. 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方勤务工作及其它在满洲境内有关援助朝鲜的工作，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负责；

4. 请你即派朴一禹同志（内务相）到沈阳与彭德怀、高岗二同志会商与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作战有关的诸项问题。彭、高二同志由北京去沈阳。

10 月 8 日晚上，当倪志亮大使和参赞柴军武将此电报面交金日成首相时，他高兴得两手一拍说：“太好了！”他立刻用手分别拉着倪、柴两人的手进入会客厅，随手拿出几瓶酒请倪、柴一起喝酒言谈。其问他一再对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和中国人民的大力支援表示深深的感谢，并称赞中朝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将永垂青史。

斯大林临阵犹豫

关于出兵援朝问题，本来中苏双方早已商定：地面兵力由中国负责。空军掩护支援由苏联负责。因此当中共中央于 10 月 2 日决定出兵援朝后，毛泽东于当日深夜即将决定电告斯大林，以使苏联空军作出准备。但是当 8 日晚周恩来飞抵莫斯科后，被告知斯大林正在苏联南方黑海之滨克里米亚附近的阿布哈季亚别墅休假，9 日上午周恩来和翻译师哲在苏联元帅布尔加宁的陪同下，乘苏联政府专机飞抵克里米亚，然后乘汽车前往克里米亚以东的阿布哈季亚，当晚 7 时与斯大林开始会谈。苏方参加会谈的有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贝利亚、米高扬、布尔加宁和莫洛托夫。会谈主要协商在中国志愿军入朝时，苏联能出动多少战斗机和轰炸飞机支援中国援朝志愿军，并由谁担任指挥，以及中国地面部队更换苏联武器装备等问题。

出乎预料的是斯大林根据朝鲜战争 10 月 2 日以后的事态发展,判断美国已不惜代价和风险,决心向鸭绿江边中苏边境进攻。他担心如苏联空军在中、苏、朝边境与美国飞机和地面部队作战,可能会引起苏美之间的直接军事冲突,有诱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所以,在出动空军支援中国志愿军作战的立场上犹豫后退了。

斯大林在与周恩来的谈判中,明确表示,苏联可以先给中国 20 个师的武器装备并尽快运到满洲里,但是苏联空军目前尚未准备好,暂时无法出动。其实,空军和陆军不同,飞机调动转场不过三两天就可准备完毕,而当时还有 10 天准备时间,完全可以作好一切准备工作。斯大林的态度,不过是犹豫推诿之意。

中苏这次高级会谈直到次日凌晨 5 时才结束,中方代表周恩来对这一突然变化大吃一惊,立刻感到事关全局,于是他在苏外长莫洛托夫陪同下,赶紧于 10 月 10 日飞回莫斯科,在中国大使馆将苏联空军暂时不能出动的情况迅速电告毛泽东。

毛泽东 10 月 10 日下午收到周恩来的电报后,未曾料到的突然情况立即使他陷入焦虑之中,是马上出兵还是暂缓出兵呢?当夜他又突然收到彭德怀自安东发来的准备 11 日晨入朝与金日成会谈的电报,这两份电报使他翻来覆去更感决心难定。经与代总长聂荣臻商谈后,他决定立即给彭德怀发电,通知彭明天先不要入朝而是和高岗一起迅速回京开会。

这时已是深夜,聂荣臻考虑万一明晨以前彭德怀收不到电报,彭就将入朝会见金日成,于是聂荣臻于 11 日晨 1 时左右赶到总参谋部作战室给彭德怀打电话:

你来电已收到,原定方案有变化!有变化!主席请你和高岗明天迅速回京,中央有事讨论。”

10 月 11 日下午,彭德怀奉命带了指挥所负责人成普由安东乘火车于深夜抵沈阳。12 日,彭德怀在沈阳和高岗召集东北局和东北军区的领导紧急开会,针对他在安东调查到的部队存在的困难,特别是后勤供应问题研究了一些紧急措施和解决办法。当晚 8 时,彭、高又接到毛泽东急电:

(1) 10 月 9 日命令暂不实行,13 兵团各部仍就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

(2) 请高岗、德怀二同志,明日来京一谈。

13 日早饭后,高岗、彭德怀即乘专机由沈阳飞回北京,由聂荣臻代总长在北京饭店迎接,聂说:“下午要召开政治局会议,对出兵问题再次讨论。”

在彭德怀与高岗奉命回北京之前,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已全部越过“三八线”,并已作好大举进攻平壤的准备。10 月 9 日麦克阿瑟以威逼口吻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发出最后通牒:

最后一次要求你和你指挥下的军队,立即放下武器并停止作战。

10 月 10 日下午 4 时,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边又到我国外交部转交了英国外交大臣贝文致我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的电报,称:“如果北朝鲜不愿放

下武器，那么‘联合国军’统帅将无他途可循。”面对敌人大军压境威胁恫吓的情况，金日成首相于10月10日紧急召见我国驻朝鲜临时代办柴军武同志，明确表示：“我们决不会放下武器，决不会投降，我们要抵抗到底。”

11日金日成首相以誓死保卫祖国的决心向朝鲜全国发表广播说：“今天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用鲜血保卫祖国的每一寸土地。”

10月13日下午，毛泽东主席再次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了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彭德怀在会议上汇报了三个问题：（1）与朝鲜代表朴一禹会谈的内容。（2）当前侵朝“联合国军”兵力部署和动向。（3）志愿军各部备战情况和存在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经彻夜会议后，政治局同志一致认为，即使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也必须立即出兵援朝。

会议号召要自立更生，发扬我军历史上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丰富经验，克服各种困难，即刻入朝迎击冒犯之敌。

聂荣臻元帅在回忆毛泽东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对是否出兵援朝作战时写道：“对于打不打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也是左思右想，想了很久。毛泽东同志对这件事确实是思之再三，煞费心血的，最后才下了决心。中央作出最后决定后，彭德怀为防止部队对出兵援朝产生怀疑和松懈情绪，立刻在中南海给他同机飞回北京正在军委作战部待命的成普打电话，让他给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发出急电，要求志愿军各部仍要继续作好出国准备。”

就在13日政治局会议结束后的当晚，毛泽东给仍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发了火急电报：

与政治局的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再压至鸭绿江边，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政治局紧急会议结束后，毛泽东还与高岗、彭德怀进一步研究了志愿军出国时间、渡江方案，以及东北对志愿军后方供应保障问题。

14日清晨，由于天气不好，飞机飞行有困难。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高岗先乘火车离京返回沈阳，立即召集志愿军、东北军区和东北局的负责人开会，传达了政治局的最后决定。宣布立即作入朝的各项准备，并决定准备召开参战部队师以上干部动员大会。

14日全天，毛泽东与彭德怀又详细研究了志愿军的出兵和作战方案，最后确定志愿军各部于10月18日或19日分批渡江，先在平壤以北适当山岳地区组织防御，待机歼敌。

10月14日21时，毛泽东将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13日作出的关于立即出兵援朝的决定和第一步作战方案电告周恩来，其要点如下：

- （1）我已告彭德怀在他到德川研究情况后，在平壤至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构筑两道至三道防御阵地。如敌来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
- （2）美军进攻到平壤需要时间，由平壤再向德川进攻又需要时间；
- （3）我军决于10月19日开动，全军26万人渡过鸭绿江需要10天时间；
- （4）为准备在11月内在敌进攻德川区域时，打一个胜仗，我们决定12个步兵师3

个炮兵师均开进为好；

(5) 在我军开进修筑工事期间，朝鲜人民军方面还是继续抵抗，尽可能迟滞美伪军前进为有利。

毛泽东为什么将上述决定告知周恩来？因为“斯大林本来希望我们出动6个师”而中央根据彭德怀的建议改变了原来的方案，将12个步兵师和3个炮兵师及战车团、高炮团、工兵团等全部出动。中央认为这种改变出兵方案，有必要通告苏方，以使苏联方面了解我国出兵情况，从而尽快解决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困难。

10月15日清晨，彭德怀乘飞机自北京飞回沈阳。这一天他在沈阳一面部署志愿军出兵援朝的各项准备工作，一面又利用短暂时间视察了鞍山钢铁厂和沈阳兵工厂。因为他知道东北是我国重工业基地，打仗要靠重工业，战争的胜负，除了人是主要的因素外，武器是重要的因素。

当他在沈阳参观了刚试制生产的六管火箭炮实弹射击后，又惊又喜地称赞工厂的负责同志说：“你们工作很有成绩！我们也有自己的火箭炮了。”他还亲切地鼓励职工们加紧生产，支援前线，要在技术上精益求精，并指示工厂领导要采取措施，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

15日，由于敌军已全面开始围攻平壤，平壤危在旦夕。金日成首相特派副首相兼外务相朴宪永前来沈阳会见彭德怀。朴向彭说明敌军已逼近平壤，金首相要求中国尽快出兵，并希望与彭德怀同志早日会面。彭德怀告诉朴：“我们中央已最后决定，预定自10月19日开始，部队分批渡江，希望人民军继续阻击敌人，迟滞敌人，我同高岗今天要赶赴安东，去布置13兵团部队渡江计划……”。

蒋介石三度准备出兵朝鲜

1950年6月25日晚，蒋介石在收到驻南朝鲜大使邵毓麟关于朝鲜战争的报告同时，也收到了李承晚由其驻台湾的大使面交的告警求援急电。他当即向李承晚驰电声援，并予以鼓励，表示将采取有效步骤对南朝鲜进行援助。同时在台北阳明山“总统官邸”召集紧急军政会议，出席人员中有陈诚、王世杰、谷正纲、黄少谷、张道藩、张群、雷震、张其昀、吴国桢、俞大维、叶公超、何应钦、周至柔、孙立人、王叔铭、桂永清、蒋经国、黄镇球、彭孟缉等。会上决定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地区从6月26日零时（即25日午夜后）起，全面进入紧急备战状态，实行宵禁，停止三军官兵的休假和外宿，加强台湾海峡和大陆沿岸的海空巡逻，加强各岛及台湾海防的战斗准备，加强台湾的防空和民防措施，加强对交通运输和经济活动的管制，加强特务活动。台湾岛顿时处于弓上弦，刀出鞘的临战状态。

据麦克阿瑟派到台湾担任联络的费尔信上校和汉斯上校透露，1950年6月25日清晨朝鲜战争爆发后，当天一早，麦克阿瑟在东京就得到了布朗（驻南朝鲜军事顾问团团长）和穆西奥（驻南朝鲜大使）的地况报告，立即同正在东京的约翰逊和布莱德雷、塔斯塔德举行紧急磋商。中午和下午又陆续得到了朝鲜战况的进一步报告，获悉：南朝鲜第一师在瓮津、开城被歼，第七师被击溃，春川被围，江陵失守，共军主力指向汉城。麦克阿瑟、约翰逊、布莱德雷和诺斯塔德再次开会到深夜，会上，麦克阿瑟提出了一份“在亚洲

遏制共产党的战略计划”，经约翰逊、布莱德雷等人研究赞同后，交由约翰逊向杜鲁门转达。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是：1. 立即援助南朝鲜，并建议由台湾调一个军驰援南朝鲜；2. 认为台湾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应以海空军保卫该岛，并给予蒋介石以广泛的军事援助；3. 加强菲律宾和印度支那的军事力量；4. 保卫日本的安全。征得约翰逊和布莱德雷同意后，麦克阿瑟连夜派出以费尔德为组长的“驻台湾军事联络组”进驻台湾，同时致电蒋介石，通报朝鲜战况和向台湾派驻联络组的决定，并询问蒋介石在确保台湾安全的前提下能否派一个军驰援南朝鲜以及台湾所急需的援助，并请蒋介石严密监视大陆中共的动态，对大陆沿海采取积极的行动，以探测中共对台湾进攻的紧迫性。

6月26日晨，李承晚再次向蒋介石急电求援，蒋介石便立即召集陈诚、俞大维、叶公超、周至柔、孙立人、王叔铭、桂永清、黄镇求、彭孟緝、萧毅肃、俞济时和王世杰等在阳明山“总统官邸”开会，直到深夜。

26日中午稍过，美军驻台湾军事联络组在组长费尔德率领下，由东京飞达台北。“国防部”厅长赖名汤、刘廉一前往接待，并陪同费尔德到阳明山会见蒋介石，费尔德向蒋面交了麦克阿瑟的亲笔信件。

当蒋介石得悉北朝鲜发动了全面的武装进攻，已断定南朝鲜将难以进行有效的抵抗，所以他首先考虑的是用什么办法及时地对南朝鲜作有效的援助，以“击破北朝鲜共军的进攻”。蒋介石同费尔德等人从外交到军事，从保卫台湾到援助南朝鲜等各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决定派遣52军（附3师）立即作开赴朝鲜战场的准备，并对52军的干部配备、兵员装备的补充更换、运输等问题作了部署。当天下午蒋介石分别向李承晚、麦克阿瑟复电，表示一经同意，52军即可经空中和海上运赴朝鲜战场，投入战斗。同时通过外交程序向杜鲁门提出这项建议。

在美国布莱尔大厦杜鲁门召集的晚餐会宣读麦克阿瑟关于“在亚洲遏制共产党扩张的计划”时，宣布了蒋介石的这项建议。当时，约翰逊、布莱德雷和柯林斯从朝鲜战争的实际需要和军事原则考虑，都主张接受蒋介石的建议。杜鲁门也表示：当他听到蒋介石愿意派兵援助南朝鲜时，他的“第一个反应是应当接受蒋委员长的这番好意”。他并且希望看到有尽可能多的联合国会员国积极地参加“对朝鲜的行动”，他还希望联合国发出号召并组织行动。

国务卿艾奇逊则对台湾出兵南朝鲜一事坚决反对，他说：“当前台湾是最容易受到攻击的地区，麦克阿瑟明确指出了这个危险，所以我们才决定派第7舰队和13航空队去保卫台湾，怎么反而叫台湾跑到别处去保护他人呢？况且蒋介石的军队并不见得比南朝鲜军队高明。这样就不如把这些需要给蒋介石的装备直接送给南朝鲜，其效果是可以预期的。”约翰逊马上进行辩解，说台湾只是缺乏海空军，其地面部队在亚洲地区的反共国家中却是最强大的。蒋介石要求派去支援南朝鲜的52军，是蒋介石在东北的60万军队中唯一没有被中共消灭的一个军。约翰逊认为在第7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后，从台湾调52军去增援南朝鲜是可取的。杜鲁门看到双方相持不下，争论不休，遂宣布暂予搁置，望待下次会议再从长计议。

6月27日，麦克阿瑟又向杜鲁门告急，并再次请求批准蒋介石的建议，而艾奇逊却将他收到的建议蒋介石出兵的电报擅自扣压，并继续反对讨论蒋介石派兵援助南朝鲜的建议。

6月28日，蒋介石驻美“大使”顾维钧和胡适在白宫会见杜鲁门时，面交了蒋介石建议派军驰援南朝鲜的电报副本。杜鲁门表示他是十分愿意接受蒋介石的意见，同时答应将扩大对台湾的军事援助。

麦克阿瑟于6月29日从朝鲜前线视察回到东京后，第三次急电杜鲁门，请其从速采纳蒋介石的建议。空军参谋长范登堡上将也向杜鲁门进言，应当接受麦克阿瑟的请求，批准蒋介石的建议。杜鲁门、约翰逊、布莱德雷、柯林斯都主张动用蒋介石的52军，而不急于使用在日本的两师美军。他们认为，这样做不但可以争取时间，及时稳定战局，并且可以减少美军的伤亡损失，使有限的美国地面部队能够在紧急情况时使用到别的更重要的地方去。可是，艾奇逊和国务院却一致反对。艾奇逊用一种歇斯底里的神情提醒约翰逊和布莱德雷等人注意中共6月28日声明所包含的严重性和蒋介石关于援助南朝鲜声明发表后在西方盟国中所引起的震动和惊愕（注：中共声明即6月28日周恩来针对杜鲁门的6月27日所发表的声明。蒋介石声明，系指蒋介石在6月26日晚广播讲话中所讲对南朝鲜将进行军事援助和派兵驰援的事）。艾奇逊说：“中共的声明不只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威胁，而且是他们打算出兵干涉的预兆。如果蒋介石的军队开进朝鲜打击北朝鲜共军，毫不怀疑，中共必将加倍地进行还击。那样一来，朝鲜战争马上就会扩大，局势的发展也必然难于控制，其结果不仅美国将要深深地陷进去，而且会把我们的盟友吓跑。”

蒋介石的建议和麦克阿瑟的三次请求，终于在艾奇逊的阻挠下，于6月30日被杜鲁门最后否决。

7月1日，52军各部队也先后收到命令，重新恢复正常的军事训练和沿海的防卫施工。

蒋介石二度准备出兵朝鲜是美军在朝的“圣诞节攻势”遭到了彻底失败之际。当时美第3军和10兵团都面临着极其危险的处境，麦克阿瑟立即请求采取下列步骤，以期挽回败局，减少美军伤亡：

- （1）紧急从台湾空这一个军增援第8军，进而救援在东线被围的第10兵团向兴南突围。
- （2）请求授权他派飞机轰炸中国境内的军事目标，并封锁中国的海岸。
- （3）促使蒋介石在华南、华东地区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以牵制中共，使其不敢向朝鲜战场增兵。

同时致电蒋介石告以南朝鲜在战争中的危急情况，请其仍派52军前往朝鲜战场解第8军之围，并说已分别从冲绳和菲律宾派出飞机和船艇载着补充52军的武器装备驶向台湾，以接运该军从空中和海上驰赴平壤地区。

麦克阿瑟希望52军从速完成作战准备，一俟杜鲁门总统批准，即可启航赴朝。他还请蒋介石火速派出一个参谋指挥军官代表团，立即飞赴汉城，会晤联合国军司令部参谋长诺斯塔德和第8军军长华克，当面商定52军到朝鲜战场后有关问题。

11月28日上午，蒋介石收到了麦克阿瑟的上项电报，下午便在阳明山召集紧急军事会议。参加者有周至柔、肖毅肃、侯腾、孙立人、王叔铭、桂永清、黄镇球、刘玉章、胡璉、刘安祺、唐守治、阙汉騫、赵家骧、陈麓华、郭永、王楚英、杨敬斌、何志浩、刘明奎，另外还有陈诚、俞大维、叶公超、

王世杰、蒋经国及其美军联络组长费尔德等。蒋介石扼要说明朝鲜的战局和麦克阿瑟的请求后，宣布：

仍然决定派 52 军驰援南朝鲜，限 24 小时内完成出发准备，要求空军加强对大陆的侦察，海军及金门、马祖的防卫部队要加强战备，随时应付共军的进攻；空军、海军均应密切同第 7 舰队及驻台美国空军的联系；另就加强台湾防务和增援前线岛屿作战的问题，52 军的战备问题及将运到台湾的武器装备的接收处理问题等，进行了研究并作出了决定。

同时他又指派侯腾、陈麓华、郭永、王楚英于 29 日凌晨飞往汉城，同华克等商洽 52 军到达朝鲜战场后的作战行动及其他有关事项。

麦克阿瑟于 28 日急电杜鲁门，要求空运台湾的 52 军驰援南朝鲜，杜鲁门接电后立即召集国防部和国务院有关首脑会议，研究有关问题。虽然柯林斯和布莱德雷主张接受麦克阿瑟的意见，空运台湾的 52 军援助南朝鲜并轰炸中国东北，但艾奇逊、杜鲁门都害怕苏联出兵和中共增加兵力，再加上英国的反对，杜鲁门于 29 日复电麦克阿瑟拒绝其建议。麦克阿瑟一气之下，又于 12 月 3 日再次给杜鲁门发去一份措词激烈的电报，电述朝鲜局势严重，如不采纳他的建议，后果不堪设想，但是，杜鲁门不仅不为麦克阿瑟的威胁所动，而且下决心要除掉麦克阿瑟，遂于 12 月 6 日给麦克阿瑟下了一道严厉的命令：

- (1) 禁止他采取任何未经许可的行动，并责成他用现有的兵力保住阵地并尽力保存实力。
- (2) 禁止他发表任何未经国务院批准的政策性声明

但麦克阿瑟却不甘心受杜鲁门的桎梏，分别向马丁、惠里等申述他与杜鲁门、艾奇逊在朝鲜、台湾问题上的不同观点。他已知道杜鲁门正在策划除掉他的步骤和设置整他的圈套，但出于与蒋介石的密切关系和要全力给予支援的目的，他在 12 月 6 日电告蒋介石取消 52 军行动计划的同时，向美国国防部建议将驻台联络组升格为“美国协防台湾军事顾问团”，保荐骑一师少将师长蔡斯任团长，进一步扩大对蒋介石的军事援助，并把南朝鲜的兵力扩充到 30 万人，再编 25 个师。这项建议在马歇尔、布莱德雷的赞同下，很快被批准。52 军驰援南朝鲜的行动于 12 月 6 日第 2 次被取消了。

蒋介石前两次要派 52 军驰援南朝鲜之事已成为过眼烟云。但是，到了 1952 年 5 月，在李奇微调往欧洲，克拉克到东京上任不久，又刮起了一阵“从台湾调一个军去朝鲜战场替换美军”的风。于是，第三次从台湾国民党调 52 军开赴朝鲜战场作战的计划又在东京、台北、华盛顿之间热烈地讨论起来了。克拉克由意大利调到东京后，发现在苏联虎视眈眈之下，日本的防务极其空虚，除 7 万 5 千名警察外，竟无一营美国的地面部队，他非常吃惊，遂向五角大楼和白宫建议：从台湾抽一个军到朝鲜战场，以便从朝鲜战场抽出 3 师美军去防守日本。他满以为这项建议能获得通过，遂同时电告蒋介石预作准备。蒋介石明知只要杜鲁门还在白宫、艾奇逊还当国务卿，从台湾派军队去南朝鲜的事就永远无法实现，但他为了配合克拉克的行动，还是叫孙立人进行准备。到了 6 月下旬，艾奇逊又顶住了五角大楼和国会的压力，再一次使

杜鲁门拒绝了克拉克的建议。克拉克深怀歉意致电蒋介石，请其撤销 52 军支援南朝鲜的安排。自此之后，52 军驰援南朝鲜一事就再也无人提起了。

志愿军跨过鸭绿江

就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积极准备渡江出国与美军作战的同时，在美国方面，却出现了十分乐观的气氛。美国五角大楼的官员们认为“苏联和中国出兵干涉的时机已过”。所以他们判断美军在向鸭绿江边前进时，不会受到阻碍。

麦克阿瑟猖狂扬言要在感恩节（1950 年 11 月 23 日）前占领北朝鲜，直达鸭绿江边。他曾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联合国军的空军具有绝对优势，共产党人要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他们的军队就会损失一半”，“红色中国的干预会被迅速报复的威胁所吓住。”美方要员们根本就没把中国放在眼里，更没料到经过长期战乱、百废待兴的新中国竟敢与美国相抗衡。这些错误的判断，是美国政府的战略上的重大失策，也是导致美军在朝鲜战场上失败的基本原因。彭德怀在安东部署渡江方案时曾说：“麦克阿瑟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我们可以利用敌人的错误判断，隐蔽渡江，对敌人进行突然反击。”

毛泽东在此时也来电指示，“我各部派遣的援朝志愿军侦察队，均要扮装成朝鲜人民军，而不要称中国人民志愿军，借以迷惑敌人。”同电又指出：“稳定改变战局的关键，在于能不能利用突然袭击。”

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头脑毕竟还是比较清醒些，他在进入 10 月以来，不断收到来自各方面判断中国可能要出兵的情报。这些情报有的估计：“中共在满洲已集结了 30 万人的兵力。”有的估计“中共约有 45 万人的军队正在满洲集结”，这使杜鲁门“对中国在北朝鲜进行干涉的可能性日益担心。”于是杜鲁门紧急决定，必须和麦克阿瑟进行当面磋商，以便从麦克阿瑟那里得到关于中国出兵的第一手材料和判断。

10 月 15 日，杜鲁门由华盛顿乘飞机经过 30 个小时的飞行，飞抵太平洋上的威克岛，与麦克阿瑟当面会谈。杜鲁门问：“中国进行干涉的可能性怎样？”

“可能性极为微小。中国在满洲约有 30 万军队，其中不超过 10 万至 12.5 万人部署在鸭绿江边，但只有 5 万至 6 万人能够渡江作战，他们没有空军，如果中国人试图前进到平壤，那将会出现一场最大规模的屠杀。”麦克阿瑟毫不含糊地回答。他向杜鲁门断言保证：“朝鲜战局是赢定了。中国共产党人不会进攻，我认为到感恩节，正规抵抗在整个朝鲜就会终止。”

杜鲁门和麦克阿瑟的会谈，使美国政府认为侵朝战争已近尾声。于是杜鲁门亲自授予麦克阿瑟一枚橡叶勋章，以示对麦克阿瑟在朝鲜所谓卓越功绩的表彰后，于 10 月 16 日返回美国旧金山。17 日杜鲁门得意地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我们在美国国内的人们对我们自己的陆、海、空军和陆战队战士们的卓越成就特别感到自豪。联合国要求我国为联合国提供第一位司令官也是我们莫大的光荣。我们有这么一位合适的人选来完成这个历史使命，真是全世界的幸运。这个人就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一个非常伟大的战士。”

就在杜鲁门和麦克阿瑟为暂时的胜利兴高采烈的同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领导下，正紧张地为出国作战加速准备工作。

17日上午，彭德怀指示参谋长解方带作战参谋龚杰随朴宪永过鸭绿江到达新义州李委员长处，商谈彭德怀司令员和志愿军渡江后进一步展开行动的具体安排。下午，彭德怀与高岗乘飞机返回沈阳与东北局、东北军区等领导同志进一步研究志愿军出国作战的装备器材，被服和医院的保障问题。

但此时，彭、高突然又接到了邓华和洪学智等的来电称：

昨日渡江部署会议结束后，经过讨论许多同志表示，现在部队高射炮太少，又无空军支援，敌人可集中大量飞机、大炮、坦克，毫不顾虑地向我阵地进行大规模攻击。而朝鲜多为山地水田，天寒地冻，工事更不好挖，如敌大举进攻，则阵地很难坚持。大家认为，各项准备工作也不充分，政治思想未普遍深入动员，建议渡过冬季明春再出动为宜……。

彭德怀和高岗接到来电后，感到此事有关战略全局，问题重大。正好这时又接到了毛泽东17日下午5时发来的急电，令他俩于18日乘飞机火速回京。这是因为周恩来定于18日自莫斯科回北京，所以毛泽东电告彭、高：“对出兵时间，以待周18日回京向中央报告后确定为宜。”并要求彭、高紧急回京参加中央会商。

18日清晨，彭德怀与高岗乘飞机返回北京，当面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渡江部队的情况和邓、洪17日来电内容。

此时敌进甚速，平壤告急。就在当日晚召开的中央会议上，当周恩来和彭德怀各自汇报了情况后，毛泽东主席最终决断说：“现在敌人已围攻平壤，再过几天敌人就进到鸭绿江了。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随后毛泽东又指示彭德怀先以电话通知邓华、洪学智等，要求志愿军各部队严格保密，严密伪装，立即进行政治动员，补足食品弹药，召开誓师大会，立即准备出国作战。

彭德怀奉毛泽东指示，以毛泽东的名义，给邓、洪、韩、解及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发出了特急绝密电报。电文如下：

邓、洪、韩、解并告贺副司令：四个军及三个炮兵师决定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19日）晚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江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4时即停止，5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为取得经验，第一晚（19晚）准备渡两个至三个师，第二晚再增加或减少，再行斟酌情形。余由高岗、德怀面告。

毛泽东

10月18日21时

同一天，为加强和统一志愿军司令部的指挥机构，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决定：“彭德怀的临时指挥所与团部（即原东北边防军司令部）合并，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洪学智、韩先楚为副司令员，解方为参谋长。”

当此紧张时刻，一个统一的精干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正式成立了。同时志愿军各路渡江部队亦开始向鸭绿江边急速开进。中华人民共和国伟大的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就此揭开了。

10月19日清晨，彭德怀、高岗由北京乘飞机火速赶回安东。当天黄昏时分彭德怀仅带了一名参谋，两名警卫员和一部电台乘一辆吉普车，在渡江部队的先头，开始跨过鸭绿江大桥。在硝烟弥漫、炮声隆隆的朝鲜战场上，

我党我军的一代名将——彭德怀又开始导演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威武雄壮的一幕战争活剧。

第二节 从鸭绿江到三八线

神兵天降

1950年10月19日黄昏，冷雨霏霏，细密如麻，浓云低低地压着大地。在迷蒙的充满寒意的秋雨中，中国人民志愿军40、39、42、38军和3个炮兵师，分别同时开始在安乐、长甸河口和辑安三个渡口，雄赳赳、气昂昂、浩浩荡荡地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10月25日，作为志愿军先头部队的40军首战南朝鲜军，抗美援朝战争从此正式开始。

10月25日，南朝鲜军的一个营闯进志愿军第40军隐蔽集结的温井地区。该军立即从公路两边发起突袭，以拦头、截尾、斩腰的战术，将其全歼。次日，南朝鲜军第6师的第7团进至鸭绿江边的楚山，这是战争期间南朝鲜军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到达中朝边境。该团进入楚山后，竟向对岸的中国领土射击，可是随后他们即发现侧后有中国军队，急忙放弃楚山南逃，途中被志愿军第40军歼灭大部。

初战获胜，极大地提高了入朝部队的作战信心。部队通过实战感到，南朝鲜军虽然全部是美式装备。然而每个师只有一个105毫米榴弹炮营，火力还不很强，其士兵又大部分是被强征入伍不到半年的新兵，战术技术水平都很低，作战时主要依靠美国飞机和火炮的掩护。因此，彭德怀总结说：“敌人离开了飞机大炮，攻不能攻，守不能守，只要我充分利用夜间，实行大胆的迂回包围、穿插作战，是可以歼灭敌人的。”志愿军通过初战，也发现南朝鲜军另一个特点，即南朝鲜军易打却不易全歼。因为该敌一遇打击，往往马上丢弃车辆、装备，化整为零钻入密林。志愿军不是朝鲜人，语言不通，地形不熟，战场喊话和找向导都很困难。所以在击溃敌人后要实行严密搜索，才能较多地消灭敌人。

志愿军和南朝鲜军交火已经几天了，美军对于中国出兵仍然抱怀疑和不在乎态度。美国陆军历史最悠久的王牌师——第1骑兵师（美国开国时创立的番号，其实该师早摩托化）仍然向距鸭绿江边60公里的云山前进，支援已在那里的南朝鲜军第15团，这时，志愿军第39军已经奉命围歼在云山的南朝鲜军。这样，中美两国军队的第一次交战——云山之战就此打响了。

11月1日傍晚，志愿军第39军以8个步兵团和2个炮兵团的兵力，向云山之敌发起围歼战。部队在隐蔽接近和包围敌人后、不待进行火力准备，即以一部兵力突然冲入云山镇，以打乱敌人指挥。部队打进敌人阵地后，发现敌兵臂上带着马头臂章，且个头高大，知道是美国军队。这时美军刚与南朝鲜军接防，戒备疏忽，把进入镇内的志愿军当成了南朝鲜军，还同他们握手。我军先头部队将错就错，进至美军一个营的营部前才突然开火。敌人遭受突袭后一片惊慌，脆弱的南朝鲜军第15团迅速崩溃。由于双方实行近战，美军优势的火力无法充分发挥作用，被迫丢弃大部分重装备，午夜后，在坦克的掩护下开始突围。在突围路上，美军骑8团又遭志愿军截击，坦克大多被炸药包炸毁。在其第1营、第2营趁隙逃脱之后，其第3营被包围。随即志愿军采取白天隐蔽，入夜发起攻击的战法，向该敌连续进行了两个夜晚的猛攻。至11月3日夜间，残敌除个别突围外，全部投降。前来增援的美骑1师第5团也被击退。据我军统计，云山战斗共消灭美军约1800人（美国的统计数字是损失约1000人），击毁和缴获坦克28辆，火炮190门。

云山战斗开始的同一天夜晚，志愿军总部判定清川江以北敌人只有5万余人，且处于分散状态之中，而我军可以集中12—15万人投入作战，因此决定向敌发起总攻。具体战法是：以侧后迂回结合正面突击，力争分割和歼灭清川江北的敌军主力，特别是南朝鲜军的3个师。从11月1日晚间起，志愿军各部展开全面攻击。可是敌军因美骑1师的失败而发现志愿军的力量强大，急忙于11月3日全线撤退。敌军全部是机械化装备，尽管前沿各部孤立突出，收缩却十分迅速。一天之内，敌军各部已经后撤了几十公里，退守清川江以南，并利用良好的工程机械设备，抢修工事进行防御。志愿军各部队都是徒步追击，加上第38、66军因对敌空袭顾虑大多，行动迟缓，结果未能完成迂回敌侧后的任务。11月5日，鉴于抓住敌军主力加以歼灭已不可能，部队粮、弹又已供应不上，志愿军总部命令各部停止进攻。11月7日，在东线的黄草岭担负阻击任务的志愿军第42军和朝鲜人民军一部在抗击了美军陆战1师连续7天的进攻后也向北后撤。第一次战役至此结束。

第一次战役共进行了13天，不成建制地消灭了敌军1.5万人（据我方统计），其中大部分是南朝鲜军。通过这一战役，粉碎了敌人在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使朝鲜人民军获得了整顿的时间；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志愿军取得了同具有现代化装备的敌军作战的初步经验，这就为下一次战役的辉煌胜利奠定了基础。

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绩

1951年初，坐阵东京的麦克阿瑟对来自朝鲜的报告极不相信，鸭绿江以南出现了共产党中国的军队？真令人难以置信。

情报部门证实，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大量调集在中朝边境，但是，这并非意味着中国打算介入战争。并且、一旦这样做，将会被立刻发觉，美国远东空军的侦察能力是举世公认的。

任何熟悉亚洲的人，都知道中国历史上各种乌七八糟的军队。就麦克阿瑟所知，自从军阀混战的年代以来，这些军队从未有所改进。所有记载中国历史的著作统统说明了一个事实：几百年来，中国军队从未战胜过第一流的外国军队。麦克阿瑟甚至明显地希望，中共军队会撞到他的枪口上。“我每晚为此而祈祷，”他对艾夫里尔·哈里曼说。

麦克阿瑟对于中国人介入朝鲜战争的可能从未真正放在心上，他傲慢而武断地宣称，中共只是想恐吓别人，实际上，他们在尽一切努力来避免最终的摊牌，北京的强硬讲话，不过是共产党人的典型伎俩，以恫吓美国那些软弱的西欧盟友。或者，为将来的和谈攫取有利的位置。但是，可以大胆地断言，中国决不会卷入这场毫无希望的战争。

第8集团军的情报官员与最高司令部所持观点相同，他们不相信，大批的中国军队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神鬼不知地进入朝鲜北部的荒野地带。因此，专家们一致认为，增援北朝鲜人军事行动的是一小股中国军队。事实确凿不移，但却很难确定其真正的内幕。一个审讯者认为，中国正在帮助友邻保卫边境地区；另一个则证实，他们在保护鸭绿江发电厂。然而，所有的人都相信，仅有微不足道的中共军队介入了战争。最初，入朝中国军队被估计为5000人。三周之后，数字上升到60000多人。直到屋顶塌落时，平壤的美国第8集团军司令部仍然声称：“中共入朝军队没有公开介入朝鲜战争的迹

象。”

华盛顿并不如此乐观。当前线传夹中国人活动的报告后，参谋长联席会议非常焦虑。他们负责主管驻扎在世界各地的美国军队，目前，正为美国的盟军部队，尤其是那些英国人在北朝鲜极为缓慢的推进大伤脑筋。因此，参谋长联席会议迫切要求迅速查明事实真相。

在最为关键之际，中国军队突然无影无踪了。11月6日黎明前，驻守在清川江北部美第8集团军防线前部的澳大利亚军队，遭到中国一个师的不断攻击。但是，天刚破晓，攻击即完全停止了。这些部队沿山岭向北撤退，突然难以置信地神秘消失了。中国军队似乎钻入了地下。

当时，美国采取了两种手法：一方面，同意联合国邀请新中国的代表参加安全理事会听证会，并试探以所谓保证中国在鸭绿江上利益，换取中国坐视其占领全朝鲜；另一方面，对鸭绿江以南的中朝军队控制区域进行为时两周的“空中战役”，并炸断鸭绿江桥。同时，“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将其第一线的兵力增加至20余万人（其中美军7个师、南朝鲜军6个师、英军2个旅、土耳其1个旅），并有约1100架作战飞机和900辆坦克支援。

中共中央决定不理睬美国的和谈试探，集中精力争取在战场上取得胜利。为了增强志愿军的力量，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原来作为预备队的第9兵团在司令员兼政委宋时轮、副司令员陶勇率领下，于11月9日至19日由辑安、临江方向入朝，赴东线作战。

第9兵团是第3野战军的部队，下辖第20、第26、第27军共12个师，约15万人。

第9兵团入朝前，部队对于寒区作战既缺乏经验，又缺少思想和物质准备。炮兵为了更换苏式装备，还大都留在东北，因此每师只有过去缴获的美日式75毫米的山（野）炮10余门。该兵团因接到军委的命令后即仓促入朝，部队还是在开往东北的火车上才得到通知，在车站上换乘列车时才领到棉衣，部分人还未发到手。部队里还有许多人没有棉鞋棉帽，只好以毛巾包头、毛毯裹身。可是第9兵团凭着高昂的斗志、冒着零下30度的严寒，隐蔽进入朝鲜东部山高、林密、路狭的盖马高原。在敌日夜不停地实施侦察轰炸的“空中战役”的情况下，该兵团15万人隐蔽开进竟完全未被敌发现，美方事后也称此为“当代战争史上的奇迹”。

至11月24日，在朝的志愿军总数已达45万人，其中作战部队38万人。朝鲜人民军第3军团一部在东线配合，在敌后的朝鲜人民军和游击队也积极袭扰敌人。第二次战役发起前，志愿军除了以后撤诱敌外，还释放了100余名美军和南朝鲜军的俘虏，并向其解释我军因粮食不足，要后撤回国。这样，一方面以实际行动向敌人宣传了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另一方面也增大了敌人的错觉。

11月24日，“联合国军”统帅麦克阿瑟狂妄地向全世界发表公报，宣布发动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同日，敌军数千门火炮向着只有我军个别警戒人员的前沿阵地轰击后，各路敌军开始分头沿路向北推进。这时，西线美第8集团军和东线美10军之间留下一个数十里的缺口。西线之敌右翼又是刚受过打击的南朝鲜军第2军（辖第7、第8师，不足2万人）。因此志愿军总部决定利用这个早已选好的敌军薄弱点，向西线敌人的右翼德川发动攻击，下一步再向美第8集团军的深远后方迂回。

11月25日黄昏，西线敌人已推进了6—12公里，其右翼更加暴露。当

天夜幕降临后，天空升起一轮圆月，在国内革命战争中，有星光之夜，我军通常组织小规模夜战；有月光之夜，我军通常组织大规模夜战。在朝鲜战场上，月夜也是志愿军进行夜战的最好时机，美军曾将这时的月亮称为“中国人的月亮”。就在这个月夜。伴随着敌人心惊的军号声，西线志愿军6个军在200公里宽的战线上同时发起进攻。

在西线正面，志愿军4个军（第39、第40、第50、第66军）的夜间攻击虽然消灭了部分前沿之敌，进展却不大。主要原因是敌人兵力火力密集，不易分割，一时形成对峙。向敌右翼迂回的第38、第42军却取得了很大成功。第38、第42军在攻击前，侦察分队已经查清敌军的接合部疏于守备，因而各穿插部队一夜之间就顺利地将南朝鲜第2军分割。第二天白天，部队利用敌我双方插在一起，敌机难以分辨之机，向溃逃之敌猛打猛冲，将敌两个师全部击溃。11月27日早上，美国广播新闻评论员宣称：“大韩民国军队第2军被歼灭，业已完全消灭不复存在，再找不到该部队的痕迹。”事后，美国参谋学校专门撰写了《德川战役南韩第2军被歼的检讨》一文，作为研究中国军队进攻战术的范文。该文称赞志愿军进攻作战的优点是：“集中压倒兵力于企图决战方面，”“发动大规模重点的夜间攻击，深入敌阵地后方控制整个战场。”

尽管美国方面宣布南朝鲜军第2军已被歼灭，可是志愿军在德川、宁远战斗中的歼敌数字据统计只有5000余人。其主要原因是南朝鲜军一击即散，纷纷躲入深山，志愿军主力又忙于继续迂回，不能以较多兵力进行搜剿。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讲，南朝鲜军第2军作为一个战术单位确实已不存在了。

德川战斗胜利后，志愿军总部命令第38军和第42军向西线进行双层迂回。第38军进行内层迂回，插向价川、三所里，包抄美9军后方。第42军进行外层迂回，插向顺川、肃川。如果此着成功，就可以将美第8集团军主力合围于平壤以北。

11月27日晚，第38军第113师全部轻装，只是骡马驮载少量轻型火炮伴随出发，部队沿山间小路全速前进，在夜间排除了少数敌人的零星抵抗后，天明已进入敌方纵深。这时敌人戒备疏忽，只有飞机来往侦察。第113师为了迷惑敌人，部队索性去掉伪装，整队前时，果然使敌机误以为这支部队是由德川败退下来的南朝鲜军。11月28日8时，第113师经14小时行军，前进72.5公里，插到了平壤至价川公路的交叉点三所里。

志愿军占领三所里，使清川江北的敌军三面被包围，立即陷入极度的恐慌之中。同日，麦克阿瑟向美国政府报告，中国人要把他的部队“全部歼灭”。

29日，“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在腹背受击的情况下，开始动用大量飞机掩护全线撤退。同时，以美骑兵第1师、英第29旅各一部向北增援，猛烈攻击志愿军第38军第113师扼守的三所里、龙源里，企图打开南逃通路。

当时，南北之敌相距不到1公里。部队头顶上有上百架飞机轰炸。地下有近百辆坦克的南北相对冲击，部队随身携带的弹药又多已用完。在这种情况下，指战员利用缴获的武器，以无比顽强的精神和敌人搏斗。第337团3连在龙源里，第335团3连在松骨峰的阻击战打得最为顽强。战士们打完了子弹，就用石块、拳头、牙齿和敌人拼命，作家魏巍在《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报告文学中，曾把松骨峰战斗称为“朝鲜战场上一次最壮烈的战斗。”在第113师部队的顽强阻击下，敌人打开通路的企图未能得逞，被迫丢掉辎重改道向安州方向撤退。志愿军各军当即在清川江畔西起新安州，东至价川，

南至三所里、龙源里地域内展开了分割围歼敌人的战斗。美第2师、土耳其旅大部被歼，美第25师、美骑兵第1师被重创，其他部队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击。

第二次战役从11月6日至12月24日历时49天，志愿军共歼敌3.6万余人（其中美军2万人，包括美第8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于败退中车祸身亡）。收复了“三八线”以北除襄阳外的全部土地，并解决了“三八线”以南的瓮津半岛和延安半岛，扭转了朝鲜战局。对此，美国统治集团的御用宣传工具合众社哀叹：“这是美国建军以来最大的失败，是美国陆军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第三次战役

美国军方在出现了“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绩”后，对志愿军的力量也作出了过高的估计。12月29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经讨论认为：“中国部队现在十分强大，如果他们全力以赴，完全可以迫使联合国军撤出朝鲜。”然而新接任美第8集团军司令（这时美10军和其他在朝敌方部队也都归第8集团军指挥）的李奇微却不同意撤退，并建议条件一许可就恢复攻势。最后，美国军方确定先观察形势，力争守住南朝鲜。美军在吸取了被志愿军迂回穿插的教训之后，迅速在三八线以南纵深地区建立了五道防线（分别称为A、B、C、D、E线）。南朝鲜军的8个师被摆在第一线，美英军放在第二线，是一副可打可撤的姿态。这时敌作战兵力有20万人，士气却降到战争中的最低点。李奇微形容当时的美军说：“这是一支张皇失措的军队，对自己、对领导都丧失了信心，不清楚自己究竟在那里干什么，老是盼望着能早日乘船回国。”同时又说：“南朝鲜在中国军队打击下损失惨重，往往对中共士兵怀有非常畏惧的心理，几乎把这些人看成了天兵天将。”于是，李奇微忙于振作士气，并采取了“夜间收缩部队，让部队与部队之间紧紧衔接在一起，到昼间则以协同分队发起有力的反冲击”的新战术。这样，很快就加大了志愿军进行运动战的难度。

12月27日前，志愿军6个军（第38、第39、第40、第42、第50、第66军）和人民军3个军团（第1、第2、第5军团）共30余万人（其中志愿军23万人）隐蔽进入三八线以北的预定地域。这时，部队仅勉强补充了弹药，国内运来的粮食只能满足最低需求的1/4，靠朝鲜政府发动北朝鲜地方群众向志愿军借粮，才筹到3万吨粮食，解决了一时的急需。各部队战斗员的缺额，靠抽调本单位的机关勤杂人员进行了补充。这时全军虽十分疲劳，但是受到连续胜利的鼓舞，士气高昂并充满信心。

第三次战役发起前，朝鲜人民军第2、第5军团就在东线越过三八线，向敌侧后渗透。12月31日晚17时，志愿军在西线向敌三八线防线发起全线进攻。攻击开始前，部队发挥了出色的伪装技能，各部采取拂晓进入出发地，然后以树枝、白雪严密伪装，在白天瞒过敌飞机和前沿哨兵的侦察，入夜即突然发起攻击。攻击开始时，志愿军集中了100余门火炮，在主要方向进行了短促的火力准备。这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第一次大规模使用炮兵，为打开突破口起到了重要作用。只是由于炮弹不足（每门炮约百余发），炮兵机动力又差，向纵深突破后，主要靠轻装的步兵乘第一线的南朝鲜军混乱之机，大胆穿插追击。第42、第66军鉴于部队已和逃敌犬牙交错地混在一起，敌

机不好识别，就大胆地实行白天追击，结果消灭了南朝鲜军第2师主力，受到志愿军司令部嘉奖。这一战例证明，只有实行昼夜连续作战，才能取得较大的战果。

经志愿军和人民军两天一夜的穿插追击，至1月2日，第一线的南朝鲜军已经全线崩溃。尽管美国宪兵在公路上阻截，李奇微还亲自把吉普车横在公路中间企图阻止他形容为雪崩一样的溃兵，可是都无济于事。汉城以东的南朝鲜军的溃逃，使汉城地区的10余万“联合国军”处于被中朝部队从右翼实施深远包围、在汉江以北背水作战的危险。因此，李奇微不顾南朝鲜政府的反对，下令放弃汉城。

中朝联司发现敌人全线撤退后，立即下令全线追击。由于敌军全系摩托化部队，徒步无法追上，只消灭了敌人的少数掩护部队。英军第29旅被美军安排在汉城以北掩护后撤。志愿军第50军在1月3日下午以穿插截断了该旅的退路。该旅大部虽然在坦克飞机掩护下突围，但是入夜后志愿军部队即以反坦克手雷、爆破筒猛扑向英军坦克，一举击毁和缴获坦克31辆，歼灭了英军一个坦克中队和两个步兵连。这是抗美援朝战争史上以步兵武器歼击坦克的一个成功范例。

1951年1月4日夜间，志愿军第50军和第39军的1个师连同朝鲜人民军第1军团进入了汉城，汉城内到处是熊熊大火，居民在敌欺骗宣传下已逃避一空。1月7日，第50军占领水原，1月8日人民军第1军团又一次占领了仁川。同日，中朝部队已全线进抵三七线，第三次战役至此结束。在战役中，据我方统计，共歼敌1.9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南朝鲜军。中朝军队伤亡仅0.85万人（其中志愿军0.58万人）。

美军汉城方向发起大规模进攻

自1月25日起，以美军为主的西线敌军向汉城方向发起大规模进攻。这时中朝两军领导正在平壤以东的成川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研究部队休整和春季攻势问题，发现敌人大举进攻后，联司立即决定停止休整转入防御。作战部署主要是“西顶东放”，即以一部兵力在西线顶住向汉城攻击之敌，集中主力于东线，待敌深入后举行反击，并向西线之敌侧后迂回，从而粉碎敌军进攻。这时志愿军首长也已看到敌我力量对比的不利变化，估计反击可能受挫，因而决定如反击受阻，就放弃汉城及三八线以南地区，待战略预备队到达后再举行反击。

从1月25日至2月16日，志愿军第50军和第38军一部在汉江以南进行了20余天的阵地防御战，以阻击向汉城进攻的美军第1军。这次防御战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第一次大规模的防御作战，其激烈程度和全新的特点，都在我军战史上写下了新的一页。

在国内革命战争中，我军也经常进行防御作战，然而进攻之敌基本上是以步兵进行突击，较少使用飞机和坦克，炮火也有限。如解放战争中最激烈的黑山阻击战和塔山阻击战，敌人每天在我一个军的防御阵地上一般发炮1万余发，同时也只有几架飞机投弹。我军靠在前线集中配置兵力，主要以步兵火力杀伤敌人，并辅以英勇顽强的不断反冲击，一般就能保持阵地的稳定。可是在朝鲜战场上的情况却完全不同，美军实行的是空地配合的立体进攻。汉江南岸的防御战一开始，美军对我军一个团的防御阵地每天就发射炮

弹数万发，而且是由炮兵校正机指挥发射，射击比较准确，同时以数十架飞机支援，空投炸弹上百枚，从空中封锁我军纵深对前沿的支援。当时天寒地冻，构筑工事极其困难，部队的防御纵深只有 20 公里，防御正面宽约 40 公里，地形为平原与丘陵交错，因河流封冻，敌坦克可以横冲直撞。攻防双方的兵力虽然大体相当，可是我方火力强度只及敌几十分之一，这种防御战的难度确实是我军过去所未见的。

防御战开始时，志愿军还按照国内战争对方式抢筑了野战工事，并在第一线配备了较多的兵力，可是在敌人火力准备时，前沿兵力就往往被杀伤过半。剩下的人员虽然依托残存的工事英勇抗击敌人，并与冲上阵地之敌顽强搏斗，却因白天后方难以支援，结果在敌反复攻击下常常人地皆失。吸取这一教训后，第 50 军在前沿对部队实行疏散配置，火炮也分散隐蔽。待敌军步兵接近我阵地时，我步炮兵再突然开火；对于白天失去的阵地，夜间再以反击夺回。这样不仅减少了自己的伤亡，也有效地抗击了敌人的攻击。经 14 天节节阻击和反复争夺，敌军只前进了 18 公里，并付出 1 万余人伤亡（我方估计）的代价。2 月 10 日，敌军进占已被我方主动放弃的仁川，但是汉江以南的主要阵地仍在志愿军坚守之下。2 月中旬，汉江已开始解冻，为避免背水作战，第 50 军和第 38 军之一部才于 2 月 18 日前全部撤到汉江以北。

汉江南岸的防御战虽然以后撤结束，却争取了时间，并初步摸索出在现代战争条件下进行运动防御的新战术。早在第一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就注意到第 42 军第一次战役期间在东线以固定阵地实行顽强防御，虽守住了阵地，自身伤亡也较大的经验，感到防御时疏散配备的重要。1951 年 1 月 8 日他在志愿军高干会上提出了“运动防御”这一原则。即“在一地防御时间不很久（一两天），敌对我配置也没有搞清楚，因此，敌人的炮兵、空军和坦克对我危害也有限。”“阵地要宽广、纵长，方不致为敌所制，又能保持我机动。兵力配备应以前轻后重为原则……采取火器分散，火力集中的原则”。通过总结汉江南岸的实战经验，志愿军司令部及时向全军发出战术指示，强调进行防御作战，必须筑好工事，采取疏散纵深的兵力配备，较大的反击必须夜间进行。不能死守一地，在争取到一定时间或无力防守时，应主动地转移阵地。此后，运动防御（或称机动防御）一时成为志愿军抗击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之敌进攻的基本形式。

在汉江南岸的防御战中，部队表现得极为顽强。除了每天都遭受前所未遇的空炮火力攻击外，美军坦克还乘志愿军反坦克火力薄弱之机。几乎每天都冲入志愿军防御纵深，有时达 10 公里。可是部队却十分沉着，在一时无法消灭敌坦克的情况下就集中火力打敌步兵，敌坦克失去步兵支援，天黑前就只好退回。第 50 军原是由起义部队改编的，在战斗中以军长曾泽生（原国民党军第 60 军军长）为首的起义人员和四野加强该部的骨干都显示出良好的战斗作风和较高的军事素养，彭德怀高度评价了第 50 军的战绩，表示今后要优先给第 50 军换装。第 38 军在汉江南北的作战中，也经受了该军成立后最严峻的考验。该军入朝时装备已比较落后，90% 的战斗兵还使用日本三八式（即 1905 年式）步枪，入朝后又一直作为主力使用，耗多补少。当时半数以上的步兵连已不足 40 人，每班只有 3—4 枝枪堪用，其他的人只有手榴弹，却仍然士气高昂地奋勇作战。当面的美军虽然火力和机动力都占绝对优势，其官兵却十分畏惧志愿军的打击，不敢进行战役和战术迂回，只是缓缓平推，平均一天只推进 1—2 公里。

双方在汉江南岸激战时，东线南朝鲜军的3个师和美2师一部已进至横城以北，形成突击。按照预定计划，2月11日晚，中朝军队6个军（志愿军第39、第40、第42、第66军及人民军第3、第5军团）以迂回穿插战术，向该敌发起攻击。由于在夜间利用了敌人的空隙大胆深入，战斗进行得十分顺利。南朝鲜1971年出版的《韩国战争史》第十章曾对此记载说：

2月11日夜，中共两个军和北傀军（系对朝鲜人民军的诬称——作者注）的一个军团发起大规模反攻，前线国军3个师顷刻溃散。

由于志愿军一部合围不到位，南朝鲜军第8师师部逃脱，只有其所属的3个团和美2师的1个营被我歼灭，南朝鲜军的第3、第5师的部队在溃散后也大多乘隙逃走。但是这次反击战的战果还是辉煌的，在二天一夜的战斗中，共俘虏南朝鲜军7500人，美军500人，这是抗美援朝战争中俘虏南朝鲜军数量最多的一次战斗。

横城反击战胜利后，志愿军于2月13日乘胜向横城以西的砥平里发起攻击。参战部队有分别隶属于3个军的6个团共1万多人，由第40军军长温玉成统一指挥。当时由于胜利产生了轻敌思想，认为砥平里守敌只有4个营约3000人（实际上是美2师的1个团和1个法国营共6000人），因怕其逃走，我军匆忙以野战进攻方式向已经构筑了坚固工事之敌发起攻击。可是守敌不仅已设置了铁丝网和地雷区，还有20辆坦克。志愿军攻击部队只有3个炮兵连共十几门火炮，每炮只有20—30发炮弹。结果在进攻中对敌火力不能压制，坦克不能摧毁，障碍区也未能突破，部队还遭受较大的伤亡。经二天二夜激战，仍然僵持不下。这时敌援兵已到，志愿军不仅弹药大都耗尽，各部因缺粮多靠喝粥度日。因再战不利，2月16日志愿军和人民军各部从砥平里、原州一线北撤。

砥平里战斗规模并不大，对于朝鲜战局的影响却很大。这一仗志愿军只是小受挫折后主动撤退，损失不大，可是却完全暴露了自己的主要弱点，当然如果没有这一战，只要战争继续，这些弱点也会暴露。通过这一仗，美国军方认清了志愿军火力薄弱，攻坚能力差，即使达成穿插突破，也会因供应困难而难以深远前进。此后，美军不再像过去那样一遭迂回穿插即慌忙后撤，而是敢于固守一点。美国陆军第8集团军军事历史科编写的该军简史中声称：“第2师在砥平里的英勇坚守后来证明是挡住共产党进攻的转折点。”南朝鲜的《韩国战争史》也曾吹嘘说：“砥平里战斗，是美军同中共军作战中在战术上取得的第一个成功战例，鼓舞了全军的信心和希望，解除了美军决策当局对战局发展所抱的顾虑。这次胜利的意义可与英国第8军在阿拉曼取得的胜利相比拟，也可以说是‘第二仁川’”。这些话自然有夸张吹嘘成分，可是美军在朝鲜战场上的战略战术从此确实有了改变，美国政府首脑也更确定了在朝鲜打下去的决心。

志愿军自砥平里撤退后，即取消了向汉江以南敌军侧后迂回的计划。2月17日，中朝联司首长决定，全线转入运动防御，准备争取两个月时间，以集结兵力，改善交通运输，囤积作战物资，待引敌深入，置汉江于敌背后，再行反击。2月下旬，为了催促增援，并向毛泽东说明朝鲜战场的困难情况和请示下一步方针，彭德怀赶回北京。前线中朝部队且战且向三八线以北缓缓转移。自2月19日起，敌军在东线发起进攻。3月7日，敌军又在西线发

动代号为“撕裂者行动”的攻势。中朝军队第一线8个军（其中人民军4个军团）组织了运动防御。这时，志愿军前线部队的困难局面超过入朝以来任何时期。因弹药不足和炮损严重，炮兵部队大多先撤往三八线以北休整。有些前沿阵地因守各部队饥饿，被迫放弃。前线部队指战员的各种装备也破烂不堪，赤脚露体已成普遍现象，因生活困苦病倒者也大量增加。在战斗人员减少过半的情况下，各部队凭着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和高昂的斗志，仍顽强奋战。3月7日一天内，第38军和第50军在汉江北岸就有几个连队战至最后一人。志愿军司令部及时总结了经验，并根据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意图，于3月8日发出了关于当前作战指导方针的指示，又强调了兵力配备“前轻后重”、火力配备“前重后轻”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志愿军部队在敌火力占绝对优势的空军、步兵、炮、坦的协同进攻面前，利用山区和丘陵的地形，只以少数人坚守前沿各个支撑点，多数兵力分散隐蔽在阵地后方，各种队属火炮适当前推，并有层次地分散隐蔽。当敌人步兵接近阵地时，各种火器突然集中开火，敌突入阵地后，则适当投入后方兵力反击，与敌近战，使敌空、炮支援难以发挥作用。在一地杀伤较多敌人后，再利用夜间转移到新阵地。这种作战方式，虽然不能长久地挡住敌人进攻，却可以用较少的代价换取敌人较大的损失。

3月14日，人民军第1军团根据联司预定计划主动放弃汉城。随后，中朝第一线部队8个军转入第二线休整，第二梯队的3个军零1个师（第26、第39、第40军和人民军第19师团）接替了第一线运动防御的任务。各部在节节阻击中继续给敌人以很大打击。第26军在长津湖之战后经过整顿和总结经验，在防御中表现十分出色，该军在七峰山、海龙山的防御作战中与敌反复争夺，有一个班曾创造了以反坦克手雷一举击毁坦克9辆的模范战例。3月间的朝鲜正值冰雪融化，美军将泥泞的公路形容为“巧克力汤”，这种气候也影响了敌机械化部队的前进。4月初，中朝部队已基本撤至三八线以北，敌军因发现我方大量新锐部队到达，也停止进攻，4月21日第四次战役结束。据我方统计，战役期间共歼敌7.8万人，我方战斗损失共5.3万人。

在第四次战役期间，出现了“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被杜鲁门突然解职的事件。这一事件，是麦克阿瑟坚持其局部战区的利益，以至同美国政府的全球战略发生尖锐矛盾的反映。当美军再次进抵三八线时，美国政府首脑考虑到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主要敌人是苏联，不愿长期陷于一场无法打赢的朝鲜战争中，因此，于3月20日通知麦克阿瑟应寻求与中朝方面谈判，可是麦克阿瑟却于3月24日狂妄地发表声明，威胁要轰炸中国沿海和内地，这使美国政府首脑和英、法两国都大为愤慨。4月11日，杜鲁门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麦克阿瑟撤职。随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解释说：“把战争扩大到共产党中国，会把我们卷入一个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敌人进行一场错误的战争中。”（美国新闻社1951年5月15日电，过去我国国内有的著述在引用这句话时删去了前置短语，结果未能准确解释这句话的原意——作者注）得到麦克阿瑟被撤职的消息后，中共中央领导人也感到欣慰，因为这证实了把战争控制在朝鲜境内的估计是可以实现的。

第五次战役

1951年4月22日到6月10日，中朝军队联合举行了第五次战役。这次

战役是朝鲜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双方共投入了100多万军队，相互都进行了激烈的攻防作战。

从2月间开始，我方就已在筹备大规模的战役反击，以扭转当时的被动局面。3月1日毛泽东提出下一次战役的设想说：“我们计划在我第二番部队到达后，在4月15日至6月底两个半月内，在三八线南北地区消灭美军及李承晚军建制部队数万人，然后向南汉江以南推进，最为有利。”志愿军首长也对这次战役寄予很高的希望，3月14日彭德怀提出：“下一战役是带决定性的一仗。”4月19日志愿军发布的第五次战役的动员令中，也强调这一仗是“朝鲜战争的时间缩短或拖长的关键。”

鉴于第四次战役期间志愿军部队“青黄不接”尤其是兵力不足的教训，中央军委以当时后勤所能保障的最大限度，向朝鲜调集了部队，2月中旬至4月初，第3、第19兵团、第47军以及新组建的大批特种兵相继入朝，朝鲜人民军也进行了整顿扩编。4月间，我方在朝兵力已达到130万人，其中志愿军的作战部队和支援部队即达95万人（作战部队77万人，后勤支援部队18万人）。

新入朝的第19兵团原为解放战争中组建的华北野战军第2兵团，杨得志任司令员，李志民任政委。下辖第63、第64、第65军。第3兵团是西南军区抽调入朝部队，因司令员兼政委陈赓还未到任，由副司令员王近山带队。兵团部是以云南军区机关为基础于1951年2月临时组建的（第二野战军解放西南后，各野战兵团和军、师都已改为军区、军分区，负担剿匪和建立政权的任务），指挥第12、第15、第60军。

至4月中旬，在朝的志愿军已有15个军，一线则有11个军共54.8万人。连同人民军第一线3个军团，我方第一线作战总兵力已近70万人。而当时敌军在朝的地面作战部队总数为34万人。由于看到我方兵力空前雄厚，在数量上对敌具有很大优势，志愿军首长对于战役寄予了很高的希望，规划第一阶段攻势就歼敌5个师（其中美军3个师），并推进至三七线。然而，实际情况对我方却并不十分有利，当时中国方面的空军仍不能参战，坦克兵还在向朝鲜调运途中，中朝部队与敌相比，火力上仍处于绝对劣势。最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后勤方向，尽管后勤力量已大大加强，可是在朝部队成倍增加，供应上的困难还未缓解。三八线南北约150公里宽的地区因双方反复争夺，居民逃散，已形成无粮区，我方参战部队主要靠身上背负的粮弹作战，一般只能保持5—7天的供应。美军这时也摸清了志愿军的弱点，将志愿军的攻势称为“礼拜攻势”（身上只能背一礼拜的粮食）和“月夜攻势”（太黑的夜晚也不便组织进攻），并确定了“磁性战术”（即我攻即退，保持接触以消耗我军，待我军粮尽后撤时又紧随追击）等一套相应的对策。同时敌方已估计到中朝军队的反击即将开始，我军过去以战役突然性和战术新奇致胜的因素也不复存在，进行运动战的难度在事实上已大大增加。

鉴于入朝新军准备仓促，彭德怀曾向中央军委建议将战役推迟到5月上旬发起，可是由于得到美军新近在日本组建的第16军有在北朝鲜海岸登陆的消息，为避免同时两线作战，于是决定先击破正面敌人，再打登陆之敌。彭德怀作出决定并上报军委，于4月22日发起攻势。

4月22日傍晚，中朝军队14个军（内含人民军3个军团）沿着200多公里宽的战线同时开始进攻。根据预先确定的正面突击和战术分割包围相结合的作战原则，部队采取多钳合击的方式，向前穿插。第9兵团和第39军首

先在战线中央击溃南朝鲜军第6师和美24师之一部，将敌军的战线分割成两部分。东西两线的中朝军队乘胜向后撤之敌猛攻，在为时7天的第一阶段的攻势中，全线推进了70—80公里，在战役进攻的总体上取得了胜利。

5月16日晚，中朝军队共13个军（其中志愿军9个军、人民军4个军团）发起第二阶段进攻。西线的第19兵团佯攻汉城，以吸引美军主力。中线的第3兵团实行中央突破，切断了敌东西线联络。担任主攻的第9兵团和人民军三个军团在东线开始分割包围南朝鲜军。由于采用了傍晚突破，夜间向纵深穿插，天明实现合围的方式，加上攻击部队十分勇敢，东线的南朝鲜军迅速崩溃。志愿军第20、第27军发起进攻后，第一夜就推进了25—28公里，和东部的人民军一起，至5月18日就切断了南朝鲜军4个师的装备（随后大多被美国飞机炸毁），却由于东线山高林密，一时搜剿不易，只歼敌1.7万人，但是南朝鲜军的4个师迅速被击溃，这使得美国军政当局对于南朝鲜军的战斗能力更表示怀疑，并斥骂李承晚政权无能，从而加深了美李矛盾。

从5月16日至5月21日，中朝军队经5天连续进攻，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中朝军队在东线普遍进了50—60公里，在敌方战线上打开了一个大缺口。然而在进攻中，我方由于供应困难，不得不停下3天等待补充，美军和南朝鲜军各一个师以摩托化行军，仅十几个小时就行进100多公里，迅速堵塞了缺口。这时，我方鉴于部队疲劳和供应困难，已无法发展战役胜利，决定春季攻势到此结束，将主力转移至三八线以北休整。

5月22日，中朝部队开始北撤。由于是胜利后的班师，部队根据上次战役的经验，觉得敌人的“磁性战术”只是缓缓跟进攻击，所以上下普遍出现麻痹。当时志愿军还有8000伤员还未运走，也影响了部队的行动。这时，李奇微却根据对我军“肩上后勤”能力的计算，认为我军已进攻5天，粮弹基本耗尽，又没有得到新的补充，锐气已失，所以使用其以逸待劳的美军7个师为主力（每师约1.8万人）连同南朝鲜军等部共13个师，于5月22日开始全线反扑。

这次敌方反扑时，改变了上次战役中稳扎稳进的战术，大胆地以坦克群和摩托化步兵组成“特遣队”，在大批飞机掩护下，沿公路向我方纵深迅速穿插，抢占桥梁和渡口，配合后续部队包围志愿军后撤部队。当时，由于部队未安排好交替掩护，第3兵团电台又被敌机炸毁，所属部队失去指挥达3天之久，在中部战线一时出现混乱。加上一些指挥员缺乏现代技术兵种的知识，在前沿布置掩护部队时不注意破坏桥梁，也未很好地以火力封锁道路，而是把兵力集中在山头上，结果敌军一旦突破前沿，就能于3天内在我方纵深推进50—80公里。至5月24日，志愿军第12军军部和下属的两个师、第27军主力和第60军所属的第180师被敌人截断在三八线以南。

面对突然出现的严重局面，被截断的志愿军部队大都表现出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由于敌军“特遣队”兵力不多，敌步兵又普遍缺少近距离攻击搏斗的勇气，主要依赖火力进行封锁拦截，突围坚决的部队都获得了成功。如第27军发现敌坦克和空降兵已插入自己的后方，全军又已基本断粮，但是军领导沉着地组织部队交替掩护，寻敌空隙，灵活地绕路转移，全军终于建制完整地平安撤回。第12军主力也冲出了敌人的包围。该军第91团在敌纵深90公里处被围，可是该团发扬红军的优良传统，一路寻食野菜，夺取敌人的武器，并利用夜间和敌人混在一起夺路突围，5天后终于和大部队会合。只有第180师由于领导不力而自身出现混乱，遭受了严重损失。

第五次战役历时 50 天，据我方统计，共歼敌 8.2 万人。我方作战损失 8.5 万人（包括死、伤、失踪）。特别是在战役后一阶段，部队在后撤中有 2 万人失踪。其中第 3 兵团因一时出现过混乱，加上内部一些潜伏的坏分子乘机叛逃，因而失踪人员最多，达 1.6 万人（其中第 60 军失踪人员又占半数）。美方则宣称在 5 月下旬俘虏我方 1.7 万人（这一数字占朝鲜战争中志愿军被俘人员总数的 80% 以上）。这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作战仅有的一次严重损失。

从 1950 年 10 月至 1951 年 6 月这为时 8 个月的战役反攻阶段，志愿军连续进行了五次战役，基本完成了出国时的战略目标，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决定性的胜利。从这一阶段开始到结尾的双方军事位置上看，战线从鸭绿江边又被推回到 400 公里以南的三八线附近，同时据我方统计，中朝军队共歼敌 23 万余人，其中美军 8 万人（美国公布的数字是美军战斗损失 5 万人）。志愿军作战减员也达 20 余万人。志愿军在既无飞机掩护，又无坦克支援，仅拥有少量炮兵的憎况下，能够同拥有现代化装备的敌军作战取得胜利，这在世界战争史上是少有的。

第三节 板门店舌斗

美国发出和谈信息

第五次战役刚刚打完不久，美国便正式发出了和谈的信息。1951年6月30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奉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之命向我方发表声明，表示愿意举行停战谈判，并建议谈判在元山港的一只丹麦伤兵船上举行。

时隔两天，即7月1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首相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便以声明的形式答复了李奇微，同意派代表与美方代表会晤，并建议会晤在三八线南多方控制区开城举行。

李奇微的声明似乎发表得很突然，我方的答复也似乎异乎寻常地快。其实停战谈判的问题不但早就提出，而且已酝酿很久了。

1950年10月2日，美军悍然越过三八线，向朝鲜北部发动进攻时，苏联等国就曾向第5届联合国大会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提案。我国政府也发表声明支持这项提案。但是美国却操纵联合国否决了这项提案。

1951年1月11日，美国突然又向我提出了停战谈判的建议，并操纵联合国通过了“联合国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提出的解决朝鲜及其远东问题的五项原则意见：要求在朝鲜立即安排停火，以各种措施实现“联合国”在朝鲜建立统一“政府”的决议，由英、美、苏、中4国代表讨论解决远东问题。

这时我志愿军已经连续进行了3次战役反攻，将美军赶到了三七线，解放了汉城。美国战略重点在欧洲，它不愿也无力再向朝鲜投入更多兵力，担心再打下去，不仅可能失败，而且可能被撵出朝鲜半岛。为避免彻底覆灭的命运，美国急于停火谈判。

美国的这一立场，在1月12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做出的决定中体现得更明确。从这个决定分析，当时美国最根本的利益和最大的危险仍在欧洲。美国必须在欧洲部署大量军事力量，并鼓励北约盟国也采取同样做法。美国的根本利益决定了它绝不可能陷入亚洲这场持久战，消耗掉原应部署在欧洲的军事力量。这很可能是克里姆林宫所希望的。在这个分析的基础上，杜鲁门政府制定了对朝作战政策：必须把战争限制在朝鲜，保持对海空力量的限制，不再派任何增援部队，尽可能稳住三八线附近的战线，然后寻求停火，达成停火协议，使朝鲜恢复到1950年6月25日以前的状况。

美国政府在强调除非“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由于军事原因被驱逐，决不自动撤军的同时，还做了如果顶不住就撤出第8集团军去保卫日本的准备。

彭总作为我方战场统帅，即明了敌人的情况，也明了我军的情况，美军放出和谈信号后，他认为这时谈判形势对我方有利。可以多占地方，同时还可以少牺牲许多同志。彭总作为战场指挥员，把这些情况和自己想法向中央作了反映。

当时，毛泽东主席有自己的考虑，不想谈，考虑到敌人和谈没有诚意，是缓兵之计，同时也想争取更大的胜利。以后调去了19兵团、3兵团、20兵团、47军、16军等，又组织了大的反击，经与敌人在三八线上反复争夺，最后把战线稳定在了三八线附近。

美国在一年的侵朝战争中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他们的兵员和物资的消耗比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头一年消耗多1倍。其物资消耗平均每月为85

万吨，几乎相当于当时美国援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1 年半的数量。本来美国全球战略重点在欧洲，可是它却在侵朝战争中动员了全部陆军的 1/3，空军的 1/5，海军的 1/2，还动员了英、法等国一部分军队，由我军入朝时的 42 万，增至 69 万。这在战略上是轻重倒置。虽然如此，仍感兵力不足。美国的战备预备队，只剩下在日本的美军两个师和伪军 3 个师以及在美国国内的 6 个半师，再往朝鲜增兵已十分困难。英、法等国则更不愿意再往朝鲜增兵。美国付出代价如此巨大，胜利却十分渺茫。这不仅引起美国人民强烈不满，反战、厌战情绪日益高涨，而且使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也日益激化。

面对军事和政治上的不利局面，美国陆军副参谋长魏德迈哀叹道：“朝鲜战争是个无底洞，看不到联合国军有胜利的希望。”美国统治集团感到单纯靠军事手段打败中朝联军，解决朝鲜问题已不可能。5 月 16 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遂做出“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动”的决定。6 月初，美国又通过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多次透露愿意通过谈判结束敌对行动的意图。美方之所以先倨后恭，完全是被我们打的，和谈局面完全是我们打出来的。美方在表示愿意和谈的同时，军事上也暂时放弃了全面进攻，改为在三八线附近构筑防御阵地，转入战略防御。

我军经过 5 次战役，虽然把敌人赶到了三八线，扭转了朝鲜战局，步兵占有很大优势，炮兵、坦克兵和后勤保障力量也得到了加强，但是与敌人相比，技术装备仍处于非常悬殊的劣势。此时，我军的兵力已由入朝时的 30 万，增至 77 万，人民军由 11 万增至了 34 万，我方总兵力已达 112 万。敌我兵力之比为 1:1.6，我属优势，但是技术装备呢？敌人有轻迫击炮以上火炮 3560 余门，坦克 1130 余辆，飞机 1670 余架，舰艇 270 余艘。我军仅有少量坦克和飞机，火炮的数量质量亦远远不如敌人。制空权、制海权完全掌握在敌人手里。我军虽然步兵数量多、战斗力强，占有较大优势，但是由于我军仍无白天行动的自由，部队机动和物资供应均受到很大限制，此种优势很难充分发挥。这种情况下，我若想消灭敌人有生力量需要时间，需要有个敌我力量消长的过程，需要一个改善我军技术装备、提高我军现代化作战能力的过程。这样，战争的长期性就非常明显了。既然速胜是不可能的，那么当客观上出现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可能性时，我们当然应抓住这个时机，一方面准备持久作战，一方面与敌人举行停战谈判，争取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因此，美方在 5 月底放出和平空气后，金日成首相便于 6 月初到达北京，同毛泽东、周恩来商谈了有关停战谈判的方针与方案。

6 月 23 日，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马立克在联合国新闻部举办的“和平的代价”广播节目中发表演说。马立克说：“维护和平的事业是可能的，朝鲜的武装冲突目前最尖锐的问题也是能够解决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各方有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意愿。苏联人民认为，第一个步骤是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而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

马立克的这个讲话，代表了朝中方面的观点。6 月 25 日，我《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中国人民完全支持马立克的建议，并愿为其实现而努力。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朝鲜反侵略战争，其目的就在于求得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

同时，杜鲁门在美国田纳西州发表政策演说，一方面叫嚷要继续进行侵略战争，另一方面又表示愿意参加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

接下来的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李奇微的声明和金日成首相、彭德怀司令

员的答复声明了。

从此，朝鲜战争便开始了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交织进行的边打边谈的相持局面。

美国毫无诚意

停战谈判开始后，李奇微提出他们的联络官乘坐的每一辆吉普车上都将悬挂一面大白旗以防被误伤。会谈了几次以后，美联社的一个记者写了一篇东西，说堂堂的美国代表，代表联合国军总司令去谈判，车上挂着白旗，太不光彩了，这简直是投降嘛！这么一讲，引起了轩然大波。原来说打白旗是为了安全，是保护他们的标志，美联社记者这么一讲，他们不干了，不打白旗了。后来又说不开城谈判也不行了，理由是开城没有中立气氛。他们中止了谈判，要求将谈判地点由开城移到双方军事接触线上的板门店，否则就不恢复谈判。我方为了扫除对方阻挠复会的借口，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以后会谈就挪到了板门店。

对于停战谈判，美国毫无诚意。

一方面，他们积极备战，从美国本土运来 10 多万兵员补满缺额，增加炮兵、坦克部队，美空军第 116 师、第 136 师两个战斗轰炸机联队进驻日本，美第 40、第 45 师由日本调入朝鲜，增加其陆、空军作战力量，将英第 28、第 29 旅和加拿大第 25 旅、新西兰炮兵第 16 团组编为英联邦第 1 师，扩大了大丘机场，新开辟原州、水原等十几个海空军运输补给基地，修建东豆川里、水平、麟蹄等十几处前沿机场。还抓紧修筑道路、运输作战物资、出动大批飞机轰炸志愿军交通运输线和后方基地。另一方面，又在谈判桌上，节外生枝，仅讨论议程问题就拖了半个多月，讨论军事分界线时，美国借口其同我军比较有“海空军优势”，必须在陆上取得“补偿”，提出将分界线划在志愿军阵地以北约 38—68 公里的开城、伊川、通川一线，企图不战而攫取我方 12000 平方公里的土地。

这一政治讹诈理所当然地被我中朝方面严词拒绝后，美方公然说，那么“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

李奇微也狂妄地声称：“用我们联合国军的威力，可以达到联合国军代表团所要求的分界线位置。”

8 月 18 日，敌人趁我遭受特大洪水灾害和绞杀战危害的极端困难之机集中美伪 3 个师的兵力，在航空兵、装甲兵支援下，向北汉江以东至东海岸约 80 公里的人民军防御正面发动进攻，发起所谓“夏季攻势”。8 月 22 日，他们轰炸扫射了中朝代表团住所，谈判被迫中断。美国企图以军事压力逼迫中朝方面接受其在谈判中提出的不合理要求。

敌人向人民军发起攻击后，朝鲜人民军在粮、弹供应不足的困难情况下，利用野战工事，进行了顽强阻击和积极的反击。激战 3 天，敌仅占领人民军部分前沿支撑点。8 月 21 日，敌被迫转入重点进攻，战斗更为激烈，有的阵地人民军与敌反复争夺达 10 余次。朝鲜人民军 2、5 军团为了打击进攻之敌，乘敌疲惫之际，夺回部分阵地，决定于 8 月 25、26 两日，先后对敌进行局部反击。第 5 军团以第 6 师、第 12 师各两个团，反击进占杜密里以北地区之敌，第 2 军团以第 27 师在第 5 军团第 6 师一部配合下，反击大愚山之敌。战至 27 日夜，第 5 军团先后收复了 983.1 高地、773.1 高地、752.1 高地、

三台洞、阵岬、鸠岬等阵地。第2军团对大愚山之敌的反击，当夜未解决战斗。此时，敌我双方为加强各自的兵力，都迅速地调整了部署，准备再战。

9月1日，敌人又重新发起了进攻，每日不断地以营、团的兵力，向我人民军的项岭、杜密里以北773.1高地（敌称该线为“血岭”）、大愚山以北加七峰、1211高地及加田里以北的阵地攻击，战至9月8日，敌伤亡惨重，仅占我部分前沿阵地。9月9日，伪8师每天以1个多团的兵力，在大量飞机和猛烈炮火支援下，向黄基至松角约4公里我防守地段连续攻击，防守该地段的人民军第3军团的1个团顽强抗击，昼失夜反，与敌人激战4天，阵地屹立未动。14日敌又将进攻重点集中在道味岬至芦田坪4公里地段上，每天以4—5个营的兵力进行轮番攻击，人民军3军团顽强防守，又激战4天，敌仍寸步未进。至9月18日，敌除了在杜密里以北851高地至1211高地继续保持进攻并一直持续到10月中旬外，其它地段均已被迫停止进攻。敌因攻击851高地，伤亡惨重而无所获，所以他们把该地称为“伤心岭”。至此，敌人在朝鲜东线发动的夏季攻势，终于被我英勇的朝鲜人民军所粉碎。

在东线朝鲜人民军粉碎敌人夏季攻势的过程中，我志愿军64、47、42、26军各以一部分兵力，先后向德寺里、399.1高地、西方山、半流峰等敌人阵地发起了攻击，占领了西方山、斗流峰要点，改善了我军平康平原的防御态势。

在夏季战役中，中朝两国军队全线共歼敌7.8万余人（内有美军20002人），敌人在东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仅突入我阵地2—8公里，占领我土地179平方公里。我军胜利地粉碎敌人在夏季的攻势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也说：“这次的攻势是没选好时机，没选好地点，没选好敌人的败仗。”

敌人的夏季攻势被我军粉碎后，仍不甘心，又在西线发动“秋季攻势”。他们这次改变攻击重点集中攻击志愿军防御阵地。10月3日，敌人集中英联邦师和2个美军师，于西线进攻我64、47军正面防御高地。以后，敌人又转向东线，集中两个师向我68军防御阵地进攻，集中美军两个师和伪军两个师，向我67军防御阵地正面进攻。

进攻我64军防御阵地正面之敌，是英联邦第1师和美骑兵第1师第5团一部，其进攻重点为高旺山、马良山。敌每天以一两个团的兵力向我猛烈攻击，激战至4日下午，我守高旺山及其以西227.0高地的部队主动撤离了。10月5日，敌将进攻重点指向马良山及其西南216.8高地，每天敌均以1个多团的兵力在大量飞机和猛烈的炮火支援下，进行多梯队的轮番攻击。我马良山阵地曾5次失而复得。我防守216.8高地的一个连，依托坑道式的掩蔽部，即由两个“猫耳洞”贯通的马蹄形防炮洞，1天内连续击退敌人20多次的冲击。而我以很少的代价大量地杀伤了敌人，初步显示了坑道工事的优越性。激战至8日，因敌伤亡过大被迫停止进攻。

防守天德山及418高地的47军141师1个营，每天抗击敌人两个步兵团的猛攻，平均击退敌人10余次冲击，阵地被炸为焦土，只剩下1名副团长率10余名轻伤员，顽强地守住了阵地。

这次敌人发起的秋季战役又进行了将近1个月，我军打退了各种进攻之敌，东西两线共歼灭敌人7.9万余人，敌我伤亡为3：1。敌人在西线仅前进约3—4公里，东线仅前进约6—9公里，共占我土地467平方公里。

敌人这次是东西线同时进攻，攻势十分猛烈。我军有4个军同时投入战

斗。后勤保障任务很重，弹药消耗急剧增加。战斗激烈时，西线部队平均每天消耗迫击炮弹4个基数，山野炮弹2个基数。在激战的10天内，东线部队平均每天消耗弹药126吨。志愿军后勤部队在克服洪水灾害，开展反“绞杀战”斗争的同时，千方百计地保障了部队反击作战供给的需要。

敌人连续发动夏季、秋季攻势，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而遭到巨大伤亡。美方深深感到，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在战场上也难以得到，不得不被迫返回到谈判桌旁。

两军激战上甘岭

1951年夏秋季的防御作战，我军虽然取得了很大胜利，但在敌人密集的炮兵、坦克、航空兵火力的猛烈轰击下，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实践证明，仅仅依托一般野战工事作战，是很难有效地保存有生力量，进行持久坚守防御战的。

在夏季防御战役后期，特别是秋季防御战役中，战士们为防炮、防炸弹，在山上挖了一些“猫耳洞”。后来，又把这些“猫耳洞”挖深，把两个洞联结起来，形成一个马蹄“U”形小坑道。敌人打炮时，战士们就进去隐藏；敌人炮火向我纵深延伸，敌人步兵接近时，战士们便冲出来杀伤敌人。这就是坑道工事的雏形。

这种由战士们创造出来的初级工事，在敌人炮兵、航空兵的猛烈火力轰击下，经受了考验，对保存我军有生力量，保证防御的稳定性，起了明显的作用，证明了它是劣势装备的我军同优势装备的敌人作战的一种好方法。

这种工事在我军防御阵地上出现后，彭总立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军终于找到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好方法。1951年10月志司（志愿军司令部。简称，下同）发出指示，要求在全军进行推广。一个全军性的挖洞子热潮便在志愿军的防御前沿迅速地开展起来。那些日子里，敌人在上面打炮，我们在下面放炮（炸洞子），整个防御地域内，地上和地下，日日夜夜滚动着隆隆的爆炸声，战士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钎，一边战斗，一边进行战场建设。

敌人从1951年“秋季攻势”失败至1952年秋，再没有发动大的攻势。这段时期，朝鲜交战双方，除了在谈判桌上激烈交锋以外，没有什么大的攻防行动。而停战谈判也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朝鲜战场出现的这种僵局进一步引起美国及其盟国内部的反战情绪。他们纷纷提出要退出这场看不到结果的战争。当时美国正值大选高潮，美国大选的竞争焦点，不是国内问题，而是如何尽快地解决这场“令人讨厌的朝鲜战争”。在这种形势下，美国统治当局急于扭转他们在朝鲜战争中的被动局面，企图以向我发动新的攻势取得战场上的胜利，缓和内部矛盾，以此当做竞选的筹码。

1952年7月中旬，美陆军参谋长柯林斯、海军作战部长弗克特勒、远东海军司令布里斯柯、太平洋舰队参谋长海尔、第7舰队司令柯拉克等相继窜到朝鲜前线进行视察。8月中旬，美侵朝总司令克拉克、伪总统李承晚、第8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以及第1、9、10军长，先后到铁原、金化地区进行视察。在这期间，敌人频繁调动部队和进行军事演习。

当时，志愿军领导已经预感到敌人为适应其政治需要和配合谈判，有再

度向我发动秋季攻势之可能，决定在敌人进攻之前向敌人发起战术性反击作战。

9月10日，志司电告中央军委：

我为争取主动，有力打击敌人，使新换的部队取得更多的经验，我们拟在换防之前，以39军、12军、68军为重点，各选3—5个目标，进行战术上的连续反击，求得歼灭一部敌人，其他各军亦应各选一至两个目标加以配合。估计我各处反击，敌必争夺，甚至报复，进行局部攻势，这就更有利于我杀伤敌人。反击战斗时间拟在本月20日—10月20日进行，10月底进行换防”。

两天后，志司收到军委的回电：

9月10日电悉。同意你们10月底3个军换防的计划，和换防前的战术行动。

这样，志司就于9月14日23时20分，向全军下达了战术反击的命令。要求第一线各军按照统一计划各自选定目标，对美伪军的班、排、连支撑点及防御阵地实施进攻，求得在进攻当晚完成攻歼任务，在作战指导下，强调准备好了再打，组织密切的步炮协同，加强对空防御，大胆使用坦克配合步兵作战，并作好抗击敌军连续反扑的准备。

根据志司提出的作战方针、目的和要求，志后（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简称，下同）将所需弹药提前储存于各前沿兵站，并储存了两个半月粮食。

当时敌我双方正面部队的布势是：敌人5个军18个师，其中一线展开15个师，二线3个师。我军10个军、人民军3个军团，其中一线展开7个军、人民军2个军团，二线志愿军3个军、人民军1个军团。

这次反击虽然进攻目标都是敌人的连排支撑点阵地，但是进攻的目标多，遍布整个东西战线。我方动用兵力虽不多但参战建制军不少。志愿军有6个军参战（39、65、40、38、12、68军），人民军两个军团参战（第3、第5军团）。这次反击的特点是在志司的统一布置下，各军根据各自准备情况，陆续发起进攻。

9月18日晚，夜色很暗，担任主要攻击的39军以4个连的兵力在100多门火炮支援下，突然向其正面敌人的两个连支撑点发起攻击，全歼美军两个连及1个排。随后，又打退敌人1个排到1个营的兵力连续反扑30多次。12、68、65、40、38军和人民军第3、5军团在完成准备后也陆续发起了反击。

我军在正面180多公里阵地上对敌方18个目标进行了19次反击。其中美军防守的7处，伪军防守的11处。共打退敌人1个排至1个团兵力的反扑160多次，歼灭敌人8300多人。

这期间，敌人将预备队第45师前调，接替伪第8师防务。预备队伪第1师也前调，接替美第3师防务。我方分析敌人有可能采取大的行动。

为了在敌情未有更大变化之前给敌人更大的打击，志司决定随即进行第二阶段的战术反击。由西海岸到东海岸一字展开的第一梯队65、40、39、38、15、12、68军7个军参战。

10月6日黄昏，我7个军各以连排为单位在东西两线宽达180余公里正面上，在760门火炮的配合下，同时向敌人23处1个班到1个营兵力的防守

阵地发起攻击。除 2 个目标由于准备不充分，未能攻占外，其余目标均于当夜或第 2 日攻占。

我军开始发动全线战术反击时，“联合国军”还摸不清我军的作战意图。我反击发起后的第 6 天，即 9 月 24 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亲临前线视察，他还认为“共军是试探性的进攻”，“是想探悉他们要夺取的地方的地形”。我军在全线对“联合国军”23 个前沿据点同时发起攻击，使“联合国军”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全线告急后，克拉克才恍然大悟，认为联合国军已失先攻之利，作战主动权又转到我军手里。同时他还意识到，我之战术反击作战，目的在于迫使其接受我方关于遣返战俘的方案。

克拉克为了迫使我军转入守势，扭转其所处的被动局面，谋求在和谈中的有利地位，10 月 8 日，悍然宣布和谈无限期休会，在同一天，批准了美第 8 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的“金化攻势”计划，此次攻势的目标是范弗里特亲自勘察选定的，即上甘岭地区的两个山头——597.9 高地和 537.7 高地北山。

上甘岭是朝鲜中部一个山村，位于金化以北五圣山南麓。

五圣山为我 15 军防御的重要阵地，海拔 1 千多米，西瞰金化、铁原、平康地区，东扼金城通往通川至东海岸公路，是我中部战线战略要地，也是朝鲜中部平康平原的天然屏障。597.9 高地和 537.7 高地北山，是五圣山的前沿要点。山高坡陡，地形复杂，直接威胁着敌人的金化防线。敌人要夺取五圣山，必须首先夺取这两个高地。而如果敌人夺取了五圣山，就从中部突破了敌军防线，在我战线中央打开了一个缺口，就可以进到平康平原。敌人的坦克就可以发挥优势了。还可以进一步进攻我平康、金城以壮地区。敌人看准了五圣山这两个点，并且他们以为根据他们的力量，打这两个小点是不成问题的。

敌人对这次战役十分重视，由范弗里特直接指挥。

10 月 14 日 3 时，敌人先以众多的航空兵、炮兵火力向我上甘岭的两高地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猛烈炮火轰炸，随后于凌晨 5 时美 7 师、伪 2 师以 7 个营的兵力在 300 多门大炮、30 多辆坦克和 40 余架飞机的支援下，对我仅 3.7 平方公里的两个山头发起了连续不断的猛烈冲击。与此同时，敌美 7 师、伪 9 师 4 个营还向我 15 军 29 师和 44 师阵地进行了箝制性进攻。

敌人很清楚这两个山头的重要性，一开始他们就摆出了一个势在必得的架势。我们当然也同样清楚这两个山头的重要性，我们志司领导的态度是势在必守！

志司接到负责上甘岭地区防务的 15 军军长秦基伟、政委谷景生的电报后，立即给我 3 兵团和 15 军下达了任务。要求这个点要坚决守住，不能丢失。志司还决定配合 15 军粉碎敌人对上甘岭的攻势，改变原来准备 10 月 22 日结束的反击作战的计划，延长至 10 月底。同时决定 15 军原定的反击注字洞南山的计划暂不进行为宜。指示他们集中力量，准备粉碎敌人任何进攻，不断组织小的反击作战，大量歼敌，取得经验。

志司领导还提醒 3 兵团，战斗虽然刚刚开始，但从敌人的兵力部署和开始进攻的气势分析，这将是几年来少有的一场恶仗。志司领导请 3 兵团领导转告 15 军的同志，不但准备工作要仔细，还要准备付出巨大的代价。五圣山是我们的屏障，一定要稳稳守住。志司将全力支持你们！

10 月初，15 军开展了“一人舍命，十人难当”的硬骨头活动。他们提

出人在阵地，绝不丢失一寸阵地。集中全力实施反击作战，10月6日—12日先后攻歼4个要点的敌人。

本来，15军45师拟集中第133、134团于10月8日反击注字洞南山伪2师31团1个加强营阵地。该师全部炮兵和2个步后团都已进入阵地，完成射击准备。就在这时，敌人向上甘岭发起了猛攻。我防御阵地全天电话不通，情况不明。

15军首长考虑到此时我行动的性质，力量对比和战场态势已起了变化，为了争取主动，他们在向志司报告情况的同时，改变了决心。令45师立即停止现行反击计划。调第133团、134团参战，全师炮兵转移射向，急速支援上甘岭。抽调第133团1营和第134团1营为第135团预备队，稳定防御。军预备队第86团准备参战。45师、团指挥所前移至德山岬和上所里北山、五圣山。

由于该师指挥重心迅速转移，部署调整及时，保证了战役第一阶段我军有足够的力量在两个高地上与敌人反复争夺。为我军争取主动、争取时间、向前调动预备队打下了基础。

10月14日，敌人开始向两个高地发起进攻，我防守两个高地的第135团9连和1连在仅有15门山、野、榴炮和12门迫击炮支援作战的情况下，主要依靠步兵火器、依托坑道和野战工事顽强战斗，先后击退敌30多次冲击。至下午1时，地表阵地几乎全部被摧毁，人员伤亡较大，弹药消耗殆尽，被迫转入坑道作战。当晚，我45师趁敌立足未稳，组织4个连进行反击，又恢复地表阵地。

10月15日，15军将134团两个营，133团1个营分别加入两个高地的防御。令预备队86团准备接替135团防务。15—18日敌又先后投入了两个团又4个营的兵力在飞机和大炮掩护下向我两个高地连续猛攻。我防守部队与敌反复争夺，地表阵地昼失夜复，战斗异常残酷激烈。

19日夜，我军在炮火支援下分别以4个连和3个连的兵力向敌发起反击，经过激战全歼守敌，恢复了全部阵地。但是，第二天敌人又以3个营的兵力向我反扑，我防守部队与敌激战终日，终因伤亡过大，弹药缺乏，除597.9西北山脊外，地表阵地全部被敌人所占领。

这一阶段，敌人投入7个团17个步兵营。我45师投入了3个团21个步兵连。双方都使用了猛烈的炮火，敌人死伤7千余人，我45师也伤亡了3千余人。

这时，45师已消耗很大了。3兵团向志司报告说45师已经没有力量再补充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

志司首长立即决定给45师补充1200名新战士，命令15军29师参战。命令刚刚打完反击从五圣山路过的12军停止北返，作为战役预备队，逐次投入战斗。将炮7师1个营、炮2师1个连和高炮1个团加强给15军。

同时，敌人也调整和增加了兵力。受到重创的美7师西移，其进攻597.9高地的任务由伪2师接替。伪2师将右翼1个团的防务交给伪6师，并调伪9师于金化以南为预备队。

敌人占领我地表阵地后，为继续巩固占领，一方面抢修工事，一方面进一步向我纵深发展，采用轰炸、熏烧、爆破、放毒、堵塞、断水等手段对我坚守坑道作战的部队进行封锁和攻击。

21日，邓华代司令员电话指示15军，目前敌人成营成团向我钢铁阵地

冲锋，这是敌人用兵上的错误，是歼灭敌人于野外的良好时机，应抓紧这一时机，大量杀伤敌人！

根据邓华指示精神，15军命令45师坚守坑道作战，争取时间，为进行最后粉碎敌人进攻，恢复全部阵地的决定性反击做准备。

在敌人的围攻和轰炸下，我坚守在坑道内部的部队缺粮、缺弹、缺水、空气恶浊、氧气不足，情况极端困难。但是他们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在我纵深部队和炮兵的支援下，团结一致积极作战。

打破围攻破坏，确保坑道安全，是坚持坑道斗争的关键。我军除坚守坑道、制止敌人接近外，在作战方法上相应作了改变，主要是采取冷枪狙击和夜摸偷袭的战术。138团8连坚守597.9高地一号坑道时，3天时间以冷枪狙击歼敌115名。21—29日9天时间里，我军先后组织20多个坚守坑道的分队向敌搞夜摸偷袭150余次，歼敌2000余人。

这两种作战行动虽然兵力不多，活动范围也小，但能不断给敌以杀伤消耗，使敌终日恐慌不安，达到了确保坑道安全的目的。

交战双方在3.7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投入了大量兵力、兵器。敌人先后投入兵力6万余人、火炮300余门、坦克170余辆，出动飞机3000余架次。我方先后投入兵力4万余人、火炮138门、高炮47门。战役中敌人共发射炮弹190余万发，投掷炸弹5000余枚，最多时一天发射炮弹30余万发，投炸弹500余枚。我两个高地的土石均被炸松一至两米，走在上面，松土没膝，像走入石灰里一样。地面阵地全被摧毁，许多岩石坑道被炸短3—4米。我军发射炮弹40余万发，亦属空前。这场双方都投入几个师为争夺两个连阵地的作战，持续时间之长，火力之猛烈、密集，战斗之紧张、残酷，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

战后，美联社记者报道说：“在三角山，虽然联军的大炮实际上已将山顶打得不成样子。但是，中国军队还能筑成一条铁的防线。”合众国际社援引“联合国军”指挥官的话说，“即使用原子弹也不能把狙击兵岭和爸爸（指五圣山）上的共军全部消灭。

这次战役是对我军以坑道骨干的防御体系的严重考验。我军坑道不仅是囤兵坑道，而且是战斗坑道，是两种坑道的结合。我军不仅能依托它取得战术性反击胜利，而且能依托它防御敌人大规模攻击。每一个阵地都与敌人反复争夺，每一个阵地都成为消耗敌人的“肉磨子”。在敌人炮火密集、飞机轰炸封锁的情况下，我军只能靠晚上把部队运上这两个阵地，为保证两个连的坑道作战，动用了5个师！这次战役有大量炮兵支援地面部队作战，几个团的高炮掩护地炮，地炮复放阻击敌人。我们的炮兵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步兵一呼叫，就可及时以炮火轰击敌人冲锋部队。

这次战役既是一次大规模的坚守阵地防御战，也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打钢铁”、“打后勤”的现代化战役，弹药消耗极大。在43天的战役中，共供应各种物资1.6万吨，实消耗1.1万吨，其中仅弹药一项即达5000多吨，平均每天120吨。战斗紧张时，一个团作战，需要两个团负责运输作战物资。由于敌人炮火密度每公里正面达299门，加上大量航空兵、坦克及火炮，在前沿到战术纵深20公里的地域内构成了层层火网、火墙，实行昼夜不停严密封锁，火线运输人员把物资运上去，把伤员运下来往往要通过几十道封锁线。在接近坑道时，距敌人只有二三十米，往往三面受敌人地堡群、探照灯的封锁控制。我地表阵地被打成1米多深的石粉末，有的阵地被打断，坑道被打

短，以致运输人员经常迷失方向，找不到道路和坑道口，误入敌人阵地。运输部队一个排四五十人把物资送上去，只能剩下二、三人回来。

这次战役证明在阵地防御战上，我军即使在没有制空权的条件下，以劣势的装备，也可以战胜现代化的有制空权的美国军队。金化攻势之后，敌人就再也没有向我军发动过什么象样的攻势了。

秋季反击

5月30日，志司领导召开了兵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军事会议。

会议由志愿军代司令员兼政委邓华主持，副司令员杨得志、洪学智，政治部主任李志民、参谋长解沛然，“西海指”副司令员梁兴初、副政委杜平、参谋长王政柱，3兵团新任司令员许世友、副司令王近山、副政委杜义德，9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建安、参谋长胡炳云；19兵团新司令员黄永胜、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曾思玉、副政委陈先瑞，20兵团代司令员郑维山、政委王平、参谋长肖文玖，炮兵指挥所司令员高存信，工程兵指挥所司令员谭善和，前线运输司令部司令员刘居英等参加了会议。

会上，邓华同志讲了《关于举行夏季反击的几点意见》，研究制定了战役的指导方针和部署。

5月5日，志司下达了《举行夏季反击准备工作的补充指示》。这次战役确定，西线以打击美军为主，东线以打击伪军为主。

在作战指导上，决定采取“稳扎狠打”、“由小到大”的方针。“稳扎”就是仍要坚持持久作战，粉碎敌人的任何进攻，大小战斗都要有周密计划，选准目标，充分准备，确有把握之后发起攻击。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不但要准备对付一个“上甘岭”，还要准备对付两个甚至三个“上甘岭”，这样才能处置自如。“狠打”就是在完成必胜的准备工作之后，对敌人“不打则已，打则必歼，攻则必克，守则必固”。战役的规模和步骤由小到大，全面不等齐地发展。

正当我们准备发起夏季战役，但尚未完全准备就绪时，板门店谈判又出现了岔头。美方在战俘遣返问题上无理纠缠，阻挠谈判的顺利进行。5月7日我方提出“将不直接遣返的战俘，由双方同意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在朝境内看管”，遭到美方的极力反对。他们提出了一个无理的所谓的“就地释放朝方战俘”的反建议。

此时，我军各参战部队对攻歼重点目标的准备虽然尚未全部完成，但是为了配合谈判，让敌人尝尝我们的厉害，志愿军领导决定将原计划于6月份发起的夏季反击提前到5月中旬，对敌“大动手，狠动手”，用铁拳头教训一下敌人。

5月11日志司发出命令：凡是对敌人连以下目标进攻已经准备完成的，即可开始作战。

5月13日，我20兵团所属的60、67军和第9兵团所属的24、23军先后在火炮支援下，向美军及伪军8个师的正面支撑点发起猛烈的反击。由于发起突然，攻势凌厉，战至26日，我方阵地已向敌方推进两平方公里，取得了反击的初步胜利。

这次战役我军的卡秋莎火箭炮部队21师参加了战斗。炮21师是提前进入阵地的，敌人未发现，只是发射排炮进行盲目的封锁。晚上9时，炮21

师准时发射，炮火形成数道火光，像呜呜地刮大风似的飞向敌人阵地，红透了半边天，几平方公里的敌人阵地全部覆盖。敌人阵地迅速燃烧起来了。然后炮 21 师马上转移，步兵冲上去了，步兵非常欢迎卡秋莎炮兵师。称之为炮兵之王。那时他们的车号是“84”，部队一见“84”车号就主动让路。

我军夏季反攻这种势在必打、势在大打的架式使美方感到了惊恐。他们害怕丢失更多的地盘。反击开始后，美方在战俘遣返问题上的态度便明显松动，同意了我方 5 月 7 日的方案，双方于 6 月 8 日达成协议，停战谈判有了显著的进展。但是，李承晚在美国一些好战分子的支持下，却仍叫嚣“反对任何妥协”，反对签定停战协议，要单独打下去，其谈判代表也退出了谈判。还在汉城、釜山导演了反对停战的所谓“群众游行”。

我军第一阶段反击作战结束之后，20 兵团所属的 60、67 军稍事休息，按预定计划，5 月 27 日又开始了第二阶段反击作战。这次反击将攻击目标扩大到进攻敌人营一级的阵地。5 月 28 日，西线 19 兵团亦开始第二阶段反击作战。

志愿军总部为了分化敌人，打击李伪集团的气焰，促进停战谈判，将原定以西线为主打击美军的计划，改为以打击伪军为主，适当打击美军（连以下目标），对其他国家的军队暂不攻击的策略。这次反击作战仍以东线 20 兵团方向为重点。志愿军领导调整了部署：令 54 军由西海岸开赴第一线，归 20 兵团指挥，准备接替 67 军防务；16 军由西海岸开赴第一线，归 9 兵团指挥，准备接替 23、24 军平康接合部的防务；归 24 军指挥的 204 师归还 68 军建制；21 军全部入朝，主力集结于谷山地区，作为志愿军总预备队。

6 月 4 日，20 兵团召开作战会议，研究如何贯彻志司意图。他们修改了反击作战计划，重新调整了部署，决定集中力量打击北汉江两侧的伪第 8、第 5 两个师，并准备吸引和粉碎可能从纵深机动的两个师以上的反扑。

6 月 10 日晚 10 时整，弦月如弓，满天繁星，我军进攻的炮火准备开始：各种火炮齐声轰鸣，像春节放鞭炮似的响个不停，声音震耳欲聋，炮阵地上脸对着脸讲话都听不清。这样整整打了 20 分钟后，我们的卡秋莎火箭炮 21 师又连着发了两个齐放，这时其它炮也还在打着。打完后，敌人的阵地燃烧成了一片火海，地上腾起的烟尘是红的，天上翻滚的云彩也是红的。

早在 9 日夜间，60 军的冲击部队已秘密进入敌阵地前与翼侧隐蔽处潜伏。

10 日晚，在副军长王诚汉的指挥下（军长张祖谅不在位），60 军以 3 个团兵力，在各种火炮支援下，采取多梯队的方式分别从东、北两个方向发起冲击，不到 1 个小时，全歼守敌 1 个团。首创了阵地战以来一次战斗攻歼敌 1 个团的范例。至 6 月 15 日，60 军把阵地向敌方推进 42 平方公里。60 军在第五次战役中失利，180 师打了败仗。这次算是打了一个翻身仗。

6 月 11 日 67 军将 8 个连兵力潜入敌阵地前的我秘密构筑的囤兵洞。12 日晚，67 军以 3 个团的兵力，在各种火炮、坦克的支援下，向敌人的“模范阵地”号称“京畿堡垒”的伪 8 师 21 团主阵地突然发起冲击，迅速占领该阵地，全歼了守敌。3 天后，67 军把阵地向敌方推进了 12 平方公里。这期间 19 兵团 1、46 军，9 兵团 23、24 军也向当面敌人发起了反击，并分别将阵地向敌方推进了 1.5 平方公里和 1 平方公里。

志愿军进一步的反击作战胜利，使克拉克和华盛顿的决策者们愈发感到震惊。6 月 15 日傍晚，板门店停战谈判又取得重大进展：军事分界线基本上

已达成协议，以 6 月 15 日 24 时为准，在 24 时前敌我双方攻占之阵地均为有效，在此以后（零时起），即做为 16 日计算，敌我攻占之阵地均属无效。这次停战分界线的划分，不但比以前顺利得多，而且经过这次反击，我方又向南推进了 140 平方公里。

军事分界线划定的第三天晚上，李承晚集团竟然以所谓“就地释放”的名义，胁迫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 27000 多人离开战俘营，押到李承晚军队的训练中心。李承晚集团的这一行径，引起了国际上的强烈反对，各国舆论纷纷谴责李承晚是“出卖和平的叛徒”，“不负责任的乖戾小人”，甚至要求美国换马。英、加、澳等国还抗议李承晚“破坏联合国军司令部权限”。同时，美方首席代表哈里逊也写信给朝鲜方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声明此事与美方无关。

6 月 19 日，金日成首相和彭德怀司令员致函质问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指出这是“有意纵容李承晚集团去实现其久已蓄意的破坏战俘协议、阻挠停战实现的预谋，我们认为你方必须负起这次事件的严重责任”质问克拉克“究竟联合国军司令部能否控制南朝鲜的政府和军队？”“朝鲜停战包括不包括李承晚集团在内？”

6 月 20 日，彭总由北京赴开城，准备办理停战协定签字事宜，途经平壤给毛泽东主席发了一封电报：

毛主席：20 日晨抵安东，南北朝鲜均降雨，故白日乘车至大使馆，与克衣、邓华均通电话。根据目前情况，停战签字须推迟至月底似较有利，为加深敌人内部矛盾，拟再给李承晚伪军以打击，再消灭伪军一万五千人（6 月上半月据邓华说消灭伪军一万五千人），此意已告邓华妥为布置，拟明 21 日见金首相，22 日去志司面商停战后各项布置，妥为盼示。

毛泽东接到彭德怀的电报后，当即复电，表示同意：

6 月 20 日 22 时电悉，停战协定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才能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

此时，敌人在金城以南、北汉江以西的 4 个师的阵地也更加突出，态势也对我极为有利，同时我军已查明了敌人第一道防御阵地设施情况。在这个方向上，我们已集中了 4 个军的兵力和 400 多门大口径火炮，有力量进行更大规模的进攻。因此，在接到毛泽东主席的复电后，志愿军党委在彭德怀的亲自主持下开会研究，决定立即在全线发起第三次攻击。随即指示各兵团、各军“原预选目标，如已准备就绪者，应坚决歼灭之；如新选目标应抓紧时间进行准备……对美军及其他外国军队仍不作主动攻击，但对任何向我进犯之敌，均必须予以坚决打击”。

24 日，20 兵团向志司电告，拟以他们现在指挥的 67、68、60、54 军及“志司”临时加强给他们的 21 军 5 个军的强大兵力，在金城以南、北汉江至上所里间 25 公里的地段上实施进攻，并以拉直金城以南战线，歼灭伪首都师、伪 6、伪 8、伪 3 师为战役目的。7 月上旬完成战役准备，7 月 10 日前后发起进攻。

金城以南地区，是联合国军防线的突出部。其东北部山高城陡，易守难

攻。北部、西北部山势较低。金城西南地形开阔，不易隐蔽。其东有北汉江，水深达5尺，不能徒涉。西有南大川，位于双方阵地之间。金城川从金城以西折向东南与北汉江汇合。平时水深不足1米，雨季水涨时，大部不能徒涉，成为纵深战斗的较大障碍。

敌人担任这一突出部防御的是南朝鲜的首都师和第6、8、3师。敌人的基本阵地普遍构筑了坑道、半坑道工事和大量的明暗火力点、地堡群，以盖沟、堑壕、交通壕相连接，阵地前还设置了3—15道铁丝网，增设有各种类型的地雷，纵深达150—300米，是比较完整的、支撑点式的坚固环形防御体系。但其纵深阵地工事较薄弱。

6月25日，志愿军领导批准了20兵团的作战计划，指示20兵团放手作战，如反击成功，情况有利时，可以继续向敌纵深作有限度的扩张；同时指示其他正面各军，在此时只作进攻准备，基本采取守势，如敌进攻则坚决歼灭之。命9兵团之24军保障20兵团的右翼安全。

20兵团在接到志愿军首长的指示后，在新任司令员杨勇、政委王平主持下召开兵团党委会和师以上干部会，决定以所属5个军组成3个作战集团：67军及54军135师、68军202师（欠605团）为中央集团；68军（欠202师）及54军130师组成西集团；60军、21军（附33师）及68军605团组成东集团。“中央集团”在官岱里、轿岩山地段实施突击。“西集团”由外也洞、灰占介地段实施突击。“东集团”北汉江西岸之60军由松室里、龙虎洞地段实施突击，北汉江以东之21军巩固现有阵地并以积极行动牵制当面之敌不使西调。3个集团突破后，首先集中力量攻击金城西南梨实洞、北亭岭、梨船至金城川以北之敌，拉直金城以南战线，并坚守阵地，抗击敌3—4个师规模的反扑，示后再视情况继续向南发展。

3个集团还各组织一个有力支队，准备于突破后插向敌之纵深，截断敌之退路，歼灭敌之炮兵，抢占有利地形，以利于第二步作战。志愿军领导批准了20兵团的战役部署。为了保证20兵团右翼的安全，志司决定20兵团发起进攻后，9兵团24军也从其右翼发起突击，协同其作战，志愿军其他各军及人民军各军团则自选目标，配合作战。

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派吴先恩副司令员组成志后前方指挥所，进驻20兵团，在前线实施后勤统一指挥，并调集10个汽车团的2000多台汽车昼夜赶运作战物资15000吨，其中炮弹7000吨，70余万发，炸药124吨。

7月13日晚，浓云低垂，天色昏黑，闷热异常，我军1000多门火炮，突然以排山倒海之势，铺天盖地地向敌人猛轰。我卡秋莎火箭部队2个师，向敌人连打了3个齐放。接着我20兵团的3个集团同时向敌4个师25公里的防御正面发起了迅猛的突击。

1小时后，全线突破敌人阵地。

“西集团”突破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强攻当面之敌，以渗透迂回支队向敌后纵深猛插。607团侦察排的一个13人侦察班，在副排长杨育才的带领下，在捉住俘虏弄清口令的情况下，化装成护送美军顾问的南朝鲜兵，接连混过敌人3道严密警戒，出敌不意地直抵敌首都师第1团——白虎团团部。正赶上敌指挥所开会，他们便突然开火猛烈袭击，当场毙伤敌团长以下54人，活捉19人，捣毁了伪团部和通信联络，使其无法再组织抵抗和增援，该团很快溃乱。这个侦察排有力地支援了师主力战斗，对全歼“白虎团”起了重大作用。接着，又趁暗夜堵截溃逃之敌，歼灭了一个位于白虎团团部附

近的炮兵营大部和乘车来援的伪首都师机甲团2营大部，并击毙了该团团长陆根诛。

“西集团”的这一仗打得十分漂亮利索，把李承晚的王牌团全歼，美伪大为震惊。

14日，电闪雷鸣，大雨如泼。我军趁敌航空兵活动不便，空中无敌情之机，又迅速扩大战果。西集团战至下午，攻占了梨实洞、间榛岫一线，该集团68军204师在激战中生俘了伪首都师副师长林益淳。54军130师一部在攻占424.2高地后，因未能迅速肃清坑道内的敌人，而延缓了向烽火山的攻击。

敌人的主要阵地轿岩山，碉堡林立，堑壕纵横，坑壕纵横，坑道密布，易守难攻，敌人以两个团的兵力防守。战前，敌人认为我军根本不可能把轿岩山打下来。他们的高音喇叭不住地向我广播说：“轿岩山尤如铜墙铁壁，共军将士还是赶快投降，免得白白送死。”

“中央集团”突破后，左翼199师在对轿岩山的攻击中，遭敌顽强抵抗，战斗异常激烈。我军伤亡很大。右翼200师于当夜突破后，迅速向敌纵深发展，占领了龙渊里、东山里，割裂了伪6师防御，使轿岩山和烽火山两敌侧后受到威胁，发生动摇。

“东集团”因准备仓促，进攻正面狭窄（仅两公里半）又横越山脊，加之主要突击部队走错道路，步炮脱节，进攻速度缓慢，当日傍晚才占领细岫里。

24军突破后迅速歼灭了注字洞南山、杏亭西山之敌，黄昏前占领了432.8高地及杨谷以北地区，保证了20兵团右翼的安全。

这样，至14日晚，金城川之敌已全部被我肃清。

战役发展比较顺利，自始至终贯彻了“稳扎狠打”的指导方针，巩固地占领了新攻占的阵地。

志司于14日15时电令20兵团：以主力控制现占领线，迅速构筑工事，修通道路，抢运物资弹药，推进炮兵阵地，准备粉碎敌之反扑。同时以若干有力支队，乘敌混乱之际，分别向南发展。

我军对敌人的全线突破，特别是“西集团”及24军的迅速发展，对敌金化要地造成了严重威胁。敌慌忙调来刚换防的美3师阻止我军向纵深发展，并向我24军和“西集团”进行反扑。

志司命令“西集团”及24军于14日晚，一面反击敌人的反扑，一面以攻为守，有限度地继续向纵深扩张战果。与此同时，“东集团”以第二梯队180师两个团南渡金城川，迅速向南发展。“中央集团”也以135师1个团零1个营的兵力继续向前发展。15日，我3个集团又向前推进，完成了全部进攻任务。

这时，敌人的战役预备队伪11师和伪7师已调近战场。因连日淫雨，河水上涨，金城川桥梁全部被敌机炸毁，加上我军新修的公路质量较差，泥泞难行，炮兵机动受到很大限制，通信联络和后勤供应也发生很大困难。因此，志司命令我军主力于16日主动转入防御，调整部署，构筑工事，修通道路，抢运弹药物资，准备打击敌人反扑。并以数个支队，乘敌混乱之机，继续向前发展，占领有利阵地。

伪军遭我痛击后，李承晚埋怨美军见死不救，美军埋怨李承晚无能。美伪之间矛盾加深。16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和美第8集团军司令泰

勒勿忙赶到金城前线，整顿败军，部署反扑。

当日，敌人先后以伪 3、6、8 师残部及伪 5、7、9、11 师和美 3 师等部向我发起反击。进攻重点是我“东集团”黑云吐岭、白岩山一线突击阵地，企图恢复失地。17 日，敌纠集 6 个团的兵力，在飞机 100 余架次和大量炮兵支援下，向我“东集团”阵地猛攻。我“东集团”在无炮兵支援的情况下，与敌激战终日。这时，志司和 20 兵团领导鉴于黑云吐岭和白岩等“东集团”所占阵地过于突出，又处于背水作战，我军通往这些阵地的道路和桥梁均遭到严重破坏，物资供应和炮兵支援都难于解决，命令“东集团”除以 1 个营继续守 461.9 高地有利阵地外，其余部队当夜全部撤到金城川以北。中、西集团也作了适当收缩。

17 日晚 18 时，志司向全军发出指示：近来板门店谈判敌人态度转硬，克拉克、泰勒昨日飞赴前线，召集高级军官会议，声言发动最大的反攻，企图夺回金城以南失掉的阵地。估计敌人反扑规模之大和激烈程度，会超过去年秋天的上甘岭战役。我进攻部队，要紧急行动起来，抢修新占阵地工事，组织炮火，加强交通运输，在敌反扑中，予敌更大的杀伤和歼灭性打击，同时命令其他正面各军，以积极的动作牵制当面之敌。

从 18 日起，敌人反扑的重点逐渐转移到我“中央集团”602.2 高地及巨里室北山等阵地。这时，我“中央集团”炮兵阵地已转移就绪，行进道路已经修通，前沿阵地将士严阵以待，我军凭借着有利的地形与步炮的密切协同，与敌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尤其是 19、20 日两天，敌人在飞机 480 余架次，坦克 30 余辆和猛烈炮火的支援下，继续进行猛攻，战斗异常激烈。我军不畏牺牲，英勇抗击，给敌以重大杀伤，牢牢地守住了阵地。在“东集团”正面，敌人继续反扑，企图夺回 461.9 高地，但未能得逞。一直战斗到 27 日，我军一共歼敌 5 万余人，胜利的结束了金城战役。

金城反击战役，我军在全线攻击了敌人 39 个目标，收复土地 178 平方公里，拉直了金城以南的战线，造成了对中朝方面极为有利的态势。

毛主席对这次战役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一文中说：“今天夏天，我们已经能够在一小时内打破敌人正面 21 公里的阵地，能够集中发射几十万发炮弹，能够打进 18 公里。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

金城战役后，我军士气高昂。战役结束时，部队都不愿停止进攻。我们的部队很早就想打个痛快仗了，已经憋了很大劲儿了。以前阵地期间的反击，是小打小闹。上甘岭战役规模不小，但是防御战，要说反击战就是金城战役，不仅消灭了敌人，还收复了土地，大家都觉得扬眉吐气，高兴极了。

在我军猛烈的夏季反攻战役中，敌人遭到了沉重打击，特别是在金城反击战中，敌人损失惨重。对于这种情况，《美国第 8 集团军简史》中是这样描述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大量炮火在头上呼啸，在呼啸声中他们前赴后继攻击这个地区的大韩民国防线。在共军的猛攻下，前哨阵地一个接一个地被打跨了。”

我军作战的节节胜利，使敌人处境更加不利。他们不得不向我作出实施停战协议的保证。

6 月 29 日，美侵朝总司令克拉克给金日成首相和彭德怀司令员复信表示，今后“保证停战条款将被遵守”。7 月 13 日至 7 月 19 日，美方首席谈判代表哈里逊作出保证，“联合国包括大韩民国的军队在内准备实施停战条

款”，“大韩民国进行任何破坏停战的侵略行为时，联合国军将不以支持”。

我方鉴于美方已向我作出保证，而且有关各方都希望尽快结束战争，所以尽管我军还可以乘胜取得更大的胜利，但为了世界和平的利益，仍然同意了美方希望尽快签字结束战争的要求。

7月24日，双方谈判代表确定了最后的军事分界线。这已是第三次校正分界线了。第一次校正是1951年11月27日。由于以后接触线又发生了变化，双方于1953年6月17日第二次校正了军事分界线。第二次校正比第一次校正的分界线，我军向前推进了140平方公里。由于李承晚集团的破坏，停战协定的签字又往后推迟，以致这一个月里接触线又有了变化，所以又作了第三次校正。我军又向前推进了192.6平方公里。后两次校正较之第一次校正的双方协议的军事分界线，我军共向前推进了332.6平方公里。

1953年7月27日，朝鲜时间上午10时，双方谈判代表在板门店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及其临时补充协议。随后，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和“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分别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协定于27日朝鲜时间下午10时生效。

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金日成司令官和彭德怀司令员发布了停战命令，命令自1953年7月27日22时起，即停战协定签字后的12小时起，全线完全停火。停战协定生效72小时内，全线一律自双方已宣布的军事分界线后撤2公里，并一律不准再进入非军事区一步。要求全军保持高度警惕，坚守阵地，防止来自对方的任何侵袭和破坏活动。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却在对其所属人员发表的文告中说：协定签字并不意味着立即或早

日从朝鲜撤退。冲突还没有结束，要保持他们的实力。李承晚则发表声明：“我反对签订停战协定。”

克拉克上将在他以后写的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他签字时的心情的：“我成了历史上签没有胜利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

朝鲜停战的实现，标志着志愿军已经胜利地完成了祖国人民交给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为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

这一胜利是中朝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胜利，是全世界爱好和平力量的胜利，是一次历史性的胜利。正如彭德怀总司令1953年9月在《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中所说的：“它雄辩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的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第四章

王震受命西柏坡，三路纵队挺进天山。
张治中致电促和，邓力群出任中央代表。

第一节 分兵三路入疆

王震下达进军命令

当开国大典的隆隆礼炮声震彻东方和世界时，我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正在中南、西南、西北的广阔战线上，以锐不可当之势，继续勇猛作战。由贺龙领导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主力部队为基础组建的第一野战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指挥下，在习仲勋和西北局其他负责人的全力支援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战，歼灭了国民党和西北的主力部队，迅速解放了陕、甘、宁、青四省。这时，我先头部队第一兵团挺进到甘肃酒泉，准备向新疆展开进军。

1949年10月6日，一野司令员彭德怀风尘仆仆从兰州赶到了酒泉，亲自主持了第一兵团党委扩大会议，与王震一起部署了进军新疆的详细计划。

彭德怀对全体师以上的干部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他说：“新疆现在和平解放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但是新疆有5300余公里的边防线，这些边防线都亟待我军尽快去接管防守，还有七、八万的国民党起义部队也需进行统一改编。同时，那里的敌对势力还在活动，一些国民党军中的顽固分子千方百计的要破坏和平计划。因此我军必须用最快的速度，火速进军新疆，把它真正控制在我军手上……”

会上经过认真研究，进军新疆的计划全部形成，王震司令员向部队下达了最后的命令：

“进疆的主力于10月开始进军，次年3月底以前完成全部接防和改编起义部队的工作！”

行动计划为：以战车5团附一个加强步兵连为先遣队首先行动，开进省会迪化；第2军的4、5、6三个师由480辆汽车分两路运送进疆；第6军乘飞机和汽车迅速开进北疆、东疆和迪化，从而完成全部进军行动。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十分关心第一兵团入疆事宜，决定帮助解决300—400辆汽车，50万块银洋及单独在新疆使用的人民币，并商定由苏联民航派来30架运输机，另从华东军区抽调了425辆汽车，华江军区抽调了100余辆汽车，又从原国民党起义部队中筹集了320辆汽车加上原1兵团自己的车，这样一共有700余辆汽车担任了进军新疆的陆运任务。此外还有许多商车和近5000匹骡马也参加了此次规模空前的行动。

西北军民仅用20多天时间筹集了大量的粮草衣物和御寒物资，多达几千吨，加上东北解放区军民的大力支援，我进疆部队的物资一切准备就绪。

1949年10月7日，我战车5团首先西出玉门关，北穿星星峡，开始了向迪化市的挺进……

美丽富饶的新疆

不到新疆，就不知中国之大。新疆幅员辽阔，面积 160 多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六分之一，等于 16 个浙江省，比 4 个日本国或 10 个江西省还大，仅南疆塔里木盆地面积，就等于 4 个英国的面积。与蒙古、苏联、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为邻，边界线长达 54 多公里。

新疆境内从北到南高山与盆地相间，其地形特点俗喻为“三山夹两盆”。这就是北陈阿尔泰山、南盘昆仑山，中部横卧的天山把新疆分为南北两半，形成风貌迥异的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天山山脉重峦叠嶂，气势磅礴，是亚洲最大的山系。塔里木盆地面积 53 万平方公里，是我国第一大盆地。

大山之巅，冰峰雪岭如白玉屏风耸立天际，那是号称“固体水库”的冰川世界。山雪融化，汇成滔滔巨流奔泻而下，灌溉片片绿洲。全疆发源于山区的河流约 300 余条，较大的有塔里木河、伊犁河、额而齐斯河、乌伦古河、玛纳斯河等。河流终点多为湖泊，大小共 100 余个，著名的艾比湖、博斯腾湖、乌伦古湖、赛里木湖、天池、喀纳斯湖等。不少高山湖泊风光秀丽，游人如织。

新疆地大物博，资源丰富。这里尽管干旱少雨，但河流和地下水源充足，其年径流量等于黄河、淮河和海河流量的总和。在天山南北的农村，耕地肥沃，其中不少阡陌如画的鱼米之乡，盛产粮棉，并以瓜果园艺闻名，而吐鲁番葡萄和哈密瓜更饮誉中外。在水草丰茂的牧区，羊群如云，牧歌悠扬，是新疆细毛羊和“天马”的故乡。天山原始森林遮天蔽日，林区宽 50 公里，绵延千余公里，恰似天山一条翡翠腰带。高山密林又是珍禽异兽栖息之所，各种名贵药材和裘皮都产于茫茫林海雪原。新疆的地下宝藏丰富，矿产有 100 多种。沿天山北麓是一条又宽又长的煤田带，铁矿分布甚广，藏量可观。盐湖盐山之大为全国罕见。有色金属、云母、水晶、玉石、宝石等，都是埋藏地下的瑰宝。据勘探，塔里木、准噶尔、吐鲁番三大盆地，石油储存量令人砸舌。

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

新疆古称西域，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远在公元前 138 年，汉朝便派张骞出使西域。他的出使密切了汉朝与西域各国的关系，他直接调查了西域的情况，对安息、条支等国也有了深刻的了解，而且使经由河西走廊通往中亚的大道更加畅通，成为著名于世界的“丝绸之路”。西汉以及其后历代王朝，通过这条道路加强了中国和中亚各国之间的交往和贸易关系。也扩大了汉朝在西域的影响。人们称赞张骞：“（张）骞为人强力，宽人信人，蛮夷爱之”。

公元前 116 年，汉武帝拜张骞为中郎将，第二次出使西域。张骞率副使随从 300 人，马各 2 匹，牛羊数万，大量币帛，直达乌孙。当时河西走廊已在西汉管辖之下，他从河西经白龙滩（今罗布泊东北）向西北经龟兹，顺利到达乌孙赤谷城。在此他派出的副使到大宛、康居、大夏、安息、身毒等国。公元前 115 年张骞回长安，不久病死。但他派出的副使都先后完成了任务，偕同中亚邻邦及西域各族使者，陆续来到长安，密切了汉朝与西域人民的友好关系。

东汉沿用西汉的战略部署，抗击匈奴，“先过白山，得伊吾（今哈密），破车师，通乌孙诸国，以断其右臂。”在伊吾、蒲类海（今巴里坤湖）战役

中，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人班超，率领士兵屡建奇攻，显出了他的杰出才能。

东汉把联络西域抗击匈奴的重任交给班超。他实行“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的方针，严明纪律，“即为胡虏节度，又禁汉人不得有所侵扰”，作战中，班超身先士卒，“每有攻战，辄为先登，身披金夷，不避死亡”，因此受到部下和各族人民及一些部族首领的拥护和支持。在短期内，大败鄯善、于阗、疏勒等地的匈奴。班超曾说：“今西域诸国，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贡奉不绝。”

东汉在公元前 60 年正式设立西域都护府管辖全疆，班超被任命为西域都护，都护府设在龟兹（今库车）。

唐代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鼎盛时期，新疆作为“丝绸之路”必经之地，至今尚遗存许多当年的文物古迹，如高昌古城，克孜尔千佛洞等，均为令人向往的旅游胜地。

唐朝为统一领土，在西域官制上更有明确规定：都督府有都督；州有刺史；县有县令；乡有主者；里有里正。

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和各级行政机构的建立，保证了唐朝政令在西域的推行。西域和其它地方一样，定期向朝廷进贡、纳税，统一使用唐代的钱币。新疆大量出土文物反映了唐朝在当地实行统一的户籍、均田、府兵、屯田军制度。

宋、元政权都统治着天山南北。宋代，西州回鹘和于阗等地统治者，都由宋朝任命。元朝设有宣慰司、元帅府和行尚书省等机构。

从宋到元近 400 百年间，新疆各民族所建立的地方政权，都是当时的中央王朝统辖的一部分。

明代设哈密、阿端、曲史、安定等卫所，作为地方行政机关。

清代，康熙帝平定准噶尔的叛乱，巴尔哈叶湖以东、以南地区均为清朝版图。清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统辖整个新疆地区，在乌鲁木齐设都统，伊犁、塔城等地设参赞大臣。同时郡县制也在推行。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得到进一步发展。

在新疆，左宗棠常常为人称道，他在 19 世纪 70 年代任陕甘总督时，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粉碎了英、俄瓜分新疆的阴谋，收复和保卫了祖国西北边疆，成为一代爱国将领。在乌鲁木齐左文襄公祠座立其中，一副对联写道：

提洁自东西，帕首靴刀，十年戎马书生老；

指挥定中外，塞云边月，万里寒鸦相国祠。

这足以反映当时人们对左宗棠的敬意和爱戴。

1884 年清政府决定新疆建省，设置州县。

国民党、民族军二统新疆

民族矛盾始终贯穿着新疆的历史，杜重远写的《盛世才与新新疆》一书中，论述了近代新疆几个历史人物和新疆问题所在：

新疆幅员虽广，蕴藏虽富，然以民族复杂，环境险恶，成为特殊区域，非有远大识见

兼晓军政的大员，不足应付。清季同光年代，左宗棠、刘锦棠两人皆以不世之才，前后平定新疆，设治甚久，虽小康一时，而于民族问题，始终未能根本解决。所以新疆有五年一小乱，三十年一大乱之谣。民国以来，杨增新足智多谋，以小诸葛自命，执政十七载，迭经艰险，饱遇忧患，前后如平定哈密之缠乱，消灭哥老会的暴起，抵御外蒙，防范俄哈（俄属的哈萨克入扰新疆），平定白俄，勾心斗角，巧运机谋，几尽其才智之能事，然而囿于个人的禄位观念，熟用一部三国志，皆偏于当前应付局面问题，对于民生疾苦，民族协合，向未置意，且挑拨离间，纯采愚民政策，且其才智虽高，而忽略了时代的要求和广大群众的需要。结果被其部下樊耀南假宴客之便，一枪殒命，其后民众方面也就了无声息。这是民国十六年七月七日，新疆人称之为七七之变。金树仁假七七之变，杀樊而自立，其才智远逊于杨而私心过之，于是袭杨故智，仍采愚民政策，且任用奸邪，听信谗慝……其头脑昏愤。

以大民族统治小民族的传统观念，用武力压服统治新疆必然失败，近百年来，新疆各族人民反对独裁、反对民族压迫的武装斗争，一直没有间断。

40年代初，国民党当局为镇压此起彼伏的人民起义，贸然决定就地扩充军备。

1943年3月，国民党新疆省政府发布命令，征集军马10000匹，谓之献马运动。地方上的贪官污吏趁机巧立名目，层层盘剥，赤裸裸地掠夺民财。其间蒙受损失最大的是伊犁、塔城、阿尔泰等地的哈萨克族牧民。本是不宁静的草原，更加怨声载道，民心激荡。

1944年9月2日，在新疆北部尼勒克县的乌拉斯台地区，打响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揭开了新疆各族人民以争取政治民主、民族平等为宗旨的革命运动的序幕。这一革命运动，使被誉为“新疆王”的盛世才不得不离开了他的宝座。

10月8日，起义群众攻克尼勒克县城。尼勒克起义的消息传到伊宁后，得到了伊犁地区维吾尔、哈萨克以及其他各民族广大人民的热烈响应和积极支持，起义的火焰迅速蔓延。

10月13日，国民党第8战区司令朱绍良仓皇调派机动第7师第19团去伊宁，10月14日又用专机载运伪7师参谋长曹汝霖、伪省政府内务厅长邓尚海和省公安管理处副处长刘斌德去伊宁督战，妄图扑灭人民武装斗争的火焰，但是他们的一切招术已无济于事。武装起义的烈火越烧越旺。

11月7日伊宁人民又吹响了武装起义的号角。经过激战，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最后退守艾来木巴克、航空大队和飞机场等几处负隅顽抗。

11月11日起义者占领了绥定、察布查尔、霍尔果斯等县，接着占领了博尔塔拉、温泉、昭苏等地。

11月12日，在伊宁市成立了临时革命政府。

1945年1月30日，据守伊宁城郊机场的国民党残部全部被歼，伊犁地区所属县宣告解放。

2月8日，临时革命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组建军队的决议。

3月8日，伊宁市隆重举行授旗仪式，宣告民族军正式成立。

6月，民族军向塔城地区进军，至7月31日解放了塔城县和塔城地区所属各县。9月10日民族军攻打承化县（现阿尔泰县），据守承化的国民党残部2000余人闻风丧胆，仓皇向外蒙溃逃，被民族军和游击队截获缴械，从而

宣告伊犁、塔城、阿尔泰三个地区全部解放，这场革命运动也被称为三区革命。

同年冬，民族军改组了临时革命政府，正式成立三区革命政府，从此，三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三区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天山的南部地区人民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斗争。在世界屋脊塔什库尔干爆发的人民武装起义波及到喀什、莎车等地，游击队还一度攻占了莫吉沙、叶城等县。拜城、阿克苏、温宿等县城也一度被民族军和游击队所攻占。哈密游击队也活跃在天山一带，给了国民党军需供应以沉重打击。

在这种形势下，民族军乘胜前进，于1946年秋进抵距迪化（乌鲁木齐）仅170公里处的玛纳河西岸，这里成了三区革命与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分界线。

阿合买提江和阿巴苏夫等领导的以伊（犁）塔（城）、阿（尔泰）为中心的“三区”革命，作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有力地牵制和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动摇了他们在新疆的统治。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一贯十分关怀和重视新疆各族人民的解放事业。早在抗日战争初期，我党就派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到新疆传播马列主义和我党的政策，进行革命活动。周恩来、陈云、李先念、李富春、邓颖超、邓发等领导人，也先后到新疆进行工作。无数优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为新疆各族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生命。通过他们的革命活动，卓有成效地扩大了党的影响，在新疆各族人民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王震受命西柏坡

1949年3月，西柏坡中共中央驻地。具有历史性转折意义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这里召开。

会上，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根据全国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发出了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解放和统一全中国的伟大号召。

这一天，参加会议的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接到了通知，要他马上到中央办公厅去一趟。

这位在战场上威震敌胆的将军急急忙忙的来到办公厅，只见会议室内三位中央最高领导人已在这儿等他了。

“你好啊！王胡子——”毛泽东笑着首先招呼他。

“主席好！总司令、周副主席好！”王震进门一见此阵势，慌忙给三位中央领导分别敬礼。

周恩来摇摇手说道：“来来来，快坐下，王震同志。”说着起身给他倒了一杯开水。

朱德问：“王胡子，你知道我们请你来干什么吗？”

“报告总司令，不知道！”王震起身回答。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又挥手招呼他坐来说：“快说说你那支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王震一听便猜到什么了，他仔细地向中央三位领导汇报一兵团近来的各方面情况，还不时回答了周恩来和朱德的插话提问。三位领导人显然听得很

满意，不时相互会意的点着头。

“好了！”周恩来听完他的汇报，神色严肃地看了看王震，然后说：“王震同志，中央准备把进军新疆的重大任务交给你们，你看如何。”

“太好了！”王震高兴得站起身来，激动地说：“我们一兵团保证完成任务。”

毛泽东说：“这可不是一般的任务呀，新疆问题我们要力争做两手准备，能和平解决最好，因此进军新疆是一个政治仗，只能打好。”

朱德又就有关进军新疆的一些具体问题向王震做了介绍，并告诉他有关行动计划向一野司令员彭德怀请示，由他统一指挥进军大西北的战斗。

临走前，周恩来又对王震说：“希望你们在一兵团中开展进军新疆的宣传教育，号召广大指战员发扬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革命精神，克服一切困难，从思想上物质上各个方面做好进军新疆的各项准备工作。一旦中央命令下达，立即行动。”

王震回到部队后，立即在全部队进行了宣传动员，广大指战员对进军新疆充满了信心，大家纷纷向一野首长、兵团首长请战表决心。

一场伟大的战略行动拉开了序幕……

第二节 新疆和平解放

周恩来单独晤谈屈武

但是，为了使新疆人民不受战火之灾，中共中央制订了“力争起义，和平解决”的方针。

1949年4月16日凌晨4时，周恩来单独与屈武晤谈。屈武是中共地下党员，时任国民党新疆省政府委员兼迪化（今乌鲁木齐）市长，作为国民党和谈代表在北平（今北京）参加国共谈判。

屈武先向周恩来汇报说：“昨晚张治中告诉我，南京方面估计不会批准那个和平协定。全国范围只有打下去。他让我回新疆去，让我转告陶峙岳，蒋介石要打下去，可是新疆要和平，新疆不能放一枪。”

周恩来神色冷峻。他对屈武说：“是的，国内实现和平的希望很小，如果决裂了，你要赶紧回新疆去，策动那里的部队起义，尽量使人民不受或少受损失。”

接着周恩来询问新疆部队将领的情况，特别是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的政治态度。

陶峙岳将军是一位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进步将领，他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参加过北伐战争，从团长、旅长、师长一直升任到军长、集团军司令、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和新疆警备总司令的要职。驻守新疆的国民党军队是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所属的整编42师、78师、骑兵1师共7万余人。屈武就自己所知道的情况向周恩来详细作了介绍。在谈到陶峙岳的政治态度时，屈武说：“陶峙岳是个诚实的人，张治中的态度就是他的态度。”

周恩来脸上微露笑容，说：“文白（即张治中）先生是有名的‘和平将军’嘛！”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屈武及早返回新疆，执行和平起义的秘密使命。

屈武首先约见了他的朋友、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秘书长、新疆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刘孟纯，向他转述了北平和谈经过，透露了周恩来、张治中对新疆和平起义的意见：

“虽然全国范围的和平不能实现，但新疆可以根据和平协定，争取实现局部的和平。”

刘孟纯用劲握住屈武的手，出语爽快：“我同意你的看法，那就干吧。关键在陶峙岳，我们还是先找他谈谈，摸清底再行事。”

屈武、刘孟纯随后面见陶峙岳，转达张治中的意见，并陈述了他们俩共同的和平意愿。陶峙岳似乎很平静，没表什么态度，只是在谈话临结束时说：“等等看，看发展。”

这一“看”字里面，大有文章可作。

陶峙岳和平之念由来已久

1948年秋，陶峙岳赴任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时，曾专门绕道兰州拜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治中。

张治中在他的私邸，跟陶峙岳倾心交谈，并出示自己迭次建议蒋介石力

主国内和平的函件和谈话记录。

张治中提醒陶峙岳：稳定新疆局势的关键，在于取得苏联的谅解与合作，尤其要注重疏通苏联驻迪化总领事，这不仅是政治上的需要，也是经济上谋求对苏扩大贸易的必需。

当时，解放战争的胜利号角响彻神州大地，国民党的统治已呈崩溃之势。地处西北边陲的新疆，迟早要面临或战或和的抉择。张治中和陶峙岳审时度势，都认为新疆不能响枪，响枪必致大乱。

这次长谈，张治中和陶峙岳所言均出自肺腑，两人赤诚相见，肝胆相照，对日后新疆的出路达成默契。

从此之后，和平之念一直萦绕于陶峙岳的脑际。他在“看”，即等待时机。

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向人民解放军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1949年5月，陶峙岳接到张治中发自北平的电报。张治中希望陶峙岳和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等，要共同努力维持新疆政局稳定，根据形势演变确定对策，准备走和平起义之路。

张治中的来电，对陶峙岳而言，宛如兴奋剂。他对包尔汉说：“张治中的电报是受毛泽东、周恩来的嘱托打来的，这不光是他本人对我们的劝道，也是中共方面对我们的期待，更是对我们的信任。”接着，陶峙岳面露难色，“新疆和平起义的主要障碍，是马、胡控制的部队，特别是那几个掌有实权的军官。这批人不除，或不走，终为和平之患。可现在又动不得他们，最好看解放军在西北战场的进军形势，然后再行定夺。”

6月下旬，第一野战军攻占了西安及关中广大地区之后，会同华北野战军第18、19两兵团兄弟部队继续前进……

这一天，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陶晋初向陶峙岳呈上一份《请起义投降中国共产党意见书》。陶晋初是陶峙岳的堂弟，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与周恩来身边的乔冠华结识，并相互建立了秘密通信联系。在面对新疆今后何去何从的重大选择关头，陶晋初毅然选择争取和平之路，并同屈武、刘孟纯等人站在一起，为新疆的和平起义做着艰苦的努力。

张治中于6月26日以国民党和谈首席代表的身份，在北平发表《对时局的声明》，公开宣布：与国民党政府脱离一切关系，投向人民民主阵营。

迫于大势，新疆国民党军政上层开始慎重交换对时局和新疆出路看法。时隔不久，印度新德里《美国之音》广播了湖南程潜、陈明仁通电起义的消息，一时人心浮动。

7月间，包尔汉主席邀陶、刘、屈诸人，也邀了苏联友人去南山住了几天，就新疆局势非正式地交换了意见。随后陶、刘等又邀包主席、苏联友人去郊外湖边住了几天，也是交换意见，谈话虽未涉及具体，但却比较明朗了。

在秘密准备起义的过程中，陶峙岳一直在琢磨一个人，即新疆警备副总司令兼南疆警备司令赵锡光。新疆和平起义，如果不能取得他的同意，一致行动，结果将不可想象。

8月19日，陶峙岳以检查部队后勤工作为名，约赵锡光会晤于焉耆，和陶同去的有军需供应局长郝家骏，当地驻军旅长钟祖荫，但谈话时仅陶、赵二人，郝、钟不在座。经过数小时的密谈，两人达成了一致见解，讨论了有关起义的事项，包括一些可能出现的变故应急措施。最后，两人约定：起义

的一切行动，北疆由陶峙岳负责，南疆由赵锡光负责，并且决定了两点：

- （一）待与解放军部队靠近时才接头，陶、赵两人站开，将部队交出来；
- （二）部队由解放军无条件改编。

中共中央代表赴疆

1949年8月26日，随着我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一举解放兰州，我军的第二兵团即开始了沿兰新公路的西进行动，直指新疆。就在解放西北的战役接近尾声之时，中共中央在毛泽东主席的直接部署下，提出了和平解放新疆的主张，并派出了邓力群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前往新疆，做新疆军政当局的工作，争取他们和平起义。

8月15日，邓力群到达伊宁后马上与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临时政府的领导和民族军领导进行了接触和会谈，商定在伊宁开设代号为“力群”的电台，以便随时与中共中央保持联系。

9月5日，王震兵团胜利结束西宁战役，从北挺进，这样我一野的第一、第二两个兵团不顾长途转战的疲劳，开进了河西走廊、于酒泉、玉门、安西、敦煌一线完成了全军的集结行动，形成了对新疆的强大压力。

9月8日，毛泽东主席在北平中南海约见了同中共中央谈判的国民党政府首席代表张治中将军，毛泽东说，解放大军已决定由兰州及青海分两路进军新疆，希望他能对促成新疆的和平解放做一些工作和施展影响。

毛泽东对张治中说：“你曾经在国民党中担任过西北行营主任和新疆省主席，在那儿的旧部多，影响大，我们想请你帮我们多做做工作，促成新疆问题的和平解决。”

张治中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他的信任和帮助感激不尽，很愿意为全国的解放事业尽一点自己的努力，因此很乐意这件事。“毛主席需要我做什么，我一定尽力去做好。”张治中回答道。

“我们希望你以个人的名义，给新疆军政当局发一份电报，以你在西北和新疆多年的威望和影响，促使他们尽快和平起义。”毛泽东说。

张治中听了毛主席的话，立刻兴奋地说：“我早有此意，不过我在5月间曾接陶峙岳、包尔汉来电问候我的情况以后，音讯就断绝了，现在我还不知道怎样和他们取得联系。”毛泽东说：“我们已经在伊宁建立电台，你的电报可以先拍到伊宁再转迪化，我可以告知在伊宁负责的邓力群同志。”“好的，我马上去做这件事。”张治中回答。

张治中致电陶、包二人

很快，张治中将草拟的电文交给中共中央审阅后，于9月10日发了出去，电报直接发给陶峙岳、包尔汉，文如下：

迪化陶副长官岷毓兄、包主席尔汉兄：

自接辰真电后，以西北人事更动，又因时机未至，故未再通讯。治于六月二十六日发表声明，由北平新华社播出，谅已接悉。今全局演进至此，大势已定；且兰州解放，新省孤悬，兄等为革命大义，为新省和平计，亦即为全省人民及全体官兵利害计，亟应及时表

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在中央人民政府未成立前，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领导。治深知毛主席对新省各族人民、全体官兵、军政干部，常有关切，必有妥善与满意之处理。治已应邀参加即将召开之新政协会议，并承毛主席面商希望治能返新一行。当允如有必要，愿听吩咐。甚望兄等当机立断，排除一切困难与顾虑。采取严密部署、果敢行动，则所保全者多，所贡献者亦大。至对各军师长或有关军政干部，如有必要，盼用治名义代拟文电，使皆了解接受。绍周、孟纯、经文诸同志均致意。兄意如何？盼即电复

张治中申灰平

9月11日，张治中又就有关问题，再至陶峙岳一电：

迪化陶副长官岷毓兄：

申灰电计达。兹治思及下列各点，特再电商：

（一）马子香父子（马步芳父子——作者注）及其残余部队现在何处？其与黄祖勋、周嘉彬两军之关系位置如何？

（二）马呈祥态度如何？子香对其有所揭示否？如其形迹可疑，兄将如何应付？治意能予以开导说服最好，否则可调移该部驻焉耆、轮台，而以钟祖荫师调吐、鄯、托一带，令其安心以待，从长计议，不命名其违命反抗为宜。

（三）现知黄、周两军在河西，王治岐军是否亦西撤？兄已否派员前往联络？必要时可以治名义代拟电文，即令该三军今后行动应悉听兄之命令。如其已与青海马部隔离，最好以掩护东疆、阻止马部入新之目的控置于张掖、酒泉、玉门一带如何？

（四）在驻新将领中，过去受片面宣传之蒙蔽，难免有不明大势，执迷不悟或囿于派系感情作用者，盼告以治与大家患难相共，如能接受命令，治甚顾负道义上之责任，决不使大家再走错路，蒙受牺牲。但倘有一二顽固到底无法挽救者，似宜先予调换，以免优容债事。

（五）省内保守一派，数年来虽多方控制，并加教育疏导，但其潜在势力，仍不可忽视。尤其维、哈两族中，惧苏惧共之心理时有流露，可否以治与兄名义发表文告，说明中共现所奉行者，既非共产主义，亦非社会主义，而为新民主主义，亦即与三民主义之基本要旨相符合。特别对少数民族采取平等团结，并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之政策，新省对中央关系虽转变，而新省施政纲领所揭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既定政策，绝无改变，以祛其疑惧之心。并盼与包主席邀约色以提、乌迈尔、尧乐博士、麦斯武德、伊敏、贾里木汉等到迪，分别予以开导，期共了解，藉免障碍。

（六）对伊方之联络，此时似不可少，不知已进行否？最好仍请苏领居间保持接触。

（七）此事对英、美外交人员，事先应极端秘密，事后可予以保护，维持适当国际惯例之待遇。

（八）军粮冬服及饷项经费筹备如何？为念！盼与包主席洽商，暂时只有在省内设法，一俟东西交通恢复，必有解决之方。在过渡期间，困难自所难免，此当时予关注者。

（九）据悉中苏在新省贸易及经济协定双方业已同意，但广州政府不允签订，固可遗憾，不过新的中央

政府在下月即可成立，预料苏联将首先承认，而引项协定，当可继续商谈签订，经济状况，将必改观。以上各项，均治思虑所及，举以商询。深信兄对此一适应时代保全军民之革命行动，必已考虑周到，部署严密，使能稳健也顺利地完成也。临电驰系，伫候佳音。

张治中申真平

胡宗南密令劫持陶峙岳

张治中的种种顾虑不是没有原因的，长期以来，国民党驻新疆的部队，分属两个系统，一为青海马家系统，一为胡宗南系统。陶峙岳虽身为新疆警备总司令，但实际上只能直接指挥全疆四分之一的部队，多半部队则控制在马、胡嫡系马呈祥、叶成、罗恕人等顽固军官之手。陶峙岳既非黄埔嫡系，又与马家无缘，因而对许多事情只能隐忍处之，十分无奈。

胡宗南系的整编 78 师师长和 179 旅旅长、军统特务罗恕人，掌握着除马呈祥部之外的全部北疆国民党军的作战兵力。骑 5 军军长马呈祥，是马步芳的外甥。他的这支骑兵部队，封建、宗教色彩浓厚，反动而且顽固。叶、罗、马三人，凭仗自身的军队实力，策动分裂，穷兵赎武，极力反对新疆和平起义。

陶峙岳曾多次跟叶、罗、马几人恳谈，希望他们要洞察利害、深明得失。在新疆和平起义呈明朗的时候，陶峙岳曾对叶、罗、马三人讲过一番话：“如果我们到了既不能战，又不能和的地步，进退两难，徒然自走绝路，人民不会原谅我们，历史更不会宽恕我们，那又何苦乃尔？至于我个人的生死荣辱，早已置之度外。何去何从，请大家选择吧！”

可是，叶、罗、马的顽固态度很难转变，眼见国民党如枯枝败叶，已无任何生气，他们依然企图孤注一掷，作垂死挣扎。他们暗中调兵遣将，并叫电台向胡宗南联系。

9 月 19 日，胡宗南来电，责成叶成将新疆部队移至南疆，并示如陶峙岳不走或阻止撤离，可作断然处置。

叶成接电后，连夜与罗恕人、马呈祥密商，决定于 20 日子夜队伍开拔，行动前先将刘孟纯、屈武、陶晋初逮捕，胁迫陶峙岳随部队转移。

20 日，叶到陶处，说：“你平常一切都有感情，但近来你对罗、马就仿佛没有感情了，这都是刘、屈、刘三人搞的，我们现在决定把他们扣起来！”

陶对叶说：“我没有阻拦你们进关，但是我不能不为你们分析利害。你们既然决定要扣留他们，扣了以后怎么办？怎样圆场？”

“现在是大家的生死关头，有什么话不能说的？我是为你们大家好，不要收不得场。我打电话把罗、马找来，大家当面谈一谈。”

稍许，罗恕人、马呈祥即来。陶峙岳面对顿起的风云，沉着冷静，单刀直入：

“我们今天不能作楚囚对位，唉声叹气，一定要把事情谈清楚。

“你们说我没有感情，感情还是有的，丢开长官部属的关系不说，我们还是多少年的朋友，这是大家的生死关头，怎么没有感情？”

“今天的事情可以从爱憎、是非和利害三方面看，爱憎和是非不必说了，但是利害不能不谈。你们既要进关，我从来没有阻拦过你们，而且愿意尽可能筹措车辆、汽油和现款，但是人还多呢，连军政人员总不下十万，你们想，我怎能把他们扔在戈壁滩上不管？我怎能忍心！”

“你们不能这样干的。今天不是你们和我几个人的问题，是十万人的生死问题，不能轻举妄动。如果处置不当，事情怎样圆场？对十万人如何交代？”

几个人默然伤神，垂头不语。罗恕人思索良久说道：“我们有痛苦，你似无动于衷，讲道理，又每为你所折……”说着，竟流出泪来。

第二天，陶峙岳去见马呈祥，给他疏解：

“你们要走我怎么办？你们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但有一点，我不能跟你们走！”

“仗是不能打的，一定要和三区妥协，我只能生死置之度外，以性命担保大家，绝不是我有什么政治作用！”

随后，陶峙岳单独找到罗恕人：“马是青海人，本乡本土，到时化整为零，也许能打一阵游击，你又不是青海人，你现在和馬的感情虽然很好，到那时候就不是个人感情所能维系的，应该很好地考虑。”

陶峙岳把“底”亮透：“你们带部队走也好，个人离开也好，大家都要三思而行。我要把一颗赤裸的心放在你们面前，让你们清楚，我要与全省老百姓和全军将士及其家属共生存。我有这样的责任，尽到责任，虽死不辞。”

马呈祥已动摇，叶成无定见，罗恕人如能打通，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当时警察局长刘汉东和罗、马都很要好，刘孟纯就通过刘汉东向罗、马做工作，有时又直接和他们恳谈。

一日，刘汉东找到陶峙岳说：“马呈祥想把军队交出来，愿意走，罗恕人也大致同意了。”

陶峙岳去找罗恕人、马呈祥：“你们要走我同意，希望好来好去，把一切事情安排好吧。”

9月22日，胡宗南急电叶成、罗恕人：

责令肃清迪化叛乱分子，把部队撤离南疆，今后空投接济。

大事已去，叶、罗、马已无暇顾及胡宗南的“责令”。

马呈祥、罗恕人于9月24日，叶成于9月25日清晨先后离开了迪化，经南疆去巴基斯坦。

新疆和平起义的一大障碍也就随之消除。

和平起义指日可待

中共中央联络员收到张治中9月10、11日的两份电报后，即飞赴迪化，将电报面呈陶峙岳、包尔汉。

陶峙岳、包尔汉接到张治中的来电后深受鼓舞。他们深知电报虽以张治中名义，文中所言实则均为中共中央之精神。中共中央对解放新疆的态度、宽厚政策以及稳妥方法，尤其是毛泽东对新疆问题的关切，更让他们感奋。

9月17日，陶峙岳、包尔汉复电张治中，表示已对和平转变审慎筹议，在保障国家领土、维护全省和平、避免无谓牺牲的原则，采取行动，即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全文如下：

文白将军钧鉴：

九月十日戌平电奉悉。新局前途，承详切指示，至深感激。自全国和局未成，钧座留平不返，职等在此，半年来，与绍周、孟纯、经文诸兄，无时不审慎筹议，在保障国家领土，维护本省和平及避免军队无谓牺牲之三项原则下，选择时机，和平转变。经长时间之努力，此项主张，业已获得全疆人士及全军将士之拥护。除少数法西斯，如马呈祥、叶成、罗恕人等，基于个人之立场，决定率少数干部，最近趁机飞离迪化外；其余南北疆全数部

队，均将就原驻地，继续维持地方秩序。于马等离开后，即由峙岳领导，宣布与广州政府脱离关系，依照国内和平协定，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领导。至政府方面，在策略转变时，即同时根据钧座与三区代表所订之和平条款，邀请三区原有参加省府委员返迪，恢复合作，遵循已定之和平、统一、民主、团结政策，及本生活上施政纲领，在中央人民政府尚未成立以前，暂行维持地方政务，听候中央命令，组织本省临时人民政府。预计上项工作，在本月年，可以全部圆满完成。职等自信，深明革命大义与本身职责，个人对政治上绝无企求，只期全省和平获得保障，人民不受涂炭，军队不致牺牲，则对国家、对各族人民应尽之责任，即已达成，亦即有以副毛主席及钧座之期望也。除将和平解决新疆问题意见，书面交邓力群先生转陈主席外，谨电奉闻，乞释廛注。此间人民，殷盼钧座早日莅临领导。何时命驾，愿先电示为禱。

职陶峙岳、包尔汉

九月十七日

同时收到，陶峙岳复张治中的申真电项：

文白将军钧鉴：

申真电奉悉。此间基本决策，已与包主席联衔电呈，祈赐指示。兹谨就电询各项，分报如次：

一、马子香父子，现已携眷出国朝汗。其残部，在青海大部溃散，消灭。各级将领，均向人民解放军投诚。在甘省河西境内，已无青海军队。黄周两军，与马部早无联系。

二、马子香，自西宁逃亡后，对马呈祥迄无指示。马呈祥经予说服，其个人，将率少数干部，离迪出国朝汗。所部，并交职领导转变。

三、王治歧军，并未西撤。关于河西方面，现由曾震五（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作者注）兄来迪面商，已有部署。决于新省问题解决后，随即由职领导转变。希望最近能与兰州当局发生联系。乞设法转知与周直洽。

四、驻新将领，除马呈祥、叶成、罗恕人，将率领少数干部，离开部队东返外，其余均无问题。俟渠等离迪后，职当妥为晓喻。

五、伊敏、艾沙等，决定率少数民族派，赴巴基斯坦。保守派头目，如贾里木汉、哈德万（迪化区专员——作者注），乌斯满等，亦决定离新。职已与包主席详商，准许渠等个人安全离开，不加阻挠。至各族民众，则妥为宣慰，俾安居就范。

六、对伊方联络，已由包主席办理。拟依据和平条款，施政纲领，恢复合作。但在军事方面，似应各守原防，听候中央处理，避免任何不必要的误会。

七、美领馆已撤退，只留副领事一人。英领事，在此无甚作用，必要时，当予以保护。

八、此间最感困难者，为军费问题。从七月份后，军饷即未发放，军心殊不安定。经数月来向广州极力交涉，以全军东调为理由，催索各项费用。最近包机运款前来。如全数（约一百八十万银元）能运抵迪化，则目前勉可维持。数月来所以始终未敢明朗表示态度者，此实为主要原因之一。至省府方面，亦复库空如洗，包主席实无能为力也。

九、中苏亲善关系，在新日有增进。贸易及经济合作协定之迄未签定，并非新省负责人员问题。此点苏方已完全谅解。深信新政府成立后，自可顺利解决。总之，新省情形特殊，一切不能与内地等量齐观，此为钧座所深悉。现在问题，除将来补给方面，应请中央妥为筹济外，暂仍旧可以渡过严冬。职可负完全责任，决无任何顾虑。今后新省问题，似仍宜着眼于民族、经济、政治各方面，顺应人心，执行钧座已定之政策，由毛主席审慎考虑，加以领导。为国家奠定边疆百年大计，实为当前急务也。谨电奉陈，敬乞随时指示。

职陶峙岳

九月十七日

电文所示，和平起义已无问题。

新疆驻军宣布起义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隆重开幕。毛泽东在政务百忙中，仍函示张治中，委他继续给新疆及河西的老部下做工作。张治中接读毛泽东的信后，次日便致电陶峙岳、包尔汉。对他们的态度正确，措施适当，表示欣慰。

迪化陶副长官岷毓兄并转包主席尔汉兄：九月十七日两电均悉。兄等态度正确，措置适当，至为欣慰。毛主席阅电亦表嘉许。但不悉马、叶、罗等已否离迪？又兄与黄、周两军已否取得联络？即盼以治名义电渠两人接受兄之命令，并径派人与解放军前线将领接洽，表示诚意，此时殊不应再有所犹豫顾虑，自贻伊戚也。又兄能即派员与彭德怀司令员扫秉承毛主席指示再定赴迪问题。各情盼随时电告。

张治中申养平

9月23日，毛泽东主席亲自给包尔汉回了电，电文中说：“新疆局面的转变及各族人民的团结，有赖于包主席鼎力促成，望联络各方爱国人士，配合人民解放军入疆行动，为解放全新疆而奋斗！”

随即，国民党国防部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第8补给区司令曾震五，作为陶峙岳的代表，赴兰州面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洽商新疆和平起义事项。

在兰州大厦，彭德怀同曾震五进行了热情、坦诚的交谈。

彭德怀代表中共中央陈述四点意见：

- 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野战军在1949年冬必须结束西北解放战争，以便明年进入和平建设，新疆不能例外。
- 二、事实证明，过去国民党在新疆采取所谓的和平政策既是做不到，也是不愿做的。
- 三、国民党军队、政府腐败透顶，如无人民解放军援助，靠自我转变是不可能的。从实际意义上讲，国民党军队不是什么转变，而是彻底改造。因为国民党不是某些错误的问题，而彻头彻尾的反动，不彻底改变其性质是不行的。
- 四、国民党在新疆的所有军队，必须按人民解放军制度进行整编。

曾震五带着彭德怀之四点意见，速反迪化，向一直在等候洽谈消息的陶峙岳作了全面汇报。

陶峙岳兴奋地对曾震五说：“现在，新疆和平起义已在万事具备，只剩下通电昭告于天下了。”

新疆驻军在9月25日宣布起义，由陶峙岳总司令领衔，各师旅长连名给毛主席和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来电，表示和广州政府断绝关系，接受命令。

毛主席、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并请转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司令员、副司令员、政委，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大会诸代表钧鉴：

我驻新将士三四年以来秉承张治中将军之领导，拥护对内和平对外亲苏之政策。自张将军离开西北，关内局势改观。而张将军复备致关垂，责以革命大义，嘱全军将士迅速转向

人民民主阵营，俾对国家有所贡献。峙岳等分属军人，苟有利于国家人民，对个人之毁誉荣辱，早置度外。现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大会正举行集会，举国人民所殷切期望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新中国已步入和平建设之光明大道。新疆为中国之一行省，驻新部队为国家戍边之武力，对国家独立、自由、繁荣、昌盛之前途，自必致其热烈之期望，深愿为人民革命事业之彻底完成，尽其应尽之努力。峙岳等谨率全军将士郑重宣布：自即日起，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竭诚接受毛主席之八项和平声明与国内和平协定，全军驻守原防，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之命令。谨此电闻，敬候指示。

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
副总司令兼整编四十二师师长赵锡

光，

整编骑一师师长韩有文，
整编七十八师师长莫我若，
旅长钟祖荫、李祖唐、田子梅、
韩荣福、郭全梁、朱鸣刚、罗汝正、
刘抡才、杨廷英、马平林同叩。

九月二十五日

9月28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致电嘉勉陶峙岳，包尔汉，高度赞扬了他们的真诚态度和爱国壮举，并对他们今后的工作也提出了殷切的希望。

天山南北，戈壁高原到处传遍了和平起义的消息，410万新疆各族人民奔走相告，省会迪化市内人人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发出一片欢呼之声。各族人民随即投入了积极的准备工作，到处筹措粮草物质，进行着欢迎人民解放军进驻新疆的各项准备工作。

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也向西北人民解放军发出了命令：“尽快进军新疆，早日完成保卫和建设西北边疆的光荣使命！”

毛泽东会见赛福鼎

1949年9月，以新疆三区革命主要领导人阿合买提江为首的三区革命代表团，应毛泽东的邀请，前往北平参加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不幸途中因飞机失事而牺牲。

9月15日，毛泽东主席发出了第二次邀请，由赛福鼎·艾则孜率领的第二个代表团来到北平。

新疆三区革命，是争取民族平等和自由而爆发的人民革命运动。开始，虽然没有直接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们认真地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毛泽东主席的文章，认定中国共产党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大量神奇的传说，早已在他们的心目中树起了崇高的形象。因而，亲眼看看“东方的列宁”，成了他们多年来的夙愿。这一夙愿终于有了实现的机会。

9月16日晚，由赛福鼎·艾则孜率领的代表团来到中南海怀仁堂看京戏。他们被安排在第一排的中间就座。正当聚精会神观赏梅兰芳的演出之时，一位身材魁梧的人出现在代表团的面前，挡住了赛福鼎·艾则孜的视线。正当

赛福鼎·艾则孜为看不到台上的演出而焦急时，周恩来总理出现在这人身边，说：

“毛主席来看你们来了！”

赛福鼎·艾则孜定睛细看，只见毛泽东面带笑容，慈祥地看着他。赛福鼎·艾则孜急忙起身，紧紧地握住了毛泽东伸过来的手。

毛泽东说：“欢迎你们，一路辛苦了。”

赛福鼎由于过度紧张，激动而又兴奋，紧紧握着新中国统帅的手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说了一句：“谢谢！”

在毛泽东的身边又出现了一位笑容可掬的人，把手向赛福鼎·艾则孜伸来。

“这位是我们的总司令朱德同志。”周恩来介绍说。

“欢迎你们！”

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热情和蔼的态度使赛福鼎·艾则孜无比感动。原来在他的脑海中形成的领袖可望不可及的那种神秘、缥缈的想法，瞬间便无影无踪了。由于过于激动，赛福鼎·艾则孜除了不断地重复着“谢谢”外，一时未找到比这更好的语言。

毛泽东与代表团其他代表一一握手后对赛福鼎·艾则孜说：

“今天请你们看戏，明天再见。”告别后向自己的座位走去。

周恩来总理一边向赛福鼎·艾则孜告别，一边说：“毛主席准备明天专门接见你们。”并握着他的手：“明天见。”说完跟着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走了。

代表阿里木江看着毛泽东及其他领袖的身影，呆呆地站在那儿，半晌说不出话来。当他反应过来后，深有感触地说：“呀！他就是毛泽东吗？！没想到是这么谦虚可亲的人。”

9月17日下午3时，代表团成员们怀着激动的心情步入中南海接见厅。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人见到他们来了，便离座肃立，以沉痛的心情，向阿合买提江等死难烈士们致哀，整个接见厅，变得极为庄严、肃穆。入座后，毛泽东悲痛地说：“阿合买提江·哈斯米，伊斯哈克拜克，阿巴索夫，达列力汗，罗志等同志的牺牲，不仅是新疆各族人民的一大损失，也是全国人民的一大损失。他们的精神永垂不朽！”

他接着说：“你们在新疆解放区所进行的斗争，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一部分。你们牵制了国民党在新疆的十多万军队，对解放大西北乃至全国做出了贡献。”

这一切部完全出乎新疆同志的意料，他们没有想到毛主席等党中央的领导同志，对阿合买提江等人的牺牲如此悲痛，而且极为真诚。没有想到，将阿合买提江等人的牺牲，看作是“全国人民的一大损失。”更没有想到，对三区革命给了高度评价，说它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听到这些，内心感激之情由衷而生，激动的泪水如泉而涌。它使新疆各民族代表清楚地认识到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这是新疆人民对中国共产党认识的一次巨大飞跃。

9月29日，赛福鼎等新疆代表就陶峙岳、包尔汉等通电脱离广州国民政府一事发表声明：

我们在北京正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之际，听到了国民党新疆警

备总司令陶峙岳和新疆省政府主席鲍尔汉率领新疆军政人员发表通电,脱离广州国民党反动政府、归向人民民主阵营的声明,我们认为这种符合人民要求的声明是正确的,也是新疆人民的愿望。

多年以来,为争取自由解放而奋斗的新疆人民,包括已解放的伊犁、塔、阿山三区人民在内,由于人民解放军胜利的支援,和平的获得了解放,衷心表示感谢。

新疆人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行将改组的新疆省政府的领导下,坚决保证为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而努力奋斗到底。几年来反对迪化国民党反动政府而今后在和平环境下为全疆人民的自由奋斗的三区人民,坚决保证必能和全省人民一道,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新疆而奋斗到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疆代表

赛福鼎、阿里木江、涂治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新疆,迎来了和平的祥云。

赛福鼎加入共产党

由于长期受原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早在三区革命时期,赛福鼎·艾则孜就渴望做一名共产党员。当时因无法与党中央取得直接联系,在新疆又没有组织,他的这一愿望一直未能如愿。这次和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第一次接触后,赛福鼎渴望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心情更加迫切了。经反复考虑,于10月15日他向党中央写好了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书,但是一直没有机会递上去。

来北京不觉已一个多月了,新疆代表团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拟于23日返回新疆。毛泽东决定,在他们走之前,再谈一次。

22日下午,代表团来到中南海,毛泽东谈了主要问题后关切地问周恩来:

“送他们的飞机准备好了吗?”

周恩来答:“准备好了一架飞机和技术过硬的机组。”

毛泽东似放心又似不放心的说:“好!今晚和苏联专家组织一个检查组对飞机和机组人员再进行一次深入地检查和了解,做到绝对有把握再起飞。”

这时,毛泽东将目光转向赛福鼎·艾则孜说:“明天,你在未得到恩来同志可以起飞的通知之前不要上飞机。你等候恩来同志的电话。”

从毛泽东的话语中赛福鼎·艾则孜清楚意识到,他是考虑到因飞机失事而遇难牺牲的阿合买提江等同志,为保证他们的绝对安全而作的上述周密安排。这使赛福鼎·艾则孜极为感动。就在这时,不知那儿来的勇气,赛福鼎·艾则孜拿出入党申请书,对毛泽东说:

“主席,我早就写好了入党申请书,不知我具备不具备共产党员的条件,请你批示。

说完,双手递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显得很高兴,不停地点头。说了声:“好。”把申请书装进衣兜。

23日,代表团成员都起的很早,一直等待着周恩来的电话。正8时,周恩来总理打电话说:“一切准备就绪,可以起飞,请你们去机场。”

代表团赶到机场,周恩来早已到了,赛福鼎·艾则孜急忙前去和周总理握手告别。周总理握着赛福鼎的手说:“祝你们一路平安。还要告诉你一个

好消息，你的入党要求毛主席批准了。我带来了毛主席的批示，交给你。”周恩来从衣兜内取出了批示。他知道赛福鼎·艾则孜当时读汉文还有困难，便左手拿着他的入党申请书，右手指着上面毛泽东的批示一个字一个字地给他读起来：

同意赛福鼎同志入党。此信由赛本人带交彭德怀同志即存彭处。待新疆分局成立后，由赛同志向分局履行填写入党手续。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读完后，周恩来将毛泽东的批示交给赛福鼎·艾则孜，并再次紧紧握着他的手说：

“祝贺你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党员！到了酒泉后请将它交给彭老总。”

由于过分激动和高兴，赛福鼎·艾则孜不禁泪水夺眶而出，他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这么快就批准了他的入党要求，这怎么不能使人又激动又高兴呢。他紧紧地握着周恩来的手说：“衷心感谢毛主席、周总理给了我政治生命，今后我一定加倍努力，不辜负党对我的期望。我还要感谢毛主席、周总理为我们安全返回新疆给予的高度重视和为此所做的大量工作。”

周恩来说：“今天毛主席还给彭老总拟了一份电报，通知他你去酒泉，要他和你再具体谈谈新疆的工作。彭老总和王震同志在等着你们呢，好！再见，上飞机吧。”

到了酒泉，王震、徐立清等人在机场迎接，将代表团安置在招待所。正当代表团坐在庭院休息时，彭德怀在王震和秘书、参谋的簇拥下来了。刚入座，赛福鼎·艾则孜便拿出毛泽东批示的入党申请书，将它递给了彭老总。彭老总看过后，高兴地说：“好哇！祝贺你加入中国共产党员的大军。今天我们收到中央的一份电报，上面也提到你入党的问题。”

说到这儿他叫秘书将电报取来。秘书很快将电报送到彭总手里，他拿起电话说：“先给你念一下有关你入党的部分，‘赛福鼎为代替阿合买提江的领袖人物，曾留学莫斯科，做过新疆省政府的教育厅长。据我们了解，此人是好的，此次已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他现申请入党，我们认为可以的’。”读到这儿，王震带头鼓起掌来。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赛福鼎·艾则孜一生中的重大转折。毛泽东是他走向共产主义道路的第一个引路人。

第三节 戈壁迎英豪

险遭“鸿门宴”

毛泽东主席在 1949 年 9 月 23 日给通电起义的原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的电报中号召说：“望联络各方爱国人士，配合人民解放军入疆之行动，为解放全新疆而奋斗！”

在此期间彭德怀与王震制定进军新疆作战行动、决定兵分三路火速入疆。

隆隆的战车 5 团在茫茫的戈壁上一昼夜不停地开进着，我军指战员斗志高昂，克服了大沙漠大戈壁的干燥缺水，火热不适等困难，向着新疆挺进。

当我军这支先遣队刚刚开进东疆哈密时，受到了国民党整编 178 旅的“盛情欢迎宴请”。这个旅的头目并不是真心参加起义的，当他了解到我军先遣队人少车旧时，便秘密策划了一个吃掉我军的“鸿门宴”。

他们把我军车队有意接待进了一条只有一个通道的河套里。当我军司机看见这个河套坝子地势险恶，而且附近有可疑迹象时，立即进行了侦察。果然，一条条消息传到了战车 5 团团团长胡鉴那里……

“报告团长，这里只有一条道，地形险恶。”

“报告团长，山上好象有人在监视车队。”

“报告团长，这条河套太危险，完全被制于对方的炮火控制范围内！”

胡鉴团长双眉紧锁，久久地思考着什么。他从对方不正常的迹象中已觉察到了这支国民党军不轨之心。为了既保证和平条约的执行，又防止意外，他左右思考后，果断地下了命令：“他们的宴请我们照常出席，一人不少的赴宴。”

就在对方以为我军中计而准备下手之时，他们突然闻讯我军所有车辆已全部转移到哈密城北的制高点等安全地带上了。而且我军数十名战士已埋伏在宴会周围，随时准备回击一切挑衅之举。

“撤，撤，撤……”敌头目见大势已去，只得偷偷下达了收兵的命令。

宴会照常进行，胡鉴团长在宴会上向对方晓之于民族大义，做了团结争取的工作，终于成功的挫败一起进军途中的意外变故，保证我军先遣队的顺利进军。

我军按计划离开哈密后继续西进，翻越高山峡谷，穿过吐鲁番盆地和大戈壁，于 1949 年 10 月 20 日下午，胜利到达了迪化市，并在三天之内全面接管城防，控制了机场，保证了后继大部队的顺利到来。

第 1 兵团第 6 军的部分先遣人员按总部指示，乘坐苏联提供的第一架运输机于 10 月 10 日飞抵迪化，建立了空运的指挥机构，从此一个我军当年前无历史的大规模空运部队战略行动开始实施。

从 11 月 5 日开始，由苏联民航提供的 40 架大型运输机，将我 1 兵团指挥部，直属部队和第 6 军的一部分先后空运到了哈密、迪化等地接防。到 1950 年 1 月 20 日止，先后由酒泉飞往迪化的空运飞机共 543 架次共计 15000 多人。从酒泉飞往哈密的飞机共 160 架次，空运部队 4185 人次。此外还空运了近 13 万公斤的物资进入新疆供部队需要，这前后 700 多架次的运输飞行中，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故，苏联老大哥从头到尾与我军进疆部队合作得很好，圆满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表现出他们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

人与沙漠的较量

步行入疆部队最苦，千里荒漠戈壁是难不倒英雄好汉的。

从酒泉、张掖等地出发的徒步行军进疆部队则经历了一场艰苦的战斗……

茫茫戈壁、千里荒滩，人烟渺无，气候恶劣，对我军指战员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和严重的考验。部队于1949年10月8日出发，西出嘉峪关，踏进了日夜温差极大的沙漠瀚海。

这是一个极为难忘的场景——茫茫沙漠戈壁中，长长的行军部队昼夜顶着铺天盖地刮来的风沙黄浪，指战员们腰拴绳子，一个牵住一个、一人拉住一人，缓缓地一步步艰难前进着，有人倒下了，马上有人上前扶起，有人走不动了，马上有人主动让出牲口坐骑。沙漠行军，水就是生命，行走几百公里也找不到水流，一路上的干渴加上以“塞外三怪”著称的安西大风、巴里坤奇寒和吐鲁番燥热，成了我军部队致命的拦路虎。但官兵们发出了号召：“困难再大，没有我们的决心大！威胁再多，也阻挡不了我们进军新疆的坚定步伐！”

伤员病员没有水，所有的人都让出自己仅有的一点点“生命之源”给他们。夜晚戈壁气温骤降，沙漠里无法宿营，指挥员一声令下：“继续走——”战士们翻身爬起，二话不说就行军赶路。

沙漠里行走艰难，指战员们就用棉絮和布把脚包起来，互相搀扶着一步步向前挪动，有的人腿脚被沙子磨得血肉模糊，但没有听见谁哼过一声，大家仍然坚定执着地行进着。

就这样，向东疆地区挺进的部队吃大苦、耐大劳，顽强拼搏，团结一致，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行军1000多公里，征服了沙漠戈壁，胜利抵达了东疆各要地和天山山脉东边的各个地区，全面的接管了自己的防区。

2军5师步行13天抵达南疆阿克苏后，突然得到报告：“和阗地区有人企图制造暴乱破坏我军进驻——”

军长郭鹏、政委王恩茂立即命令15团：“以最快速度开进和阗，迅速稳定局势！”

15团遵照命令马上派出先遣队乘车奔赴和阗地区。该团主力部队紧随其后，12月5日全团开进，徒步向南直插和阗……

这又是一场极为艰难的行动。

南疆人把通往和阗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称为“死亡之海”，但为了争取时间我军还是毅然选择了这条最艰险的道路，踏上了和阗故道。

“解放军要从故道进军和阗了——”

消息震动了阿克苏人民，他们立即行动起来积极支持我军。短短七、八天里就筹集了十几万公斤粮草，300多峰骆驼200多匹马和足够的饲料。

许多老人纷纷自告奋勇来当向导，为进军南疆出力。

艰难的征程开始了，在这条千年故道上，流沙早把道路掩埋。很难辨清方向，迷路掉队的事经常发生。我军侦察分队也常常迷失方向，困在沙漠里摸索着前进，有时一困就是长达两三天，缺食品缺水，但他们仍旧顽强地战胜困难走了出来……

有的迷路的战士孤身奋战在沙海里，硬凭着坚定的信心和意志找到了大

部队。侦察分队开通了道路后，团主力循道前进。行军到第7天时，全队断水十几个小时找不到任何水源，担任向导的老人好不容易记起了前方一个水坑，战士们找到它已是黄昏，可探出后水早已干枯，只好忍着干渴继续上路。

塔里木的风沙惊人，风沙一到连骆驼也恐惧得不敢行走，但指战员们顽强地搀成一团，顶着风沙前进。谁也明白，停下就意味着死亡，1营2连的一位排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因劳累伤病，被风沙夺去了生命……

前后经过12天的拼搏，15团走出了沙漠，随即又马不停蹄的赶到离和阗不远的阿塔提斯，以兵临城下的军事威慑震住了企图暴乱的反动分子，稳定了和阗的局势，为南疆的和平局面打下了基础。

10月25日彭德怀习仲勋致电嘉奖15团全体官兵，向这些英勇无畏的战士致以崇高的敬意。

我军挺进新疆的胜利，深刻地显示了党的政策的巨大威力。广大指战员自觉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每到一地，主动为群众挑水、打柴、治病、扫院子。得到了各族人民的拥护和爱戴。许多群众不避风险，为我军送情报，当向导，侦察敌情，以及送粮、送水。伊犁地区各族人民，得悉我军奋勇西进的消息后，纷纷献粮献物，在短短的几天里，就筹集了几十万斤粮食和大批物资。他们不辞劳苦，千里迢迢，赶运到乌鲁木齐，慰问人民子弟兵。各族人民对我们的信任和爱戴，使全军上下无比感动，更加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更加坚定了保卫和建设祖国边疆的决心。

在全军指战员的共同努力和新疆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援下，继先遣支队战车团于1949年10月20日进驻乌鲁木齐后，郭鹏、王恩茂率领的2军，于12月22日前，先后进驻南疆各重要城镇；罗元、张贤约率领的6军，于1949年11月5日至1950年1月20日进驻乌鲁木齐及北疆各地。至此，我军历时两个多月，行程6千余里，圆满地完成了进军新疆的任务，把五星红旗插上了天山、阿勒泰山和帕米尔高原。在玛纳斯河岸上，我人民解放军与坚持向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民族军胜利会师（民族军于1950年1月10日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军），两支兄弟部队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欢呼拥抱。

新疆的初步建设

根据毛泽东关于“你们的进军任务包括出兵西藏，解放藏北”的指示，我人民解放军于1950年3月派出一支先遣分队，向西藏地区侦察前进。他们翻越了海拔6千多米的昆仑天险，穿过冰雪覆盖的无人区，克服了饥饿、严寒、迷路、高山反应等重重困难，几临绝境，终于胜利到达藏北改则地区。解放军这一英勇的行动，完全出乎西藏反动上层的意料。当先遣分队到达藏北的日土宗（县）时，他们以为是神兵天降，目瞪口呆。

进军藏北，好比给西藏上层反动分子背后猛刺一刀，有力地配合了西南主力部队解放西藏的行动，促进了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先遣分队抵达藏北后，大雪封山，供应断绝，但他们无所畏惧，猎取野驴充饥，把麻袋缝成衣服御寒，宁可自己挨饿受冻，也不加重藏族人民的负担，从而粉碎了反动上层挑拨我军与藏族群众关系、把我军逼走逼死的阴谋。他们像冈底斯山一样，牢牢地扎根在藏北高原。在这期间，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把自己的热血浇灌在“世界屋脊”之上，成为今天培育西藏社会主义花朵蓬勃开放的土壤。他们的英雄事迹至今还在藏族人民中传颂。

帝国主义和新疆内部的反动势力，并没有因为我军入疆而放弃他们的反革命企图。1949年冬，在美蒋特务策动下，乌斯满、哈力拜克、尧乐博斯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他们煽惑群众，劫掠杀戮，甚至袭击部队，围攻城镇，反动气焰一时甚为嚣张。由于我们采取了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方针，很快把被裹胁的群众争取过来，经过几次围剿战斗的胜利之后，至1951年夏，叛乱即告平定。

1950年春，整编和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的工作开始进行。新疆起义部队人数达8万之多，整编改造他们至关重要。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和新疆军区党委，派李铨、张仲瀚等一批干部到起义部队中工作。他们模范地执行党的政策，处处以身作则，把我军官兵一致、上下一致、军民一致的优良传统带到起义部队，深入进行了我军路线、方针、宗旨的教育，发动起义官兵，开展了诉苦、民主运动，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党的组织和政治工作等人民军队的一整套制度。经过党的教育，他们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思想上完全站在了人民一边。

1950年9月25日，在新疆和平解放一周年之际，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授予这支部队光荣的“八一”军旗，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由陶峙岳将军任兵团司令员，正式编入我军序列。

我军还陆续抽调了2万余名干部战士，组成各级工作团（队），深入农村、牧区，参加了地方民主建政、建党、减租反霸、土改、牧区改革、镇反、三反五反等各项工作，斗倒了恶霸地主、反动伯克（牧主），摧毁了封建统治的根基，建立了人民民主制度，使各族人民从政治上得到了翻身解放，并在斗争中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后来这些干部战士中的许多人，转业到地方工作，他们像革命的种子，撒遍天山南北，深深扎根于各族人民群众之中，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边疆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

我进疆大军始终把为各族人民办好事，建设社会主义新新疆当作中心任务。解放西安后，便注重研究新疆情况，招罗各种人材。在酒泉集结待发时，开始打造工具，收集种子，派先遣部队及技术人员到驻地防区进行调查研究，勘查测量，准备修渠开荒。我军入疆后，行装甫卸，征尘未洗，立即继承和发挥延安精神和南泥湾屯垦的光荣传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广大指战员一手拿枪，一手拿坎土曼，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渺无人烟，荆棘丛生的荒野碱滩上，挖开冰雪，安营扎寨，用他们战斗过的双手，向塔里木、准噶尔盆地的千里荒野展开了新的进军。没有房子挖地窖，没有工具自己造，没有牲口人拉犁。不熟悉当地作物栽培规律，虚心向随军入疆的农业专家学习。他们开发荒原，兴修水利，植树造林，架桥铺路，兴办牧场、渔场及各类作坊，真是百业兴旺，蒸蒸日上。正像当时部队流行的一首歌曲所唱的“劳动能够翻天地，戈壁滩上盖花园”。

天山南北被开垦出了上百万亩土地，兴建了八大水利工程，开展了石河子和塔里木垦区，带动了各族人民的劳动热情。到了1950年秋，部队已经能够半自给。1951年，即可基本自给了。此时，新疆首种了棉花和甜菜等经济作物，扩大了种植范围。当时开垦的那些农牧场，经过不断拓新，今天已发展成为新疆粮、棉、畜和经济作物的生产基地。

解放的新疆没有任何现代工业，在首府乌鲁木齐，仅有一座很小的火力发电厂和光绪年间江南造船厂生产的一台车床。人们穿的衣服和各种日用品、生产工具等，都要仰赖内地和国外进口。我军进疆后，为了发展新疆的

工业，广大指战员精打细算，节衣缩食，用节约下来的军费作资金，自己动手，艰苦创业，兴建了钢铁厂、纺织厂、发电厂、农机厂、水泥厂、汽车修配厂、煤矿等厂矿企业。当时，从军区领导到各级干部、士兵、职工和家属，都一齐上阵参加劳动。还从几千里外的西安、天水等地用汽车运进了这些工厂的设备。另外，在苏联同志的关怀下，他们又从苏联引进了汽车修配厂、火力发电厂的设备，以及一些汽车和拖拉机。为了解决资金困难，军人们成立了合作社，以相当于银行存款的利息，鼓励广大干部战士储蓄。这样既为干部战士增加了积蓄，又活跃了市场，收集了游资，用来作为发展生产的资金。经过两年的奋斗，到 1951 年秋初步打破了新疆经济的困难局面。到了 1952 年，由于许多工厂先后投产，农业又取得较好的收成，军民生活大大改善，开始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当各族人民穿上新疆自己生产出来的“天山”细布、花布时，无不欢欣鼓舞，他们高兴地唱道：“脱去千年老羊皮，换上天山细布衣，感谢亲人解放军，感谢领袖毛主席。”

通过开展大生产运动，不但解决了部队的供应，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而且发展了新疆的经济，改善了各族人民的生活，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从而使我军在新疆牢牢地站稳了脚跟，受到了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实践证明，只有用发展经济，战胜贫穷，我们党才能领导各族人民战胜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从胜利走向胜利。

第五章

东南沿海反登陆，人民军队再显神威。
胡璉兵败东山岛，蒋介石难圆“反攻”梦。

第一节 窜扰活动未能奏效

蒋介石整编残军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悍然命令其第7舰队及第13航空队进驻台湾。朝鲜战场的复杂局面，使原本担心我军会渡海解放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似乎胆子又壮了起来。蒋介石调整指挥机构，将台湾、澎湖、金门等地的部队予以整编，将原有的20个军的番号缩编加强为12个军又6个独立师，还将收编的海匪武装“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改编为“中华反共救国军”。

经过整编军力，台湾军事指挥机构在福建、浙江沿海未被我军攻占的20多个岛屿上部署了7万余人的作战力量，其中有6万余人的正规军驻扎在最易受到我军攻击的金门、马祖两岛。在广东沿海，国民党军队当时还占据南鹏岛及万山群岛中的几个小岛。

国民党部队以这些岛屿为基地，对大陆及沿海已解放岛屿进行各种骚扰破坏活动。

我3号炮艇被敌击沉

根据敌人的兵力部署情况，我沿海前线部队积极充实粮弹，修筑工事，同时采取了反击与进剿并举的态势，对于撤退到海岛的残敌进行围剿，在已攻占海岛上抗击其回窜，避免了处处分兵、消极防守的弊端。

1950年7月9日，毒辣辣的太阳把大海炙烤得直冒白烟。陈雪江队长检查完了队里的备战工作后，坐在树荫下和战友下五子棋，正下得高兴时，电台里传来了海军首长的指示，要他们配合21军62师奔袭大陈之敌。

炮艇大队是1950年2月在镇江刚成立不久的一支队伍，此次出海作战，嫩竹扁担能否挑得起千斤重担，谁都没有十分的把握。但是，全队上下士气高涨，尤其是那些曾在国民党海军里干过的人员，更是摩拳擦掌，情绪激昂，他们渴望创造辉煌的战果，来证明自己爱国。

当日下午，陈雪江率领他的炮艇大队由海门进至琅玕山，与在那里待发的陆军机帆船队集结。

这琅玕山岛，位于台州湾南侧，由黄琅和白果山两个小岛组成。两岛中间夹一湾碧水，那就是金清港，出港向东14海里就是大陈岛了。军区指挥员选定琅玕山岛为集结地点，是由于这里地势高，树木繁茂，艇船在湾内待机十分隐蔽。

按作战指挥所规定，指挥员们白天在岛上观察了大陈岛敌舰锚地和预定登陆点的地形。夜幕降临后，艇船编队出航，以每小时6节的速度悄悄地向大陈岛前进。当编队行至琅玕山与一江山之间的海面时，海上风浪骤起，白色浪头像一座座小山似的，从右侧压过来，艇船剧烈地颠簸着，随时都有艇

翻人亡的危险。当时在海上的陆军 62 师师长周纯麟担心艇船经受不住，决定撤回琅玕山避风。

入夜，陈雪江命令 1 分队长张家麟和 3 分队长邵剑鸣分别率领 103 和 3 号炮艇在金清港外锚泊警戒，监视海面敌情。

翌日清晨，辽阔的海面上漂浮着淡淡的白雾。邵剑鸣从望远镜中发现正前方海面有一个黑点，凭着他的直觉和经验，很快判明这是一艘国民党的大型炮艇。邵剑鸣是 1944 年驻刘公岛汪精卫的伪海军练兵营的起义人员，参加人民解放军后作战勇敢，曾多次立功受奖。此时发现敌情，他立即招呼张家麟准备迎敌。

张家麟比邵剑鸣大几岁，办事比较沉着、老练。他见邵剑鸣急火火的样子，提醒道：“我们的任务是负责警戒，发现敌舰应该先请示。”

邵剑鸣沉不住气地说：“钻进宠子里的鳖，等你请示好了，它娘的还不早溜了。依我看，咱们先斩后奏，怎么样？”

“不行，一定要先请示！”张家麟毫不让步。

邵剑鸣见说服不了张家麟，也就只好采纳了他的意见，起锚随着 103 号艇一起返港报告。

途中，邵剑鸣担心请示后不让打，便让 103 号舰单独返港报告，他擅自命令 3 号炮艇调转方向，全速向吨位大于自己十多倍的敌艇冲去。

敌艇见 3 号炮艇单艇出击，便调头向外海驶去，诱其追击。邵剑鸣求战心切，一心想吃掉敌人，因而中了敌艇的“调虎离山”的诡计，遂令炮艇加速前进。

突然，敌艇放慢了航速，在距离 600 米处首先向 3 号炮艇开火。一发发炮弹在 3 号艇的四周爆炸，海面上腾起一支支水柱。邵剑鸣为发挥本艇火力，一直逼近到敌艇 200 米时才指挥还击。激战中，枪炮兵赵孝庵用双联装机关枪一连打了 250 发子弹，敌艇舱面上顿时混乱起来，两挺机枪也被打哑了，舰尾升起了浓烟和火舌。这时敌人发狂了，用 40 厘米双联装机炮向 3 号炮艇连续还击。激战不一会儿，3 号炮艇操纵室被两发炮弹击中，副艇长许慎和操舵兵马全福当即牺牲。一块弹片又击中正在指挥作战的邵剑鸣，他左眼被击穿，脑部受重伤，当场英勇牺牲。

这时，已经失去操纵的 3 号炮艇，舰尾又连中数弹，艇上的机枪、火炮全部炸坏，两名射手及弹药手也相继倒在血泊中，情势十分危急。

敌人见 3 号炮艇失去抵抗力，更加疯狂地向其射击。

枪炮手赵孝庵从昏迷中刚刚醒过来，他强忍着手和腿已六处中弹的剧烈伤痛，以顽强的毅力爬进操舵室，冒着呛人的浓烟，用受伤的臂膀扶着舵轮，全力扭转艇首，试图驾艇返回琅玕山。但行驶不远，艇身又中弹 4 发，舱底钢板被炮弹击穿，艇内大量进水，不一会儿，3 号炮艇便沉没于海底。

艇上 17 名人员，除 3 人泅水生还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

3 号炮艇的沉没，在参战人员的心头蒙上一层阴云。战前，陆军中有些人对小炮艇能否掩护他们渡海登陆就心存疑窦，原海军人员对小炮艇出海作战的能力也缺乏信心，如今眼看 3 号炮艇被击沉，战友牺牲，不少人情绪比较低沉。

突袭披山岛

张爱萍司令员得知3号炮艇被击沉的消息以后，心情非常沉痛。他立即报告华东军区，军区考虑到进攻大陈的作战意图业已暴露，便电令炮艇大队“立即撤回海门待机”。

炮艇大队撤回海门，部队情绪十分低沉。

作为海上指挥员的陈雪江羞愧得抬不起头来。他走到哪里，陆军总是指着他叽叽喳喳地议论。

“我早就说小炮艇不能出海作战，可人家偏不信，这不，摔跟头了吧。”

“几条小炮艇，不知天高地厚的，竟敢跟人家的大军舰硬碰，肥肉没吃到，反倒被肉吃了，教训啊……”说者声音拉得很长。

一个河南口音的老兵话更难听：“俺打了四、五年的仗，身上连块皮也没擦掉，别在革命胜利的时候，让小炮艇把俺这140多斤送进大海喂鳖喽。”

冲着这些议论，陈雪江即使浑身都是嘴也无法解释清楚。他只有一个办法，痛苦的沉默。

周纯麟师长和孙云汉政委最理解陈雪江此时的心理。他们同意陈雪江的意见，找准机会，争取打个漂亮仗，把部队的信心鼓起来，把敌人的威风打下去。

于是，三人认真分析了敌情，认为进攻大陈岛暂时放一放，选一个易攻的敌岛作为攻击目标。

一个是一江山岛，这个岛的守敌虽然不太多，但离大陈岛只7海里，进攻时容易被大陈敌人发觉，敌舰可以及时赶来支援。

另一个是披山岛，一个月前的6月2日，披山海匪首领吕渭祥曾率敌600余人，乘我军驻守部队换防之机突然登陆对玉环岛坎门镇实施偷袭。我守岛部队步兵74师220团8连及随后赶来的增援部队立即组织反击，歼灭这股凶悍海匪100余人，其余之敌见我军防守严密，再战恐难脱身，只得仓惶逃往海上溃退。

披山岛的守敌实力虽然比一江山岛强大，还驻有四、五艘艇船，但离大陈岛37海里，进攻时大陈一时难以察觉，即使察觉了也因距离较远而不易增援。

一份由周、孙、陈共同签署的作战方案用电报发往华东军区。

军区首长回电否决了。

周、孙、陈没有失去信心，他们根据掌握的敌情，重新修改了作战方案，第二次送了上去。

军区首长问：“有没有把握？”

周纯麟师长回答：“百分之百把握不能说，七八成把握还是有的。”

“我要的是百分之百的把握。”军区首长再次拒绝了他们请战的请求。

第三份报告又送了上去。

这一次，军区首长总算开恩了，同意他们打披山岛。

就在3号炮艇失利的第三天，1950年7月12日黄昏，我军步兵62师的2个营兵力分乘两艘登陆艇，在4艘炮艇的掩护下，乘敌从披山和一江山岛秘密调遣兵力增防大陈岛之机，利用黑夜渡海，向披山岛进攻。

周纯麟和陈雪江率领一支由一个炮艇分队和不载部队的30多艘机帆船为第一路，从金清港浩浩荡荡地出发了，直向大陈岛方向佯动。入夜，以两个炮艇分队和装载陆军两个步兵营的30余艘机帆船编成第二路，由孙云汉和炮艇大队政治处副主任廖云台指挥，直奔披山岛而去。

夜幕降临了，天气突然发生变化，乌云遮去了天上的星月，狂风骤起，波涛翻滚，气候十分恶劣。参战人员怀抱着为3号炮艇报仇雪耻的决心，不顾晕船呕吐，坚持航行，深夜抵达石塘湾集结。

第二天天刚破晓，艇队便出现在披山岛海面。陈雪江举起望远镜，发现岛西面锚地停泊着敌“海鹰”号、“新宝顺”号、“精忠”1号和“精忠”2号4艘炮艇，还有许多机帆船。披山岛守敌没有料到受挫的人民海军还敢驾着炮艇长途奔袭，打上门来。当我艇队向敌锚地发起突然攻击时，毫无思想准备的敌人摸不着头脑，顿时乱成一片，仓惶砍缆起锚，夺路逃窜。

分队长张家麟见为战友报仇雪恨的机会到了，他率领3艘炮艇奋勇追击，大胆插入敌艇群，集中火力围歼300多吨的“精忠”1号。激战中，负隅顽抗的敌上校支队长被击毙。群魔无首的敌人，见大势已去，不敢再战，乖乖地挂出白旗投降。“海鹰”号和“精忠”2号丢下“精忠”1号不顾，只顾仓惶逃命去了。

这时，被堵在锚地的“新宝顺”号仗恃吨位大，火力强，疯狂进行反扑。107号艇冒着敌艇密集的炮火，抵近射击。但是，由于火炮口径小，无法将其击沉。艇长杜克明为在大陈援敌未到之前迅速解决战斗，急中生智，看清“新宝顺”号是木质船，便下令撞击敌船。脊背已经负伤的操舵兵陈贵松，忍着剧痛将艇首对准“新宝顺”号尾部，开足马力撞了过去。只听一声巨响，敌艇尾部撞开一个大口子，海水哗哗地灌进后舱。在炮艇撞击敌艇的刹那间，艇上的机关炮、机关枪、小炸药包和手榴弹，呼啦啦地打了过去，敌艇上一片鬼哭狼嚎。在“新宝顺”号艇上指挥作战的是国民党浙江省玉环县县长林森，此人对共产党恨之入骨，在他的督战下，艇上的敌军拼死顽抗。敌我两艇靠得很近，双方展开轻武器对射，战斗打得十分激烈。

激战中，103艇和104艇在张家麟的指挥下及时赶来助战。张家麟也是从国民党海军起义的。3号炮艇沉没，邵剑鸣和许多战友英勇牺牲，激起他杀敌的满腔怒火。他抓住有利攻击时机，接连下达“快速进体，撞沉敌艇”的命令，指挥103艇朝“新宝顺”腰部猛撞过去。枪炮兵龙钦祥、炊事员厉保安和一位向导民工，带着炸药包和集束手榴弹，趁撞艇的瞬间，飞身跃上敌艇，先将敌首林森击毙，缴了19名敌人的枪械，然后连续用集束手榴弹和炸药包将敌艇舱底炸裂。

待三位勇士押着俘虏返回103艇后，“新宝顺”号载着几十具敌人的尸体沉入海底。

击沉“新宝顺”号这一令人振奋的场面，鼓舞着所有的参战人员。攻上敌岛的陆军步兵见了，都连声欢呼“打得好！”艇队人员更是个个扬眉吐气。

海上战斗行将结束时，周纯麟师长和陈雪江大队长命令艇队将敌投降的“精忠”1号拖回，不料一艘“太”字号敌舰，从大陈岛方向疾驶而来，见“精忠”1号已挂白旗投降，敌舰连发10余炮，将其击沉。然后敌舰由西南转向正北跟踪追来，企图袭击锚地内的海军艇船。海军艇队和岛上陆军的战防炮、迫击炮当即以密集炮火猛烈还击。敌舰势单力薄，不敢恋战，慌忙向大陈方向退去。

至此，披山之战胜利结束了，击沉敌“新宝顺”号炮艇1艘，俘敌“精忠”号炮艇1艘（后被敌舰击沉）及机帆船1艘，帆船2艘。俘敌540多人，毙伤敌500余人。

我军返航时，大海涨潮了。

此时，陆、海军人员的心中也正在涨潮，这是胜利的喜悦之潮。

突袭披山岛虽是小仗，但它是华东海军成立后的首次陆海协同联合登陆作战，显示了年轻海军的雄威。第一次应用小艇打大舰、木船打军舰的做法，在人民海军创业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重新夺回玉环岛

为了彻底粉碎国民党军及海匪猖狂进攻，我军还多次采取主动进攻的战术，将其立足点——被占岛屿一一拿下。

在这一年的夏季，我军驻浙部队还剿灭北麂岛敌守军 600 余人，而驻闽部队则进袭了西洋、浮鹰两岛，驻粤部队在进攻中攻占了南鹏岛。

解放军攻防结合的战术，使台湾当局借登陆窜犯扩大其政治影响，配合国际反共势力侵略朝鲜的玩火行动一再受挫。

然而，台湾当局不甘失败，仍然硬着头皮坚持武装窜犯大陆。

1950 年 11 月 20 日凌晨，曾受到我军沉重打击的披山海匪吕渭祥，经过一段时间的修整及充实武器装备，又率 800 余众，分兵 3 路再度偷袭我玉环岛。

当时，我守岛部队因兵力不足，被这股海匪武装攻入玉环县城及占领了该岛大部分地区。但我军少数兵力仍然与登岛之敌展开了殊死战斗。玉环县警备大队的 2 个班，在没有支援的情况下，奋勇杀敌，独立阻击海匪进攻达 7 个小时，为增援部队的赶到赢得了时间。得悉海匪登岛的消息后，我军驻守楚门地区的步兵 61 师 183 团的 2 个多连部队，当即起程，徒涉 20 多里的海峡浅滩，登岛投入激战，经过我军增援部队和守岛部队的 6 个小时的协同作战，一举歼敌 180 余人，击溃了吕渭祥的残部，重新夺回了玉环岛。

“根据地”企图又遭失败

1951 年初，朝鲜战局急剧恶化，美军及其李承晚部队开始向中朝军队发起全线进攻。在这种形势下，台湾当局又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调集军力向大陆展开大规模窜犯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1951 年 1 月 13 日，毛泽东电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中南军区陈毅、邓子恢等领导人，要他们根据朝鲜局势以及台湾当局可能对大陆厦门、汕头等地大规模进犯的情况，拿出对策。中央军委也向这两大军区发出了要“确保重点、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具体指示。

在我军调整了兵力部署，加强了重点地区和岛屿的保卫后，台湾当局自知派遣大部队窜犯占不着便宜，于是决定停止实行大规模进犯大陆的军事行动，仍然以小股武装的形式窜扰我边防地区。

但是，长时期地“小打小闹”，已经碰得头破血流，看来不改变打法，其最后下场决不会比原来的强。为此，台湾军事当局一改往日以窜犯沿海地区为主的作战形式，把活动舞台由沿海拉到了内陆山区，将“海上阵地”移至“山区根据地”。

根据这一战略构想，台湾当局除继续利用海匪武装打头阵外，还专门成立了“敌后工作委员会”和“大陆游击总指挥部”等长期工作机构，妄图在美国顾问对匪特分子进行了游击战训练之后，再次掀起“反攻”的“高潮”。

为了实现建立“敌后游击区”的黄粱美梦，1951年6月至9月，台湾当局4次派遣6股共800余人的武装匪特，在南到广东海南岛的琼东县，中为浙江的象山、乐清县和北至福建的惠安县等漫长的海岸线上，先后登陆窜犯，但均被严阵以待的当地军民一举歼灭。

一上岸就挨打，回回都是以失败而告终。可是时间长了，敌人也学“聪明”了。他们开始与我军“斗智”。

如1951年9月上旬，在敌占岛——乌丘岛盘踞的“福建省反共救国军”370余人，在原国民党仙游县警察局督察长、“泉州纵队”陈令德和原国民党德化县县长、“永安纵队司令”陈伟彬的率领下，分两股在福建惠安县登陆并于第二天越过福厦公路，打算流窜到戴云山区，在我内陆地区建立“游击区”和“根据地”，准备长期与我军周旋。

陈令德率领的“泉州纵队”和陈伟彬率领的“永安纵队”，均系台湾当局聘请美国军事顾问进行强化训练并给予“全美式”装备的精悍匪特组成。

登陆后，“泉州纵队”居然凭借优势火力，一路连续摆脱了我地方民兵的阻击，向着既定目标戴云山进窜。而“永安纵队”更是阴险狡猾，全部伪装成解放军，一路冒充我“剿匪”部队，使一些地方民兵和群众被其诱杀。

台湾当局的内窜作战，正中我军“诱敌深入”的“口袋战术”。正当这两股匪特武装做着在戴云山安营扎寨的美梦之时，却已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我军预设的包围圈中。

1951年9月6日和7日，福建军区司令员叶飞亲临战区，指挥这场围歼战。

“泉州纵队”和“永安纵队”在习义路、东山寨和七丘山、白洋山等地被我军74师、87师和地方武装的23个连队、9个区中队以及几个县的上万名民兵分割包围。9月7日，“永安纵队”司令陈伟彬在七丘山的围歼战中被我军战士击毙，其属下只得分散逃窜。

值得一提的是，这支匪特武装的成员毕竟经过严格挑选和精心训练，其狡猾程度，非一般土匪可比。

在我军的天罗地网中，少数匪特竟然想出假扮民兵押解俘虏的模样，妄图蒙混过关，但最终还是被我围剿军民揭穿，全部被俘。

“泉州纵队”司令陈令德，在战斗中只身逃跑，而后装扮成化缘和尚“云游”躲避搜捕，直到9月15日，在逃窜路上被我村村设岗、路路放哨的民兵识破而做了阶下囚。

经过我福建晋江地区军民历时半个多月的全力清剿，这两支曾不可一势的匪特武装，除8人从海上逃跑外，全部被歼和被俘。

台湾当局内窜建立“根据地”的企图，又一次遭到惨重的失败。

第二节 胡宗南再举“帅”旗

蒋介石召见胡宗南

台湾当局内窜建立“根据地”的企图遭到惨重的失败后，仍不甘心失败。蒋介石依恃台湾与美国签定的“防务协定”，企图改变战术与我抗衡。

既然“小的”行不通，那么干脆来“大的”，于是制订出了“以大吃小，速进速退”的战术。

所谓“以大吃小”，即动用几倍或数十倍优势兵力，在其海、空军的协同下，突然袭击我军防御力量薄弱的海岸突出部分或沿海岛屿，力争歼灭我军守岛小分队，一俟我军大部队赶往增援，便迅速撤离，这种“打了就跑”的战术，一直延用到第二年在进犯我东山岛遭到惨败后方才停止。

为了统一指挥浙东所有岛屿之敌，蒋介石于1951年9月17日亲自召见了反共老手胡宗南。

蒋介石破例为自己的下级倒了一杯茶，背着手在室内踱着步子，一言不发。

胡宗南猜不透蒋介石葫芦里究竟装的是什么药，试探地问：“委员长找我有……”。

蒋介石没有正面回答他，反问道：“寿山，你是一个爱说真话的人，这些年来，我被那些说假话的骗子坑害不浅，丢了江山社稷，困守这小小的台湾岛，现在，我很想听听真话，哪怕半句也行……”

胡宗南受宠若惊地从沙发上弹起来，“叭”地一个立正，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

蒋介石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说：“寿山，以你之见，这浙东诸岛还能否守住。”

胡宗南知道蒋介石素有爱听虚言的习惯，但他觉得现在站在自己面前的“总统”，似乎与以前的蒋介石不一样，于是他说：“委员长既然信得过我，那我只好直说了。以我之愚见，我军虽然退守台湾孤岛，但孤岛并不孤。”

“说下去。”蒋介石鼓励地说。

“说它不孤，根据有三点：第一，强大的联合国部队正在朝鲜战场上与共军决战，这是对委员长‘反攻大陆’方针的最大支援；第二，有美军的第7舰队帮助我们守卫台湾岛，再加上中美‘防务协定’，台湾就等于进了保险箱，万无一失了。这最后一点嘛……”

胡宗南突然收住话，用眼睛的余光瞟了蒋介石一眼。

“说吧，说吧。”蒋介石催促道。

“这最后一点嘛，是这样的，”胡宗南清了清嗓子说，“现在，浙东诸岛仍然为我军掌握，这些大大小小的岛屿，既是拱卫台湾本岛的门户，又是反攻大陆的前沿基地。有了这些岛屿，民国的失地就不愁夺不回来。只是……只是目下守岛部队编制混乱，缺乏统一而正确的指挥，恐怕后果堪忧啊！”

胡宗南说出这最后一句话，光秃的额头上冒出细细的汗珠。

蒋介石要的正是胡宗南的这最后一句话。于是，他以不容商量的口吻命令道：“知我者寿山也。大敌当前，为了党国之大计，从今天起，我任命你为‘浙江人民反共游击队’总指挥兼省主席，钟常青少将作你的副手。以后，浙江诸岛的防务就由你全权负责了。”

胡宗南知道自己又上了蒋介石设下的圈套，但又不便于立即解脱，只好硬着头皮接受了委任。

胡宗南以败军之将，不但逃过了一场政治风波，不久还得到蒋介石的再一次重用。

1951年9月18日，即蒋介石召见后的第二天，胡宗南便奉蒋委员长的旨意，把浙江沿海诸岛的杂牌军纳入突击大队和一个海上游击纵队，并从台湾先后增调四个军官战斗团和几艘军舰。总兵力达12000多人。

为了给浙江沿海诸岛守军打气，胡宗南亲自拟发了一份电报：

各驻岛国军同仁：

悉共军近日有攻打我浙江沿海诸岛之意图，望众官兵齐心协力，同守自己之世界。为党国效劳。坚守者，将大赏。

胡宗南

9月19日

胡宗南不愧为是一名反共的老手，上任伊始，他与副官钟常青亲临浙江沿海诸岛巡视，犒劳守岛官兵。有的士兵手捧着胡宗南从蒋介石那里“特批”的大洋，感激涕零地喊：

“胡主席万岁！”

胡宗南听了，心里比吃蜜还甜。

白沙岛首次失败

1952年春天，国内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部队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编。蒋介石认为共产党被政治问题搞得晕头转向，自顾不暇，正是“光复大陆”的难得良机，于是秘密电告“胡主席”：

抓住战机，寻隙出击，严惩共军，为党国效力。

蒋中正

3月20日

胡宗南得到蒋委员长的如此器重，不觉精神大振，连夜召开了守岛敌军头目会议，部署秘密的“袭共”计划。

3月28日，黑沉沉的夜幕把大海遮盖得严严实实，天上下着毛毛细雨，这正是隐蔽出击的好时机。胡宗南命令吕渭祥、王枢两位上校指挥官，率领1000多名“反共救国军”，在夜幕的掩护下分乘23艘机帆船、9艘海军舰艇，向我海门镇东北岸10余里的白沙山岛守军发起突然袭击。

我守军警卫连3排哨兵吕洪书听到头门山方向有马达声，迅速向值班排长徐忠报告。徐忠听到敌情报告后，立即命令7班加强巡逻，9班进入阵地，同时，立即向连长顾展宏请示处置。

此时，大海正在涨潮，敌海军舰船趁涨潮之机向我阵地疯狂地开火射击，顿时，白沙山岛上火光四起，土石飞进。在密集的火力掩护下，敌人像一群发了疯的野兽，声嘶力竭地叫喊声，从一艘艘舰船上涌下来，纷纷登上岛岸，向我守岛部队开枪射击。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7班大部伤亡，其中一个江

苏籍的战士身上中了 30 多发子弹。排长徐忠在与敌人抵近射击中，一连打死 3 个敌人后，头部中弹壮烈牺牲。

登陆之敌见我防御阵地失去抵抗能力，又集中兵力向纵深攻击。连长顾展宏立即命令 2 排投入战斗，激战半个小时，渐渐感到力量不支，退到 147.5 高地，依托有利地形进行顽强抗击。

战斗打响后不久，我 62 师师长孙云汉得知敌人登陆白沙山，迅速命令就近的该师海防大队长齐德胜和陈超政委派部队火速支持；同时疾速通报给驻海门的华东军区海军炮艇大队长陈雪江和台洲军分区机帆船大队长戴玉生，让他们派舰船支援白沙山战斗。

陈雪江和戴玉生接到命令后，分别率领各自的舰、船大队全速向白沙山海面疾驶而去。但由于气象恶劣，能见度极低，双双迷失了方向，急得两位指挥员双眼直冒火星。

战斗一直打到天亮。停泊在白沙岛附近海面上的敌军舰船，将几十门火炮同时对准我 125 高地，进行反复轰炸。登陆的敌人依恃着炮火的支援，向我坚守的高地发起轮番冲击。这时，我前来支援的陆军先头部队因受到敌炮火的拦阻，一时难以发挥作用。

战斗打到 29 日 8 时 30 分，我 186 团 2 营从上盘涉水上岛增援。我海军炮舰第二次赶来白沙山海面，与敌舰船展开了激烈的炮战。敌指挥员吕渭祥、王枢见我炮艇火力猛烈，2 艘机帆船被我炮艇当场击沉，深感两面受到夹击，形势不妙，他一面指挥敌军对我炮艇进行抵抗，一面命令登陆部队撤退。撤退中，我海军炮艇以火力进行追击，敌 1 艘机帆船中弹起火，炮艇又向其连开数炮，终于将其击沉。这次战斗，进犯的国民党军在损失 200 余人后逃走。

但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1952 年 6 月 10 日，胡宗南又亲率 1200 余人进犯浙江温岭县的黄焦岛，守岛解放军 1 个连，扼守要点，激战 18 小时，后又在增援部队的配合下，将未及上船逃跑的国民党军全部歼灭。此次战斗，我军伤亡 46 人，歼灭胡宗南部 310 人。

1952 年 10 月 19 日，我人民解放军主动出击，以 1 个加强步兵营和 1 个炮兵营的兵力经 4 个小时的航渡，登上国民党军袭占的南澎岛，6 个小时的激战后，全歼岛上敌军 118 人，击毙其少将指挥官，收复南澎岛。

1952 年 12 月 14 日，1000 多国民党军袭击福建漳浦县的六鳌半岛，其时在六鳌镇的解放军只有 1 个边防排，他们英勇抗击了十几倍于己的国民党军的袭击，歼灭其 100 余人，并配合援军进行追击，打得来犯者仓皇逃窜。

南日岛窜犯得逞

但是，国民党军这种“以大吃小”的突然袭击，也曾有几次得手。他们在 1952 年先后袭击福建莆田县湄洲岛、南日岛和浙江平阳县乌岩、雾城时，都使解放军的驻守部队和当地人民群众遭受一定损失，其中尤以窜犯南日岛为著。

1952 年 10 月 11 日，驻金门岛的国民党军第 14 师和 75 师各两个团及海匪突击大队，共 9000 人，分乘舰艇、机帆船，在 8 架飞机掩护下，第三次窜犯南日岛。

南日岛是福建省东部莆田县的一个较大的岛，东西长约 14 公里，两端最宽处在 7 公里左右，中间最窄处只有 700 米。南日岛东部起伏较大，有大乔

山和九重山、笔架山、猪母山，海拔都在 130 米以上，山势陡峭，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岛西部则是平缓的山丘、土坡，平均海拔 40 多米，最高处的山边村后山才 80 多米。南日岛面积约 80 平方公里，有 60 多个村庄，万余居民。南日岛为莆田县第 9 区，区政府设在岛西部的南日村。

10 月 10 日，金门国民党军称“为庆祝国庆，举行陆海空军大演习”。

10 月 11 日凌晨，10 艘登陆舰和十几条机帆船在夜幕中驶离了金门料罗湾，编队向南航行。大亮时接近南日海面，发现 1 只渔船，3 艘登陆舰集中火力射击，渔船被命中，桅杆顷刻倒下，有人被抛上半空，1 艘国民党军登陆舰又朝渔船撞击，将其撞为碎片，几个落海渔民也被撞死。

上午 9 点多钟，国民党军在万湖、土地坪、岩下村和东户、西户一线登陆，人民解放军 1 个连依托有利地形顽强阻击，激战终日，大部壮烈牺牲。11 日下午 2 时后，大陆增援部队 2 个营先后赶到，强行登岛，前仆后继。某部 2 营试图在后埕头登陆，遭敌人火力封锁。被迫退回。只有 1 个排漂至坑口，登陆成功，但与海匪部队遭遇，在众多敌人围攻下，除 8 人被俘外全部阵亡。某部陆战营 2 个连在坑口白沙洋强行登陆，上陆后仅剩 1 个连的兵力，敌军先以撤退引诱我军深入，后将我军包围于草埔村地区，机枪手李忠志在全排战友阵亡情况下，冲入敌群，拉响了手榴弹。某部 5 连副连长荆玉珍在战友全部牺牲自己又两处负伤的情况下，只身奋战两个小时，打退国民党军 5 次冲击，最后壮烈牺牲。

12 日晚 9 时，某部副参谋长石洪贞率 1 个营的兵力在坑口后埕头登陆，随即遭国民党军优势兵力的围攻，13 日凌晨，双方展开肉搏，天亮时，我登陆战士大部牺牲。

在南日岛上我军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的同时，大陆一边的莆田至石城正抢修运兵的公路，数万人昼夜奋战，三天里抢修通了 60 公里的公路，但渡海增援的部队一直遭受国民党军炮舰和飞机的火力阻击，众多木船被击沉，上岛增援的兵力少且分散，被国民党军各个击破。

袭击南日岛的国民党军在围攻我守岛和增援部队的同时，大肆抢劫岛上居民，破坏我地方政权组织，岛上的敌特和地霸管制分子也跳出来，为国民党军带路，指认我干部党员，围攻群众积极分子。南日岛鸡飞狗跳，混乱不堪。

战后统计，南日岛区公所干部亡 5 人，被俘 15 人；公安队亡 3 人；损失驳壳枪 6 支人步枪 8 支，手枪 12 支，大米 800 斤，税款 160 万元（建国初的人民币，100 元相当于 1 元）；区委会、区政府、妇代会公章，县公安局通行证 500 张以及民兵党团员统计表全部被劫；人民群众损失鸡 633 只，鸭 11 只，猪 324 头，黄牛 3 头，衣服 660 件，粮食 2835 斤，门板 75 块，棺材 12 口，羊 10 只，还有 11 名群众被杀害，43 人受伤，5 人被掳往台湾。

此战，我人民解放军共损失 1300 多人。

13 日夜里，国民党军全部撤退。

反攻年成了失败年

国民党军“以大吃小”窜犯活动的几次得逞，使蒋介石集团一度得意忘形。他们在 1952 年 12 月召开的有美国第 7 舰队司令参加的“战略会议”上，宣称 1953 年将是他们的“反攻年”，将继续进行“具规模”的反攻作战。但

是，人民解放军沿海各军区根据总参谋部的指示，认真吸取经验教训，严密注视敌情，扎实做好反袭扰准备工作，使蒋介石集团的“反攻年”变成了“失败年”。

1953年5月29日，人民解放军某部一举攻占了羊屿、鸡山和大、小鹿山等4个岛屿，歼灭国民党守军230多人，生俘“浙江人民反共突击队”42纵队少将司令何卓权。这4个岛屿位于温州湾的出海口，地位十分重要，在浙江大陆解放后的3年间，解放军与国民党军曾数度争夺这4个小岛。我攻占4岛后，蒋介石十分恼怒，命胡宗南“务必夺回”。

1953年6月19日，胡宗南，乘“阳”字号驱逐舰，亲率国民党军官战斗团1600余人，在17艘军舰的掩护下，向我60师野炮排的羊屿守军及公安17师50团3营9连两个排驻守的大小鹿山实施突然袭击。

我守岛部队在来势凶猛的强敌面前，个个怀着血战到底的决心，他们依托堑壕，用步枪、机关枪和迫击炮对敌人进行了反击。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先后打退了登陆敌人的10多次进攻。由于敌火力太强，反扑一次比一次凶猛，守岛分队尽管奋勇拼杀，但伤亡严重，再加上天气酷热，部队无水喝，无饭吃，绝大部分壮烈牺牲。

战场的形势对我极为不利。

在这紧要关头，我前来支援的海军温台巡逻艇大队1、2中队8艘舰艇和陆军60师的一个营及时赶到。海军舟山基地战舰大队的“临沂”、“遵义”2艘炮艇也随后而至。

敌人见我舰艇突然出现在战场上，慌忙转调舰头，以炮火进行拦阻射击。我艇利用夜幕向敌舰逼近攻击，一发发炮弹像雨点似的落在敌人的舰船上。舰船上的敌人眼看着快到手的胜利即将化成泡影，岂肯甘心，便以密集的炮火进行垂死的抵抗。

激烈的近战中，我冲在前面的一艘登陆艇的驾驶舱中弹，艇首的大门被炸坏，钢缆被打断。操舵手的手臂、耳朵受伤，接着右腿又被炸断。他从舵舱的地板上慢慢爬起来，忍着钻心的剧痛，将胸死死地压在舵轮上，使艇保持航向。

此时，514、515两艇冒着蝗虫般的枪炮弹，全速冲近敌岸，在100米处，以猛烈火力压制敌人，使受阻的登陆部队迅速登上敌滩头阵地。

居高临下的敌人，见我军已经登陆，向登陆部队猛投手榴弹，压得我军抬不起头来，情势非常危急。陈立富立即命令舰艇用炮火顺着山坡往山顶急袭。艇炮打到哪里，登陆部队就冲到哪里，一直用火力的伴随掩护登陆部队攻上山顶。

遭我艇炮打击的岛上之敌，他们向大陈岛守敌拍去了求援的电报。不一会儿，三艘气势汹汹的敌舰，从积谷山以东的海面上驶来。早已埋伏在那里的2中队炮艇，见敌舰进入了埋伏地，主动出击迎敌，激战10多分钟，敌三舰两伤，遂调头朝大陈方向拼命逃去。

在攻打浙东诸岛的战斗中，60师的部队与陈立富的炮艇中队多次协同作战，配合十分默契。该师的指战员每当一接到渡海作战任务，就提出要与海军的“老伙伴”（指陈立富的炮艇中队）搭档，再也不像开始时那样轻视小炮艇了。

为了配合大、小鹿山岛的登陆、抗登陆作战，巩固已开辟的温台航线，“瑞金”、“临沂”、“淮阴”、“遵义”、“兴国”5舰先后在渔山岛海

面和三门湾海域进行巡逻和护航。

《海军史》对 1953 与海军在东海海域进行的 50 多次作战的战果作了详细的介绍：歼敌 1300 余名，击沉敌舰船 16 艘。重创敌舰 8 艘，艇船 2 艘，俘获敌舰船 26 艘。通过这一系列的战斗，国民党军队被迫紧缩外围的兵力，退守主要岛屿。

胡宗南这个老牌上将遭我军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后，他的反攻大陆的美梦像肥皂沫一样破灭了，自感羞愧，提出辞呈。蒋介石气得破口大骂：“娘西匹，无能之辈！”于是，抓起一支毛笔，在胡宗南的辞呈上写下了“同意”两个大字。

蒋介石撂下毛笔，转念一想，胡宗南虽然在指挥浙东诸岛反共中吃了败仗，但他毕竟还是一个反共的功臣。于是，他派长子蒋经国到大陈，把灰溜溜的胡宗南迎回台湾，算是给了他一点面子。

终难补赎“前愆”

此后，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西北王”，在外界眼中是颇有点神秘的。他很少接见记者，不对记者发表谈话，更拒绝记者摄影。于是，他的照片、意见或主张，很少在报纸上刊载。此外，他还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很少与人家相周旋……人们和他之间似乎隔了一层幔帐，幔帐彼方人物形象模糊，像庐山在云雾中，自然越发觉得神秘起来。对于这一点，台湾那位与胡宗南相交颇深的记者卜氏曾认为，从胡行动谈吐，以及他左右的泄露，知道他之多少有点有意如此，大概不出下面 3 个原因：

一、他自视很高，既不满意于当时满朝文武欺民盗世，炫惑弄权，独行特立的性格便格外强烈地自然表现出来；

二、他是军人，军人以服从领袖命令为天职，除在职务上隶属关系中述说必要的主张意见外，没有对众扬言喋喋不休的必要；

三、他有他专心致志的工作，无谓的不说，开会，应酬，只是耗损精力，浪费时间；他了解人类心理，他企图用工作表现“不见其人”来扩大并加深人们对于他的印象。

卜发表这些看法后没几天的一个下午，他又应约单独采访胡宗南。

侍者把卜直接带进餐室，餐桌上早又摆好香烟水果，还有两只高脚玻璃杯。

胡从楼上走下来，他是在睡午觉中被叫醒的。

卜和他面对面。胡始终保持着那份矜持，即使说笑中。卜日后说，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是相当微妙的，它的深浅是被决定于无数的因素，小到一种气氛也会影响到距离，素昧生平的一个新闻记者和一个退职将领的两次晤谈，不可能有更深度的彼此认识。何况再加上彼此若干程度的保留。

胡宗南始终采取让卜多获得一些的态势，但也处处设防；而卜因职业养成的惯性，自然也不放松发掘探取的机会。结果，彼此都说得很多，局面既不像他在举行一个记者招待会，也不像作时事分析演讲，从未一面倒。

据卜报道，反攻大陆这一机会到来，胡是绝不放过的，他必须尽他的军人职守，另一方面也有一股消雪前耻补赎前愆的强烈情绪。他告诉卜，他的个人计划，研究对大陆作战成为他目前主要课程。

然而，朝鲜战争结束后，国际局势对台湾不利，台湾内部各方面也极不

安定。胡宗南的“军事反攻”只有梦里常温了。

1962年2月13日下午，一生倔强，并顽固地坚持“反攻大陆”的胡宗南，似乎预感到什么，他对去探望他的罗烈唏嘘地说：“冷梅兄，哼……国家需要我们，反攻大陆需要我们，但！……如今我竟病倒在床上……唉……！”连声的叹息，接着两行热泪夺眶而出。20多年来，这是罗烈第一次看到胡落泪，但谁想到这也是最后一次了呢！

14日上午，64岁的胡宗南在台北近郊荣民医院因心脏病去世。据跟随胡宗南20多年的参谋长罗烈说，胡一生自律甚严，生活刻苦，再加患有多年的血液脂肪过多症和糖尿症，因遵医嘱，禁食富于脂肪和蛋白质的食物，平素仅以蔬菜佐餐，致营养不良，体质日衰。胡宗南是2月7日（即农历初三）在家中洗澡后，突感不适，经内科名医诊断认为病情复杂，在家人及亲友的劝促后，乃即送荣民医院治疗。罗烈说：自胡住院后，蒋介石也曾于12日亲莅医院询问胡的病况。

第三节 东山岛之战

蔡斯提议袭击东山岛

这是 1953 年 6 月底的一天，蒋介石正闷郁不堪，忽报美国驻台军事顾问团团长蔡斯求见。

刚刚入座，这个趾高气扬的客人就开门见山地说明来意：“几年以来，我们双方朝夕操练，海陆空三军并用，以敌前登陆为目标的训练工作，已经差不多了，孙司令要我去看过，我也满意，希望总统也去看看，准备出击。”

在平时，对美国有关“反攻大陆”的一言半句，蒋介石都万分激动，而眼下，韩战败得惨，自己的部队不但没有派上用场，反而碰了一鼻子灰，而美方还要按照几年前的计划“反攻小岛”，蒋介石已吊不起什么胃口，但也不能表示不干，当下陪笑道：“我想起来了，团长的意思是，要我们这支苦练了几年的精兵，按照预定计划，出击挨着广东的福建东山岛？”

蔡斯道：“对对，是时候了！”

蒋介石一怔道：“怎么是时候了？你们在韩战场不好好地打，这 6 天之中，对方来了个反击，就解决了联合国 26000 人。李大统领 4 个多精锐师给击溃，对方阵地向前推进了好几公里，连战斗机都来不及起飞就给拿走，你们不但不加把劲支持李大统领的反对停战，反而还要与共党继续停战谈判。”蒋介石摇摇头道：“我对你们的做法实在不乐观。”

蔡斯冷笑道：“你说得对。可是你也忘了，突袭东山岛的计划，正是你们订下来的，也是你们要我们顾问团负全责供应装备、训练进攻的，老实说，这种帮助完全为了你们打算。请问：突击一下有什么用呢？特别是那个小岛，你要我们美国海军去守的话，那是不可能的。不过我们赞成，因为这一来可以使自由中国的威信提高起来，可以使共产党顾此失彼。特别是今天，你既然明白我们在韩战场非常不利，那么为什么不可以利用突击东山岛的胜利，以呼应韩国战线，来振奋联合国声威，并且削弱共军对韩战场的支援呢？”

经蔡斯一说，蒋介石心里也跃跃欲试，企图为自己争回哪怕芝麻般大的“面子”，于是就顺水推舟道：“也好，既然团长这样有兴趣，我们自当按照计划办事。不过有言在先，第一，希望你们支持；第二，一旦登陆，最好占领，这一点就必须你们派出舰队，否则或许有变。”

蔡斯笑道：“第一点好办，这次出击的部队，从头到脚，从降落伞到运输舰，无一不是我们美国的东西。”

蒋介石插嘴道：“希望你们不但要派顾问去，并且希望多派几位去，因为我们没有陆海空三军敌前登陆和立体作战的经验，此外还希望派去的顾问在官街上要高些，这样可以鼓励士气。”

蔡斯在心头骂道：“这分明是要拖美国落水嘛，你这老狐狸！”嘴上却说：“顾问是一定要派的，而且人数也一定比前几次小规模突击要多，因为突击东山岛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军事行动。至于占领与否，要看具体情况，原则上恐怕还是不占领为妙。你大胜而归，声威不小，你给他撵走，就前功尽弃了。”

蒋介石道：“那么，舰队……”

蔡斯笑道：“第七舰队当然是防卫台湾的，要它出动，还得问问白宫。”

蒋军将领认为袭击必胜

送走蔡斯之后，蒋介石立即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会上，众将领都认为这番出击，没有理由失败，因为东山岛上并无正规军防守，而且孤立海中，来个突然袭击，对方必定措手不及。于是，个个摩拳擦掌，仿佛不战也能“攻克”。

受此气氛感染，蒋介石也颇为兴奋，道：“我们来到台湾，已经五个年头，再不显点颜色给他们看看，我们也太对不起‘南朝王师’的大陆同胞了！我们一到东山岛，岛上老百姓一定盛情欢迎，风声远播，那么我们反攻大陆便更有望了。而且联合国军正在前线受挫，我们这次胜利，定必大收鼓励士气之效。”说到这里，蒋介石仿佛看到了青天白日旗已插上东山岛：“你们凯旋回来，美国的贺电也跟着就到！你们别忘记我们在南韩争取战俘归来，目前困难重重。虽然三方面合作，把不肯来台的共产党打死了很多很多，但是我们不希望把他们都弄死了，如果他们知道我们东山岛大捷，这批战俘便很可能到台湾来了。总而言之，这一次你们出击的意义重大，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定个日子出发吧！”

经研究，会议将袭击日子定在7月16日，出发地点包括金门、左营等地；计划海路动用兵力一万余人；另遣200余名伞兵助战。

出发前空军侦察报告：“东山岛上有部队”，但美、蒋双方研究结果，认为共产党忙于抗美援朝，区区小岛，不可能驻有重兵；攻其不备，必操胜券。再说，这番出击动用了飞机、军舰、伞兵……必获全胜，于是按照原定计划汇合，乘着明月将圆，视野辽阔，纷纷准备登机下船。

空降部队首次出动

7月16日凌晨，200多名伞兵在台湾新竹机场集合待发。机场上，一位美国军事顾问正不可一世、趾高气扬地对他们训话：“你们是精锐之中的精锐。再过两小时，你们脚下便是东山岛的土地，便是共产党的土地，你们英勇地降落之时，便是共产党溃败的开始！”

“记得在空降训练之初，我们分两方面进行，一方面是你们大规模的空降；另一方面是特殊训练，个别的或者是三三两两地空降，但两者的目标相同：大陆！想当年你们中间有跌破头的，有跌断手的，甚至还有好几名牺牲了的。可是你们便是最好的证据：自由中国是可能建立空降部队，这使我们美国朋友十分兴奋，同时对推翻北平，也增加了信心。

“为什么我们要出击东山岛，我想我们必须弄清楚：在众多理由之中有一点：就是为了给韩国战场获以鼓励！我们攻占了东山岛，意义重大，等于在韩战场打了个大胜仗——不，超过了在韩国打个大胜仗！”

“现在，你们该检查一下全身的东西，像我们著名的球队出赛那样，希望你们的心情不必紧张，要把周身的细胞都松弛下来，直到跳离机舱之前，才把精神集中起来，并且运用你们的智慧和武器！”

最后，那位军事顾问得意忘形地说：“这是反攻大陆的第一天，也是伞兵出动获得胜利的第一天。预祝你们胜利，我们等在机场上欢迎你们胜利归来！……”

伞兵总队长顾保裕也要求部队“不成功，便成仁”。

4 时整， 16 架军用运输机在新竹起飞，直飞位于西南方向的东山岛。

这批伞兵被认为是蒋介石的“血本”。他们都经过美军长期的精心训练，从头到脚都是美国装备。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在抗日战争时就开始受伞兵训练，有的已经是 10 年以上的“老兵”了。这次窜犯东山岛前，策划者首先在伞兵内部苦心拼凑，然后又把他们集中起来专门训练。据后来被俘的国民党伞兵中尉分队长张永春和少尉分队长张建民说：“在窜犯东山岛前，美国在台湾的所谓军事顾问团人员就紧张起来，给伞兵‘紧急授课’，传授所谓爆破术和美式通讯器材的使用法。7 月 1 日，伞兵就在美国军事顾问团指导下进行了‘沙盘演习’，7 月 8 日又在台湾八德飞机场举行‘菱形岛’（东山岛如菱形）降落大演习，演习时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蔡斯和蒋军空军司令王叔铭都在场

打气。”

胡璉指挥万人抢滩

在伞兵出动的前一天，7 月 15 日 21 时，国民党军金门防卫部上将司令长官胡璉，率领 45 师（欠 133 团 2 个营）、18 师 53 团和海匪 1、2 突击大队等部计万余人，分乘舰艇 13 艘，由金门启航驶向外海。

胡璉是 1949 年 10 月底人民解放军攻打金门岛失利后发了官运的国民党陆军上将。在国民党军界，他虽被讥为“匹夫”，但金门岛一战后，他几乎比任何一位国民党军星都耀眼夺目。所以，突袭东山岛这一国民党军的“反攻大陆前哨战”就由胡璉来指挥了。

胡璉久经战阵，小心谨慎。他认为位于泉州的解放军要增援东山岛至少需要 3 天，其间最关键的又是漳州附近被国民党飞机炸毁的九龙江大桥，因为在泉州到东山岛 270 公里的道路上，九龙江大桥地扼要冲，此桥未复，泉州援兵便不能南下东山；援兵不到，他便有 3 日内拿下东山的把握。

7 月 14 日中午，他在得到空军关于九龙江大桥仍未修复的报告后命令开始行动。

夜色中，舰队在悄悄地航行。指挥舰上，美国顾问不可一世。他双手撑腰，立在舰桥上训话道：“再过几十分钟，我们就不可能说话、亮灯，发出不该有的声音了。

“当天明之后，当我们展开拂晓攻击的同时，我们的空降部

队会及时来到，当我们海陆空三军的立体战斗、敌前登陆成功时，东山岛上便会飘扬着我们自由中国的旗帜。我把摄影能手带来了，希望他在诸位努力作战的时刻，可以拍摄到很多沙龙！”

听完训话，士兵们且有另一种预感，有人说：“东山岛上没有守军，这个消息值得怀疑；后来有人说侦察机发现了部队，我

们又该怎样调整火力？”

一个连长道：“管他妈的，反正东山岛一点儿大，我们可有万把人登陆，怕什么？”

另一个排长说：“话虽这样讲，可是共产党的民兵很有几下，我们也不能不防。”

连长道：“没什么，咱们也好久没动了，也该出来活动活动。

开开洋荤啦！”

那万把人偷偷摸摸来到东山岛前，按照预定计划，要在月亮下去之前，不但建立滩头阵地，而且要占领制高点。16日4时40分，从台湾起飞的运输机和歼击机掠过胡璉编队上空。此时，登陆部队也已换乘完毕，胡璉命令部队抢滩。

海防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东山岛是福建的第二大岛，面积为165平方公里，人口约83000，是闽南的海上屏障。驻守东山岛的是解放军公安80团两个营（欠1个连）。

国民党军在金门的异常动向为当时设在上海的华东军区指挥机关获悉。7月15日23时，华东军区通报：

金门匪首胡璉亲率正规军4个团、海匪4个大队，在海空军配合下，于15日晚9时自金门出发。

福建军区首长判断，敌若往北，可能突袭南日岛、平潭岛，往南则可能突袭东山岛，因为它们距金门均约150公里左右，正好是一夜航程。其中敌最可能攻击的是东山岛，其次是平潭、大嶝及厦门岛。

16日1时，福建军区首长决心：如果敌进犯平潭、南日、大嶝、厦门，驻军坚守，后续驰援；如果敌进犯东山，守岛部队则在抗击后撤离，因为东山岛面积大而兵力太少。福建军区首长对东山岛守军特别指出：留1个精干营进行机动防御，非战斗人员在拂晓前掩护东山县党政人员转移出岛，守岛部队如遭敌优势兵力进攻，可相机转移。

16日4时50分，我东山岛驻军公安80团团长游梅耀，正根据上级命令组织撤离，忽然接到敌在岛北八尺门渡口附近上空空降的报告，游团长立即命令该地的水兵1连，坚决守住渡口，他将立即派兵增援。话音刚落，又报敌在岛南的亲营登陆，有千人之众。游梅耀略作思忖，知道来者不善，因为敌动用伞兵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敌伞兵封闭了八尺门渡口，按原计划撤离东山已不可能，岛上人员只有坚守待援，于是他命令位于八尺门渡口对面的陈岱的团后勤派兵渡海南来，支援水兵连打敌伞兵，这一招起了重要作用。

上级同意游团长坚守待援的决心，并命令就近的272团驰援东山，命令泉州附近的82师等部火速增援。中央军委也命令广东军区的122师急速东进，配合作战。

伞兵降落后林村

在我军各级指挥所文电往来，调兵遣将之际，东山岛上已是一片火海。

4时45分，正准备撤离的水兵一连官兵大部已上船，岸上只有连长和6名水兵，当发现敌伞兵在后林村西山降落时，他一边命令岸上水兵返回仓库拿机枪，一边向游梅耀团长报告情况，并派人把上船的士兵叫下来。

三五分钟后，水兵连7人手中的4挺机枪一齐对空开火，敌机队形被打乱，跳伞高度也从200米上升到1000米，降落次序混乱，有的掉落海中。

6时许，后林村的民兵也加入作战，他们一起依托300多年前民族英雄戚继光抗击倭寇时构筑的古寨断垣，寸土必争，与敌伞兵展开血战。

8 时许，公安 80 团后勤派来的 1 个排在八尺门渡口登陆，与水兵连一起作战，控制着渡口。

敌伞兵本来信心不足，经我军一阵打，就更加慌张了。据被俘的伞兵中尉分队长张永春说：“解放军的对空射击火力真猛，打得飞机不敢低飞，有的飞到两三千米以上的高空就慌慌张张地把伞兵丢下了。我领跳的时候就觉得事情不妙。”敌伞兵一大队重兵器中队二分队中士副班长邱新林慌得着地时连基本动作都忘记了，一下子就扑跌在地上，上胸受伤，我军俘虏他后，马上把他送进医院进行紧急治疗。他说：“我在跳伞时就知道凶多吉少，但想到不跳下来回去也是给枪毙，只得闭着眼睛朝下跳了。”

在我军炽烈而有组织的火力射击下，有的伞兵没有碰到东山岛的一块地皮，就在半空中断了气，变成“空中僵尸”摔到地上，有的带着伤跌落下来。

侥幸不死的蒋军伞兵乱七八糟地降落在岛上后林一带山区。他们还没有站住脚，岛上的人民解放军、民兵和人民群众就立即向他们展开了严密的围剿。

登陆部队进展困难

胡璉部队登陆不久，伴随着一阵军号，守军枪声四起，将那匍匐行进之际，辛辛苦苦进得几尺的蒋军，一下子逼退回沙滩。

眼看就要下海。美国顾问当下要他们集中兵力，夺取高地，同时利用东山岛四周是海的特点，避实就虚，改变目标，硬攻强占。

接下的情况，使美国顾问不禁烦闷。他拿着望远镜，立在舰桥上遥望战场，队伍虽然是登了岸，但伤亡惨重，没法登上山顶。

“怎么搞的？”美国佬问舰长道：“这样打法，还谈什么反攻大陆？”

那舰长道：“不过据我所看到的，今天这一仗如果说他们打得不卖力，那真是不公平了。”

美国佬喃喃地骂道：“我不管什么公平不公平，我们的工作是要你们登陆成功！”他皱眉：“你瞧，整个小岛还有多大？天不亮就登陆，狗娘养的到此刻还没有结果。”

那舰长又急又气，回答道：“你瞧那个方向，仰攻，侧攻，空中扫射，实在打得很惨，我们这一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美国佬狠狠地说：“我总怀疑你们的战斗意志。”

舰长道：“这次实在不能怪我们了，人都是百里挑一挑出来的，个个生龙活虎，武器配备都是你们最好的，此外还有伞兵和舰艇，今天如果不能得手，那真是不可思议。”他满有把握地说：“我想你不必着急，再过一会，就可以看见山顶飘扬起青天白日旗帜。”

那美国佬还没开腔，惊天动地一声响，一艘小型登陆艇已遭击中，爆炸起火，迅速翻沉；美国顾问顿脚道：“脓包哪！脓包，怎么搞的！怎么搞的！”

那舰长一听，心都寒了。正待说些什么，空中又一声爆炸，一架战斗机也遭击中，爆裂开花，两个火头向山上垂直坠落，把那舰长看得呆了。

美国佬狠狠地说：“这不行，得赶快想办法，把第二线开上去！”舰长当下传达命令，第二线兵力接着涉水上岸，匍匐行进没有几步，又给炽烈的火力压了回来。

蒋介石坐等“胜利”消息

二股部队出动后，国民党设在上林的电讯总站便开始忙碌，工作人员里里外外，跳出跳进，紧张等待东山岛登陆消息。蒋介石在黎明前稀里糊涂醒来，问：“登上东山岛了没有？”手下告诉他：“刚才来电报，说东山岛已经在望，他们都准备好了”

蒋介石没法再睡，干脆起床在厅中守候。蔡斯、蒋经国等人早已凑在一起，有的吸烟，一支接一支：有人喝咖啡，一杯接一杯……

踌躇满志的蒋介石所听到的战情报告不外是：“战况激烈，伞兵也已投入战场，收获极大。”就是：“这一次把他们杀了个措手不及，我们一上去就占便宜。”

消息无一不对自己有利，可是时已过午，还接不到占领东山岛的消息，蒋介石开始忧心忡忡了。

蒋经国安慰道：“一定是因为我们侦察机去了几次，引起他们注意，临时增加了兵力，因此延长了我们攻占的时间。”

蒋介石心头老大一个疙瘩，绕室徘徊，感到花了这么大“本钱”竟不能当场见效，迷惘忧急，不可思议。

“前线指挥部”来的报告，仍然对攻方有利，可是时已入晚，还不闻占领东山岛消息。蒋介石面对那幅沿海地图，眼见东山岛在上面只是一点儿大，但出动一万多人，海陆空三军“立体攻击”竟然毫无办法，而且飞机已经毁了两架，小型登陆艇也已沉了3艘，伤亡数字虽未报来，但估计不会太少。如果真的大败而归，那今后在美国人面前更是无法抬头。

蒋经国的情况比他还窘，因为蔡斯就坐在他的身边，每一道电报，每一个字，他都极端重视，不是说：“怎么回事？”就是说：“得想办法！”把蒋经国窘得无法回答。蔡斯忽地叹道：“瞧模样，那些伞兵都完了！”

孙立人道：“不至于吧？”

蔡斯道：“如果伞兵还在作战，怎会到此刻还没登上山头？伞兵当然降落山头，不可能降落海里的。”

接下来没人愿意多说一句话。只听蔡斯哇啦哇啦，吹二次大战时美国兵的登陆与作战，统帅如何了得，将领如何机智，部队如何勇敢，战斗如何激烈，无一不反衬了蒋介石的无能，以及美国最新配备放在蒋军身上是如何“可惜”。

蒋经国悄悄地命电台给东山前线发了个急电：

限即刻到，×密。东山岛之战关系国际视听，务盼协力以赴，于黎明前予以攻占。

中正

那前敌指挥接到电报，真是万念俱灰，不知如何是好。拂晓突袭竟未得手，已经凶多吉少了；整整一天毫无成就，意味着这一仗只得准备开溜；夜间对方生龙活虎，能不被歼灭已属万幸，如今竟要他们在黎明前占领，岂非笑话？

战斗英雄黄飞龙

早晨的雾还没有消散，从海上传来马达声。突然一颗一颗蓝色的白色的信号弹，透过薄雾，指向天空，敌人的坦克爬上来了，敌机在天空掠过，敌人的大炮盲目地轰击着。

“同志们，沉着地打，争取为人民立功。”这简短有力的话，是守岛部队6连狙击排火力班副班长黄飞龙在动员战友们。

大约有一个排敌兵爬上来了，标尺1500米，1300米，1200米……

敌人已落在我军的火力网中了，“打，狠狠地打！”黄飞龙立即下达射击命令。

重机枪吐出愤怒的火舌，敌人成批地倒下去了，滚下去了，敌人被打退了。

敌人恼羞成怒，又拼凑更猛烈的火力，向我阻击班轰击。他们以一个连的兵力，继续向我军阵地运动，敌临近我军阵地时，重机枪又开火了，敌人又被迫退了下去。

战斗激烈地进行着，重机枪猛烈地吼叫着，黄飞龙突然发现机枪防火帽快要掉了，这样，喷出的火苗就会增大，敌人就会很容易发现机枪阵地的位置。

怎么办？这时机枪打得快发红了，热度很高。黄飞龙毫不犹豫，用右手握着防火帽，一阵剧烈的刺骨烧痛，使他全身抖了一下，他咬紧牙关，拧紧了防火帽，右手烫起很多的泡。

敌人不能从西南方向攻下重机枪阵地，便从东北方向运动，企图从我方阵地后面来压制我军。黄飞龙立即指挥全组转移射击方向，架好机枪，瞄准时，才发现前面有一片荆棘挡住视野。在敌人炮火不断的轰击下，黄飞龙奋起跳出阵地，顾不得刚才的烫伤、荆棘的刺痛、鲜血的流淌，用双手排除了障碍。重机枪向着敌群又怒吼起来。

激烈的战斗中，黄飞龙的重机枪组，配合阻击排，连续打垮了敌人五次进攻，钉住了敌人4个钟头，给我军歼灭敌人创造了有利的战斗条件，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

通讯员传来转移的命令。接下来，阻击排最重要的任务是抢先占据一个黑色石头的山岗。黄飞龙立即组织全组转移，途中，正射手腿部中弹，黄飞龙立即抢前扛着机枪筒，继续前进。

当他们到达一个小山头，刚架起机枪要打时，一颗炮弹打来，副射手又负伤了，他吩咐副射手撤到安全地方去。这时，他感到自己的头上一阵痛，血顺脸往下流，滴在衣服上。

眼看着自己亲爱的战友被敌人打伤、牺牲，旧仇新恨，涌上心头。他回过头往下看，敌人正拥爬上来。他忘记了伤口的疼痛，抓住机枪向敌人一阵猛烈的扫射，压得敌人不能前进。

突然，“克擦”一声，机枪不响了，机枪子弹打完了。

敌人又涌了上来。这时，黄飞龙迅速地摸出了最后一颗手榴弹，拉开导火线，像巨人一般站立起来，扑向敌人。“轰”的一声巨响，在敌尸四飞的时候，英勇的黄飞龙为祖国光荣地、壮烈地献出了生命……

战后，福建军区政治部整理黄飞龙烈士事迹上报，经华东军区政治部批准，追认黄飞龙烈士以“福建军区战斗英雄”的荣誉称号。

公云山高地阻击

7月15日深夜，警惕地守卫在祖国福建东山岛上的人民解放军某部第2连的连部里，举行了紧急会议。

“……情况就是这样。准备战斗。”连长郑德修用简短的命令结束了会议。

祖国海岛上的村庄依旧十分安静。战士们用熟练的轻捷的动作，迅速进入公云山高地，指挥员周密地检查了兵力的配备和布置的火力，战士们又一次擦拭始终保持着洁净的武器，大家满怀胜利信心，准备痛击敢于来犯之敌。

16日清晨5时，1000多蒋军向公云山高地涌来，激烈的战斗打响了。第2连的指战员们接到团长的命令：“坚守公云山高地，把敌人钉住在高地前面，等兄弟部队上来围歼！”这是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回答团长的是连长郑德修的坚决的声音：“请首长放心！”

从上午9点钟开始，敌人在炮火掩护下，向公云山高地进行连续不断的攻击。当敌人接近公云山高地的时候，突然遇到了解放军战士们猛烈的射击和手榴弹，敌人没来得及还手，就连死带活的滚下山去。以后敌人几次冲锋也都被打垮了。

2连6班的阵地，在公云山高地西部左边的山腰间，是战斗最激烈的一个地方，敌人对这里的轮番冲锋几乎一直没有停息。在紧张的战斗中，副班长江顺珍负伤了，战士王旺炎接过副班长的机枪，把爬上来的敌人扫了下去。枪管打得烫手，他脱下鞋子垫着打。下午，王旺炎也负了伤，子弹穿透了他的腰。但是他知道，现在6班的同志们，一个人挡着十几个敌人，少一个人就少一份守备力量，他包扎了伤口，英勇地继续战斗。

6班的勇士们一次又一次的打退了敌人的冲锋，成批地杀伤了敌人。这时候，阵地上飞快地传播着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

“兄弟部队打得真漂亮，敌人伞兵一下就给我们歼灭啦！”

战士们欢欣鼓舞地互相保证说：“我们也一定把敌人钉在这里，最后歼灭他们！”

黄昏，战斗更加激烈起来，高地周围的交通壕被敌人占领了，山头上硝烟滚滚，敌人借着烟雾从正面和侧后爬上山来。

战士们知道坚持到底就是胜利，他们利用点滴时间不断地从敌人死尸身上搜集子弹，把六〇炮弹的保险针拔掉代替手榴弹，负伤的士兵继续坚持作战，文化教员、炊事员也赶来参加战斗，敌人在2连英雄们面前依旧被打得头破血流，垮了下去。这时，兄弟部队某部12连迅速赶到，团指挥所调来的火炮排也到达2连阵地，大大地鼓舞了2连指战员们的胜利信心，也大大加强了坚守公云山高地的力量。

敌人当晚几次绝望的进攻，又被打退了。英雄的公云山高地，真像擎天的铜墙铁壁一样，使疯狂的敌人不能前进一步。

一网打尽敌伞兵

东山岛我军被围、被分割，进行浴血奋战之际，福建、广东朝东山岛方向的各公路干线都战车滚滚，各增援部队纷纷赶赴战区。

泉州、漳州沿线的地方客货运输车辆纷纷向泉州、漳州集结，车上的旅

客就地下车，货物卸在路旁，后面的车辆继续前进。

漳州附近的九龙江大桥，14日中午敌机侦察时尚未修复，但晚上工兵们已把桥板架好，所以战斗一打响，我军的汽车源源而过，很快向东山集中。

我军援兵部队最先上岛的是272团3营。他们于10时30分上岛后，协同公安80团部队，牢牢控制了八尺门渡口，但岛上敌我对比，仍是10比1，战斗仍然激烈紧张。

但我军勇猛迅速，蒋伞兵根本无法集合整队。降落在山里的蒋伞兵乱得东一团西一堆，有的盲目打枪，有的干脆藏到山沟和石缝里去。我军副排长林士墙带着几个战士向前搜索，发现有两个蒋伞兵正在胡乱地射击。副班长谢感猛地从他们侧后扑去，林士墙从正面冲上去。林士墙大喝一声：“缴枪不杀！”一个蒋伞兵慌忙丢枪投降，另一个还想挣扎，林士墙举起枪喝道：“你想死！？想活！？”这一个伞兵也就乖乖地放下了武器。

11时左右，我军分割包围了所有的蒋伞兵，岛上的民兵和群众也张开了搜捕伞兵的天罗地网。我军某部5连4班赶上一座山头，刚到上面，一群蒋伞兵也拥了上来。4班战士扔出一串手榴弹，敌人就连滚带爬地逃下去了。

4班长带领战士跟踪追击，追到山脚下，忽然一个敌人也不见了。4班长突然向着稻田大声喊道：“不要躲了，赶快缴枪！”马上有两个伞兵拖着浑身泥浆从稻田里爬了出来，其中一个一面爬上田埂，一面还在撕着帽子上国民党党徽。4班抓了两个俘虏后，又继续进行搜索。他们发现在路旁又有一个奇怪的土堆。战士许庆森立即上去扒了一下。这个“土堆”忽然动起来，一个从头到脚都涂满了泥土的伞兵爬起来投降了。

就这样，东山岛上的人民解放军、民兵和群众从所有的角落里，把蒋伞兵一个个搜出来。前后不过八九个钟头，200多个蒋伞兵就被一网打尽。号称蒋军“精锐之中的精锐”就这样一败涂地了。

台湾吹嘘“东山岛大捷”

八尺门渡口血战之时，国民党军登陆部队终于在亲营、湖尾村上了海滩，他们以21辆水陆坦克为前导，很快占领了东山县城。游梅耀根据收拢部队、坚守主阵地的决心，命令各前沿部队迅速收缩，与主力汇合，但由于敌进展较快，1连1排被困于马鞍山地段，全部牺牲；1连连部及2排被困于官路尾，也无一生还；县公安大队也因未及时转移被围，伤亡过半。但千方百计回撤到位的部队坚决扼守主阵地，打退了敌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16日午后，东山岛除公云山、牛犊山、王爹山三个主峰和八尺门渡口共约三四平方公里的地方仍在我手外，其余均陷敌掌。这时胡璉已迫不及待向台湾报告，他已夺占东山岛，台湾开始祝捷，吹嘘“反攻大陆的序幕已经拉开”，“东山岛大捷”，“东山岛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云云等。

然而，坚守公云山高地的公安80团2连，不畏敌人的三面包围，仅凭7个土木堡，200多米长的堑壕和长不足百米的土坑道，已打退国民党军18次冲锋。272团12连前来增援后，他们又一起击退国民党军13次冲锋，天黑时公云山高地前躺着413具敌人的尸体。

坚守牛犊山主阵地的公安80团5连、6连互相配合，当敌一度夺取前沿部分表面阵地后，他们组织力量反击，夺回阵地，尔后又打退敌一个营的5次冲击，毙敌200余人。

进攻王爹山主阵地的国民党军，也始终未能突破核心阵地。

16日入夜后，战斗仍十分激烈。因解放军增援部队仅272团3营上了岛，其余仍在赶赴途中，岛上我军兵力越来越少。

东山岛战争落下了帷幕

16日23时，敌指挥机构在3路主力部队进攻均无大的建树的情况下，决定加强兵力，孤注一掷，将一直充做预备队的53团投入战斗，妄图以此在天亮前拿下我军这3处主阵地。

然而，台湾军事当局的如意算盘还是落空了。7月17日凌晨，我军增援部队272团接替了公安80团的阵地，而28军的82师和41军122师先头团等大部队已渡海进入东山岛。

41军122师先头团——365团登岛后，即于凌晨5时向王爹山方向的敌军展开攻势，以减轻我主阵地的压力。28军82师244团登岛后亦以迅猛的动作从左翼发起冲击。

登岛后曾一度幻想凭借优势兵力攻占东山岛的国民党军，此时已感到战局正朝着于己不利的方向发展，为避免被我军分割包围，遂决定收拢部队，寻找有利时机尽快突围回撤。

鉴于敌军已经动摇和准备溃逃，福州军区指挥机构果断地决定，不待增援东山岛的部队全部到齐，即刻命令已登岛部队向敌军发动全面反击。

反击作战的具体部署为：我登岛部队分西、中、东三路方向出击，最后聚歼登岛之敌于湖尾以西地区。

西路攻击部队由41军122师365团与121师361团三营组成，中路攻击部队由31军91师272团组成；东路攻击部队则由244团组成。

三路攻击部队中，打得较为艰苦的为东路的244团部队。

因此路方向的国民党部队担负着掩护主力部队回撤的作战任务，故尔拼死凭借险要地势顽抗。

当244团追击到柯塘山时，遇敌两个连兵力的阻击。敌人居高临下，而该山又陡又滑，担任攻击任务的该团2连1排，两次发起冲锋后，即仅剩下能够坚持战斗的9个人。再度攻击时，又被敌构筑的地堡火力打得难以行动。

眼见追击受阻，5班长张学栋，为了保证进攻的胜利，决心与敌血战到底，不顾随时都可能牺牲的危险，端起机枪直扑敌阵，直冲到距敌地堡火力点10米处时，浑身上下已7处负伤。张学栋随手向敌堡投去一颗手榴弹，将敌机枪炸哑，当他艰难向前爬动的时候，敌人火力点的机枪又响了。这时，伤势严重的他，在手榴弹和机枪弹夹里的子弹全部扫光了的情况下，没有丝毫的犹豫，一面呼喊战友们勇敢冲锋，一面挺立起来，朝着敌人地堡扑了过去，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死死地压在敌人的射击孔上，为战友们夺取柯唐山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1953年7月17日下午6点，我军三路反击部队逼近了湖尾沙滩。

登岛的国民党士兵，眼见大势已去，唯恐被我军歼灭，纷纷拥向海边，争相夺船逃命。而前来接应的敌海军舰艇上的官兵，见状也慌了手脚，有的未等装满溃逃的敌兵，便抢着起航急驶。结果，被扔在沙滩上的部分国民党军士兵只得向我反击部队举手投降。

1953年7月17日下午7点，保卫东山岛的战斗落下了帷幕。

7月19日中共福建省委员会、福建省人民政府、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联合组成慰问团，由福建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孟东波率领，前往东山慰问人民解放军海防部队和协助部队作战的当地居民，慰问团带有大批慰问品和慰问信。随同慰问团前往的还有福建省京剧团、公路文工团、闽南文工团和7个电影放映队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政治部，也在18日派出该部文化部部长蒋峻基，带领来福建演出的华东军区解放军剧院话剧队、福建军区文工团歌舞队和电影队并携带大批慰问品和慰问信，前往东山慰问海防部队。

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

东山岛战斗，我军共歼灭国民党军3379人，其中打死打伤2674人，俘虏715名，炸毁坦克2辆，击沉小型登陆艇3艘，击落飞机2架，并缴获轻重机枪109挺、无后座力炮2门、六〇炮26门、火箭筒18个，还有大批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

东山岛战斗胜利后，中央军委打电报嘉奖参战部队。

毛泽东评价说：东山岛的战斗不光是东山的胜利，也不光是福建的胜利，而是全国的胜利！

台湾的“检讨会议”

东山岛战斗结束后，蔡斯急忙前往慰劳美国顾问，并从那里聆取“溃败经验”。顾问们抱怨蒋介石的部队万分不济，有人说：

“从装备和训练来说，决不在共产党之下，而在共产党之上，因为美国的东西总是世界第一流的；但在士气方面。蒋的部队就远不如共产党，有如李承晚的部队那样，一触即溃，像一根糖做的手杖。”

蔡斯却想起了朝鲜的美国兵，也是一根糖手杖！便说：“到底损失情形如何？”

另一名顾问掏出小本子道：“也真可怜，一万多人去，只得七成回，一路上和各舰舰长料理善后，至少有3400名官兵出了事，包括伤亡2660人以上，被俘700人以上；途中不治或跳海自杀……”

蔡斯问：“还不到两天，从出发到归航才37小时，就死了这么多？”

“度日似年！”又一名顾问诉苦道：“这种样子的战争，守在台湾比出击好几万倍！我们一分钟一分钟挨着，实在难受！”

“其他损失呢？”蔡斯问：“今天一早，他们还敢在报上吹牛，说是他们准备最久的一次攻击，我看这该是最惨的一次攻击了！”

众顾问皆叹气，一个说：“其他损失也不小，2架飞机、3艘小型登陆艇也没有了；轻重机枪100多挺、无座力炮2门、六〇炮26门、火箭筒18个也没有了，还有其他大批枪支弹药和军用物品。这位‘运输大队长’，当着我们的面，又把大批美援转送给共产党了！”

而最使蒋介石难堪的，莫过于双方的“检讨会议”了。他没有出席，但蔡斯的声音还是很快就能传到他耳朵里。

“这是不能想象的。”蔡斯双手撑桌，一顿教训道：“准备了好几年，比二次大战中的邓苟克战役还充分，我们却打败了！在这么一个小小的岛上，

对方措手不及，防卫力弱，驰救困难，武器落伍，可是居然把我们进攻的精兵打了个七折！”他一顿：“而且我们并没有占领，甚至没有到达高地，就给人家从海边到山腰，打了个落花流水！”蔡斯歇了片刻接着又道：“让我们冷静一下吧！报上说这是‘国军准备最充分，兵力最强大的一次攻击’，我看我们错了，不但报上不该发表，而且也不能这样发表。”

他冷冷地瞅一眼蒋经国铁青的面孔：“我不打算在这时候研究新闻稿，我只想和大家研究一下：为什么我们败得这样惨！”他一顿，又一扬手，道：“首先我想起的，是你们说的：东山岛上居民一旦发现国军进攻，必然起来帮忙打共产党，而我们也必然在里应外合的情况下，攻占目标、消灭敌人——”他又一顿：“可是事实如何呢？据顾问们、舰长们在舰桥上望见的，当地老百姓迎接我们的是打击而不是欢迎！甚至有些女人，望远镜中可以看见她们挑着木桶，艰难地在流弹中向守军行进，没有问题，她们是尽了供水送饭的责任，请问她们这样做，说明了一个什么严重的问题呢？你们对敌情太糊涂！东山岛驻军数字到现在还不清楚，而岛上的民心如何，你们更是糊涂！”

蒋经国垂首无语。

“其次，”蔡斯道：“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出击？大家明白，除了表现国军的力量之外，主要是予高丽前线以鼓舞！”他双手一摊：“如果我在高丽前线，听到这一仗的结果之后，心情恶劣，无以形容，我是如此，其他的人心情还需解释？”蔡斯哀叹一声，接着又说道：“我们的头面都打肿了，如果今天还有人惋惜国军没有参加韩战，乃引致韩战之糟；不如说国军幸亏没有参加韩战，否则韩战的溃败，恐怕会提早！”

蔡斯的这番话简直比刮蒋家父子几记耳光还令人难堪。在座的人没一个敢吱声，甚至连大气都不敢透一口，蔡斯扫了一眼与会人，绷着脸道：“我无意抨击任何一方，我只是沉痛地说明：就因为中共主力在高丽前线，我们才有更大的信心突击东山岛；如今韩战一旦停止，共军回师大陆，必然也会增强沿海兵力，到时候请问国军又该怎样反攻？怎样出击？怎样有信心杀敌？——呵，朋友们，问题实在严重之极！”

会场气氛十分窒息，但蔡斯好不容易抓到了一个痛击蒋介石的机会，怎能轻轻放过？便喋喋不休道：

“而且，据顾问报告，有一个连几乎没有经过战斗，就给中共包围、缴械、俘虏了，美国武器在这里并没有好好运用，却出现了这么严重的现象，请问这是为什么？”

凝重的气氛中蔡斯再问：“到底为什么？”

还是无人答复……忽地蔡斯大声说：“如果没有人回答，我可要说了！”

蒋经国闻言，有如巨雷劈顶之感。

“士气问题！”蔡斯道：“严重的士气问题，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他痛击蒋家父子的“军中政治工作”道：“我们知道，军中政治工作万分重要，而其主要任务，在于告诉他们为什么要反共？怎样去反共？东山岛之战则暴露了我们军中政治工作的空虚！”他加一句：“我们要改善！”

众人闻言皆惊，意味到这不是什么“反共”问题，而是美方要对蒋“逼宫”的问题了，正窒息间忍无可忍的蒋经国起立，发言道：

“谢谢蔡斯团长的意见，”他的声音发抖：“我们是要改善！我们的军中政治工作做得不好，我们是要改善！”

众将领紧张地听他说下去：

“可是，请各位原谅我们的苦衷，”他咽口唾沫：“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叫做‘胜败乃兵家常事’，譬如美国，这是一个使我们尊敬的国家，他们的军事天才，真是精彩之至，他们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但在两次大战中，他们也有失败的教训，特别表现在敌前登陆，美国历史上的失败例子也不是一个。”

气氛似乎变得更紧张，简直要爆炸。

“拿韩战为例，”蒋经国道：“这两天打得更糟，美国的朋友公开承认，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战败！是么？”

蔡斯的面孔绷得更紧。

“而今天的消息说，李大总统希望扭转局势的这一仗，败到天地失色，数以百计的美国顾问失踪了，再也没有回到部队，请问：我们能责备这些美国顾问失职么？讥讽他们无能么？埋怨韩国部队是草包么？……”

蔡斯拼命抽烟。

“不能！”蒋经国大声说：“相反，我们要向美国致敬！”众人闻言皆愕。

蒋经国大声说：“致什么敬呢？那是因为在自由世界中，美国是反共的先锋，他们花了这么多钱、动用这么多人力、布置了这么多基地，他们反共再明白不过、并且举世闻名，因此我们要致敬！至于东山岛之战，主要虽然是国军，但更主要的是美国的力量！训练这一万多人的，是美国！装备这一万多人的，是美国！领导这一万多人的，是美国！策动并且主持这一次攻击的，是美国！而失败之后，并不以为气馁而继续要领导反共的，还是美国！”蒋经国咬牙道：“请问美国有这样坚决的信心，难道我们不应该向他们致敬吗？”

这一席话，分明把美国“得体”地挖苦个够，把蔡斯气得小胡子“波波”地响。他当然不把蒋家父子放在眼里，他趁蒋经国话音刚落，就起立说道：

“自从二次大战之后，美国在反共大业上的确出了好大气力，真是举世闻名。可是拿南韩来说，我们不能不引以为戒！南韩的李大总统是反共的，但他的手下却是反李的，请问诸君：世界上有比这个更严重的事么？”

众人闻言无法作声，万分紧张。

“一个国家，”蔡斯道：“只靠美国帮忙，自己没有办法，行么？蒋夫人有一次在做礼拜时，说过一句使我印象极深的话，她说：‘天助自助者’，这句话非常贴切！请问，一个不会说话、不会走路、甚至不会动作的瘫痪者，即使屋子里堆满了锦衣佳肴，漂亮的女人，甚至大批黄金，可是这对他有什么用呢？他不能自助的结果，只有加速自己的灭亡！”蔡斯狠狠地把胡子一捋：“今日美国也如此：无论怎样以反共为己任，但在需要援助的国家之中，如果都像韩国那样，我看是没什么希望的了！”他感到难以转圜，便接下去道：“我深信台湾胜过韩国，韩国的悲剧或许不至于出现在台湾，因为就双方动用的兵力来说，突击东山岛无论怎样失败，它的损失恁地也比不上韩国。”众人正透过一口气来，不料蔡斯急转直下道：“可是也有严重的，那是自由中国声望上的损失，这犹似台北报纸所宣传的：自由中国准备甚久、配备极好，却无办法对付那个蕞尔小岛，我怕天下人对蒋总统耻笑！”

蒋经国脸色铁青，却强笑道：“方今之世，美国第一，只要美国体谅我们的处境，同情我们的处境，那么区区东山岛之战，就不足挂齿、无人讥笑了！”

蔡斯恨恨地说：“不！”

在众人惊愕之中，蔡斯心想：“一不做，二不休，今天可要他好看的！”便强笑道：“为什么‘不’呢？因为是这样的：美国和自由中国的合作反共，真是水乳交融，团结无间，可这仅仅限于自由中国和美国政府之间，换句话说，中美两国的民间以及行政部门之中，对若干反共的措施，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是毋须解释，也不必存心躲避的。”他加强语气：“我们要重视这个事实！譬如刚才蒋主任所说的谅解，美国当然没有问题，韩国之战搞成这样子，美国还不是还在反共而不是反李？——可是请注意：这是美国政府的态度而不是美国全体官员、议员的态度，更不是美国纳税人的态度！”蔡斯透了口气，继续说道：“因此可以回答蒋主任的是：美国政府对自由中国是可以谅解、并且也应该谅解的，只是这不能代表美国朝野的态度。”

蒋经国冷冷地问：“那么，美国朝野对自由中国的意见又是怎样的呢？”

对于这个挑战性的问题，蔡斯心头骂人、嘴上却说：“这件事，我想这不但不是我所应该说的，而且也不是我所知道的。不过我可以把人家对韩国的意见提供参考，由于韩国不等于自由中国，因此所说内容不一定合适，请勿误会，而且事实上我也不能负责。”

众人有山雨欲来之感，听他有板有眼地指桑骂槐道：

“美国朝野对韩国的一般印象，认为他们虽然是在反共，但对反共所尽的力量，实在微不足道！美国花了这么巨大的气力帮助他，可是这一仗打得怎么样呢？抛开美国和联合国方面的情况不谈，南韩部队在前线所提供的不是一连串的大捷，而是一连串的大笑话！”

这分明在暗示老蒋的失败了，蔡斯捋捋小胡子道：“而在韩国政府之中，贪污之严重，军人之抓权，都是使人头痛的问题，我先声明我没有资格批评我们任何一个盟邦，我只是转达我们国内对盟邦的意见：南韩接受美援始终嫌少，但对美国希望他们能更民主一点，更自由一点的意见，却从未嫌多，其实他们根本在胡闹，于是出现了更多更多的笑话，而这是华盛顿所不能为他们洗刷的。”蔡斯提高声音：“美国确实在支持南韩，但南韩如果不能接受美国的规劝，甚至出现了类似独裁的政权，那美国无法估计南韩明天的发展，包括李总统个人的出路！”

这席话分明已经淋漓尽致，把蒋介石骂得不成体统了，众将领眼观鼻、鼻观心，对今天这个会的“估价”十分焦心。但蔡斯还是抓紧了李承晚的辫子，指着和尚骂贼秃道：“诸位诸位，我的话还没说完。讲到南韩问题之严重，一如自由中国的朋友所看到的，那只是上层有那么几个，与下层之间没有痛痒相关之处，也就是说：和全体军民的感情毫无联系。”蔡斯接着大叫：

“曾经有南韩的官兵在冰天雪地的前线，痛哭流涕道：‘我们在这里送命，为的是什么呢？’这句话太值得我们重视，因为凡是官兵认为这种仗对他毫无关系的话，如要争取胜利，那简直是奇迹。”

蒋经国冷冷地问道：“请问：美国官兵在韩国前线怎么想法的呢？”

蔡斯一怔，旋即冠冕堂皇地说：“美国官兵都明白：他们是自由世界赖以支持的核心，因此反共必须站到第一线，做一个榜样给盟邦看看。”他明白对方的弦外之音，接着说：“至于成败，那是另外一回事了，韩国前线连原子弹都用不上，也只好暂时便宜了共产党。”

见对方口风已软，孙立人生怕双方再也下不了台，便笑着说：“今天这

个检讨会很有收获，相信对今后的反共，有很大的好处。至于我个人的看法，因为我是负责训练的，感到东山岛之败，训练方面也存在着不少缺点，例如伞兵，盟邦帮了这么大的忙，把最有名的伞兵专家都调到台湾来，说明盟邦的帮忙，已经是至矣尽矣！我们应该抱怨自己的疏忽，例如这次伞兵的出击，出发前的练习是不够的。我们记得有一次跳伞演习，不少人距离目标很远很远，其中有几个甚至降落在什么地方也找不到，说明我们的训练有待充实。”

众将领知道孙立人在为对方转圜，一齐透了口气，但蒋介石获悉之后，好几天没平下这口气。

七百战俘获得宽待

据不完全统计，从 1949 年秋季至 1953 年 7 月近 4 年的时间内，台湾当局对大陆沿海地区进行的上百人至上万人的登陆进犯活动共约 71 次，出动的总兵力为 47700 余人，在作战中被大陆军民歼灭 7900 余人。

东山岛保卫战，是我军打击国民党军登陆突袭的最大一次作战行动。而台湾当局在这次登陆作战遭到惨重失败以后，便不得不变换手法，彻底放弃了“以大吃小、速战速退”的战略方针，从此仍以小股武装对大陆进行袭扰和窜犯。

这种小股窜犯活动，一直延续到 1965 年 8 月方才基本停止。

东山岛战斗中被我军俘获的蒋军官兵 700 多人，得到人民解放军的宽大待遇。

这批俘虏一到后方，我军就发给他们蚊帐、衣鞋等各种日用品和零用钱。病伤俘虏立即得到妥善的治疗。被俘官兵每天能吃到远比蒋军中丰富的食物。

头两个月，人民解放军就帮助许多被俘官兵和他们在大陆上的家庭取得联系，并分三批将部分被俘人员遣送回籍。

1953 年 10 月 12 日和 14 日，人民解放军又分两批释放在东山岛战斗中被俘的蒋军官兵，至此，在东山岛战斗中被俘的 700 多人中，已有 600 多人被释放，其余的也在以后一段时间里继续被资遣回家。

被俘的蒋军官兵非常感谢人民解放军给他们的宽大待遇。前蒋伞兵总队一大队二中队少尉分队副张念享说：“人民解放军宽待俘虏的政策完全和以前一样。我们被俘后官兵都得到同样宽大的待遇。现在，我们开始认清了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的罪恶本质，再不信他们的胡言乱语了。在短时期内，我们大部分人已接到了家信，知道了家乡安居乐业的兴旺景象。我庆幸从此可以重新做人并和家人团聚了。”

对所有被释放回家的俘虏，人民解放军一律发给他们充足的路费，家在北方的还发给棉衣。

第六章

西南边陲狼烟迭起，李弥率部频频入甯。
缅甸政府上书联合国，中缅联合打击残军。

第一节 云南和平解放

蒋介石赐怪宴

1949年，挥师西南的解放军势如破竹，所向披靡。至11月下旬，贵阳、重庆相继解放。这时，云南各地要求和平解放的呼声更加高涨。在城市里，工人、学生、街道居民都纷纷走上街头，散传单，写标语，举行集会游行，要求民主，要求解放；在广阔的农村里，革命活动也很活跃，到处流传着“桃花开，李花开，桃李百花开，迎接解放大军进山寨”的歌声。人民的呼声震动了三迤城乡。在这种形势下，早已同共产党取得联系的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一方面倾听人民呼声，停止征兵征粮，禁止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务活动，拒绝国民党国防部和西南长官公署等单位移驻昆明；一方面为慎重起见，又派周体仁去广州谒见叶剑英总参谋长，请求指示。

周体仁原是北平警备司令，1949年1月31日随傅作义将军起义后，9月底却悄然到昆明，住进他的好友、卢汉内弟龙泽汇家。开始，他守口如瓶，推说想家乡才回云南来的，后来他摸清卢汉也准备起义后，才对龙泽汇说：“朱德和叶剑英以前都在云南上过讲武堂，他们对云南十分关心，特地叫我来对你们传达此意，并介绍北平起义的经过。”随后，龙泽江把他引见给卢汉，多次商谈起义的事。之后，周体仁又奉卢汉之命去谒见叶剑英，叶剑英很高兴地接见了，并告诉他陈赓司令员和宋任穷政委所率领的第四兵团，已进军到南宁，要他赶快随军前往，并立即派人送他到南宁，随陈、宋大军入滇。

与此同时，蒋介石在加紧阴谋活动，仍想在成都、西康、云南作最后的挣扎。他一面命其嫡系部队胡宗南残部开进滇西，一面电召余程万到成都面授机宜，并任命余程万为兵团司令，以扩充26军的势力，还开始以昆明机场作转运站，运送主要人员和重要物资到海南岛。特务们更与26军和第8军连成一气，进行妨碍起义的种种活动。

其时卢汉在昆明，拥有两个军，一个是第93军，军长龙泽汇，是卢汉的内弟（卢汉夫人是龙泽清），国民党中央军校第八期毕业。以前是第93军第22师师长，参加过东北四平街战事，在义县升为副军长。国民党军败走东北前，龙泽汇还在南京，故未随卢浚泉、盛家兴被俘。回云南又任保安第3旅旅长，拱卫昆明附近。另一个军，则是余建勋的第74军。余也是云南人，原是云南保安第2旅旅长，一向在滇西保山、大理、永平一带。这两个军，前者是保安部的底子，后者也是由第184师掺杂地方团队组成。

12月6日晚11时，卢汉召集了一次紧急会议，出席的有杨文清、马谔、卮晓清和龙泽汇一共5人，商询起义的准备情况。卢汉说：“时机是紧急了，如等解放大军到威宁、盘县一带，我们才起义，那就太迟而没有价值了！”与会者听后，知道起义的时机已经来临，心情非常激动。但这时卢汉的主力

部队之一余建勋的 74 军还远在大理、保山一带，而龙泽汇 93 军所部的陇生文师又在剑川、鹤庆，在昆明的部队只有张中汉和张秉昌两个师，力量是很薄弱的。最后商定，要用一切手段立刻把余建勋军和陇生文师赶运昆明。会议开到 7 日凌晨 6 点方散。

岂料这一天，张群奉蒋介石之命飞到昆明，与卢汉商谈，要把国民党的“国防部”等重要军事机关搬来昆明，像抗战时期一样，便于接受美国的军事物资，使云南成为反共的基地。卢汉以云南在抗日时人民负担过重，元气未复，民心浮动，实难应允作答。张群未达目的，即和在成都的蒋介石通电话，并说 8 日回成都复命。蒋在电话中，要张群告诉卢汉，叫龙泽汇和张群 8 日同去成都面报云南情况。卢汉动了一下脑子，即向张群说：“李弥、余程万、龙泽汇他们 3 个军长都在昆，一起去报告情况更好。”张群很赞同。于是，李、余、龙 3 人遂同张群于 8 日同飞成都。

李弥，字炳仁。云南莲山人。黄埔军校四期毕业。抗日期间任第八军副军长，后升为军长，日本投降时率全军进驻山东。后任 13 兵团司令。

在淮海战役中，国民党第 13 兵团全军覆没，只身逃离战场的李弥从济南经潍县、青岛、上海来到南京，蒋介石又东拼西凑，重新组建了一个第 6 编练司令部。除李弥仍任司令官外，并以曹天戈、傅克精、邱开基为副司令官。第 8 军军长仍由李自兼，副军长乃以柳元麟担任。柳是黄埔四期毕业，浙江慈溪人，曾任过侍从室副主任，故实际是第 8 军军长。不久，李弥即率部赴江西鹰潭，继至湖南衡阳整训。此时南京已岌岌可危，国民党当局对西南后方已特别重视。当时云南省主席是卢汉。该省虽驻有余程万的第 26 军及滇东刘伯龙的第 89 军，但力量不雄厚，故蒋介石命令李弥入滇，以监视卢汉的行动。于是李部便一面开拔，一面招兵补充。

余程万，广东台山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曾任过李延年的参谋长，在王耀武的第 74 军当过师长。抗战时期守常德，调升为第 26 军军长。8 日下午，他们乘车驶出成都飞机场。公路上拥挤着胡宗南的残兵败将，汽车无法通行。一路上停停走走，开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蒋介石的住处——“中央军校”。张群叫三人洗脸喝茶，由他上楼去禀报。不久，蒋介石走下楼来，李、余、龙三人行礼如仪，蒋介石一摆手，示意他们坐下。他照例寒暄几句，问卢汉的病好了没有？其实卢汉没有病，但被问者仍回答说好多了，感谢他对卢汉的关心。可是，蒋介石突然话锋一转，问道：“如果共军窜到云南，卢主席和你们怎么办？”

龙泽汇鼓起勇气回答：“遵照校长指示，把云南变成坚实的反共基地，积极防御，尽力抵抗。”“要是抵抗不住呢？”

“向滇西撤退到大理一带抵抗。”

“谁叫你们跑滇西的？”蒋介石显得很不高兴，气愤地说：“我的学生必须听话，效忠党国，现在云南就靠你们！你们和卢主席要这样打算，我就不管你们了。”

“卢主席和我们有困难呀！”

“有什么困难？”

于是，龙泽汇就罗列了一些去时和卢汉商量好的困难，比如：武器不够，军饷没有，汽油也没有……

此时的蒋介石显得十分慷慨，全部给予圆满的解决。他说，武器在仓库里有的是，现有美国借给的银洋，存在菲律宾，马上空运给你们，至于汽油

就更好办了，立刻可以从海防沿滇越铁路运到昆明。他还一再问龙还有没有困难，当得到“没有了”的回答之后，又叮嘱龙“晚上去找顾总长办个手续”。

蒋介石这才转向余程万和李弥，心不在焉地问了一两句之后，就大谈其“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的有力支援”、“胡宗南部队已向云南滇西挺进”等等，勉励大家要发扬黄埔精神，保持军人气节。

蒋介石谈完后就邀请大家吃饭。在邻近的餐室里，他在一条长餐桌上席就座，却要人把龙泽汇安置在他的左边首座，其次才是余程万和李弥等。右边居首作陪的是张群，其次是胡宗南和俞济时、盛文等。蒋那天请客的方式不仅特殊，而且奇怪，侍从给每人只端来一份，量不多，采取中餐西式的吃法。大家都不说话，各吃各的，吃得很客气。这次御前赐宴很快就结束，蒋介石和张群便上楼去了。

晚上9时许，蒋介石的侍从武官领龙泽汇去见“总参谋长”顾祝同，顾正在他的官邸里烤火，彼此略事寒暄，谈话便转入正题。顾祝同问：“总统刚才电谕，你们云南所需物资，我当优先满足。不知你需要多少？”其实龙提的那些困难，只不过是敷衍之词，到底所需何物，他们正准备起义，根本没谱儿，便推诿说：“报告总长，我没有带参谋副官来，具体数字一时计算不出，等明天我回到昆明，再造表册派人来领。”

顾祝同答应了几个“行”字，龙又讲了几句应酬话。随后问了问他的兄弟、龙在军校时的同学顾蓉君的近况，便告辞回到了住处。

这一夜，龙泽汇始终未能成眠，一方面是因为冷，一方面是心里装着事。

平地一声雷

由于气候关系，张群的专机到9日下午才起飞。同机飞昆明的除了张群、余程万、李弥和龙泽汇之外，还有新近任命的国民党西南军政副长官孙渡。冬天日短，到昆明已近黄昏，在暮色苍茫中，久候的小车载他们疾驶入城。

把张群安排在卢汉的公馆里住下之后，龙泽汇才去见卢汉。刚上楼，卢汉劈头就问：“岳公（张群字岳军）来了没有？”“来了。”“他来了就好！你先看看这个。”卢汉把一张通知递给龙泽汇，龙接过一看，只见通知上面写着：

本日张长官莅昆，订今日（九日）下午九时在青莲街卢公馆开会。各军，各单位关于应请示和需要请领的一切事项，须先行分别列单，到会时自行呈出，特此通知。

（名单从略）

主任卢汉九日下午五时

龙泽汇看罢通知，感到莫名其妙。卢汉解释说：“我把你和马锬，谢崇文，也列入通知的名单里了，届时你们三人不必来。今晚10时就要行动。”

“起义吗？”龙惊问。

“对！”卢汉肯定地说。

“我们的部队呢？”

“陇生文师已到安宁集结，余建勋军正在全速东进之中。”卢汉接着扼要地向龙说明了情况。原来，12月9日这天，当卢汉接到成都来电，得知

张群将四度来昆明之后，根据当前形势，认为这是千载一时之机，毅然决然地作出起义的果断抉择。为迷惑蒋介石在昆明军政人员和特务的耳目，卢汉故示镇静，施放烟幕，特于当天下午在私宅大摆筵席，宴请美国驻滇“总领事”陆德瑾和“副领事”，英国“总领事”海明威，法国“总领事”戴国栋等人。当时汽车盈门，宾主尽欢，一般局外人决不会预料到会有什么突然的事变发生。卢汉刚演完这出戏，现在第二出戏专等张群到来，就要开场。卢汉想趁张群大驾光临之际，假借张群之名，把蒋介石在昆明的军政首脑一网打尽。

卢汉命令龙泽汇马上上五华山。在警备司令部里，副军长俱晓清向龙汇报了93军的准备情况。陇生文师已奉命在右起滇池，左至杨方凹一线布防，张秉昌师沿金殿至长虫山一线构筑工事，张中汉师负责城区戒严，作城防预备队。龙泽汇又进行了仔细检查，并召集有关人员作周密的研究。

晚9点整，余程万、李弥、沈醉和宪兵副司令李楚藩、宪兵司令部参谋长童鹤莲、空军第5军区副司令沈延世、师长石补天等人，都按时到会了。但卢汉却异乎寻常地到9点半钟还不见到会，按常情，卢汉总是在会前就在会客室里等候客人的。与会者等得不耐烦了，都不断地看看手表，又看看门，可始终未见召集人的影子。石补天站起来正想到外面看看动静，警卫营长龙云青却大踏步地走了进来。与会者误以为是卢汉来主持会议了，都不约而同地起身恭立。殊不知响起了炸雷般的一声吼叫：“举起手来，不准动！”在十几支手枪的威胁下，这些将军和大特务都无法施展其伎，有的则吓得目瞪口呆，手足失措，举起手来，服从缴械。只有李弥不甘屈服，用威胁的口吻质问：“这是搞什么名堂？”龙云青反问他：“你还不知道吗？”就这样，这些人被分批押上汽车，解到五华山光复楼扣押。他们的副官、卫士和司机，早已当了俘虏。

与此同时，住在卢汉新公馆里的张群，正在往成都打长途电话，但电话早被撤了线，摇不通。他被这突如其来事变吓慌了，当即要求副官带他去见卢汉，可是副官不在，忽然有两个警卫闯进门来，对他进行搜查缴械，并告诉他卢汉已上五华山，云南已经起义了。这个消息使张群目瞪口呆，丧魂失魄，顿时软瘫在沙发上，半天站不起来。张群就这样被软禁在住所里。晚10点整，通讯兵已把各机关部队的电话都接通到总机上，卢汉站在光复楼的主席办公室里，向各机关部队庄严地发出命令：“现在我宣布，云南起义了！各单位按照原定计划开始行动！”

云南，就这样静静地和平解放了！

一面五星红旗从了望台上冉冉升起。龙泽汇在警备司令部里，一直等到把卢汉向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和全军全国以及向云南全省军民发表的通电拍发完毕，随后又检查了一下全市的戒严情况，一看表，时针已指零点。这时，龙才猛然悟到自己还没吃饭，感到十分饥饿和疲惫，便向俱晓清交代了一声，驱车回家吃饭。饭后由于疲倦，就坐在沙发上睡着了。

宣布起义的第二天，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就从北京发来驾电，对云南起义给予了高度评价，驾电说：“通电敬悉，极为欣慰。昆明起义，有助于西南解放事业之迅速推进，为全国人民所欢迎。”贺电还鼓励全省军民团结战斗，建设新云南。电中又指示，有事可直向在重庆的刘、邓请示。紧接着，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从重庆发来贺电；叶剑英总参谋长也从广州发来贺电，对云南起义祝贺嘉勉。

很快，起义的喜讯像春风一样传开了，全省各地群情振奋，奔走相告。原来处在紧张状态的昆明市，顿时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新景象：商店开门，家家户户挂出了五星红旗，张灯结彩，各界人士笑颜逐开；大街小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青年学生在街上扭秧歌，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欢庆起义的成功，欢庆云南解放！

释放张群

10日凌晨3点左右，龙泽汇妻子李贤贞把他叫醒：“快，卢主席叫你。”

龙霍地一跃而起，马上开车上五华山，快步走上光复楼。刚进门就听见啪的一声，卢汉把茶杯一掷，对马锬厉声喝斥：“叫你扣飞机，你不扣，叫你通知龙泽汇、卮晓清、谢崇文来五华山坚守岗位，怎么一个都不在？你为什么不予通知？你有意扯我的后腿，破坏起义。警卫营长，把他带下去！”马锬是原国民党“绥靖公署副主任”，卢汉对他很器重，曾长期任卢汉的参谋长。在这突发的情况下，他脸都吓白了。大家都清楚，卢汉在盛怒之下说“带下去”，就是意味着枪毙。在这关键时刻，怎么能这样做呢？龙立即叫来警卫营长徐正芳，叫他在楼外等一等，飞步上楼，向卢汉求情说：“我从成都来，一直没吃饭，是我回家吃饭后疲劳睡着了。”杨文清等又从旁劝解，卢汉这才消了气，改口说：“把他扣起来！”3天之后，卢汉又下手令，“马锬解除处分，照常办公。”

卢汉当即命令龙泽汇和卮晓清：“你们确实负起责来干，有什么差错惟你们是问。”接着大家分头去忙工作。

宪兵是蒋介石部队中比较顽固的，不好对付。宪兵13团就驻在圆通街，是当时起义的心腹之患。好在该团团长王栩是云南弥勒人，和龙泽汇在中学和军校都是同学，一向靠拢卢汉，龙想争取他参加起义。经卢汉同意，龙泽汇马上打电话叫王栩到警备司令部来，卢汉对他晓以大义，不等说完，他就连声表示：“愿随卢主席起义，绝对服从主席的命令。”于是，龙泽汇叫王栩把宪兵团集合起来，收缴武器，全团带到北教场西营房改编整训。

驻在如安街的蒋军第6编练司令部，因李弥被扣，由参谋长卓立负责，卓立早有起义之心，龙泽汇便打电话叫他维持好所部官兵，如有困难，则派部队去强迫缴械。卓立回电话说：“不必派，不必派，只要几辆卡车，少数徒手官兵来办就行了！”他说服了全部官兵参加起义，自动解除武装，使军队毫无损失。

龙泽汇同时派部队会同警察局分别逮捕特务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监督驻滇的各伪中央机关部队的行动，特别是抓住了军统特务徐远举、周养浩、陈世贤等，人心大快。

可是，驻在马村天祥中学的宪兵教导团，十分顽固，龙泽汇派朱德裕团去包围，双方发生激烈的枪战，还发射了迫击炮弹。后来龙了解到王栩和该团团长常德的关系比较好，便叫他写信去劝降。不久，该团便打出白旗，表示愿意起义。驻在五里多粮食仓库的26军工兵营，拒不起义，被起义部队王国祥团包围，战斗十分激烈。龙泽汇和卮晓清、昆明市长曾恕怀一道乘车视察城郊布防情况，选择碉堡阵地，都无法通行，只好从侧边绕过去。该营抵抗了4个多小时，见大势已去，经喊话后才向起义部队投降了。

还在当天拂晓，龙泽汇就已派副师长邹谷君去封锁机场，扣留飞机，并

给站长蒋绍禹通了电话，望他随卢汉起义，蒋绍禹与龙是黄埔8期同学，满口应承。在视察防地路过机场时，龙泽汇又敦促他行动。他立即集合全体飞行员宣布起义，并提出请求上飞机去取行李，龙泽汇同意了。当龙继续向前检查防地时，忽听飞机隆隆，有一架飞机起飞了。龙急回机场一看，方知是飞机油箱里的汽油没有控干，被蒋绍禹钻了空子，他带着十几个飞行员上飞机之前，抢去了两个守飞机的哨兵的枪，趁势发动起飞，飞机未经跑道，沿着机场边上起飞而去。龙泽汇十分恼恨，便报告卢汉，成立了飞机场司令部，以张有谷为司令，负责管理空军人员。

11日，当龙泽汇在机场检查工作的时候，杨文清、杨适生等送张群到机场来，说是卢汉特许他搭英国环球航空公司的飞机飞香港。原来，在张群被扣之后，一再向卢汉写信，说他没有军权，留他无用，望念昔日旧交，放他离昆，则感恩不尽，他保证今后到国外去当寓公，决不再搞政治活动了。龙泽汇登上飞机，察看舱情，张群见龙，以为不放他走，惊惶万状。龙说：“张长官要走，我们不强留。云南起义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望去后多为国家着想，善自保重。”他这才释然而称谢。

龙走下舷梯，翘首凝望，直至飞机在白云里消失，他心想：卢汉和张群在政治上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卢汉得以在云南执政，而且突破重重难关，维持了4年之久，都和张群从中竭力维持分不开。张群认为卢汉是拥护他的，是主持滇政比较理想的人物，故主张维持云南现状，不进行改组，并促使卢汉赴重庆与蒋介石妥协，卢汉对张群也是一向知恩感德，极为尊重，每有人去重庆必送礼物，书电往返不绝。张群亦自知有恩于卢汉，所以不避艰险，四度飞昆，为蒋介石说项，要把云南变为反共基地，不料竟被卢汉所扣。然卢汉仍不忘旧恩，甘当军令，放走张群。

昆明保卫战

为了建立新的革命秩序，统一军政指挥，卢汉遵照中共中央宣布的约法八章和第二野战军规定的四项办法，成立了临时军政委员会，组成人员是，主席：卢汉；委员：杨文清、李弥、余程万、安恩溥、吴少默、宋一痕、谢崇文、曾恕怀。

云南起义，粉碎了蒋介石要在云南建立反共基地的阴谋。他不甘心失败，猖狂进行反扑。他提升汤尧为“陆军副总司令”，负责指挥蒋军第8军和26军进攻昆明；任命曹天戈为第8军军长以继李弥，彭佐熙为26军军长以继余程万；为了激励士气，每军特发大洋10万元。

汤尧的指挥部设在曲靖，他以第8军为右翼，26军为左翼，残缺不全的宪兵5个团为预备队，向昆明进犯。蒋介石又派飞机轰炸昆明，以配合陆军的进攻。五华山光复楼东边中弹一枚，门窗均炸毁；龙泽汇的副官吴昌汉把龙推进防空洞，他伏在洞口被弹片炸伤左胸；有一枚炸弹贯穿屋顶掉在民政厅的一把藤椅上，没有爆炸；还有几枚落在翠湖卢公馆附近，水花飞溅，状如倾盆大雨；华山东路平政街一带，中弹甚多，房屋被炸毁，居民死伤数百人。卢汉立即命令市长曾恕怀带人去抢救慰问，并决定将指挥机关搬到圆通山办公，誓死保卫昆明！

这个决心鼓舞着全市军民。虽然敌军两倍于起义部队，但起义部队有全

市人民的支援，工人和青年学生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都自动组织义勇自卫队，要求发枪。参军极为踊跃，市民亦自发起来，参加修筑防御工事，组织救护、运输、肃奸队，军民一心，同仇敌忾。卢汉日夜坐镇在指挥司令部里，随时在电话中向军师长询问部队情况，时常找军需官了解粮弹的储备与供应，召集参谋人员谢崇文、佺晓清、杨济宽、杨剑秋等研究作战方案，对敌我态势进行详尽分析。又特向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求援告急，积极与边纵朱家璧进行联系，要求边纵攻击 26 军的侧后。当卢汉收到刘、邓大军的陈、宋兵团已奉命向云南全速挺进的消息时，起义部队极为振奋，对保卫昆明更加充满信心。

12 月 16 日下午，敌搜索部队在昆明外围与起义军警戒部队发生接触，揭开了战斗序幕。17 日凌晨，东南两路敌军向起义军发起试探性攻击，在大板桥、跑马山、小板桥一线发生激烈战斗。第 8 军之一部则迂回至金殿黑龙潭一带，侧击起义军的守备部队。卢汉在积极组织反击的同时，又派扣留下的几架运输机去轰炸蒙自、沾益飞机场，破坏敌空中补给基地，并向敌军散发传单，侦察敌情。入夜，敌军小部队四处进行扰乱，似有要在次日发动总攻的模样。卢汉星夜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对策。鉴于 93 军防广兵单，配备薄弱，阵地拉得太宽，在敌人大兵力的攻击下，势难持久，就召集谢崇文、佺晓清、杨断宽等参谋人员和龙泽汇研究后，断然决定缩短防线，以城防工事为主阵地，在北教场、巫家坝一线的前方作为迟滞敌人行动的前进阵地。这样既可节约兵力，以逸待劳，发挥城防工事的作用，又可以控制有力的机动部队，作为支援重点方面的作战和出击，先求稳当，次求变化，不致造成挨打而无法还手的被动地位。

另一方面，卢汉遵照刘邓首长的电示，加紧做李弥和余程万的工作，以瓦解和促使第 8 军和 26 军官兵起义。卢汉早在 11 日即发表二人为军政委员，12 日又把余程万搬到他家新公馆里住，派李耀廷、张天如去作陪说服；让李弥转移到龙泽汇家里住，由赵诚伯、李鸿谟作陪说服。二人都很愉快地接受了指示，当即发表起义广播，并多次写信去敦促 26 军改变番号，参加起义。李弥还主动提出放他老婆先去向第 8 军做说服工作。卢汉虽然疑信参半，但仍同意了他的请求。可是当晚，据他老婆返昆说，第 8 军官兵表示只要李弥能出去，一切均可照办。为减轻昆明的军事压力，保全地方元气，卢汉便决定放李弥出去，希望第 8 军实现起义的行动。岂料李弥一出去后，却主张不打昆明，把部队拉到他的家乡滇缅边境，以便取得美英支援。谁知曹天戈疑心他被卢汉收买，挟持他继续与人民为敌。

果然，18 日拂晓，26 军发起猛烈的进攻。上午 8 点左右，敌人炮弹打到巫家坝机场内。龙泽汇带卫队驰至机场。恰适保 6 团退下来，龙大声疾呼：“不准退，不准退！”并当面下令该团团长李达人稳住战局。李慌忙地说：“我、我在诱敌深入。”“胡说，你这样搞，会影响全线的！”龙怒火中烧，不顾一切地命令部队向前守住阵地，顶住打，冲上去！这时敌人的迫击炮弹在附近爆炸，起义部队不为所动，继续反击，全团士气大振，奋勇杀敌。正在这紧张时刻，余建勋的先头部队保 5 团赶到，于是两团官兵握成一个拳头，向敌人狠狠打去，一举将敌击退。与此同时，李焕文的保 10 团在杨方凹一带受敌猛攻，龙泽汇只好命令作机动的赵振华率保 15 团顶上去，终于打退了敌军。龙泽汇将战况向卢汉报告，卢汉高兴地给保 5 团团长马荣凯和赵振华记功，并把李达人撤职查办。

到 19 日凌晨，东南两路敌军全线发动总攻击，战斗异常激烈。自晨至晚，枪炮声不绝于耳。敌步兵在炮兵火力掩护下，进行波浪式冲锋，声势凶猛。第 8 军的山炮部队放列在大树营前方，直接轰击东北城隅，大东门、圆通街及圆通山上均落有零星炮弹。起义部队 93 军依据坚固的城防工事，构成严密的交叉火网，予敌猛烈的集中射击。任敌反复冲杀，仍未越雷池一步。在夜幕降临之后，敌军组织敢死队，并欺骗士兵说，城内银行里的黄金白银很多，打进昆明，可以自由行动 3 天。敌又发动了空前猛烈的进攻，妄想利用暗夜，集中优势兵力和火力，摧毁城防工事，打开突破口，突入城内，抢掠财物，扩大战果。但由于城内守备部队的顽强抵抗，集中自动火器，予以歼灭性的打击，粉碎了一批敢死队员的疯狂猛扑。南线的柳坝、南窑一带，炮火连天。东线的第 8 军一部则迂回到铁峰庵、涌泉寺一带，被起义部队张秉昌师英勇阻击，形成拉锯。卢汉命令龙泽汇和俱晓清、许义浚等分别到各阵地督战，给部队很大鼓舞。当夜，纺纱厂附近枪声激烈，龙泽汇即率领卫队经东寺街去察看，见居民纷纷走上街头，迎到他们面前，毫无惧色。人们盯着龙泽汇说，“龙军长，不要怕，假使敌人窜进来，我们拿扁担也要把这些狗日的打出去！”人民的支援鼓舞着起义部队，人人争先，奋勇杀敌。午夜以后，敌军攻势顿挫，再衰三竭，直至停止猛攻，只得派小股兵力不断扰乱。卢汉立即命令部队利用战斗间隙，进行整补，以迎接来日的决战。

还在头一天上午，巫家坝前沿送了一个自称投城的班长到指挥司令部来，口口声声要见卢汉。龙泽汇叫人仔细搜查他的身上，除了一封信外什么也没有。这是 26 军前线一个名叫罗伯刚的团长写来的信，信中表示该军为了营救余程万，一定要战斗到底，哪怕只剩一人一弹，也要血染滇池，在所不惜。卢汉当即叫人把送信人带去见余程万。这个班长见余程万后放声大哭，余程万也为之动容落泪。卢汉考虑到既然 26 军是以营救余程万为名而战，如果放余出去该军将无所借口，可以起到从心理上瓦解敌军的作用，从而避免兵祸，可保地方元气。即使万一不起作用，大不了如李弥一样，对起义军也不会有什么影响。何况余程万信誓旦旦，坚决起义，为人也没有李弥那么奸诈呢！因此，卢汉遂决定放出余程万，并由杨文清陪同，亲自和他谈了一次话。谈话的主要内容是概述了当前的形势和解放大军已逼近云南的情况，并且着重指出：“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均已被打垮，现在这两个军又算得了什么？蒋的亲信都已逃到台湾，留你们在这里当替死鬼，对国家对个人有什么好处？就利害关系而言，我过去追随蒋介石，这是大家知道的。现在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我也毫无顾忌地宣布起义，你们又有什么可顾忌的呢！”余程万感激涕零，以手指天为誓，表示出去后一定要率全军起义，决不辜负卢主席和云南地方父老的这种厚爱。随后卢又嘱咐：“你要把 26 军移驻宜良、开远一带。改变番号，通电起义，接受新职，待部署妥当后，望即返昆行使军政委员的职务。”12 月 20 日上午，即由俱晓清派一参谋和吉普车一辆，送余程万出巫家坝。岂料这时炮火猛烈，26 军的山炮部队正向起义军核心阵地前沿射击。步兵正向五里多、吴井桥方向冲杀，企图突入塘子巷火车站。而第 8 军则重点攻击昙华寺、大树营地区，步兵在隆隆的炮火掩护下，突击崔公堤附近阵地，有的狡猾地利用连埂的村庄和工厂，企图突入市区，其炮火则不断向东城一带盲目射击，炸毁民房多处。中午，忽报铁峰庵失守，敌军已登荷叶山、王帽山构筑工事。起义部队随即将预备队增援大小连山，战局十分危急，卢汉连续急电催余建勋军主力火速来援。

直到下午4点,在26军炮击的空隙里,余程万才爬上巫家坝附近的一个土堆上,手摇白旗,高声呼叫:“我是余军长,你们不要打了!”叫了几声,对方步兵看清了余程万,遵命停止射击,把余程万迎了过去。果然,南线炮火遂趋沉寂。傍晚,26军的攻势已停。东北面的枪炮声却有增无减。

夜里,卢汉接到刘、邓两将军重庆来电,谓已饬令杨、苏兵团派出快速部队,用汽车运输,星夜驰援昆明,希与切取联系,密切配合,共歼敌军。杨勇司令员和苏振华政委,也从贵阳来电告知,快速部队业已派出,正兼程驰援昆明,约于23日即可到达曲靖。解放大军驰援昆明,指日可到的喜讯,瞬即传遍全军,一时士气大振,欢声雷动,连日的顾虑和忧虑为之一扫,战斗精神焕发,遂用猛烈的火力歼灭东北方向敢于来犯之敌。

21日清晨,出现了奇怪的情况,不仅南线寂静无声就连东北两面的枪炮也不响了!难道敌人已经知道解放大军不日将到昆明解围的确切消息了么?果然,敌人得知人民解放军将到的消息后,惊恐万状。谍报26军的攻城部队是在20日黄昏奉命向南撤退,至宜良后余程万遂为新任军长彭佐熙所挟持。第8军是在当天黎明前知道26军已经撤退,陷于孤立境地,感到侧翼暴露,生怕被我围歼,也就纷纷撤退了。昆明城围遂告解除。

第二节残军立足金三角

残军败走建水

当第8军未撤大板桥之前，170师师长孙进贤曾接到一次李弥自沾益发出之急电，即命令第170师立刻北进嵩明、东种，占领巧家。任务是掩护第8军主力向滇北撤退，计划分两路向川、滇、康边境转进，与胡宗南靠拢，但孙进贤本人及其他军官均表示反对，遂未行动，部队都集中于大板桥。

李弥此时亦自沾益回到大板桥，遂立刻开会，在提到全军转进西康计划时，第6编练副司令曹天戈及各位师长则一致反对。大家都认为当时胡宗南在西康，已处于困境，正在走头无路，自身难保。况且西康荒凉，人烟稀少，资源补给与冬季士兵之被服，都是难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大军跋涉，眷属随行，恐怕不到西康，就有瓦解之虞，不如趁卢汉、余程万两部尚未会合之际，从速穿过呈贡，直奔建水为上。同时滇南物资丰富，又接近国境，更便于进退。李弥听后，遂放弃己见，依从众议。于是即作如下之部署：

（一）令教导师为右纵队，占领呈贡，负责对卢汉之警戒，以掩护主力右侧的安全，俟军主力通过后，该纵队即直开石屏集结。

（二）军主力为中央纵队，按第42师、军部、陆军总部、第237师、第170师顺序，经呈贡、晋宁、江川、通海，至建水集结。

（三）令第331师为左纵队，并指挥陆军总部的直辖团队，经陆良、路南、弥勒至开远集结。

（四）限各纵队于即晚（22日）夜暗开始行动。

在22日傍晚，第8军即开始行动，沿途除了在呈贡、江川与卢汉的部队轻微接触外，可以说相当顺利。在此期间，蒋第6编练部即奉命改为第8兵团，司令官则由“陆军副总司令”汤尧兼任。汤系安徽合肥人，为合肥耆宿汤立夫的哲嗣，身材魁伟，个头比李弥、曹天戈都高，时年已60余岁。汤与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等，都有深厚的交情。在未来云南之前，是“陆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长。李宗仁虽委关麟徵为“陆军总司令”，但实际职权仍操之于顾祝同，汤则成了“陆军总部”负责人。大势渐去，汤率总部人员和眷属，由南京逃到曲江，又由广州而至柳州，最后才拖到云南曲靖。汤与卢汉的“绥靖副主任”马谏，参谋长谢崇文都是陆军大学同学，张群自成都最后飞到昆明当日，汤就由马谏及卢汉的云南保安副司令柏天民口中知道卢的起义消息，所以，先一日便逃回曲靖。此际汤尧在云南已是国民党“中央”留在大陆的最高官员，李弥和余程万，分别提升为云南省主席及“绥靖主任”，便是由汤推荐的。

汤尧兼任蒋第8兵团司令官后，第6编练司令部之原有干部曹天戈仍任副司令官，孙进贤由第170师师长直升第9军军长。第3师师长田仲达升为第9军副军长。石建中则由第42师师长升为第8军副军长，以顶替在昆明未逃出的副军长柳元麟。

部队集中建水之后，李弥一看自己的部队尚未损失，故亦由消极顽抗趋向积极顽抗。除了陪汤尧向部队讲话外，并计划在建水成立云南临时“省政府”；还想委第8军的军法处长唐昌熊为建水“县长”。

第8军、26军及第9军余部，此时都集中于建水、蒙自一带。附近的地区如开远、箇旧、石屏、龙武、宝秀、碧色寨以及中和营、鸣鹭都在控制之下。对于全军今后之动向，李弥则主张依靠此间之丰富资源，险要地势做为基地，必要时可与解放军决战，万一不支，再入越南。李弥当时派第237师李彬甫开赴元阳、小羊街诸地，与红河两岸的摆夷地方武力联系，其中戛丽街的李润之、前93师的吕国铨亦都被李弥拉拢。但汤尧、曹天戈，则认为撤澜沧江、怒江一带，作为根据地，支撑到5月雨季到来，解放军即使追至，其亦难以行动，等到秋后，再以国际局势之变化决定行止，才是上策，万不得已，退入缅甸、老挝亦可暂保实力，最后去当白华，亦好过垮在此间。至于余程万，此时已是上不为国民党当局信任，下不为部下支持的孤家寡人，只有依附汤、曹、李拖住部队再说，何去何从，意见都不一致。

蒋介石接见李弥

1950年元旦过后，蒋介石派“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周芳繁和空军第三军区副司令易国瑞飞到蒙自，接汤尧、李弥、余程万到台湾。据说在台湾见到了蒋介石，除汤尧受到嘉许外，李、余两人都受到责备。尤其余程万更是备受指责。

1月14日，顾祝同才与汤尧、李弥由台湾飞到蒙自，余程万则未同来。顾祝同指示部队务须确保蒙自机场之安全，与台湾加强联络，并决定以蒙自为基地，宣布将第26军空运台湾，防务全交第8军。1月15日上午，顾祝同召集师长以上干部训话，还特别召见新任第9军军长孙进贤。

顾祝同这次到蒙自，带了700箱“袁大头”，分发李、余两军做军费。按一箱装两布袋，每袋1000元计之，也是一笔大数字，可见当时蒋介石对这部分残军之重视。

孙进贤在清点银元现场曾对部下发牢骚：“顾祝同刚才约见时，就嘱咐我万不得已时，可以投共产党，暂时换旗，保持实力，待机再起。这真是大混蛋，共产党是干什么的，会吃你这一套。”同时还提起其本人的一段往事：“以前我在徐蚌会战时，冒死突围逃到南京，当时没办法，穿了一套士兵棉服去见顾祝同，我说我是淮海战役逃出来的师长，门口卫兵初时就不准见。以后在南京砲亭巷第13兵团办事处借钱，买了套将军服，再去晋见顾祝同，他妈的更气人，我认真地报告徐蚌前线情形，顾老总连听都不听，拿着这么大的部队被打垮，竟无关痛痒，你说可叹不可叹！”这些话出自孙进贤痛心战局败坏时，相信不会是假话。可见这位身居高位的顾将军，真是昏庸及至荒谬了。

顾祝同于1月15日下午，即与李弥又飞西昌胡宗南驻地，并约定16日再回蒙自。但在飞走不到4小时，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军第114师、第115师之先头部队，即从广西百色经富州、文山赶来，遂与国民党军在西戛龙附近接触，次日凌晨蒙自亦发生激战，以致国民党军队对机场失去控制能力，于是将部队空运海口，转台湾的计划被中断。到蒙自的空军第3军区副司令易国瑞、空运大队第101队队长乌钺亦都随着驾驶来的飞机困在蒙自。此时汤尧与曹天戈便在鸡街开会，决定将部队集中建水，想西撤车里、南峽、思茅一带，靠澜沧江之富庶、险要，欲顽抗到底，同时亦得到西昌李弥的复电，约定部队到达澜沧后，李弥即归队。

17日，第170师、42师，陆续到达建水后，即决定退到石屏，与教导师会合。汤尧、曹天戈，在召开一次团长以上军官会议上，亦规定了西撤的注意事项。下达的命令是：

（一）19日13时开始，分左右两纵队，以最快速度经宝秀、元江、墨江、普洱向思茅前进。

（二）右纵队由教导师、第170师编成，派孙进贤为该纵队指挥官，限于本日（19日）13时开始，于20日拂晓前出发完毕，经宝秀以北道路直趋元江，控制元江两岸制高点，确保元江大桥，并掩护主力安全通过。尔后该纵队即解除右纵队任务，改任军主力的后卫，以孙进贤为后卫司令官，继续原地监视，迟滞共军之追击。尔后与军保持一天距离跟进，同时彻底破坏元江大桥。

（三）左纵队以第42师和直属部队编成，派石建中为该纵队指挥官，限于明日（20日）12时出发，经宝秀直趋元江。军部随该纵队前卫跟进，通过元江大桥后，该纵队即解除左纵队任务，改任军主力前卫，以石建中为前卫司令官，继续前进。

在部队出发之前，已得悉彭佐熙的第26军部分空运台湾后，已无战斗力，现在向红河转进，实现其进入越南的计划。田仲达的第3师亦故意落后，在箇旧附近起义。至于李彬甫的第273师，经电台彻夜呼叫，亦没有回音。在此情之下，国民党余部只有在石屏分两路西撤元江。一路由汤尧、曹天戈、石建中指挥走赤瑞湖以南，过老凹底；一路由孙进贤带领经宝秀，沿赤瑞湖以北，过青龙广。孙进贤一见田仲达被自己逼走，只剩下第3师的残余及人数不足的李桢干教导师，和自己的基本部队第170师，便格外小心。于是便在宝秀开会，孙进贤及新升任的第170师师长李得元，参谋长刘启凡，3个团长左豪、浦景云、张元伟都出席，财务科长胡土方亦在座。当时决定部队到达元江铁索桥后，即由两团人守住铁索桥两端，待两路大军通过后，再听候命令，会议指定张元伟团在最后掩护。张元伟是山东蓬莱人，陆军大学毕业，任过于兆龙第96军的参谋长。他大发宏论，表示一团人在后掩护太危险，孙进贤硬指定张元伟，并担保代为解决困难及危机，于是便整装前进。

孙进贤抗战对期在湖南雪峰山、洞口就与日本鬼子打过山地战，他命令部队一有情况，即上山头，占领高地，使解放军阻击部队伤亡甚多。孙部途中以无线电与汤尧、曹天戈、石建中联络，始终不通，部队快到元江时，却传来一连串情报，如林彪的大军即来，余建勋亦出发了等等，弄得孙进贤颇为紧张，便决定边打边走，以脱离战斗前进为主。

但到达元江铁索桥后，却不见汤、曹、石的部队。且铁索桥系在悬崖之下的元江面上，与想像中的铁索桥根本就是两样。在宝秀会议时，还以为元江系在平原之上，可据守两岸，但该桥系架于深壑中，就没办法来控制。于是孙进贤便命令左豪团撤后，但解放军追击部队已占领重要山头。此时左团由下仰攻，损失巨大，结果，连团长左豪亦失踪，故使孙进贤进退失据。过铁索桥吧！部队由高处走到下面，解放军在后面追击，部队在射程之内，就有溃散之虞。同时部队一过江，铁索桥便不能控制；如不过桥，元江彼岸情况不明，一旦铁索桥不能通过时，部队就有前进受阻，后退无路之危险。再者，汤尧方面电讯不通，亦不知道第8军是溃于后，抑超于前，而且时机紧迫，又不能停兵等待。孙进贤在无可奈何下，便率领大军利用铁索桥渡过元江，未几，解放军即由后追来，并占领后路山崖之制高点。孙进贤顿呈惊慌，

便在元江之平坝上查勘方向，此际孙每一行动，后面总是尾随很多人，情景有些像淮海战役将垮前突围的局面。孙进贤即大声发脾气说：“老跟着我干吗？”其实部队已呈混乱状态，大家六神无主，不跟主管跟谁呢？

说时迟，那时快，解放军在铁索桥对岸之山头已隐约可见，过江后的部队休息于江边之平坝上，完全暴露于解放军的射程之内。孙于是立刻下令特务营营长耿方振，将铁索桥炸毁，以断追兵。

这时的孙部，除了本身的 170 师、教导师外，尚有第 3 师一部分，另外有宪兵团及空军人员随行，于是整顿一下，找了一位当地人做向导，穿过元江城直奔大歇广，而占领墨江。

至于汤尧、曹天戈、石建中之左翼纵队，在 1 月 20 日由石屏出发，21 日始到宝秀。据说沿途以向导引路错误，在孙进贤过元江后第 3 日，即 24 日才到铁索桥，当时曾遇到被遗弃的第 170 师团长左豪，大家都一筹莫展的困在元江东岸。后来第 42 师师长石建中，见无法过江，曾拟掩护汤、曹突围，另觅渡口而未成功。25 日，汤尧与曹天戈均在失散中被俘。后来胡士方在贵阳遇到石建中的参谋长吕威，据吕说石一路应战，几经艰苦，始达元江，万料不到孙进贤会过河炸桥，愤恨下拔枪自杀。石建中，热河凌原人，清华大学毕业后，又入黄埔军校第十期。

还有第 26 军，自蒙自机场失守，彭佐熙率领 5000 多人向红河方面突围，进入越南，与其时湖南省主席黄杰的 27000 多人，都被缴械困在莱州，后移住金兰湾，历尽 2 年寒暑终于去了台湾。另一股则由副军长叶植楠和团长罗伯刚率领逃抵车里、南峇一带。

金三角称霸

1950 年 1 月 24 日，国民党第 8 军主力在元江被歼灭，只有第 8 军 237 师 709 团团长李国辉率 1000 余人因驻扎在元江下游而免歼，从元江且战且逃，逃至车里的大勐龙之蛮宋寨，在蛮宋由 93 师流落人员叶文强和车里宣慰司土司刀栋材的帮助和引导下，渡过打洛河逃往缅甸三岛。在三岛他们遇到从打洛逃出的第 26 军 93 师 298 团伤兵，并被告以 298 团残部已逃向泰缅边境，打算经泰国回台湾。李国辉率部又从三岛渡过楠垒汀，穿过野人山的原始森林地区，在饥饿、虐疾、毒蛇、猛虎的袭击下，经过 12 天的艰苦行军，队伍疲惫不堪，沿途不少人非战斗减员，于 1950 年 4 月 21 日到达泰缅边境湄公河西岸的小勐棒，与 93 师 278 团残部巧遇。

2 月 19 日，93 师 278 团在南峇打洛被解放军打击，被俘 500 余人后，团长罗伯刚、副团长谭忠率领残部 500 余人渡过打洛河向缅北三岛，再由三岛到小勐棒。到小勐棒后罗伯刚卖掉了大部武器，换成金条，因其妻已去台湾，就单独经泰国先回台湾，把部队交给副团长谭忠，让谭忠通过大其力到泰国，等候台湾派飞机来接他们去台湾。谭忠部队在小勐棒与 93 师 709 团李国辉残部会合，并经商讨决定留在缅北，不回台湾。小勐棒位于缅北大其力以东、湄公河以西，紧靠泰缅边界，只要步行 20 分钟就可以进入泰国，处于金三角的中心，是个“三不靠”的山区。李国辉和谭忠商定自立为一支“复兴部队”，由李国辉任指挥兼 709 团团长，谭忠任副指挥兼 278 团团长。部队合并后拥有 1600 余人，司令部设置在小勐棒寨子的教堂里。他们设法与台

北恢复了联络，请台湾给予空投，台北回电：“自谋出路。”残军就开荒种地建茅屋、修营房，收税经商，在缅北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独立王国”，这也是国民党残军在东南亚金三角立足的开端。

这里还要提一提云南境外的马帮。远在清朝中期，从云南到东南亚各国就有商路，云南境内一些贫苦群众，为了谋生，常常赶上几匹骡马到缅北、老挝、泰国贩卖药材、鸦片，并从泰北买回英国的布匹、化妆品、日用品等。为了防止路上抢劫和野兽的袭击，人们往往成群结队同行，并带有枪支武器。抗日战争时期，马帮有所发展，他们除贩运鸦片、还贩运军火、药品，所带武器也逐渐现代化。他们又多和当地汉人、华侨及少数民族头人保持联系。特别是云南开远、大庄、楚雄的回族马帮尤为庞大，人数多、骡马多、武器精良，逐步控制了泰缅商路。国民党残军到达缅北后，云南马帮马守一、马云庵、马缓学、马鼎臣、沐国玺、熊定钦、杨文光等均纷纷投靠，混为一体。

李国辉、谭忠的“复兴部队”经过了一段整休后，将马守一的马帮、原 93 师的流散人员加以搜罗，部队逐步扩大到 3000 人。下属：

- 709 团，团长李国辉；
- 278 团，团长谭忠；
- 特务大队，队长陈龙；
- 搜索大队，队长马守一；
- 独立第一支队，队长张伟成；
- 独立第二支队，队长蒙保业；
- 独立第三支队，队长石炳麟。

国民党残军在小勐棒修建营地、招兵扩军，引起了景栋缅甸国防军的密切关注。1950 年 5 月 20 日，缅甸国防军一个连奉命由景栋进驻大其力，要残军派代表前往谈判，残军派“复兴部队”副参谋长、原 93 师参谋主任蒙振生前往大其力谈判。缅军要残军限 10 日内撤出缅境，残军不从。又于 5 月 25 日、6 月 日两次谈判，均无结果。6 月 3 日缅军要求派高级代表到景栋谈判，残军派丁作诏和马鼎臣为代表到达景栋，即被缅军扣捕。6 月 16 日至 8 月 23 日缅军集中数千人的兵力，在空军的配合下，向残军驻地小勐棒、勐果发起进剿，残军于 6 月 28 日和 8 月 23 日组织两次反击，将缅军赶出了小勐棒和勐果，重返驻地、并攻占了缅军重要基地大其力，迫使缅军停战谈判，释放了马鼎臣，以残军撤出大其力和景栋至大其力公路两侧为条件，同意残军进驻孟萨。8 月底，缅军派汽车将残军送出大其力，残军返回小勐棒后进驻孟萨。

孟萨是一个有 40 多个自然村寨的大坝子，这样，残军便拥有了基地和生存的条件。“复兴部队”即在孟萨建立了训练队，由何永年和苏振声担任正、副教育长，公开招收当地华侨和民族子女受训，从而有了喘息和发展的机会。残军的发展便引起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台湾当局的重视。

第三节 李弥二次入窜云南边境

李弥收整缅泰残军

为了搜罗缅北国民党残军，蒋介石派原第 8 军军长李弥到缅北进行视察。1950 年 8 月 16 日，李弥经曼谷到达泰北夜柿（读音米赛）；1951 年 2 月 20 日李弥第二次到孟萨视察 3 天，又于 3 月 8 日带领参谋长钱伯英、副参谋长廖蔚文等人，到达孟萨，正式成立“云南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部”，自任“总指挥兼云南省主席”，直属台湾“国防部”指挥。李弥还命令 709 团改编为第 193 师，李国辉任师长，278 团改编为第 93 师，任命原 26 军军长彭佐熙在香港经商的侄子彭程为师长，任命在曼谷经商的原 93 师师长吕国铨为第 26 军军长、叶植楠为副军长。

1950 年 4 月，原第 8 军副军长柳元麟、第 6 编练司令部副司令傅克军、李弥的妻子龙慧娉、师长李彬甫、副官处长何永年、团长浦景云等 20 余人，乘私人商车由昆明潜逃滇西畹町，逃往缅甸。随后相继外逃的还有卢汉起义部队暂编第 12 军 36 师参谋长（原云南绥靖公署科长）马俊回、腾冲县县长刘绍汤、滇东机场守备司令苏令德和云南省政府警务处处长邱开基、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书记裴存藩、整编第 77 旅旅长钱伯英、第 5 师师长李则芬、第 58 军 26 师师长王少才、第 125 军参谋长和荣先、预备第 11 师副营长徐剑光、滇西护路总队大队长王晨天、在乡军人团长朱鸣元、第 26 军输送营连长何子钰、第 58 军营长杨一波、保安团中队长杨文光、缅宁专员彭季谦等，这些外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均为李弥收容。

同时，李弥还策动了境内外民族土司头人武装，外迁外逃投附国民党残军，使国民党残军发展到 6900 余人。

美特策划“入侵华南计划”

这时，美国一面在亚洲北部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一面要阻止“共产主义”进入东南亚。美国国防部除了给在印度支那的法国殖民者以军援外，并拟订“堵塞亚洲共产主义进一步扩张”的政策。三军联合参谋长于 1950 年 4 月向美国国务卿进言：“如果将采取迅速和持续的措施，减少共产党中国的压力……联合参谋长已注意到中国国民党部队活动力重振和效能显著有增加的证据。”并建议，实施“一项在干涉东南亚共产党活动的地下特别行动计划”。中央情报局并着手研究如何使用逃缅国民党残军“入侵华南计划”的实施。按杜鲁门总统的想法，武装在缅甸的国民党残军，利用他们来使缅中边境（由西藏到泰国）成为坚固的屏障，“显然是解决的办法”。

1950 年 6 月至 7 月，美国前任驻泰国武官谢尔敦在曼谷开设“海洋供应公司”，开始向残军接济军火和服装。12 月，美国在泰北清迈设领事馆，专门负责对残军救济，直接指挥和派遣顾问训练残军。1951 年 2 月，美国派人与李弥商谈军火供应，3 月，由两名美国人送 260 驮武器、物资到残军总部孟萨，并用 C—46 和 C—47 型运输机向孟萨空投，每月至少 5 次。从 1950 年 4 月起，美国每月给国民党残军 20 万铢泰币，8 月又改为 7 万美金，9 月起每月又增加家属救济费 2 万美金，直到 1952 年 6 月前后才停止。

残军首次窜境

李弥受台湾“国防部”的命令，并在美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于1951年5月发动了对云南边境的大规模军事窜扰。6月21日，西路国民党残军攻占沧沅县城、岩帅、党坝、南掌和镇康县的南伞、大营盘、山口寨；6月6日，东路军从缅北孟养地区入窜孟连县城，占据糯福、孟马和孟连县城；6月12日，游击大队吴运绥部、特务大队罗成部400余人入窜孟遮县以南地区，以牵制解放军；李弥亲自到缅北班阳雍和设立总指挥部，先后投入兵力8000余人。美国出动了无标记的C—47运输机多次向入境残军空投武器和补给。

6月3日，解放军云南军区在残军入窜云南边境时，立即发布剿灭李弥残军的命令，组织了5个团兵力分4路追剿。6月上旬，人民解放军云南军区步兵第117团，第121团各一部向糯福、青塘出击；6月10日，吕国铨率部退出国境。6月下旬，步兵120团、123团、基干2团、115团等5个团兵力合围入侵耿马、双江残军，李国辉率部撤出国境。

残军二次窜境

国民党残军第一次入窜失败后，李弥于7月又组织了第二次入窜。

对李弥两次入窜，云南军区司令部再次组织追剿。两次作战先后50余天，国民党残军共被歼549人，残军于7月底全部退出国境退缩至缅北果敢至三岛一线，李弥指挥部由班阳撤回孟萨。

李弥两次窜扰云南边境失败后，把部队集中云南境外的几个基地上，分兵四处抢占地盘，迅速地占领缅北萨尔温江以北，云南境外以南的大片掸邦的科康、佤邦、景栋三个省的地区，控制了该地的鸦片和贸易，收纳赋税，收缴公粮，使当地民族土司、头人纷纷依附残军。李弥在孟萨开办“反共抗俄大学”由李弥、李则芬任校长和教育长、大肆招收华侨和汉族子女扩充实力、休整训练，收编土司民族武装，给予番号。台湾还派遣军官和特工人员700余人到缅北，充实残军。1951年11月李弥在孟萨修筑机场，1952年1月又从台湾带回一队“民航运输公司”空运飞机到孟萨，C—47型运输机定期每周两次由台湾至孟萨往返。美国还以M—1型步枪、五〇口径轻机枪、反坦克炮、高射炮等武器装备了8000名新兵。到1953年1月，国民党残军已发展到1.85万人，编为一个总部、一个指挥部、3个军区、4个师、16个纵队，活动地区北至缅甸昔董、南至耶县，西至孟苏、孟畔土司管辖区，东至老挝孟信，南北长达530公里，东西宽有280公里。

残军被迫退台

1952年8月，国民党残军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渡过萨尔温江向缅甸中部帕奔、毛淡棉、那县发展，并与缅甸“克伦自卫军”成立“联合作战指挥”，公开宣称联合缅甸所有反缅甸政府武装，推翻缅甸政府。残军向萨尔温江以南的发展，直接威胁了缅甸主权。

缅甸政府为了自身的利益，于1953年1月集中了3个精锐的步兵旅组织拦截，缅军这次作战以萨尔温江为中心，波及范围广，动用兵力多，战斗极其激烈。当时缅甸的海陆空国防军全部只有20000人，而用来围剿的达10000

人以上。在这1万多兵力中，7000—8000人是骁悍善战的钦族部队。钦族部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英勇抗日而闻名于亚洲。他们擅长于山林作战，身背轻机枪爬山越岭如履平地。此外，缅甸还雇用以印度人为主体的“国际兵团”3000—4000人。

这次战役缅军是经过长期准备的。他们易集中兵力，处于主动攻击的地位，在人力、武器装备等方面均有较大的优势。

战争开始，国民党残部毫无准备，司令部主将李弥及参谋人员均不在，剩下的只有“反共大学”教务长、副总指挥李则芬和参谋长杜显信坐镇孟萨。只有两个团的兵力可参加劲战，其他团队番号人数虽多，但未经过正规训练且分散于近20个点，易被各个消灭。

缅甸的第一个战略步骤是：先消灭驻守萨尔温江东西两岸的江口、孟板之敌，然后分兵两路，北攻孟布，东夺国民党残兵总部孟萨。

这时残军在这些地区的兵力均甚薄弱，孟板由邹浩修率两个连防守，他的另一个连驻江口以东的拉牛山。孟萨总部只有2个连和一个排的守兵，而孟布也空虚，93师师部及一个直属连，总共不至400人。

5月21日在萨尔温江的沙拉渡口，杜显信命令张云岳带领总部的两个连去江口增援。这时，警卫营邹浩修率两个连从孟板败退，渡江至东岸的江口，与张云岳两个连汇合。缅军一个团包围江口，一连发动3天猛攻，遭到残军的拼死顽抗，又调来重炮参战。5月22日缅军在空军的配合下攻克萨尔温江西岸的残军桥头堡猛畔据点，残军坚守沙拉渡口。23日，缅军集中炮火猛击沙拉渡口，这时缅军采用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采用的跳蛙战术，跳过江口，在江口分兵上下游各30里处渡过萨尔温江，向残军孟萨总部和猛布据点进攻。这就是有名的萨尔温江战役。

24日，残军被迫放弃沙拉渡口，固守拉牛山。

在拉牛山山口，残军与缅军相遇并展开了激烈的肉搏，双方伤亡惨重，国民党残军只剩下400余人，缅甸国防军于第二天开始猛攻。105大炮轰得拉牛山口土崩石碎，浓烟滚滚。第4天，缅甸空军参战，飞机同时轰炸孟萨、孟布和拉牛山。30日，残军放弃拉牛山。

缅军并没有巩固好胜利果实，残军在杜显信的带领下，炮轰萨尔温江江口重镇，并以“反共大学”学员为先锋，警卫营殿后攻占了江口，虽伤亡惨重，但缅军也痛失了江口。虽即拉牛山又回到残军的手中。

缅军原打算跳过江口分兵两路攻打孟萨和孟布，一举歼灭国民党残军。现在，江口已失，而残军在孟萨总部又只剩下一个空架子，缅军捕捉不到作战对象，于是转而集中兵力围攻孟布，以期消灭残军主力——李国辉部队。由于山势陡峭、地形复杂，缅军大部队四面包围孟布，但还不能合围，残军仍能从许多小道与外界联系。经过20多天的围困，仍没能达到消灭敌军的目的。

6月，残军主力由缅北基地回军增援，收复拉牛山、沙拉渡口，同时增兵孟萨、猛畔、猛果。缅军腹背受敌，于6月13日撤回萨尔温江以西。

缅军这次以萨尔温江区域为中心对国民党残军的围剿就这样基本结束了。

1953年，缅甸政府向残军进行军事行动的同时，向联合国控诉台湾国民党侵略缅甸领土，危害缅甸主权与安全，并向联合国提供了大量残军侵犯缅甸主权的照片、文件、实物。4月23日，联合国通过决议，要求国民党残军

撤回台湾或居住在指定的禁区内。尽管美国政府千方百计地设法把提案搁置，但在大量的物证面前，美国政府被迫利用它的影响于5月23日在曼谷召开美、泰、缅、台湾“四国军事委员会”会议，经1个月的谈判，决定在缅甸的国民党残军全部撤往台湾。

由于李弥总部拒绝撤台，会议只好拖延下来。但联合国作出要求国民党残军撤退的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支持下，在国际社会强大的压力下，国民党军队残部不得不同意派代表去曼谷参加谈判。由于李弥当时不在台湾，故由副总指挥李则芬充当谈判代表，另一副总指挥柳元麟为代总指挥。当要“撤回台湾”的消息传到孟萨的时候，残军内部的思想混乱，年轻人希望回台湾进学校，做劳工赚钱别谋出路，免得在缅甸受苦；老资格的军官们另有打算。李弥、参议员及总指挥部秘书长丁作韶不主张撤退，在台湾有后台的柳元麟认为应该服从台湾命令撤退。反共思想十分顽固的丁作韶到处宣传不能撤退。他的理由是，撤退到台湾，大家挤到一个小岛上，有什么作为呢？留在缅甸这个无限好的江山，大有作为。以国民党残军的兵力而论，如能和缅甸山地民族反政府武装相结合，足可以成立一个“缅甸民国”，然后进入联合国，不但个人有出路，将来说不定还能反攻大陆，重回云南哩！但是，同意丁作韶的意见者甚少。当时尚在台湾公干的李弥是主张不能撤的，因为他不肯把在缅甸即得地盘和人马输掉。但当他看到“金三角”的台柱李国辉愿撤退时，就主张以退为进；只撤老弱残兵，留下骨干以期东山再起。在这关键时间，国民党残军内部四分五裂，甚至公开冲突起来。

9月，缅甸政府再次把问题提交联合国讨论，台湾驻泰国的代表才同意撤退部分残军。

撤退工作从11月开始，残军由缅北开往泰国边境，再乘卡车前往泰国清莱，然后乘陈纳德“民航运输公司”的飞机赴台湾。由于残军撤退时不带武器，缅甸政府提出了抗议，美国驻泰大使威廉·唐纳德为此给美国驻台湾大使发电。11月9日美国驻台湾大使卡尔·蓝钦回电答复：蒋介石提出，如果美国继续施加压力，台湾将公布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在缅甸的国民党军的内幕。唐纳德认为，此时中共和苏联早已知道中央情报局在缅甸的活动，便坚持要残军撤退时带走武器。此后残军撤退时只好带走一些破残老式武器，撤退工作一直延迟到1954年5月。先后撤退的有：李弥总部、“反共抗俄大学”、第26军军部、93师、193师、第10纵队、第4纵队和第3军田中田部的全部；保2师的大部，第18纵队、21纵队和18支队的一小部，共5472人，家属1035人。撤回台湾的残军除少数身壮年青的编入台湾特种部队外，大部被安置在台湾花莲。李弥本人1961年才回到台湾。

李弥到台湾后，即居台北新店镇北新路，长子云川，次子获之，均学成居美国。李弥则返朴归真，成了虔诚的天主教徒，时与于斌枢机主教、关吉玉、蒋复聪相过从。1973年12月8日突以心脏病复发而逝世。死后之治丧委员会由何应钦、谷正纲、于斌、薛岳、李宗黄、张宝树等主持。

第四节 中缅联合打击残军

残军实力再次扩大

李弥总部撤台后，留在缅北的国民党残军还有1万余人，多数人是云南籍及当地的民族武装，不愿去台湾，但因没有统一的指挥部，台湾曾一度停止供应，加之缅军又出动1.6万兵力攻占残军驻地，残军大批逃亡。与此同时，云南境内党政军民向国民党残军发起了强大的政治攻势，一方面散发“回归证”，另一方面，边民纷纷出境呼夫唤子，至使外迁外逃的民族土司人武装纷纷回国。这样，少数民族武装基本瓦解。1952年至1955年被争取回国投诚的国民党残军官兵共3296人。至1954年6月，残军缩减到5800余人。

1954年，国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边境进行民主改革，台湾当局认为有机可乘，便派国民党残军副总指挥、原第8军副军长柳元麟，重返缅北，搜罗残部、恢复补给。柳元麟返缅北后，搜罗残军4500余人，组成第3、第5、第7军3个军，成立“东南亚自由人民反共联军”，盘踞在泰缅边境。11月1日改番号为“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隶属于台湾国防部情报局。1955年10月，曾德兴率部由老挝到达缅北，编入柳元麟部。另以吕维英为首的一股，亦于1954年10月1日窜回缅北，在三岛地区成立“滇南人民反共救国军第1军”，共1300余人，盘踞孟美、三岛、孟歇、孟坎一带。1956年初，台湾派国防部情报局游击行动处处长罗果到缅北，传达情报局“统一指挥、统一补给、整编部队、加强训练”的命令。2月，吕维英部编入柳元麟部。

1957年，国民党残军经过整顿，统一了指挥关系，将总部设在缅老边境、湄公河西岸的江拉，在孟百修筑机场，台湾恢复了对残部的交通联系和补给。10月，台湾国民党召开八全大会，强调对大陆的政治反攻，指令缅北残军对云南地区进行情报、心战、策反、组织暴乱。残军为此拟订了一个“安西计划”。8月，为配合台湾对大陆东南沿海制造紧张局势，柳元麟亲率残军1460余人分四路进抵云南边境。对柳元麟的武装窜扰，云南军区在边疆成立了7万余人的联防队，执行“以军队为骨干，以群众为基础，以政治斗争为主，建立一条人民防线”的方针，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残军的窜扰，粉碎了台湾“政治反攻”的阴谋。

1959年初，西藏上层公开叛乱，台湾当局认为形势对其有利，对残军更为重视。2月，蒋介石在台湾亲自召见柳元麟；3月开始恢复对残军空投装备、给养；4月派情报局副局长任剑鹏率督导组到缅北调解残军内部纠纷，点验人员，统一指挥。国民党残军大肆搜编民族武装，在缅北果敢、大孟宜、卡佅山等地招兵，利用云南边境大跃进中出现的政策不稳定的情况，煽动边民外迁外逃，胁骗当兵。到1959年底，柳元麟部已发展为5个军、1个军区、15个师、6个纵队、6个独立团、3个独立支队，共9400余人。1960年7月，台湾将特种作战部队的1个大队400余人由台湾空运缅北，加强残军的指挥、技术、通讯、医务、政工力量，并制定了对云南边境的窜扰计划。特种作战部队中将司令夏超、第6军中将军政治部主任徐汝辑、特种作战部队副司令胡开业亦受命到残军分别担任副总指挥兼教导总队长、政治部主任、孟百守备区司令职务，加强对残军的控制。

杨成武率指挥组到云南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这一敌情非常重视。1960年5月4日，毛泽东主席在昆明军区呈送的内参上作了重要批示。毛泽东指示昆明军区和云南省委：应立即加强有关地区的工作，派得力人员去各地调查情况，研究对策，千万不可马虎大意，轻易相信下面太平无事的书面报告；中央军委亦应派员去云南布置对策。

在一次晚饭后，毛泽东走出菊香书屋，叫秘书请来周恩来总理和总理的军事秘书，一起闲亭散步，就防止国民党残匪窜犯等问题交换了意见。5月5日，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出了关于边境斗争的部署，并派副参谋长杨成武将军率指挥组到云南，具体落实军委的指示。

缅方允许跨界剿匪

缅甸是中国的友好邻邦，两国山水相连，胞波情深，边民常用这样的语言来说明两国边疆友谊：中方的鸡到缅方下蛋，缅方的藤在中方结瓜。

中缅两国边界是清朝时期清政府和英国政府划定的。新中国成立后，中缅两国一直遵守着历史形成的国界线。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政策，使双方更加和睦友好。陈毅副总理访缅时，曾留下美好诗句：“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

1960年1月，缅甸联邦总理奈温将军访华。1月28日，中国周恩来总理，缅甸联邦总理奈温总理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之间的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

按协定，中缅成立了边界联合委员会。中方由驻缅大使姚仲明担任首席代表，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丁荣昌少将担任首席顾问。缅方由国防军副总参谋长昂季准将担任首席代表，缅北军区司令官山友准将担任首席顾问。

1960年6月，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在缅甸首都仰光召开了第一次联合会议。会议讨论了边界安全等问题。

为促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周恩来总理和4月份再次上任的吴努总理分别代表两国政府于1960年中国国庆之日，又签署了正式划定中缅两国边界线的条约。

可是，由于当时李弥，柳元麟残部在边境不断进行窜扰破坏活动，不仅使边境人民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危害，而且使中缅勘界受到严重影响。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于1960年11月4日在中国昆明市召开联合会议。会议根据中缅两国政府签订的《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专门商讨了如何保障边界勘测的安全警卫问题。这次会议协商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可以跨越国界，进入缅甸20公里范围内清剿国民党残匪，会上，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丁荣昌将军和缅北军区司令官山友准将联合签署了《捕杀蒋军残匪协议》和《联合作战命令》。缅方还派出苏敏昂少校作为山友准将的特派代表到西双版纳的中方指挥部，作中缅联合作战联络员。

1960年11月，驻扎在中缅边境的我陆军第13军39师和云南省军区的部分边防部队共5个团和一个营的兵力集结边境，并在云南勐海县成立了前线指挥部。

两国军方合力歼敌

缅甸政府于 1961 年 1 月出动 5000 主力部队集结在大其力、孟岭准备进剿柳元麟总部。此时，中缅两国政府签署了勘界协议，缅甸国防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勘界警卫部队的配合和支援下，给国民党残军一次沉重的打击，攻占了柳元麟总部所在地江拉。柳元麟率总部及主力 2500 余人渡过湄公河逃往老挝；第 3、第 5 军 3500 余人，逃往泰缅老边境；1300 余人窜卡佤山区。是役在江拉总部缴获美制弹药和军用物资有 5 吨之多，为此缅甸政府再次向联合国控告台湾国民党部队侵犯缅甸主权，同时还缴获的美制武器进行展出，邀请美、泰、印尼等国武官前往参观。2 月 16 日，缅甸空军又击落一架美制 4 引擎运输机，当时该机正向缅甸境内的残军隐藏地空投供应，这便使美国国务院的处境十分尴尬，不得不表示愿意协助国民党残军遣返台湾。遣返工作从 3 月 14 日开始，残军由美国飞机从老挝南塔空运到老挝的会晒，渡过湄公河即乘大卡车运往清莱，在清莱再乘飞机撤往台湾。到 4 月 12 日撤台告一段落，先后撤台人员共计 4521 人。柳元麟回台湾后，任“国防部”作战督察研究委员会委员。

留缅残军各寻出路

1961 年 5 月，柳元麟总部撤台后，“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番号随之撤销，台湾即停止了不愿撤台残军的一切供应。留在缅北的残军 5000 余人，则分别由段希文、李文焕、马俊国掌握，各自为政，各霸一方。不久，因生活补给没有着落，残军人员纷纷逃亡，各自寻找出路。原第 25 师师长曾德兴率部 500 余人，窜到老挝，投靠老挝右派军队；马俊国率残部投靠台湾情报局，改编为“滇西行动纵队”，专门从事武装特务活动；段希文率第 5 军 2000 余人窜至泰缅边境的孟放、回中坡地区，收编吕维英从老挝富米带回的残部和屈鸿斋部，成立“东南亚反共志愿军”；李文焕率第 3 军窜踞泰老边境景康山区和泰缅边境的景老山区。

台湾当局为了控制利用段希文、李文焕，于 1961 年令驻泰国清迈代表杨文湘传达台湾的“关怀爱护”之意，要段希文、李文焕服从台湾决策。李文焕以“化整为零，以求生存”拒绝把部队撤往台湾，并对其部属说：“总部叫别人去台，我管不着，13 师是不去的，镇康弟兄我要带着，弟兄们去台湾回不了家，见不了爹娘。”杨文湘向台湾报告：“李文焕不会将武力用于反共，主要留用在当地做大烟鸦片生意。”段希文在一次招待台北要员的宴会上说：“有人指责我违背上级命令，才陷入今天的困境，如果上级认为我还有用，我当鞠躬尽瘁，否则唯盼了清一切手续，候命行止。”从此，台湾停止了对第 3 军、第 5 军的补给。

1963 年，台湾当局为了配合中印边境武装冲突和配合东南沿海的军事窜扰，又先后派情报局副局长沈之岳、特情室主任徐仁隽、监察委员段克昌等赴泰北，到段希文、李文焕两部“视察”，以恢复补给为诱饵，策动两部对云南边境进行心战策反，窜扰破坏。段、李二人也有求于台湾补给，所以从 1963 年至 1966 年 9 月 30 日多次由第 3 军、第 5 军派出小股武装向云南潞西、孟连、沧沅、镇康等县进行武装窜扰。残军虽被解放军边防部队打死 27 人，俘虏 11 人，但台湾当局仍要段、李两部做出更大的“成绩”来，否则不予补

给。段希文、李文焕却因感到，窜扰云南边境费时长，损失大，因而停止了窜扰行动。1966年10月和1967年3月，蒋介石、蒋经国两次亲自召段希文、李文焕到台湾，商谈3、5军统一合作事宜，原则上同意恢复对国民党残军的补给，但未作具体承诺。1968年3月，台湾又派罗汉青到曼谷，发给慰问金2万美元，继续商讨：“节制”问题；年底，台湾又单独召见段希文；1969年5月，蒋经国亲赴泰国；7月，又派参谋次长易瑾、特种作战部队司令夏超到段、李两部商谈补给整编问题，条件是要兵不要官，老弱一律不要，军官重新调整，整编后由易瑾、夏超、项成豪任正副指挥官、参谋长。段希文、李文焕召开骨干会议研究，认为台湾条件苛刻，旨在瓦解其部，从而拒绝了台湾的条件，不接受改编。1970年1月，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周中峰、情报局局长叶翔之再赴泰北，进一步压段希文、李文焕接受改编。段、李两部从两次撤台的教训和本身利益出发，怕改编后丢掉老本，但又想得到台湾的补给，很是矛盾，因此长时期讨价还价，却始终不同意改编。

残军余部投靠泰国

段希文、李文焕多年乞求台湾补给无望，决定投靠泰国政府。从1970年2月至10月，段、李与泰国军方经过6次会谈，于10月17日正式达成协议。泰国军方同意残军3、5军以“移民”方式进驻泰北境内，青壮年编入泰国地方自卫队，待遇与泰边防警察相同，担任泰、缅、老边境一线的驻防和防共任务，老弱病残的官兵和家属迁入泰北清莱府帕蒙山和雷峦山居住、生产，每人分地1莱（2.4亩），由泰国军方供给1年的生活费，从1970年10月份起进行补给。台湾获悉后，通过原总指挥柳元麟专函致段希文、李文焕，劝阻3、5军不要接受泰国补给，有什么困难，台湾都同意解决。1972年10月叶翔之再次赴泰向段、李表示，愿意恢复补给。此时台湾政府已被逐出联合国，尼克松、田中相继访问中国，段希文、李文焕认为此时接受台湾补给“害多利少”，当即拒绝。李文焕通知所属部队：“余意：没有补给10余年，我们都撑过来了。现在国府日趋困难，日本驻台大使馆已关闭，中共与日本政府达成协议，互派大使，泰国承认中共亦不会长，我们如再接受国府补给，短期内官兵生活固可稍加改善，但泰国与中共的军事压力必定很大，到时非逼着撤台不可……因此要求各部不准台湾特务人员进入驻地。”

残军进入泰北后，曼谷的大学生发表声明称：“泰国国土不可侵犯”，“不允许其他国家的军队在泰国国土上”，要求残军“撤出泰国国境”或“解除武器”。残军知道缴出装备就意味着死亡，但泰国军方还是要收缴，残军只好一面交出旧式武器，一面再向商人购买新式武器，既应付了舆论，又更换了装备，以免被吃掉。

1970年12月8日，“联合指挥部”在昌孔成立，由泰军草信少将、吞通上校为正、副指挥官，由残军第5军参谋长陈茂修为联络官；由3军、5军抽调人员组成“剿匪”部队，分别进驻泰老边境的帕蒙山和雷峦山。随后3军在帕蒙山成立帕蒙总队，兵力增加到850人，5军在雷峦山的密耳成立“莱弄指挥部”，兵力增加到800人。从1971年7月到1973年11月先后“剿匪”作战8次。如叭当战斗，在段希文指挥下出动700余人，由段国相率敢死队一举攻克叭当，将游击队赶出湄公河。该役残军战死70余人，负伤300余人，占“剿匪”部队的一半。泰国军方授予段希文1枚勋章，并慰问作战部队，

对伤残官兵发给公民证，对参战官兵发给居住证，并批准 3、5 军编为“泰北山区民众自卫队”，段希文为指挥官，李文焕为副指挥官，编制为 1500 人，属泰国陆军“保安司令部”指挥，由泰国军方供给粮食和弹药，不发武器，打仗时由军方临时供给，或由泰军配属炮兵。“联合指挥部”在清莱设立“分指挥部”，在唐窝、美斯乐设有“联络处”，残军内部仍称“3 军”、“5 军”，国际舆论仍称“93 师”。

1980 年 6 月 18 日，段希文死于泰国曼谷，由副军长兼参谋长雷雨田升任军长和“泰北山区民众自卫队”指挥官。

1981 年春，泰国政府在泰国中部修建一条以彭世洛为中心、由西向东的横贯公路。公路修到考牙山麓时，遭到当地民族游击队的阻击，修筑公路被迫停顿，于是泰国军方命令残军进攻考牙山游击队。考牙山位于泰国中部密索至汪沙公路北侧，海拔 1290 米，残军出动 500 人，由陈茂修指挥，青年指挥官杨维纲为前敌指挥，会同泰军“黑豹军”，于同年 3 月击溃游击队，从而得到泰国军方赞赏。战斗结束后，泰国空军派 4 架专机将残军送往清迈，并在清迈当地举行了“欢迎会”。泰国报纸大幅报道残军“功迹”，泰国《民众日报》誉称残军为“山老虎”。战利品被送到曼谷进行展览，死亡者被给予国葬，列名纪念塔，参战部队全部批准加入泰国国籍，发给身份证。泰国军方进一步控制了对残军的指挥权，在残军参加“剿匪”、护路期间，泰国军方每人每月发给 370 株，每月补给泰币约 60 万株，至 1981 年 12 月“护路任务”结束。

金三角的异乡人

1961 年国民党残军第二批撤台后，第 3 军、第 5 军官兵家属 1500 余人逃入泰北，被泰国移民局以“难民”身份安置在泰北 7 个村寨。1970 年 10 月，国民党残军与泰国军方达成协议，同意残军老弱官兵和家属迁入泰北山区居住和生产，每人分给土地，由泰国移民局安置了 6000 余人在“难民村”内。1975 年，中泰两国建交，泰方为防止对中国的刺激，将“难民村”改名为“自立村”，意即村民要自立更生，依靠正当行业，发展经济，独立防卫。1980 年，“自立村”由 7 个发展为 13 个：联华新村、和平新村，满堂新村、老象塘新村、万养新村、蛮丙贺肥新村、光武新村、帕弄光华新村、黄果树新村、美斯乐兴华新村、热水塘新村、回中坡新村、盘龙新村。经过 20 多年的变迁，至 80 年代后期，他们及其后代人数已逾 4 万人，但居住在村寨里的却不足 3 万人，因为有人在附近城镇出生，而已取得泰国国籍，可以自由移居泰国其他地方。

据 1988 年资料，清莱和平新村有 400 余户，粮食已能自给，居民不再种罂粟，而改种咖啡、茶叶、水果，但蔬菜还得向外族购买，村内有商店 10 多间，每逢街天（集市）更是热闹。各自立村均设有村长，多由国民党残军留下的老年军官担任；每个自立村有 1 个自卫队，人数从几十人至 100 人不等。13 个自立村计有自卫队 1000 余人，多系本村残军的第二代、第三代中青年。每村有 1 个由本村村民组成的“管理委员会”，管理本村一切事务，并秘密向过往商队或贩毒马帮征税。

泰国军方设有“三二七部队”，专门负责管制 13 个自立村，白天由陆军数人把守村口，检查出入证件，晚上自立村自卫队负责治安。1986 年 4 月，

泰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某负责人曾说：“自卫队先缴枪，经过甄别考查，是否忠于泰国政府后，再吸收他们加入泰国国籍，并重新发给武器，成立新的自卫队，但只能穿便衣。被吸收泰国国籍的只有 2000 余人，其他村民只能领取外籍人临时居留证，只能到离村 100 公里的地区活动，不准许出国，并严加管制，不准搞两个中国。”

台湾于 1970 年全部停止对残军的补给后，官方关系已经断绝，只有台湾“华侨联合会”、“难民救济总署”每年派人到泰北送给各种树苗、种籽并派遣农业专家帮助残军和其眷属发展农副业生产。为解决自立村村民子女读书的课本，又委托香港“集成书店”铅印课本，通过泰国“中华商会”供应自立村子弟学生，并派教员到这些子弟学校当教员，准许每年以奖学金形式接收自立村选送 40 名学生到台湾上学。每年“双十节”，自立村可派代表到台湾观光、观礼。“中华航空公司”曼谷办事处常派人以台湾“地下大使”人员身分到残军驻地视察，台湾当局有时还派记者到泰北采访。

残军尽管生活极不安定，但中文学校仍以各种形式继续开办，80 年代末自立村共有中、小学校 17 所。泰国政府 1984 年 6 月作出决定，自立村的所有学校应受泰国教育法令的约束，应以泰文为主课，中文为选修课，每周授中文不得超过 5 小时。但学生学中文如饥似渴，师生就利用早晨和晚上非正课时间，系统补习中文，这样既不违背泰国法令，又可以学好中文。有个训导主任风趣地说：“邓小平主张一国两制，我们搞的是一学两制。”“只是为了把中华文化传给后代，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骨血啊！”

1950 年逃往境外的残军官兵，现在多是 60 岁开外的老人了，他们多数和缅甸、泰国的华人和当地少数民族结婚，与当地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都能讲云南话，大多数人不懂缅老语，形成了一个与住国隔绝的封闭社会，保留着中国人的传统风尚，并有不少人定居于泰国其他城镇，从一些夜总会、酒吧间的歌女、招待员的身上可以看到他们的形影。泰国一些华文报社的排字工也占相当的比例，因为他们的中文水平较高，这些年轻人出生于泰国医院，根据泰国国籍法的法令，他们自然获得了泰国国籍，他们工作努力、学习刻苦，有中华民族意识，但不大关心形势，对前途彷徨苦闷。在泰国北部的一些城镇可以看到相貌酷似云南人，讲着一口云南话的青年男女骑着摩托车在街上驰骋——这就是残军后裔的形象。

